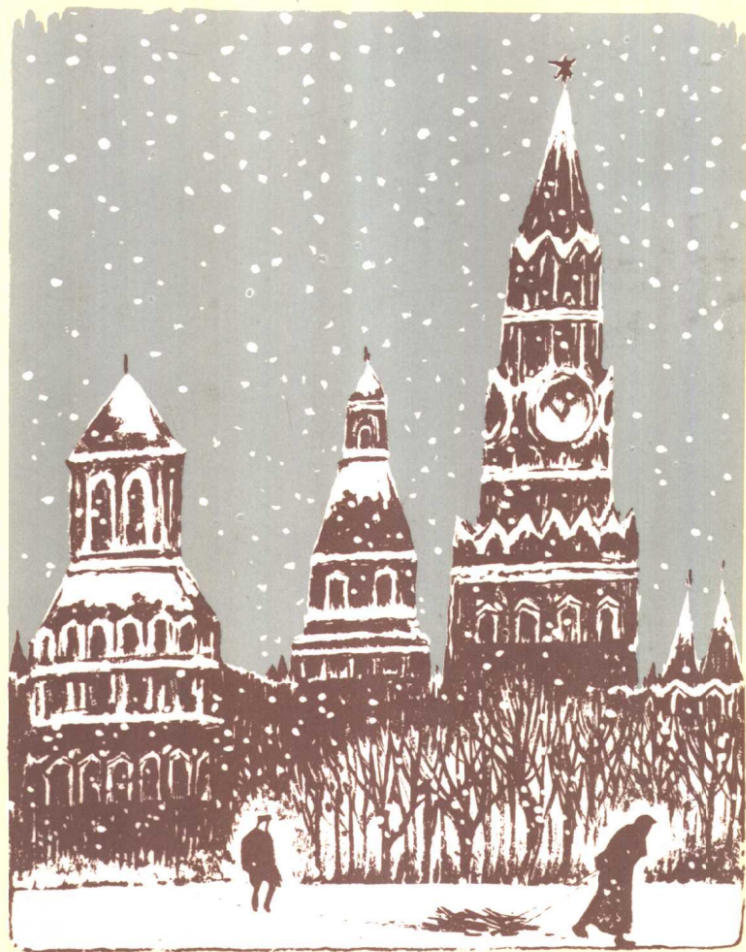


莫斯科的寒夜

夏濟安譯

夏志清校序



萬卷文庫(76)

莫斯科的寒夜

夏濟安譯

莫斯科的寒夜

萬卷文庫⑦⑥

譯者：夏 濟 安
封面設計：何 懷 碩
出版者：姚 宜 瑛
發行所：大地出版社

臺北市瑞安街23巷12號

郵撥帳號：19252

電話：7074464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電話：3812264

初版：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

定價：H\$22.00 精裝 140 元

有版權
勿翻印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20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掉換 ·

「莫斯科的寒夜」序

夏志清

近年來，海內外愛寫文章的教授們莫不甘爲各大日報副刊寫稿；稿酬豐、讀者多，一篇文章刊出多少發生些作用，何樂而不爲？二三十年前的臺灣，情形可並非如此：除了職業作家、業餘作家外，經常給副刊投稿的反都是中大學生。他們大半都很清苦，藉賣稿以維持生活，而且怕同學笑，往往都用筆名。先兄濟安臺大外文系學生間，我就知道有幾位憑自己筆耕所入而完成他們的學業的。那時候，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也很清苦，但給副刊寫稿的風氣尙未開（想來稿費也不高），他們不情願拋頭露面，只好另找財源。外文系的教授們，因爲他們英文程度好，總有公私機關找他們擔任翻譯工作：把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者把英文文件、書籍譯成中文。先兄濟安民國三十九來臺任教臺大外文系後，就憑這些課外工作以增補收入（據我所知，他的同事友好侯健、吳魯芹也莫不如此）。直至四十五年主編「文學雜誌」，正式用眞名發表中文文章前，他翻譯了三部小說：高夫力·白倫敦（*Godfrey Blunden*）的「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史勃伯（*Manès Sperber*）的「燬」（*The Burned Bramble*，原題 *Der Verbrannte Dornbusch*）回「淵」（*The Abyss* 原題 *Tiefer als der Abgrund*）一書。白倫敦、

史勃伯二人都走二次大戰結束後享譽的反共小說家。時至今日，原籍奧國，一九〇五出生的史勃伯，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似較穩固。他寫的原是總題「汪洋一淚珠」(Wie eine Träne im Ozean, 一九六一德文本初版)的三部曲，濟安僅譯了「艸」、「淵」(德文版，一九四九、一九五一)這兩部，而末把「灣」(Die Verlorene Bucht, 一九五五；英譯本標題為The Lost Bay)譯出，同謂憾事。

五十年代初期美國對待蘇聯態度相當強硬，香港美國新聞處有意把白倫敦、史勃伯的小說中譯，不僅因為當時二氏文名頗籍，也也讓中國人知道蘇聯奴役人民，吞佔東歐的真相。

當時為新聞處代找二人著作譯者的當是宋淇兄——他自己也以林以亮的筆名主編了「美國詩選」、「美國文學批評選」這兩部書，並託濟安主譯了「美國散文選」上册——他早知道濟安富有翻譯經驗，並對小說、散文這類文體最感興趣。只可惜，這三部小說譯本主要在香港發售，並未推銷到臺灣。加上濟安用了「齊文瑜」這個筆名，除了他的少數好友外，一般讀者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原著者——白倫敦、史勃伯——也非海明威、福克納這樣在國人問大家都熟知的作家，譯本即在香港銷路也不廣，市面早已買不到了。我很高興大地出版社姚宜英女士有意重印濟安的譯著，以廣流傳，現在先推出這部「莫斯科的寒夜。」

該書是白倫敦初登文壇第一部小說，一九四六年由美國立本卡公司(J. B. Lippincott Co.)發行後，博得各報章好評，「時代」週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那一期譽之為「克斯脫勒『正午的黑夜』之後最好一部以俄國為背景的小說」，我認為沒有誇張其辭。「正午的黑夜」(Darkness at Noon)英文版

初刊於一九四〇年，之後，蘇聯轉為英美抗德的聯盟國，美國大量攝製反納粹的影片，肉麻捧蘇聯英雄抗戰的也有兩三部——如高爾溫監製、羅勃泰勒主演的「北國之星」(The North Star)——小說界情形想也是如此，沒有人寫揭露蘇聯內幕的小說。一九四〇——四六年之間，並無更出色的以蘇聯為背景的一篇是信得過的。但時至今日，克斯脫勒已公認是位博學多智的散文家、小說家，他的重要性不僅是他早年的反共小說而已。而白倫敦差不多已是位被遺忘的作家，「莫斯科的寒夜」虧得已有了中譯本，能在今天重版；假如白倫敦能知道他有一本書今天在中國人讀者間銷行，他應感到十二分高興的。

「文章不朽之盛事」，但一本好書能在市面上流行幾年，在新書層出不窮的自由世界，實在很難說。主要還得靠作者不斷努力，不斷有新作問世，讓批評家、讀者羣注意到他歷年來創作路線、思想路線之延展。我們對一位作家的整個創作生命感到興趣了，他個別作品的好壞反而是次要的考慮。這樣的作家，他的著作生前就受到重視，往往死後就有不少傳記、研究問世，也有人化功夫把他的日記、書信，以及未發表的作品加以發表，這樣他的文名可以延續下去。雖然數十年之後，他的讀者不一定太多，他在文學史上至少已保留了一個位置。目今，吳爾芙人 (Virginia Woolf) 的日記、書信發表的數量早已超過了她生前出版的作品，但二三十年之後，會有多少人真有耐心去看那些日記、書信，就很難說。誰怕浮吉尼吳爾芙？她死後佈露的手稿太多了，我對她就望之卻步。德國首席大文豪歌德一生作品知有多少？對英語系統的讀者而言，能讀過他「少年維特」、「浮士德」上卷就很對得起他了。我一直有心想讀他的長篇小說，但三十年來那裏有閒情逸致去讀它？歌德的文名當然世所公認，但除了德語

系統的國家外，他的讀者並不多。

克斯脫勃早年雖也是新聞記者出身，但同時也是個道地的歐洲知識份子，語言懂得多，求知慾也非常強，而且一九四〇年移居英國後，就能用英文寫書，這一點實在了不起。因此，他寫了「正午的黑夜」等三本小說後，寫小說的靈感沒有了，照樣可以寫文章，寫書（而且都是研討相當冷門的題目），每隔幾年，總有一本「巨」著問世，博取報章的注意。到今天，他是七十四歲了，隔幾年他去世後，有多少人讀他、研究他的思想、生平很難說。但他至少可說是歐洲二十世紀知識份子間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名字不會給人忘掉。

白倫敦一九〇六年出生於澳洲墨爾本，近年來一直住在巴黎，也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正如濟安「譯者序」裏所說的，「早歲從事新聞事業，第二次大戰時代表澳洲和英、美各家報紙在歐非各戰場採訪新聞。一九四一年稍迄一九四三年夏駐莫斯科，窮一年半的光陰，親自考查，搜集材料。」他的「莫斯科的寒夜」以及第二部小說「暗殺者猖狂的時節」(The Time of the Assassins 一九五二年力本卡公司出版)就根據他在蘇聯那段時間見聞所及而加以編寫的。「莫斯科的寒夜」問世後，「時代」、「禮拜六文藝評論」、「大西洋」月刊等刊物都大力贊揚。一九五二年即有「輕便叢書」Bantam Books 紙面本大量發行(二毛五分一冊)。一九五三年，紐約雙日公司(Doubleday & Co.)推出一種配合高級讀書人趣味的紙面本「錨泊叢書」Anchor Books，發動了一個美國出版界的大革命；從此各大出版公司爭相仿效，把自己出版的好書都放進紙面叢書裏去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美國紙面叢刊，封面惡

俗，紙張粗劣，一般人看完即丟，也難得翻印好書。只有「輕便叢書」及另外一家公司還挑選些當代名著重印，封面仍是紅紅綠綠的。「莫斯科的寒夜」能給收入「輕便叢書」，表示當年算得上是部暢銷書。

我在一篇近文裏說過，高中畢業，我就不看中譯小說了。因之「莫斯科的寒夜」出版後，濟安寄我一冊，我也只讀了「譯者序」。他去世後，在柏克來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一本「輕便叢書」紙而本“*A Room on the Route*”，回紐約不久，就把它讀了，很為感動，覺得先兄把它譯出，時間沒有白費。最近翻閱了一下白倫敦其他兩部小說。「暗殺者猖狂的時節」講的是二次大戰期間，德軍佔據卡各夫 Kharkov 城後，烏克蘭人民歡迎德軍，協助德軍殺魚肉人民的共產黨，同時城裏面共產黨地下組織照舊活躍，德軍暫時退出卡城後，大報其仇，屠殺當地烏克蘭居民。「時代」週刊（一九五二、五月十九日）認為小說讀來極為 gripping（抓住人心），但比不上「莫斯科的寒夜」，敘述較為「鬆懈」（diffuse）但「寒夜」本身我就認為有些處理「鬆懈」的毛病。我翻閱白倫敦的第三本小說是「西洋鏡會議」（*The Looking-Glass Conference*，紐約，Vanguard Press，一九五六），用的是誇大的諷刺手法，人物失真，我認為寫得極壞。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之間，美、蘇、法、英、中共諸國在日內瓦舉行了一個會議，調解韓戰停戰之後以及印度支那地區的各問題，南韓、北韓、越南等國都有代表團參加。中共代表團領隊是周恩來。白倫敦想是駐派日內瓦的新聞記者，自己在場，看到了各代表團所表演的醜態，把它寫成小說，一貫其反共的立場。但白倫敦對蘇聯雖很有研究，對東方人一無所知，處理得滑稽中帶有胡鬧。周恩來變成了「辛先生」（Mr. Sing），我看了一點也不像他。他的下屬也寫得誇張失實。此

後的小說哥大圖書館未備直，想為得更糟了。「莫斯科的寒夜」大獲好評後，白倫敦即被「時代」週刊聘用為國際新聞採訪者——到一九五六年已由「約稿編輯」昇任為「副編輯」Associate editor，他長年住在紐約，生活極寫意，看樣子早年寫小說那股勁不免逐漸消失了。想來，他在時代公司告老退休後，即搬居巴黎。一九七六年他同他太太瑪麗亞 Maria 合寫了一本「印象主義畫家與印象主義」(Impressionists and Impressionism)，由國際有名的 Skira 公司出版，想是本圖文並茂的 coffee-table book (放在客廳供人鑑賞的巨型書)。「莫斯科的寒夜」是獻給瑪麗亞 (For Maria) 的，不知寫書時期二人是否已結婚。瑪麗亞很可能是蘇聯女子，「寒夜」裏的「小妖精」維姐莉亞。

「莫斯科的寒夜」、「暗殺者猖狂的時節」都是史大林尚在人世時期發表的作品，那時蘇聯作家只能發表歌頌祖國，粉飾史大林暴政的作品，白倫敦憑着自己新聞記者的良心，揭露史氏暴政更難能可貴。克魯曉夫當政後，蘇聯文藝工作者處境稍為改善些，在蘇聯國境外，有些「抗議作家」dissent writers 的作品也能翻譯出版。一九五八年「齊伐哥醫生」英譯本出版是轟動世界的大事，巴斯德納克在「莫斯科的寒夜」裏還有人講起，他在四十年代是位生死不明，已被政府監視的反動作家。巴斯德納克去世後，一九六二年索忍尼辛即在蘇聯刊物上發表了「伊凡生命之一日」(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翌年即有各國譯本，極受重視。之後，一本本巨著在國外出版，索忍尼辛也同巴斯德納克一樣，榮獲諾貝爾獎金。索氏身歷暴政，其對蘇聯之瞭解，當然遠比一個新聞記者憑一兩年的觀察所得到的，更深刻，更徹底。「莫斯科的寒夜」到今天在英美各國早已絕版了，主要原因在此。

所以「莫斯科的寒夜」能在我國重印，不僅是白倫敦的福氣，也是我國讀者的福氣。「正午的黑夜」據彭歌先生「三三草」專欄上的報導，也剛出了陳麟先生的中譯本，書名是「黑色的烈日」，千乘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四十年代的反共名著，今天我們能看到譯本，對我們的反共復國大業也不無小助。我們不僅要知道三十年來中共禍國的真相，我們也該知道蘇聯的內幕：凡是肯定人性和自由，揭露共產黨奴役人民、摧殘知識份子真相的書籍，我們不嫌其多，何況「莫斯科的寒夜」，確實是本好書。

當然，時至今日，譯者夏濟安在我國文壇的地位要比白倫敦在美國文壇的地位高得多，這也是本書重版的主要考慮。五四以來，我國好多文豪都翻譯過看來似乎不甚重要的西洋作品，而這些作品在其本國早被遺忘，在中國因為譯者的聲名大，反而一直流傳着。「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居民無書可讀，「魯迅全集」還是公開出售的，我想不知多少青年讀者真把魯迅所譯的「桃色的雲」、「小約翰」、「錶」這類作品讀了。不管譯筆如何生硬，總比讀「毛澤東選集」有趣些。美國小說家勞荅斯 Marjorie Rawlings (1896-1953)，寫過一本暢銷書「一歲的小鹿」(The Yearling)，該書一九四六年搬上銀幕後(葛利哥利畢克主演)，我想就很少有人去讀了。但此書既有張愛玲的譯本，張的文學成就遠高於勞荅斯，我想將來研究張愛玲的學者，也會去品賞她那部譯作的。美國傳記小說家史東 Irving Stone 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 (一九三四)想來是本用心考證，讀來趣味盎然的好書，可惜我未讀過，只看了「梵谷傳」的電影。但史東用同一方法寫了好多種傳記和傳記小說，算不上是值得重視的作家，他在美國的地位遠不能和余光中在我國的地位相比的。但余光中不僅把這部小說譯出，而且前兩年還化

了一年的功夫把自己的譯本加以修正，由大地出版社出版，這種努力翻譯家間實在是少見的。主要原因，余光中自知是今日我國文壇的重鎮，連自己的譯作也給它一個傳世的機會，而史東自己僅是位專寫傳記的作家，雖然有兩本書暢銷一時（另一本是「米蓋朗其羅傳」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而拍成電影，他的願望也僅止於此，自己是絕無意儕入大作家之列的。

余光中近文「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號）舉例暢論目今暢行「惡性西化」的白話文，一半是由於多讀「劣譯」和「譯文體中文」的影響。光中兄同時認為白話文西化是免不了的，到今天我們不能只寫白話古典的文體。要寫「化西為中」的現代白話文，最好多讀「上乘的翻譯」，因為「上乘的譯文」遠勝過「西而不化」的無數創作。上乘的翻譯家問他舉例引了三位——夏濟安、喬志高、湯新楣。（當然光中自己也是位「西而化之」的名翻譯家。）自宋淇開始，不少人討論先兄的譯筆，總選上一段霍桑的「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霍桑文句特別長，用字特別典雅，濟安把它化成語調鏗鏘的中文，光中認為「成語較多，語氣較文，句法輕鬆動人」，是「化」多「西」少的上乘翻譯。但白倫敦寫的是二十世紀的英文，濟安不僅「照顧中文」，也儘可能「克己禮人，保留原作句法。」全書筆調最動人的幾章寫的是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回憶，蘇聯內戰期間先兄翻譯這幾章也特別賣力，真讓「過去的經歷，挾着戲劇性的力量，一幕幕的湧現在書中人物的心頭。」光中兄如有興趣把這幾章的原文同譯文對照讀，即知我言不虛。

今年暑假我化了兩個星期，把「莫斯科的寒夜」原文、譯文對照讀了一遍，有三四處譯的比較疏忽

的地方（任何翻譯家都有偶而打瞌睡的片刻），我都把它改正了。更發現第十四章開頭有一小節未譯（因為米德迦此人的談吐不雅），最後一小章（第四十章）也給刪掉了。我同意濟安的看法，小說到第三十九章結束，比較更有力量，最後一章給人畫蛇添足之感，主要白倫敦借用米德迦這個老粗的脚色，說明俄國人民是不怕強敵的，他們雖然痛恨史大林，痛恨共產黨，他們還得要在祖國的土地上活下去。我自己不善翻譯，就請劉紹銘把這兩節原文譯出。紹銘弟是濟安的高足，自己也是翻譯名家，當然樂意把中譯本補全。為讀者方便起見，我在譯文前面列了一張中西人名對照表，俄國人的姓名，僅憑中文音譯，是不容易記住的。

濟安的「譯者序」不僅說明了故事的背景，介紹了主要人物，也是「莫斯科的寒夜」最公允的一篇批評。現在我把該序全文抄錄在下面，以便提高讀者閱讀這部小說的興趣：

譯者序

一九四二年一個冬天的晚上，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裏正在慶祝十月革命，開着盛大的宴會。斯達林格勒的危險時期已經過去，紅軍正準備反守為攻，英美盟軍剛剛在北非登陸，蘇聯對德戰爭非但有了轉機，而且勝利似乎已經在望，那一天的國慶紀念日，是值得大大的慶祝一番的。

同時在莫斯科的一條大路邊上的一間小房間裏，窗半開着，在這寒冷的冬夜竟然沒有生火，一個青年人手裏提着自動步槍，眼睛裏冒着火，很緊張的等待着。他要等一輛汽車在樓下走過，他的自動步槍就要卜卜的往下打去。他所等待的是史大林的汽車。

這一條大路正是克里姆林宮到政府官員鄉間別墅的必由之路，警備是十分森嚴的，莫斯科人普通不呼其名，就叫它做「官道」(The Route)。但是在「官道」兩傍陋室裏居住的人民，雖然身處不斷的嚴密的監視之下，並不是個個擁護他們的政府的。不，他們可能簡直滿懷怨望，把史大林恨如切骨。不論他們表面上是如何的平靜安順，他們的怨恨一有機會還要發洩：他們甚至於可能採取行動，那天晚上手提着自動步槍在寒冷的陋室裏鴿候的那個青年，就是一個例子。

那個青年對於史大林的仇恨，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名字叫卡爾，本來是用來紀念共產主義的祖宗卡爾·馬克思的，——是一個革命家的名字。可是他太天真，他愛批評，他的名字又是卡爾，卡爾不是一個德國人的名字嗎？德蘇既然開戰了，名字像德國人的俄國人難免有通敵嫌疑，於是卡爾被捕了。

卡爾的一家都是對得起共產黨的，只是共產黨對不起他們。他的父親伊凡，母親蘭吉，都是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共產黨，但是革命的「功勳」敵不過新統治者的猜忌，伊凡那一批所謂老「布爾什維克黨」正是一九三七年大清黨的對象。伊凡入獄了，由於他的堅不承認虛構的罪名，終算沒有被槍決，可是殘忍的，非人的酷刑已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的傷病之身最後還是在對德戰爭裏奉獻了給他的「祖國」。

蘭吉是個革命的女性，偉大的母親。讀本書開頭幾章「蘭吉的獨白」，讀者不但聽見一個苦惱掙扎的女性靈魂在呼號，也看到了二十世紀的革命精神如何的醞釀，如何的激蕩，如何的迸發，潰裂，終至消沉，幻滅。假如她的血液裏不斷的跳躍着對於她丈夫的愛，對於她兒子的愛，她的恨也是沒有終極的，沒有休止的。她所受的委屈太多了：她曾經幫助促使一個王朝的傾覆，她也眼看她的親人一個個被新的統治者收拾去了。特務的橫行，革命理想的被出賣，無所不在的恐怖的威脅，都影響不了她的革命熱情。她也許是老了，可是她一開口，還是那麼虎虎有生氣，不愧是一個前輩的游擊戰士。好容易看見心愛的兒子從前線溜回來了，她卻忍心看他孤注一擲的作博浪一擊。可是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前面，她還是失敗了。這個革命女英雄最後成了一批流犯中的一個傴僂的身影而已。

卡爾這個不凡的青年，使我們想起了阿支巴綏夫的沙寧，屠格涅夫的巴利洛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拉斯格爾尼可夫，那些熱情的，銳敏的，「死心眼兒」的，虛無主義的俄國青年，他們強烈的求知慾迫使他們追究每件事物的根源，他們純厚的天性使得他們熱烈的愛，也熱烈的恨，他們對於生命的抗議使得他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不惜爲理想（即使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理想）而死！卡爾就是這樣一個青年。他的思想顯然沒有成熟，可是他的動機是純潔的。他要替人類做一件好事，他要留一篇大道理給天後世，他只有拿他自己的性命和魔王來拼。十九世紀末葉和廿世紀初葉俄國就多這一類的青年，對於沙皇的被推翻，他們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這一類的青年俄國應該還有，一切黨化教育歪曲宣傳是泯滅不了人的良知良能的。可以使自由世界告慰的是這一類青年是反對史大林的。這個暴君的統治早晚要受到這種熱情的，敏感的，天真的青年的搗亂和破壞，而終於被推翻。

共產黨是要求抹煞人類的個性的，他們計劃把人化作一種只知聽命做工，不會發問題，不會主動思考的動物。共產黨統治俄國已經有這許多年了，讓我們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成就吧！本書最大成功的地方就是活生生地描繪了很多俄國人：有血，有肉，有個性，他們受着政治的影響，吃着政治的苦頭，可是他們卻沒有被政治所「統一」，沒有變成「僅僅的」政治的動物。他們雖然個性判然不同，但是就他們的深厚樸實看來，他們都是俄國人，就是像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柴霍夫所描寫的俄國人。也像那些大師所描寫的人物一樣，他們的心裏希望和失望交疊着起伏；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期待着一點點的安慰；時時刻刻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威脅底下苟延殘

生，雖然他們是多麼的愛生命呀！

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那個寬大肩膀，身材粗矮的老特務頭子，拉脫維亞人格萊哥：雖然他自己說曾經救過不少人，但是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他手下喪命的人一定更多；在本書開幕的時候，他已經是坐以待斃，等人來收拾他了。他是個相信定命論的（俄國民族性裏恐怕就有相信定命論的傾向，所以馬克思的那套歷史定命論容易在俄國傳佈），定命論者當青春的朝氣已經喪失的時候，便會變得悲觀而接受現實，聽任命運的宰割。格萊哥非但隨時準備讓史大林來取他的命，而且犧牲了自己救了史大林的一條命。

此外還有那些使人不能忘懷的典型的俄國人：生命力橫溢的，粗俗得可愛的米德迦，優雅的，虔敬的，充滿了同情心的麗莎維德；沉默的，辛勤的，粗壯的，可是終究忍無可忍的安娜。還有在紅軍裏居高位的雅各索夫斯基元帥，整天在憂懼中生活而終於出賣了朋友的美國女人瑪莉·安德森，幹特務的「小妖精」維姐莉亞……這些都是在一個極權國家裏生活的個人，在「國家」的千鈞重壓之下還保持各人個性的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反應，各人有自己的適應環境的方法，即使最後對那可惡的環境不再能適應了，失敗的方式也是各人不同的。極權國家的力量是無比的龐大的，同時個人的尊嚴也是永古不能毀滅的——這本書另一個最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強烈地描繪了這一個對立：集權國家的力量對着個人靈魂的獨立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是算不完的賬，但是假如集權國家的力量不是如此殘忍可怕，怎麼能顯出人性的如此的偉大和可愛呢？看了這本小說，我相信讀者應該對於人類的前途感覺到有帮助的。

本書裏還有幾個享受外交特權，因此少受共產暴政的威脅的外國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無疑是詹姆士·福開森。他是某一個英語國家（不是英國或美國，可能是英聯邦中的一個子國）駐莫斯科公使館裏的一個職員，他在俄國的時期不長，經驗不夠，為人直率而不够機警，因此招來了不少麻煩。他恨希特勒，他也恨史大林。他對於俄人是同情的，同情到他想插足干涉俄國人的事情的程度。本書不是一本傳奇小說，福開森這個外國人也沒有在俄國造成了什麼神出鬼沒的奇蹟。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他的天真，他的正義感，他的對於暴政的痛恨，使得他成爲一個可愛的人物。他和維姐莉亞的一段露水姻緣，改造了那個俄國小女特務的人格，使得那位在唯物主義教育下長大的少女，也嚐到了一點愛情滋味。他在俄國幾個月的耽擱，沒有替他的俄國朋友幫成什麼忙，也許無意中反而給他們添了些麻煩；只是他和維姐莉亞的關係，起初也許只是基於肉慾的引誘，後來倒真發展成爲愛情上的結合了。可是政治力量驚破了好夢，他們的關係也至此爲止。當福開森在開羅一聲叫喚的時候，

「哦，維姐莉亞，這個世紀是多麼的長呀！」

他道出了廿世紀人類的苦悶。凡是遭遇到不幸的人都會有「生不逢辰」之感，可是我們在這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已經歷了兩次大戰，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差不多處處碰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這個世紀是不是一個特別不幸的世紀呢？下一個世紀是不是要快樂一點呢？

福開森也許就是作者高夫力·白倫敦（Godfrey Burden）的化身。白倫敦一九〇六年生於澳洲墨爾本，早歲從事新聞事業，第二次大戰時代代表澳洲和英、美各家報紙在歐非各戰場採訪新聞。一九四一

年梢迄一九四三年夏駐莫斯科，窮一年半的光陰，親自考查，搜集材料。他的一本小筆記簿，總是隨身攜帶，走了很多地方，碰到很多檢查員，都沒有被搜查出來，他認為是生平一大幸事；否則的話，單憑記憶寫作，本書內容恐怕不會這樣豐富，敘述不會這樣親切的。作者文筆生動，記錄正確，使讀者好像覺得身歷莫斯科一樣。美國前輩作家獨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說：「本書所描寫的人物很正確。所描寫的莫斯科，以及它的寒冷，它的艱苦和恐怖也都很正確。作家之中，只有白倫敦一人能夠使我們在骨髓裏都感覺到蘇維埃生活的真實情形。」獨斯派索斯自己的「美國三部曲」（U. S. A.）已經是世界文壇上不朽之作了，他也是去過蘇聯的，他的這兩句話實在可以說是本書的確評。

本書的作風顯然受到法國普魯斯脫（Marcel Proust），英國吳爾芙夫人（Virginia Woolf），愛爾蘭喬莫思（James Joyce）等心理小說家的影響。本書有幾章是長段的心理描寫，這種心理描寫主要的不是感情的分析，而是過去印象的生動的回憶；但也不是輕巧細膩的那一種回憶，而常常是粗野的景象配合着狂亂的感情。過去的經歷，挾着戲劇性的力量，一幕一幕的湧現在書中人物的心頭。憑了這種手法，作者不單描寫了一九四二年冬天的莫斯科，而且把半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也都包括在內了。

本書的分章辦法也可以提一提。本書敘述的觀點是常常變換的，爲了要表現一幅俄羅斯生活的全景（Panorama），這是頂好的辦法。因此第一章是那個外國人福開森的自敘，顯得比較輕鬆；第二章接着蘭吉的回憶，便是氣勢洶湧，場面極廣，感情極深；第三章又是福開森的故事；第四章是用第三者的觀點來描寫德蘇戰爭的一個插曲，雖然好像是要描寫德軍的暴行，和俄國（特別是烏克蘭）人民在德蘇

兩種暴政下的走投無路，無所適從，但是主要的還不脫離卡爾的一家。

第五章是福開森第二次去拜訪蘭吉她們一家，那一次他待得很久。從第五章到第十八章「恐懼（瑪莉的獨白）」，都是那一晚上的事情。中間插了兩章關於伊凡盡忠的故事，在時間上這雖然不在同一天晚上發生的，但是在故事的聯繫上以及氣氛上，都和那天晚上的談話以及心理活動有關，所以作者把那兩章放在那個地方。希望讀者對於作者剪裁編排間的苦心，加以注意是幸。

夏 濟 安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中英人名對照表

Anastasia Roktovna	安娜斯塔霞·羅果托芙娜
Anna Petrovna Kosita	安娜·彼得洛芙娜
Charlie Sommers	查理·索末斯
Ferguson	福開森
Goriev	郭黎夫
Gregor Sokur	格萊哥·索可
Gustav	葛斯塔夫
Herman Loeb	漢門·陸勃
Ivan (Vanya) Romantsiev	伊凡(凡雅)·羅曼戚夫
Karl	卡爾
Kolya Kolodub	高力·郭洛德
Kopchick	高吉克
Kylenko	吉靈哥
Lizavetta Petrovna	麗莎維德·彼得洛芙娜
Losha	洛沙
Malov	馬洛夫
Mary Anderson	瑪莉·安德森
Mitka	米德迦
Netkin	奈德金
Olga Trofimovna	娥迦·特洛非莫芙娜
Rachel Semyonovna	蘭吉·賽米亞諾芙娜
Romantsiev, Grandmother	羅曼戚夫老婆婆
Rosalia Lopukha	羅莎莉·洛浦嘉
Udanovna, Madame	烏達諾伐太太
Vitalia	維妲莉亞
Yakovsky, General	雅各索夫斯基將軍
Zylinsky	威靈斯基

「西伯利亞」問題論戰 續編目次

一	「朔方備乘」簡介……………	趙尺子
二	「西伯利亞人種誌」擇要……………	何達
三	北疆國恥史話……………	柏樟
四	鮮卑利亞淪入俄國的經過……………	王蘇
五	「西伯利亞」是中國的邊疆……………	王蘇
六	「西伯利亞」秘密全貌……………	王黎亞
七	幾個地理譯名商榷……………	趙尺子
八	「西伯利亞」即鮮卑……………	王蘇
九	俄國史前時期歐陸土地與中國邊疆關係……………	王蘇
一〇	中華民族的源流……………	索文林
一一	木堂雜志……………	敬之
	「西伯利亞」的由來……………	
	俄國第三個首都……………	
	「夏種」的「歷史領土」……………	
	夏朝的「窩瓦河」……………	
	「鄂畢河」……………	
	釜山……………	
	「中華民國全圖」訂誤……………	

	「最新世界地圖」訂誤……………	
	莫斯科——誰家的天下？……………	
一二	國父抗俄遺訓疏證……………	趙家驥
一三	鮮卑地方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領土……………	楊德鈞
一四	錫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遷新疆伊率史……………	廣祿
一五	王著「西伯利亞中國領土考」序……………	趙尺子
一六	錫伯西遷伊率以前之錫伯兵葉爾羌戰役……………	那琦
一七	西伯利亞是否改名問題……………	王思田
一八	歐亞大陸經緯……………	胡秋原
一九	西伯利亞改名問題……………	地圖週刊
二〇	西伯利亞命名考……………	程發軔

目 錄

夏志清序

譯者序

中英人名對照表

第一章	兩個俄國女人	一
第二章	革命和內戰	一五
第三章	俄文教師和姑娘們	二九
第四章	自掘墳墓的女人們	三五
第五章	美國女人和蘇聯特務	四一
第六章	一個女革命家的幻滅	五三

第七章	舊日的同志	六七
第八章	獄中	七三
第九章	逃難	八三
第十章	敏感的青年人	九三
第十一章	幸運兒	九九
第十二章	權位的爭奪	一〇七
第十三章	黑板上的兩個字	一一九
第十四章	人的生命	一二七
第十五章	伊凡之死	一三五
第十六章	雅各索夫斯基將軍	一六五
第十七章	莫斯科的雪夜	一七一
第十八章	恐懼	一八三
第十九章	小妖精	一八七
第二十章	斷腿的人	二一一
第二十一章	查理·索末斯的派對	二一五
第二十二章	夫與妻	二四一

第二十三章	蟑螂和麻雀	二五三
第二十四章	安娜的轉變	二六三
第二十五章	快樂的一夜	二六七
第二十六章	一篇報告	二八一
第二十七章	安娜的結局	二九三
第二十八章	擇地而死的悲哀	三一三
第二十九章	等死的人	三一九
第三十章	卡爾的囚犯生活	三二五
第三十一章	高吉克同志的建議	三四一
第三十二章	維姐莉亞	三四五
第三十三章	告密者	三六一
第三十四章	登陸	三六五
第三十五章	死	三七一
第三十六章	雅各索夫斯基元帥	三九一
第三十七章	蘭吉的歸宿	三九七
第三十八章	麗莎維德的一封信	四〇一

第三十九章 俄羅斯的懷念·····	四〇三
第四十章 米德迦·····	四〇九

第一章 兩個俄國女人

福開森的故事

米德迦對於自己的英文，是很得意的。那天我們坐長途汽車回莫斯科（我們到伊斯脫拉夫去了），一路之上，我們想起不少英文的單字和成語，我們並且造了各種句子，好讓他練習那些單字成語。

「你的英文裏夾雜了很多俄國字了，」他說。

「我沒有聽見別人同我說起過呀，」我說。

「真的，」米德迦說。「你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說話的時候，我聽見你用了俄國字。」

「是些什麼字呢？」

「你把電車叫做 Trolly bus。是的，我聽見你把坦克說成 Tanka，機器說成 Maehina。剛才你還

說「Telephona（電話）和 Airport（飛機場）。那些都是俄國字啊。」

「都是俄國人發明的，」我說，「就像莫斯科地下鐵道一樣。」

「真的，」米德迦說。「那是了不起的建築。」

「老聽我們講話，」我說，「你一定學到不少了。」

「學了不少有趣的字，」米德迦說。

觀光局是把它們帶到伊斯脫拉去參觀德軍暴行的。現在在回程路上，每走兩三百碼，長途汽車就會撞上一堆積雪，於是輪子急轉，車身東搖西擺，好像要裂開一般。每當我們開過一堆積雪，米德迦就會對我望望，得意的微笑。「他媽的，」他總這麼說，「他媽的。」他同多數俄國人一樣，嘴裏粗話很多，但是他能用英文來罵人，他是非常得意的。

我們已經開進舊時列寧格勒的驛道，現在快到莫斯科了。

「有一個人英文說得同你一樣好，你要見見嗎？」米德迦說。

「俄國人會說英文的很多」，我說。

「但是這個人跟別人不同，她說得同英國人一樣。」

「是個女人？」

「今天晚上我帶你去。」

「晚飯以後。」

「好吧，」米德迦說。「這樣算數。可是這專是為你的。我讓你去，因為你的嘴緊。嘴非緊不可。」

「我不會告訴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的。」

「頂好帶樣東西去，」米德迦說。

「帶伏特迦酒去，怎麼樣？」

「這樣可以幫助談興了，」米德迦說，「英文都可以講得好了。」

那天晚上，我在莫斯科散步。沒有月亮，但是街道很白，發着亮光。在「A」路電車駛過的那條馬路上，米德迦在等着我。我們不開口，一起走着。我穿着我的厚革大衣，皮帽子拉下來蓋住我的耳朵。在朦朧之中，我覺得人們在我身旁擦過，但是新下的雪使得一切都 very 安靜。我們繞過這條馬路，穿過幾條小街，米德迦把我拉到一個門口，在黑影裏我們等了幾分鐘，米德迦點起一枝香煙。我不作聲。我知道米德迦等在那裏，是要看有沒有人跟着我們。然後米德迦拉着我的膀彎，我們走到街道對面，進了一個黑暗的門堂，這裏已經同外面的朦朧隔斷，我們處身在黑暗之中。門堂裏很冷，滿是人味兒，裏面一定住了很多人，也有「麥霍加」（Mahorka 一種低級煙草）和含着松香的木柴的煙味。米德迦已經走了進去，我聽見他在打門。他招呼了一聲。一個老年人的聲音答應着他。門後有腳步拖踏的聲音，一下子門開了，一道燈光，像手電棒的光線一樣，把門堂裏的黑暗劃開。米德迦把門推開，我們走了進去。沒有人迎接我們。米德迦把門門好，然後再挽着我的手臂，領我進一間小房間。

這是很小的一間房間，大約六呎寬，兩倍那麼長。裏面很整潔。一張鋪着繡花被單的牀在房間的一端，牀的附近有一張鋪着白桌布的小桌子，另外有兩張舊的精緻的椅子和一張舊式的沙發。牆壁上掛有

相片，相片中幾張棕色的是合家歡，另外幾張是較新的作品，都照的同一的題材：一個黑髮青年，作沉思的表情。屋內是暖和的：一隻小爐子裏面燒着幾根松木，一邊燒，一邊發着爆的響聲。一隻俄式小銀壺在直冒汽。當米德迦同我進來的時候，屋裏沒有人，但是很快的，我注意到沙發上的一隻縫綉籃和一隻布做的玩具小象：小象的眼睛是用鞋扣做的，狀態很活潑。

一個女人進了這個房間。她對我微笑，伸出她的手。她同我握手的時候，握得很緊。我看她是一個猶太人，年齡大約四十歲。她說她叫蘭吉。

「你看，」她說，「我們這裏很簡陋，不能招待。請坐吧。」

她的英文可算正確，但是音調有點特別，好像她是從一個從來沒有去過英國或美國的人那裏學來的。

「米德迦說，你的英文講得同英國人一樣，」我說。

「那不是我」，她說。「我的英文講得怎麼樣，我自己也明白。米德迦是要你來認識麗莎維德·彼得·洛芙娜的。我們的麗莎維德英文講得非常之好。她也會說法文。但是現在可沒有機會來練習法文了。」

「麗莎維德是前一輩的人了，」米德迦說。

「這個你不必說的。」那個女人用俄文對他說，說得很快。她的棕色大眼睛上面的黑眉毛蹙了起來。她有光亮的烏髮。鼻子不像猶太人，鼻樑很挺，就像普通所謂的羅馬鼻子，但是她的似乎傲慢的而表示好享樂的嘴唇，她的圓圓的肩膀和高聳豐滿的乳房，都是猶太人的。

「沒有關係，」我聽見米德迦在說。「這個奸細不會出亂子的。」

「沒有這種道理的，」蘭吉說。

「啊，你們這些老布爾什維克黨，真叫人討厭，」米德迦說。

那女人很快的走到米德迦跟前，好像要打他。

「喂，聽着，」米德迦說，「他假如靠不住，我會帶他來嗎？而且他還帶來了伏特迦酒。」

「伏特迦！伏特迦！有了伏特迦，你什麼都願意幹，」她說。她好像突然瘋了，她的大眼睛在黑毛底下睜得大大的。

我故意做出剛剛才聽懂這個字的意思，把一公升伏特迦酒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蘭吉突然走了出去，我對米德迦望望。

「別理會，」他低聲的說，「都講妥了的。蘭吉·賽米亞諾芙娜以前也搞政治，而且在住宅區裏還有一大間公寓房間。但是後來……你懂了……」

米德迦聳聳肩。

「Gondeyay (古德一)，」他說的時候，表情好像無限悲傷。

「你這個 Gondeyay 什麼意思？」我說。「又是你的一個俄國英文字了？」

「當然，」米德迦說。

「什麼意思？」

米德迦把一隻粗粗的食指放在他頸子的底部，突然敲了一響，聲音很大，好像放了一下手槍。他對我苦笑，他算是答覆我了。

一下子蘭吉把那個叫做麗莎維德的女人領來了。她們微笑着，她們還帶來了食物，一盤一盤的放在桌子上。有一盤酸白菜沙拉，一盤熱馬鈴薯，黑麵包，和小而硬的絞餅。還有些紅的魚子醬，我認得就是我在本星期前幾天送給米德迦的。我看他們已經把一星期的配給口糧統統放在桌上了。

那個叫做麗莎維德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年輕。她的頭髮是淡金色的，編成辮子，緊緊的繞在頭上。她的眼角微往上翹，眼睛是清澈的灰色，瞳孔大大的，顏色烏黑。她的膚色白晳明淨。她有純粹斯拉夫血統的那種直鼻子和微高的顴骨，她的身材肥滿，但同時也有點老處女的神氣。服裝整潔。牙齒整齊而白，但是一隻犬牙是有缺陷的。她的手小，指甲短，手指硬。

「啊，」她說，「因此你到莫斯科來了。」

「是的，」我說，「爲了戰爭才來的。」

麗莎維德不說什麼。我誇獎她的英文。她說得流利自然，但是她的英文是一種別緻的老式英文。

「沒有什麼希罕，」麗莎維德說。「我的保姆是一個英國人。我們在貴族女子學校的時候，我們的英文是一位格雷漢小姐教的。蘭吉同我爲了要練習，常常說英文。那是沒有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也同她們講英文的，」米德迦說。

麗莎維德輕鬆的笑了。

「是的。你聽見過了？」她說。「米德迦說英文的，說一種別出心裁的英文。」

「這是那種沒有出國門一步的先生在學校裏教出來的英文，」蘭吉說。

「可是，蘭吉親愛的，」麗莎維德說，「學一點總是好的。卡爾的英文不是也是這樣學來的嗎？」突然間麗莎維德似乎很難過，似乎她在後悔：最後這句話不該說的。

「卡爾是蘭吉的兒子，」她說。「他的照片就掛在那邊。」

她指給我看看那個作沈思表情青年的照片。我望了米德迦一眼。他的嘴動了一下，好像他又發出一個像放手槍似的怪聲了。

「你從來沒有出過國嗎？」我問麗莎維德。

「沒有，」她笑着說。「但是請你告訴我，你喜歡莫斯科嗎？可愛的莫斯科！你喜歡我們的戲園子嗎？」

我們喝着伏特迦酒，吃着小塊的魚子醬，一面討論莫斯科的戲劇界。我們講起因為前堂被炸而停業的波爾昂戲院，也講起劇團裏足趾舞女主角——培克和萊披辛斯克耶——的優美的舞技。我們提起了莫斯科藝術劇院和柴霍甫夫人在他丈夫名作「櫻桃園」裏的演出。

「啊，柴霍甫，」麗莎維德說。「多美呀！你也愛好柴霍甫的嗎？」

「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我說，「在馬利戲院演出的。」

「不錯，」麗莎維德說，「就是這個戲：『真理不如運氣』。」

雖然麗莎維德已經不是一個年青人，青春似乎還沒有離開她。我能夠想像她是一個少女，在本世紀開頭幾年的一個漫長而平靜的夏季，參加一個鄉下別墅的舞會。一個穿着白色禮服的少女，在她的編得很緊的淡金色頭髮上，包着一塊彩色的頭巾；她能演奏蕭邦的曲子，抽煙捲，也能跨上馬背大膽的馳騁；她是愉快的，但是對於時代的動態有了一點先見之明，也難免有點發愁：總之，像屠格涅夫所描寫那種少女。這是我的想像。

我指着那隻樣子很神氣的小象。

「這裏有小孩嗎？」我說。

「沒有，這是麗莎維德做的，」蘭吉說。

「你知道，我是替小孩子做玩具的，」麗莎維德說。「我用破布鈕扣來做，我們就是這樣維持生活的。」

「以前是我去找吃的，這間房屋也是我找來的，」蘭吉說，「現在是麗莎維德了。每天她做一件新玩具。農人現在都比貴族階級有錢，玩具就是他們買去給他們的小孩子的。因此我們有馬鈴薯和白菜吃，農人現在是潤了。」

「你喜歡我的象嗎？」麗莎維德說。「請看他的眼睛。這隻象好像有好記性似的，你說是不是？」

「你在那兒學的縫紉？」我問。

「我在一九三七年學的縫紉，」麗莎維德說。「但是在年輕的時候，我們學過刺繡的。因此也不

難。」

「她縫得真美，」蘭吉說。「請注意那些針腳。想想看：她在學刺繡的時候，我在學擲手榴彈。在內戰的時候，我是一個游擊隊員。」

「蘭吉·賽米亞諾芙娜是敖德薩人，」米德迎說，好像這樣一說，把什麼都說明了似的。

「那時我的志願是要能殺死一個沙皇的將軍，」蘭吉說。「麗莎維德的父親就是一個將軍。以後我們就革命了。革命倒沒有什麼，但是內戰卻是另外一件事。我所看見的種種，我真不知該怎麼告訴你。我跟紅軍一起生活，跟紅軍一起前進，我看見很多死人，也看見很多不同的死法。」

蘭吉很驕傲的說。她說完以後，我們靜了一會兒。

「我們在一所穀倉裏找到她的，」蘭吉說，看着麗莎維德。（麗莎維德低着頭，在對自己的衣兜凝視，燈光照着她緊編的髮辮，發着金光。）「她是一個小可憐蟲，我帶着她一起走。」

「她的父母呢？」我問。

「都死了，」蘭吉說。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麗莎維德說。

「啊，不要再用什麼辯證法了，」蘭吉說，她轉過來，朝着我說：「辯證法是俄國的，因為有了它，什麼事情都不要有人負責了。你懂不懂？總而言之，結果我們發現了唯物論成了另外一個上帝，不信它可不行。」

「文章裏常常有人這麼說。」

蘭吉看看我，帶着不信的神氣。

「但是，親愛的蘭吉，請想想看，」麗莎維德說。「沒有你，我會到哪兒去了？沒有革命，你會到哪兒去了？」

蘭吉沒有回答，她似乎一下陷入另一種思想裏去了。然後她安靜地重複着說：

「沒有革命，哪兒去？躲在什麼城的猶太人區裏吧，我想，就像我們一千代的祖宗一樣。」

蘭吉繼續的在沈思。麗莎維德把談話又拖回到戲園這個題目上去。我講起那兩齣新戲：『前線』和『克里姆林宮之鐘聲』，但是我看她們對那些新戲，似乎並不相信。因此我們祇好談談那些老作家，我們談起了庫布林和貢察洛夫，我們也談起了俄國民族性裏惰性之克服——這是無可比擬的俄國式的談話。

「我們當代唯一大詩人是巴斯德納克，」麗莎維德說。「很可惜的，你不懂俄文，因為他的詩是不能翻譯的。甚至於比普希金更難。他的詩是女學詩，美極了。」（譯者按：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波拉

C. M. Bowra 在所著「創造的試驗」The Creative Experiment 一書中有專章論巴斯德納克。）

「經過這樣的戰爭，他還活着嗎？」

「誰知道？」蘭吉說。「人家已經把他的名字忘了。他不曾寫過頌詩，也沒有得過獎。」

「慷慨激昂的歌這些日子多得很，」我說，「但是沒有一支比得上國際歌的。游行集會也好熱鬧。

復活節大慶祝我也在場，我看見近衛師團的兵跪下來同他們的國旗接吻，宣誓效忠祖國。哥薩克人也穿

了舊時的服裝游行。」我問麗莎維德說：「你喜歡軍隊制服上的新肩章嗎？」

「很美，」麗莎維德說。

「肩章！」蘭吉說。「她的父親就是這麼送了命的。他太驕傲了，不肯把軍裝換掉。我們槍斃了好幾千人，都是因為他們的軍服上曾經有過肩章的痕跡。」

「但是軍裝上恢復肩章，我認為對於那些貴族出身的兵士們是好的，」麗莎維德說。「他們穿了那種給農人出身的兵穿的制服，看上去總不合式，而且他們心裏也不舒服。但是現在的新制服讓他們穿，太合式了；即使隔了兩代，他們走路舉動，假如還是像貴族樣子，我們也可以不必計較了。」

「貴族子弟還有這麼多嗎？」我說。

「是的，」麗莎維德說，「俄國國內國外都有。」

「她又說廢話了，」蘭吉說。「她們那種人全有那種想法的。我們的新的愛國主義同以前的愛國主義毫不相干的。」

「你有兄弟在紅軍裏嗎？」

我問。麗莎維德對我很快的看了一眼。「沒有，但是我有一個弟弟在美國，」她說。

「總算我們講到正題了，」蘭吉說。「話已經說穿了。她有個弟弟在美國。她可以托這個外國人帶個信去。」

我看看米德迦。他在替自己斟一小杯伏特迦酒。他的圓圓的臉上，看不出他對於這些話有什麼興

趣。我看看麗莎維德。她的頭髮編結起來的頭低下去了，好像是一個做了錯事的小孩。她的白皙的臉上露出紅暈，一直紅到太陽穴上。

「但是，親愛的蘭吉，」她用俄文說，「我非做不可。」

「假如這個外國人的飛機失事了，他們在他身上查到了你的地址，該怎麼辦？」蘭吉回答說。

「我也不在乎，」麗莎維德說。

蘭吉對我說道，「麗莎維德的弟弟好幾年前到美國。她非常的想告訴他這個新出世的新俄羅斯的情形。」

「你不給他寄信嗎？」我說。

「這個問題問得不聰明，」蘭吉說。

我立刻提議替麗莎維德寄一封信到美國去。假如用英文寫的話，我相信，這封信可以跟公使館的公文一起走。或者，我的報館裏的朋友也可以替我帶走。

「我們不寫什麼信，」蘭吉說。

她走到我這裏來，挨着我坐在沙發上。她的緊張的驕傲的神氣已經放鬆了。她一定四十歲出頭很多了，我這麼想。

「你是個外國人，」她說。「你不可能知道。你不會懂。別人也不會知道的，因為見證都給毀了。只有我們是剩下的。」

蘭吉不說了，看着麗莎維德。

「我以前以為我的兒子卡爾已經死了，」她隔了好久才說。「但是現在我知道他還活着。你懂了沒有？我知道他還活着。因此我們不能有什麼舉動；因為我一定得留在這裏照顧他。我們不能有什麼舉動。」

「很對不起，」我說，「但是我可不懂。令郎是不是告假回來了？我還以為紅軍兵士從來不准告假的呢。」

麗莎維德抬起頭來了。

「你只好告訴他了」她說。

「我的兒子是送進罪犯營去的，」蘭吉說。「我以為他是死了。但是我現在知道他還活着。因此我們不能有什麼舉動。」

麗莎維德說了。「但是，親愛的蘭吉，也不會出什麼亂子的。你是無事驚慌。福開森先生只消把我的弟弟的地址抄去，這上面也看不出是哪裏抄去的。他只要告訴我的親愛的洛沙說我們都活着，都好，也就夠了。」

我看看米德迦。我看見他似乎在微微的聳他的粗濶的肩膀。他又在倒一杯酒。

「當然囉，」我說，「我把地址帶去，有什麼靠得住的朋友到美國去，我會托他帶一個口信，告訴你的弟弟說你們很好。」

麗莎維德的臉上的表情，顯得很滿意，很高興，我全副精神的看着。

「下次你再來的時候，我們把他的地址給你，」她說。

米德迦在我的身傍，我走出黑的門堂，走到街上。天在下着小雪。我們走過幾條小巷，來到一條大路——我猜想就是A馬路。在高爾基街的轉角上，普希金銅像的旁邊，米德迦碰碰我的手臂。在安靜而微明的矇矓之中，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要走了，」他說。

「謝謝你爲我安排今晚這個節目，」我說。「碰見俄國人民是不容易的事。我覺得你們的那位麗莎維德小姐很可愛。」

「就外國人而論，你是個聰明的間諜，」米德迦說。

「但是我不是間諜呀，」我說。

「那樣也聰明，」他說。

「好吧，再會，」我說。

「再會。」

第二章 革命和內戰

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回憶

蘭吉躺在那小屋的牀上，不能入睡。她躺得可十分平穩，比睡着了還平穩；眼睛在黑暗裏睜得大大的，想起她的丈夫，覺得他就挨着她，他的身體就在她的邊上，可是不敢去摸一摸，動一動，不敢把幻覺觸破了，只是希望着，希望能夠覺到他的粗糙的手和暖熱的呼吸。

這一切無非是：在那個時候伊凡·羅曼威夫活在蘭吉的心頭。

他就活生生的在那裏，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在蘭吉心裏，沒有他死的這麼一回事，她不能想像他會死去，他的生命會終結。在任何地方沒有關於他的死的事實，或者關於他的死的意念，或者在親人心目中所引起的景象——沒有墳墓，沒有十字架，沒有紮了花圈的紅星，沒有套在木樁上的鋼盔，沒有身份證或是黨證遺留下來，書上帳上都沒有紀錄，名字上或號碼上也沒有用線劃去，也不用擦掉——事實是任何地方都沒有，只是有一具光着腳的殘屍，他的生命的空壳，無名無姓的在西部大草原上一個萬人

坑裏，同無數的殘屍橫在一起。

在這個時候，伊凡·羅曼威夫在他妻子的心理還好好的活着；可是不論她感覺得怎麼真切，她的想像不再能從經驗裏得到材料來充實，她也不可能更清楚的知道他了；在這時候，他還生存在她的想像裏，但是他的生存已經不可能再有什麼發展，它已經達到頂點了；以後蘭吉記憶裏的材料逐漸減少，他的生存也只有逐漸消失了。

在本世紀初葉南部烏克蘭人口稠密，競爭激烈的生活之中，一個生命剛剛在萌芽：漸漸在黃熟的麥田，果子樹，圍着彩色頭巾的姑娘們，野草莓，新鮮的牛油，伏特迦和蜜糖餅，向日葵子的壳堆滿了多灰的街道；菜市裏滿是賣錫壺的小販，流浪的唱小曲的，喝醉了的農夫，滿臉鬍鬚的吉爾吉思馬販，戴着喀啦啦羊皮帽的泰柱克人，黑臉的西加索人，從克林來的韃靼人，坐着漂亮馬車的白臉貴族們；鄉村裏是些藍圓頂的教堂和點蠟燭的老婆婆們，放高利貸的地主，瘟疫流行的工廠，和投機剝削的外國人；他在那裏出世的那幢破爛公寓房子，一間臥室同好幾十個別家的人合住（住在門角簾幕後面是一個妓女），他的體健聲粗的老母，他的沉默寡言的父親，變了味的鵝油的臭味，大蒜，新砍的樺木柴，「麥霍加」，不透風的衣服味，虱子，斑疹傷寒和傷寒的氣味……這個衣衫襤褸小小的伊凡，聰明的頑童，那天早晨，當他的父母很同情的講起那好久起不了床的妓女，小伊凡說道，「啊，昨天晚上這個可憐的人一定碰到了一個難對付的主顧了。」爲了這種早熟的聰明，他重重的挨了打。

那就是伊凡·羅曼威夫：他就是烏克蘭的濃重的生活，它的色彩和殘忍，它的幽默和風格。在黑暗

之中，蘭吉自己對自己笑着，想着……

想着那個襤褸的兒童變成一個機智鋒利的青年，強壯的農民的身體勻稱的站在他的腳上，帽子帶得有點油腔，聲音剛剛在變粗；他是在那個老教員膝下承教的學生——伊凡以後老提起他，瘦小的老人，住在陋巷，沒人理會；那是巴枯寧和克羅泡特金的信徒，一小羣智識青年圍着他，因為他們都仰慕偉人，又相信世界在進步；突然間伊凡的視野開闊了：觀念的世界，幹實際工作的和人民英雄的世界，命運的主宰被廢棄了，迷信被破除了，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俄羅斯人的鋒利的腦筋，真正是普羅階級的腦筋，戳穿了一切古老的妥協、曲解和頑固，戳破了俄羅斯的懶惰，指向唯一的明明白白的問題；年青的身體顫抖着，亟亟地要去把問題解決了；秘密小組會議的緊張，永遠不能忘懷的第一次為了一個主張甘心冒喪失自由之險的刺激。後來有一個親王下鄉來了，帶來些外國朋友一同來打獵，警察當局是什麼都留意的，爲了謹慎提防起見，把老教員和他的學生都攆走了。

十五歲就被充軍到西伯利亞！伊凡是一直因此而驕傲的。在卡庫茨克的極北，沿着萊那河的木屋墾殖區；在木屋裏面，漫長的冬夜，無盡的討論，考茨基和普萊哈諾夫的理论，他的第一次的聽見共產黨宣言；同那些參加過一九〇五年暴動的人握手，「這裏有一位新同志。年紀多輕呀，請看他的手！這個人是做過工的，真正的普羅階級。」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過激派，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日日夜夜的討論着；矮小的沉默的杜迦希維利（Dugashvili——即史大林，曾被放逐）被人淡忘的記憶着，和善的史維特洛夫（Sverdlov）被人牢牢的記憶着；最後，監禁和靜滯的生活不能再忍

了，開始逃亡，穿越西伯利亞的大草原：一千哩長的沼澤地，無數的蚊蟲，密集的叢林，來到這條狹狹的鐵路線；在火車廂裏，農民的孩子同貴族面對面的坐着，貴族知道這孩子是個逃犯，冷冷的看着他，孩子覺得恨恨的要殺人，貴族聳聳他優美的肩膀，轉過頭去談他的一本文學刊物；幾個皮貨商人把他藏在他們的座位底下，經歷千種艱險，橫越俄羅斯，逃出國境，到了廣闊的世界。

對於伊凡·羅曼威夫，這個年輕的流亡者，全世界都可以去得，到處有食物，有工作，到處有相信進步和推翻壓迫統治的同志，有圖書館可以讀書，公園可以睡覺，農場可以工作，有船可以帶他上英國，美國，有各國文字可以學：英文，法文，德文……這個年輕的俄國人，老是在笑，隨時預備做這樣做那樣的，隨時預備唱歌，跳舞，談戀愛……

蘭吉此刻在她的小房間裏想起了這一些，想起了那些年他會談多少次戀愛，想起了都覺得有趣，好笑，因為那一些都比不上我——你說過的，是不是？你是從不說謊的。

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帝國主義崩潰，偉大的時刻來臨了：伊凡偷偷的離開了德國，進入羅馬尼亞，再回到俄羅斯，最後到了自己的市鎮，到了那一座房子，那一間房間；他的母親拿了一根棍子來見他，神情非常高興，伊凡笑了，他的母親反而哭喪着說，「兒子長大了，母親不能再打他了，母親該怎麼辦呢？」伊凡送錢孝敬他的母親，很多的盧布，母親罵他，又說要打他，他分辯說他不是賊，也不是個浪蕩漢，祇是一個革命黨：老太太趕快畫了個十字，臉上罩着愁雲；伊凡望着骯髒的故鄉，他的眼界經過閱歷已經變大了，故鄉已經不再有從前那麼的偉大；他望着農民的被徵入伍，受傷的可已摺溜

了回來；他看到官場和教會的腐化的內層，祇是一片絕望的恐懼，這一切可將要在大動亂中一掃而空，大動亂的激烈將是人們從來所沒有想像到的。他又被逮捕了，罪名是竊盜，爲了要避免重罪的處罰，他招認了，於是又是西伯利亞……

這一切都在蘭吉心頭的記憶裏和感情裏存在着，——她其時正在她小房間的牀上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這都是那天晚上來拜訪她們的那個外國人的不好——可是他是她要米德迦替她們找來的——講起了內戰，深藏心底的回憶又給撩亂出來了。

她記起了她對於她父親的敬愛，那個嚴厲的長着大鬍子的臉容，貧苦家庭的一位威嚴的家長；猶太人區裏的生活，房間牆上糊着的紙已經剝落，小販們，算命的，猶太教的節日，法律和經典，教堂裏的唱詩；她記起了她父親給她的無情的鞭打，她母親不知所措的匍伏在門後，她忍住自己的叫喊，鞭子可因此下來得愈兇，最後衝出門去，在她母親身邊擦過的時候，母親在她手裏塞了一個銀角子，她奔到海邊的懸崖，想要自殺——在十二歲的時候，死亡是多麼的不足畏呀——痛苦地站在那裏，滿腹委屈，自尊心受到打擊，可是同時又覺到手裏硬硬的角子，慢慢的愈來愈覺得手裏有個角子，終於向它屈服了：她有一個角子可以給她花的……從此以後，猶太人的過年過節都沒有她的份了。

敖德薩成了一個搜集情報和冒險的地點；從秘密集會裏流傳出來的文件，剩餘的幾本人民自由雜誌，革命女英雄的小說，描寫無道暴行的動人的故事，這些現在對於她都非常重要，她總把那些書報同她的兩個革命女英雄（薇拉·費格納和非沙·彼洛夫斯嘉）的小照放在一起。兩年之內，革命成爲一個

事實，敖德薩在動亂中：一面是「青年革命聯盟」，一面是白軍軍官坐在咖啡館裏休息，警察到處在留意；爲了要表現革命精神的團結，他們定了一個「大計劃」：他們都要到咖啡館去，一聲暗號，各人要拔出手槍，打死一個軍官，槍要繼續的放，直到自己也被打死爲止；她想像這麼一幕該多痛快。但是，後來得感謝「中央委員會」派來的組織同志，他認爲這個「大計劃」有「無政府主義」的彩色，可能會引起官方不必要的報復，他把這個計劃推翻了。

「中央委員會」來的代表是個英俊青年，老練沉着而安詳，但是眼睛的神氣是頑皮而幽默的。那天她恰巧同他在一起，警察來搜索「青年革命聯盟」的集會處，空氣十分緊張，同志們紛紛找地方藏武器，因爲他們說：誰身上查到武器，就要給警察處決；他手裏拿一枝小型白朗寧自動手槍，很鎮靜地在找地方藏起來，她走上前去，說道，「同志，交給我吧。我把它放在這裏，瞧，他們不會查一個小女孩子的。」她覺得這枝小而重的手槍活貼着她的肚子，柄上他才捏過，熱氣未退，槍口是冰冷的；她覺得手槍滑了下去，停在她的兩股之間；他感激地短短地一笑，對她點點頭，神氣就是一個同志欣賞另外一個同志的工作。這是她第一次遇見伊凡·羅曼威夫。後來，她把手槍還他，他到別處公幹去了。

法國海軍開到敖德薩來了，水手們戴了小藍帽子，帽上有紅的結粒。她的任務是去發傳單：「同志啊，請看人民是怎樣的爲自由而奮鬥！」一面跑，一面躲，她的一只手腕給抓住了，她的男裝帽子給打下來了，「啊，是個小女強盜！」她聽見法文這麼說，人們全笑了；可是一個年輕的同志逃走了又回來，幫她打，兩個都打，抓呀，咬呀，踢呀；這回水手們惱了，憲兵也來了，男女兩人被推到牆邊上，

對着荷槍的水手，水手的槍舉起了，向他們瞄準，那個青年同志的精神已經不濟，她想着「我將要死了。讓我再活一天。替國家死了也好。不，太可怕了。我不願死。」她要提起她的勇氣，她對那個青年說：「同志，你是黨員嗎？」「不，還不是。」「我也不是，但是讓我們像共產黨員一樣的死去吧。」但是水手們並不放槍，他們是跟兩個年青人開玩笑的。她被帶到法軍總部，屋子裏很多軍官，寫字檯後面坐着將軍。「把衣服脫掉，」翻譯官——一個半老的白俄軍官——對她說。「把衣服脫掉。」對他望望，很鎮定的用俄文對他說。「你竟這樣的對待俄國的女同胞。」「把你的衣服脫掉，共產婊子，你知道這是對付犯人的規矩！」她的頭低下了，黑髮掛在她的前面，年輕的臉上發着燒，慢慢的解襯衫的鈕扣，再抬起頭來看看將軍，幾個法國軍官的頭都轉過去了，將軍是個老人，臉上的表情是無可形容的生厭，對她做做手勢，叫她停了。「把這犯人帶走。」那天夜裏，在屋子底下的地窖裏，衛兵偷偷的進來，微弱的光照在他的不動的奸笑的臉上；同衛兵掙扎，知道要兩個男人才能強姦一個女人，後來她的頭頸裏，覺得他的熱氣，他的暴力用完了，他把她推開，罵她是傻瓜；她突然變得很軟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的勝利也不算什麼一回事，革命沒有了，俄羅斯也沒有了，只有絕望；在黑夜之間，她在奔跑，穿過空地和無人的街道，一個半老的白俄軍官的臉在追趕着她。

記起了這個——這是她第一次在恐懼的情感下軟化；現在在她的小房間裏的牀上，全身都是無名的恐懼，更大的恐怖似乎從黑影裏在湧上來；在她的牀上翻來覆去，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記起了……

她搭火車到尼古拉也夫去，車上都是粗大的兵士，毛髮蓬鬆，樣子很飢餓，眼睛裏露出慾火，對她

看着；她的恐懼又上來了，叫他們道：「同志們，你們唱歌嗎？大夥兒一齊唱吧！」她領導着，他們唱着，唱的紅軍的歌，游擊隊的歌，死囚的歌，農奴的歌，士兵的歌，感傷的歌，火車上兵士整夜的唱着，到早晨她的聲音變得又啞又細，但是兵士們叫她的小名，用各種親熱的稱呼叫她，後來把她送下車，送上路，一點沒有傷害她。

她是要去加入游擊隊的：她決心要成一個女戰士，加入那流浪的隊伍，大踏步跨過泥沼，睡在濕的田裏，抱着一枝重重的步槍，從來沒有想到會這樣的艱苦；後來指揮官同志走到她這身邊來了，把她的步槍掛在他肩膀上，把她舉到一輛車子上去。「你怎麼跟我們在一起？你才是一個小孩子。你多大了？」「十八，」她說謊了，她只有十六歲，她只怕指揮官同志會把她送回去。「十八了，他也可替國家作戰了。」這個人就是那天在「青年革命聯盟」她替他藏手槍的那個同志。他是伊凡·羅曼威夫，現在是紅軍裏的一個指揮官，眼睛裏的幽默已經沒有了，但是他的尖頂帽子俏皮的歪帶着，皮帶上掛着一枝「盧幹」槍（Luger），靴統裏插了手榴彈。但是他已經不記得她，並沒有注意到她又是美麗又是勇敢，但是她覺得在他指揮之下，她不會再恐懼了。

在敵人戰線後方的游擊工作：樺樹林中的小接觸，鄉村路上的伏擊，鄉村裏來的新兵，大個兒可是生手的農民，帶了槍要去解放自己的國土；她也穿了男人的服裝，皮革的上身，男人的尖頂帽，軍褲軍靴，學會了擲手榴彈，包紮傷口，騎馬，煮飯。伊凡有一天化裝成一個鄉下老太婆，到大城市去聽外國人的談話，她求他帶她一起去，他卻帶了格萊哥·索可。回來時，索可帶來了一雙美麗的皮靴，穿了一

件外套，又軟又暖，摸上去像女人的肩巾。伊凡說，這是件英國外套，名字叫做「暖裝」(Warm)；但是後幅太短，只有一個英國人，或者像索可那樣的拉脫維亞人穿上才配身；每個人都笑着，她問他怎麼把那個英國軍官打死的；伊凡說，「在這裏，」他的手指剛指在她的肚臍穴上面的地方；她說，「用的白朗寧自動式手槍嗎？」他說，「是的，你怎麼知道我帶着白朗寧？我總是把它藏起來，靠近心口的；」她說，「有一天你交給我替你藏起來的；」伊凡對她看看，說道，「哦，原來是你；」他是第一次對她看，她的臉紅得覺得受不了，她走開了，他跟着她。

所以悲劇中間，也有快樂；他們是這樣的年輕，這樣的富於熱情，看來悲劇也不這麼可怕了，即使在他們突擊那些焚燬了的村莊的時候；無人居住的田舍房屋裏，褥子割開了，鴨絨滿處飛，男人女人躺在死裏，屍體掛在絞刑架上，大烏鴉啄女屍的眼珠，手脚綁緊的兵士，從天靈蓋到胸口被騎兵刀一下切成兩半，野狗偷偷的躲在肚子腫脹的死馬的體腔裏，被英國燒夷彈燒成焦黑的稻田，鄉村病裏各式各樣的傷爛都有，壞疽病的臭味直衝腦門；這些就是他們的快樂日子的背景，但是他們的宗旨是如此純正，對於未來的信念是如此的堅定，這一切都無足輕重了：騎着光背馬，衝進鄉村裏去，拍着大門，大聲叫道：「這是什麼政府？」這都是些粗野無所顧忌的人，伊凡偏要紀律約束他們，指揮官是受人尊敬的，夜間他總要把「黨綱」念一遍，在戰爭頂激烈的時候，學習也不能放鬆，格萊哥開頭幾次學識字寫字的時候，總是纏着眉，革命黨人是很認真的，有一個同志搶劫了一個農民的住宅，以後就被槍決。格萊哥·索可帶進幾個外國俘虜，讓伊凡來審問；他聽見伊凡講外國人的話，就瞪着眼又羨慕又奇怪的聽着；

隨後把俘虜牽到一間穀倉的後面，誰都不說話，只聽見幾聲尖銳的手槍聲，格萊哥回來也不說什麼，但是臉上很高興，因此大家也跟着他一起高興；格萊哥整天的微笑着，他有小的藍眼睛，金黃色的長的眼睫毛上，都是灰塵，像是一隻老野豬的一般，他一笑眼睛裏就露出喜悅的光來了。「他這一生總是宰牛，」伊凡說。「他在這裏也沒有改行。」但是她知道這並非事實，這一夥人裏要推格萊哥頂有智慧。

跟哥薩克人作戰，跟吐吐尼克，麥羅西亞，彼得羅拉和馬克諾那些民團作戰，跟伽里西亞人，波蘭人，英國人，法國人，捷克人，希臘人，德國人作戰——戰爭拖延下去，更為艱苦，更為慘酷。伊凡成了紅色海軍陸戰隊的一個指揮官，有一列裝甲列車是撥給他的，部下都是些胸部多毛的壯士，穿了有條紋的軍裝，全身繞滿了機關槍的子彈帶，氣概是豪邁的，言語是粗野的；伊凡十分認真，為他的裝甲車而驕傲，他們在鐵軌交叉的地方總打勝仗；她自己同他一起過着粗陋而快樂的生活，為着革命過一個男人的生活；在任何村莊裏，只要有一個老穩婆，就好替她墮一次胎。這樣的生活給哥薩克人結束了，他們截斷了後路，把鐵軌的路床給破壞了，把裝甲列車包圍了；這一場戰爭是打得全軍覆沒的，陸戰隊把子彈手榴彈都打完，再拿刀來肉搏，哥薩克人活捉了他們，把沒有戰死的人都砍了頭；但是在雙方接觸之前，在晚上，伊凡叫她帶個信，穿過火線到後方去，所以她脫險了，她以為這是她最後一次看見他了。

但是裝甲列車這一次的激戰還歷歷如在眼前，尤其是它年青的指揮官伊凡·羅曼威夫，他的堅強的肌肉，發達的軀幹，他的挺直的頭顱，眼睛裏的幽默已經給責任感壓制下去，在大無畏的人中間，他有

的是絕對大無畏的精神，爲着最高尚的理想而作戰，同時有好的紀律，好的指揮，永遠受到他的同伴們的尊敬；想念丈夫想到這裏，蘭吉在小房間的床上翻來覆去，好像她的丈夫還活着；上次她知道他戰死了，同現在也是一樣，她似乎相信他還會回來，活着笑着，帽子俏皮的歪帶着，他該知道他們該怎麼對待卡爾——他們的兒子。小房間裏此刻有一點光了，一盞帶着罩的油燈在點着，燈旁坐着麗莎維德，忙着在縫紉，眼睛不時的斜過來看着她的朋友，有時手也停一停，輕輕的叫一聲，好像在撫慰一個小孩子；於是蘭吉稍爲寧靜，睡得穩一點，呼吸也平靜一點；但是一會兒之後，一陣記憶，又要猛襲心頭。伊凡現在又是活生生的在眼前了，他正是好好的在一個戰役裏活着，那是在很久以前的南部烏克蘭……

那邊黑臉的穿着黑褂的哥薩克人蜂擁衝上他的裝甲車，他們跳下馬背，高聲的叫喊「胡拉！」看住了他，把他打得昏了過去；眼前一片漆黑；後來聽得白軍的軍官用了穿軍靴的腿，在踢着他的同伴的屍首，把伊凡轉了一個身，說道，「我要這個人；」似乎覺得被網上馬鞍的前梢，又覺得一匹馬走了好幾哩，濺上來的濕泥使他醒了過來，哥薩克的咒罵和一種新的奇怪的外國語言，然後他被擲進一間小木屋——一個細木工的作場，他很感激能夠躺在這許多匏花裏面，開始覺得身上的創傷，他的大腿扭曲了，頭頂上像山嶺似的腫了一大塊；開始知道了在什麼地方，摸索着想在小屋裏找一個出口，在黑暗裏摸索着，漸漸的明白了這間小屋在他來以前已經是一所監獄。門忽然大開了，外國兵的制服他認識的，是希臘兵；白軍軍官指揮他們把他的手臂綁起來，聽見他們在叫他的名字，知道他們已經認得他了；心裏有了受困的感覺，更想要殺人，臉上露出了殺氣，潛伏在農夫的血液裏的獸性也隨而復發。白軍軍官笑

笑，點了一枝香烟，走到他的身前，把烟噴在他的臉上，說道，「你可以告訴我們不少東西，羅曼威夫同志，但是在我們開始之前，也許你想抽一枝香烟」，說着把香烟有火的一頭按到他的上唇上去。伊凡的答覆是一句咒罵，這種粗話只有紅軍陸戰隊員才說得出的。「很好，」香烟頭現在很靈巧的塞到伊凡的鼻膜上面。「這是爲了我那被共產黨趕出家門又被共產黨殺害的母親，」香烟頭又燒到伊凡的眼皮，「這是爲了我那被共產黨強姦的妹妹，」白軍軍官愈說愈火，但是漸漸的平靜下來——一種惡意的平靜，他說道，「你既然不願意開口，指揮官同志，我們倒要看看你怎麼對付我們的馬其頓軍人的巧妙玩意兒吧。」那些希臘人先把他的靴脫掉，再把他像一隻鴨子似的捆起來，放在木匠的檯上，讓他蹲着，他的腿綁緊了，可是分開的，因此他的舉丸恰巧掉在木匠的虎頭鉗裏面；白軍軍官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說道，「現在，請說吧，婊子養的共產黨同志呀；」伊凡突然又想掙扎，可是希臘兵抓緊了他，其中一人更在轉動那虎頭鉗，鉗的兩隻木牙慢慢在移近，碰到了，痛了，又昏了過去……昏了過去的時候，可是聽見馬蹄的馳騁聲和手槍聲，還有聲音在喊：「游擊隊，游擊隊！」希臘兵丟掉了他逃跑了，白軍軍官匆匆忙忙的要拔手槍，臉上又是着急又是怕；他的希望永久要幻滅了，小屋的門突然大開，一個矮胖的人很鎮靜的在瞄準，對白軍軍官放了一槍，軍官倒了，血從嘴裏射出來；來人就是索可，現在站在那裏，肥肥的手裏拿了一枝大毛瑟槍，木柄頂在大腿上，軍裝前面還插了一枝手槍——格萊哥還穿着那件舊的英國「暖裝」，但是上面已經滿是馬糞塵土了，格萊哥叫道，「凡雅同志！」（即伊凡的親暱稱呼）於是別的同同志上來替他解縛，但是格萊哥看着木匠的虎頭鉗，很是奇怪似的，手指碰碰轉柄，看得

很有興趣，似乎又在研究，說道，「是的，凡雅同志，我們早聽說過這地方，許多同志在這裏……」說着大笑起來，肥胖的身體直動着；在他的像野豬毛似的鬍眉毛底下的小藍眼睛，也笑得發着光。

很長的一段時間，他一個人躺在一間鄉村茅屋裏養傷（同時想念着她，他說過的），想着俄國已經發生的大事件，也在計算着，未來的偉大事件已經受了多少損害；痛恨着俄羅斯的敵人，心裏充滿了極端的冷酷的鄙視。傷養得好差不多了，又可以替革命工作了，他現在是在組織鄉村蘇維埃，鼓勵農民，反對地主，宣傳紅軍是有理由強徵糧食的；有一天又會上了格萊哥，同格萊哥一同出巡，有一天發現了一些木板和螺絲釘，「原來你也是個木匠，索可同志……」但是仔細一看，那東西就是上回人家用來對付他的虎頭鉗，他嚇了一跳，大罵索可不該用私刑殺人：格萊哥輕輕的說，「但是我並不弄死他們的，凡雅同志；」伊凡還是繼續罵他，最後索可逼得沒有辦法，說道，「可是，凡雅，你病了好久。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現在到處都是間諜和做破壞工作的人。他們要破壞我們的蘇維埃國家。柴姆莉亞契加這位女同志說得好，『寧可殺十個無辜的人，不可讓一個有罪的人漏網，』因為，凡雅，有一個有罪的人便可以出賣革命了。」伊凡還是十分生氣，可是索可的圓圓的笑臉還是不動聲色，只是很惋惜似的搖着頭，說道，「你受了傷之後，人都換了樣了，伊凡同志。你不知道那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在全國各處肅清反蘇維埃份子是非做不可的。」伊凡對於格萊哥的新的主張，很是驚奇，但是他小時候的俏皮，已經被一種新的諷諷的幽默代替了，於是冷冷的說道，「我看出來你是已經在替『切加』

（Tcheka——蘇聯秘密警察最早的名稱）做工作了。我聽得出你的口氣。請你自己方便吧，格萊哥。」

內戰結束，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希臘人，波蘭人，德國人，奧國人，捷克人，波羅的海各國的人，還有許多別國的人都在勝利的紅軍之前撤退了，敵人的隊伍被武力，也被革命的精神和宣傳所擊破，伊凡·羅曼威夫在替黨做組織工作，在烏克蘭一村一村的奔走，到處考問人家嚴重的黨的問題，同時也到處打聽一位叫做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少女，有一天得到這樣一個回答，「蘭吉同志？不是就是同威靈斯基同志在一起的那一位嗎？」他把她找到了，她那時候以為他死了，已經同一位來自察里津地方的工程師威靈斯基同居，現在他們又相逢了。兩個男人見到了，長談，談起辯證法，蘇維埃國家的將來，未來的世界革命，不斷的討論下去，夜已經深了，伊凡才乾脆的說道，「我是爲了蘭吉來的，」威靈斯基說道，「聽憑她吧，」她說道，「我跟你雅走，」於是默默的分離，當時就是那種情形。

她記起了一九二一年敖德薩的慘狀，餓死的人死在牀上，沒有人收殮，小街僻巷裏斑疹傷寒的濁臭，滿城好像充滿了地窖和墓道的怪味，到處是飢餓，她的父親死了，她的兄弟姊妹都死了，她的母親正是奄奄一息，臉瘦削凹陷得已經難以認得了，但是看見她的最心愛的女兒來探望她，她的大眼睛裏發着最後的感激的光。但是這些愁苦的事都給她的新的正經工作所抵銷了，何況她正爲着無限快樂的將來而欣喜，新的自由，一個國家在等待着重建，新的工業，孟什維克反對派被瓦解了，所有同敵人妥協的人都被清算了，還有那「新經濟政策」。伊凡到莫斯科去，接到一個重要的新任命，但是蘭吉現在只想着他們的孩子，拖着肚子裏的孩子到德國，去幹那秘密任務；後來孩子出世了，一切幸福都滿足了。

現在，在那間小房間裏，她在睡夢中叫着：「卡爾，卡爾。」

第三章 俄文教師和姑娘們

福開森的故事

那一年雪下得早。幾天之內，街道便已經掃清了。沒有什麼事情做；早晨看眞理報，也是乏味得很。工人們來了，把我房間裏的窗都釘死，窗縫都用廢繩敗絮塞住，上面再糊紙條。每天我往窗外望，看看掛在外面的寒暑表。那是一隻攝氏表。水銀老在零度左右徘徊。每天下午我總要盤算：出去散步是否花得來。

早晨看過報紙，烏達諾伐太太來替我補習俄文。她已經穿起橡皮套鞋了。進屋的時候，她把套鞋脫掉，擱在磚砌的火爐旁去烘。她有短肥的腿，穿着黑色紗襪。她的染色的沒指手套也脫掉，擱在火爐上；她的灰色大衣掛在門旁。烏達諾伐太太看見我的俄文進步如此之慢，很是不滿；但是她總是很高興同我閒談別的事情，把一個鐘頭消磨掉；天氣，舞劇和外國人在說些什麼，做些什麼，都是我們談話的題材。（我告訴她，根據倫敦廣播，德將馮包羅斯已經進抵伏爾迦河了。）我們總是用英文談天的。她

是個很細心平穩的人，只有一次，我覺得她的態度有點異樣：那一次她來晚了，她說她的鄰居接到丈夫戰死的消息，她不得不去安慰她。她本來沉默的面容上，現在更有了一種陰沉的表情。

「我的兒子出發了一年了，」她說，「我什麼消息都沒有。什麼都聽不到。」

「好消息就快來了，」我說。「英文裏有句格言：『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知道蘇聯政府是不會公佈死傷名單的。只有打勝仗的軍隊才有公佈死傷名單的大度。

烏達諾伐太太是個好女人，她的一生過得一定不很安逸。我對於蘇聯人有什麼不好的印象，在她面前，我總隨隨便便說了出來。上一晚我在什麼地方，我總小心的告訴她，但也並不故意的加重了說。我總是去看舞劇的。她對於「天鵝湖」也十分欣賞。

有時候烏達諾伐太太替我翻譯些報紙上的新聞，幫我閱讀。那天早晨的真理報上，有一段關於游擊隊活動的消息，我請她讀給我聽。那是很長的一段，文字虛浮，所舉的事實也是大多誇張的。這是關於游擊隊的報導，沒有人會相信的，但是官方的宣傳，我覺得也不應該忽略，文章快讀完的時候，我看到即使烏達諾伐太太本人也覺得辭句太浮誇了，她顯然頗為不安。我說今天談這麼一段也夠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可以收到一些外國報章雜誌，如泰晤士報，生活畫報之類。我問烏達諾伐太太要不要帶幾本回家看看。她謝了我，但是沒有拿。我問她是不是對於外面的世界並沒有好奇心。

「你英文懂得很多，」我說，「你有時候不想讀一些關於一個英語國家的事情？譬如，美國吧？」
「不，」她說，臉色還很正常，但是眼睛轉了過去。

「這裏一定有很多人對於美國發生興趣的，」我說。「很多人在美國總有親友吧。現在美國英國都是你們的盟邦了，互相通信也可以表示國際的親善啊。」

「美國英國應該開關第二戰場了，」烏達諾伐太太說。

「寫信到美國去是犯禁的嗎？」

「對不起，這種事情我不知道。」

「假如你交一封信給我寄到美國去，」我說，「你會怎麼樣呢？」

我看烏達諾伐太太很是不安，因此我暗暗責備自己。她的肥大鬆弛的身體在發抖，我看出來她在努力鎮定自己，想找句話來答覆我。

「福開森先生，」她說道，「這樣我得準備槍斃，當間諜罪來辦。現在只有間諜才會這樣通信。」

「你以為他們是間諜嗎？他們搜集些什麼情報呢？替誰做間諜呢？」

「對不起，請不要問我。我是教俄文的先生。這種事情我不懂。」

「我很抱歉，」我說，「我是開玩笑的。請不要放在心上吧。」

「頂好是這樣。」

「我意思是請你不要把我所說的話放在心上。我們還是談舞劇，談藝術大戲院上演的高爾基的戲；那種事情我們忘了它吧。」

烏達諾伐太太穿上她的套鞋。我幫她穿上大衣，又把手套遞給她。

「我希望我們有一天一塊兒去看一次戲，」我說，「這樣可以幫助我的俄文進步。」

「悉聽尊便。我們約定一個日子好了。但是你還得好好的讀名詞各格字尾的變化。字尾變化是十分重要的。」

烏達諾伐太太走後，我走到窗邊。我看着溶雪泥濘的街道和破碎的人行道。我想了一下，決定在午飯之前去散步一下。我到樓下查理·索末斯那裏，邀他一塊兒出去。他同兩個姑娘在一起，她們的名字是黛娜米亞和維姐莉亞，她們是常來的。我說午飯以前，到紅場附近去走一圈。他們都同意，我們就一起出去了。

紅場的細石路面上面，薄薄的結了一層冰。在莫斯科的這一帶，汽車開得真好像是瘋狂的。我們穿過馬路時，要小心翼翼，算準時間，一有空檔，立刻四個人一下衝過去。姑娘們看見這樣緊張，不禁哈哈大笑。那個叫維姐莉亞的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她的一縷秀髮拂過我的臉。她有金色的頭髮和棕色的眼睛，她對我看的神氣，總要使我的心跳得快一點。好久我沒有跟一個女孩子這樣親近了，在原則上我是不需要那些俄國女孩子的。但是有時候，我們也不能完全照了原則做人。

姑娘們稍爲懂一點英文；當然有機會我總得要賣弄一下我的俄文。我指着以前是聖母堂的房屋的上，那邊刻着一排字，我翻譯給她們聽：「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烟。」姑娘們認爲我這樣很滑稽。維姐莉亞說她的母親現在每星期去做禮拜了。我們是在紅場的靠近克里姆林宮的那一面，我們走過列寧墳和聖巴錫教堂，走近河邊。正有人在佈置游行示威，一小隊克里姆林宮衛兵沿着河濱大道上走來。他們穿着

長大衣，戴着羔皮帽，制服很挺，樣子很神氣。他們的腳在前面舉得高高的。在走着正步走，臂膊前前後後的揮着。他們整齊的走着，其中一人開始用高音唱起歌來，到合唱的地方，全隊都跟着唱，他們的歌聲響亮——是一羣粗壯的男人的聲音，沒有受過訓練的，粗野的，但是很合乎音樂的道理。他們在唱着聖戰之歌。姑娘們聽得十分興奮。

查理已經在他的房間裏備好了午飯，我們都很餓了，尤其是姑娘們。這頓飯吃得很好，我們同姑娘們玩了一個鐘頭，說着，笑着。我推說有事待料理，先走了。其實我是到戲院裏去看高爾基的戲的。戲提前開幕，因為半夜裏要戒嚴。

第四章 自掘墳墓的女人們

羅曼威夫老婆婆的故事

這個時候她該想起她的家屬。她很該想起她的亡夫，她的兒子伊凡，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兒子，和她的別的孩子們，他們都是生在陽光充足的，多灰塵的這個烏克蘭的木屋市鎮裏的。這個時候她該想起她的孫兒們，替他們做一次禱告。但是她只能想起她自己的房間，這是全尼古拉也夫最好的房間。這間房間有扇大窗，有座陽臺對着太陽，它是永遠暖和的。有一次共產黨想來佔住這間房間，但是伊凡出頭阻止了。她已經很老了，死了也沒有遺憾，她只想能再看見一次自己的房間，可是德國法西斯軍隊不理會她。他們把她同這些別的女人一起在街上捉來，把她們趕到這裏來，用手來掘壕溝。那些女人在壕溝上面站成一排，其中有幾個，年紀比較輕的，在那裏哭泣。她很想同她們去說話，因為一個人只要有件東西放在心裏想，就是想一間舒服的房間也可以，這樣就可以不哭了。她們站在那裏等着，一個德國軍官拿了一隻小巧玲瓏的照相機，準備替她們照相。

羅曼威夫老婆婆年紀太老了，死對於她已經沒有什麼可怕。但是站在她旁邊的沙芙洛諾夫娜老婆婆雖然也是老，但還沒有她這樣老；她正在哭着，因為她很關心她的孩子們的生命。她的一個孩子已經加入了烏克蘭民族獨立軍，而且已經離開她跟着軍隊走了。烏克蘭鬧獨立的事，在內戰的時候，也曾發生過，但是那時他們年紀還小，不會記得的。他們只記得一九三〇年的大屠殺，共產黨把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全殺了；他們是相信報復的，現在報復的機會來了，（可是沙芙洛諾夫娜老婆婆想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當德國法西斯軍隊開進市鎮裏來的時候，吉靈哥和另外一些人到鎮口上去迎接，他們照傳統的勞軍舊例，把麵包和鹽獻給德國人——那時她就知道不會有好結果了。吉靈哥把法西斯軍隊帶到NKVD（秘密警察）的總部裏去，那邊人是沒有了，但是德國人很高興，因為他們說，他們在那邊搜出一張共產黨員的名單，和有關紅軍駐紮的情報。NKVD的文件，吉靈哥希望法西斯軍隊把它們毀了，可是他們並不。那時她就知道要出亂子了。誰都知道德國軍隊開始清算共產黨時，是多麼可怕。德國軍隊到每一條街上去，走進每一家住有共產黨員的房屋裏去找人。她的屋子裏他們也來過。她聽見他們踢開了萊文斯基的房門，她也聽見德國軍官叫萊文斯基拿身份證出來；萊文斯基一定真的拿出來的，因為她聽見德國軍官叫道：「你是個猶太人，而且還是個共產黨！」這句話好像就是句暗號，槍接着就放，就在他的妻子小孩之前，他們把萊文斯基打死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全部共產黨員的名單。有幾個他們從二層樓陽臺上吊下來把他們吊死，有幾個吊在電杆木上，很多就吊在共產黨大會堂的大門口；死人到處吊着，有一星期之久，他們的家屬隨時可以看見。

想起了這一些，想起了這個市鎮裏所發生的慘事，沙芙洛諾夫娜老婆婆很替她的孫兒們擔心，不免哭泣起來。但是站在她旁邊的羅莎莉·洛浦嘉對於那些哭泣的人，是只有鄙視的。

羅莎莉·洛浦嘉是年輕的，是這許多女人中間頂年輕的一個，雖然長得黑黑的，也很美麗；在她這短短的生命過程中，她心裏總是憤恨不平，但是不平的情緒沒有比現在再利害了。羅莎莉的一條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她現在在想，她所以到這裏來把命送掉，就是害在這條倒霉的腿上。因為假如她的腿沒有毛病，她現在也可以同別的女孩子一樣在別處過痛快日子了。德國人叫她們站成一排，鎮上的年輕的健康的女人都叫去了，他們叫她們脫衣服；一個肥大的德國人，據說是一個醫生，按排檢查，用手指捏她們，觸她們，有時候也把手放到某些部門上去，如此他替德國軍妓營把所有的好看的和健康的姑娘們都挑選去了。伐維洛伐和伽莎和比拉那三個女人一面穿衣服，一面還笑；伽莎早就舁上一個德國軍人了，她笑着說，他們都是小個兒的，一點不麻煩，並不像俄國人那樣的利害，就她而論，她一晚上對付一團人，也不算什麼一會事。別的留下來的女孩子，重新穿起衣服，因為她們有命令要發配到波蘭的農場裏去工作。都送走了，只剩下羅莎莉·洛浦嘉。那個法西斯軍醫看見她的跛腿，不屑一顧似的掉頭而去，既不要她去作樂，又不要她去做工。她回到家裏去了，那天他們把她從街上拖了來，把她趕到這裏，叫她死在這壕溝裏。

對於羅莎莉·洛浦嘉，「死」也並不比「生」更為可恨吧。

在行列裏站在羅莎莉旁邊的一個女人，心裏非常激動，因為她知道她是不必死的。是的，她還來得

及叫喊，她有情報可以供給德軍，他們會饒她性命的。她也在這裏，這是椿錯誤。是的，她可以叫喊，說她有情報；這樣做了，別人也不會知道，因為她身旁那些人，快都要死了。她有情報，可以贖回她的生命——這個想法剛剛進她的腦筋，因此她是如此的激動。但是這一切不過是她的思想在轉，她沒有什麼行動，因為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的名字叫做范倫鐵娜·查歆可，她的丈夫是一個共產黨員，他還活着。因為德國人並不能把所有的共產黨員全殺死。安德烈·查歆可現在已經加入了「別動隊」，他們已經逃了出去，躲在樹林裏。他們在那裏躲了一冬，最近她知道莫斯科來的使者已經同他們取得聯絡，他們已經奉到命令行事了。無疑的，上次的那件暗殺案子是「別動隊」他們幹的。那個在市場裏找到的青年德軍屍體，喉管已經切斷——無疑這是「別動隊」幹的，沒有別人會用這種方法殺人。德軍統帥（他本是上次大戰時的將軍），所以勃然大怒，就是爲了那個德軍是如此慘死的；他當即下令全市居民該負責保證當地駐軍的生命，有一個士兵被害，他就要槍決十個市民作爲報復；命令一下，他就派兵士去抓人，把她抓來了，把那些女人也抓來了，帶到這裏來處決，作爲是第一批十個人質。她知道「別動隊」將要殺死更多的德國兵，可是那些愚蠢的德國人，和他們愚蠢的司令官，還以爲是市民們幹的呢。他們硬要說，老百姓不肯受範，密謀暴動；他們還要到處抓人質，進行報復，死了他們中間一個人，就要槍斃像她那樣的十個市民；這種報復方法將要推到每個烏克蘭市鎮鄉村，以致烏克蘭人將要恨德國人，怕德國人，以致他們將要忘記他們是如何的憎厭共產黨，這樣正是恰如「別動隊」所計劃的。

幾秒鐘以前，范倫鐵娜·查歆可還想起，假如她把這些話告訴了德國人，他們也許會饒了她的命，

但是她現在是驚慌萬狀，不知所措。

還有五個別的女人和一個小女孩子也都站在淺溝的上面。小女孩子抓住她母親的手。這些女人，除了羅曼戚夫老婆婆以外，都是感覺到絕望，悲傷，恐懼和憤恨，也還有一點詫異，除了羅曼戚夫老婆婆，因為她太老了，自然心平氣和，只是想着她那間房間，那間向陽的房間，在早晨太陽在地板上畫出種種光和影的圖案；想到這就是她的結局了，她也很快樂。

在那個時候，那個青年德國軍官的照相機已經對好光，把十個女人臉上各種感情的有趣的起伏，紀錄了下來，他做個手勢，叫行刑兵放槍。那個青年軍官，和他的司令官，都不曾聽說過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他們不知道農民在戰爭中是多麼的重要，但是這個理論在莫斯科是好好的研究過的。

第五章 美國女人和蘇聯特務

福開森的故事

戲院裏沒有取暖設備，但是戲的演出極佳。俄國人做這些事情是很在行的。看完第一幕我就出去。街上還有很多人等着要票子，我把我的票根送給一個穿皮革大衣的青年。然後我沿着大臣巷走，走進 Bolshaya Dmitrovka 區。天很黑，濕的雪風在腳周圍轉。我去找米德迦，但是我並不想找到他。可是忽然他走到我的身邊來了。

「哈囉，」我說。

「晚安，」他說。他用俄文說。

我們沒有說什麼別的話。我同他一起沿 A 馬路走去，一下子我們轉進一條小街，我們採取一條和上一次不同的路線，走向那座公寓房子。那一段街上沒有鋪石子，有些地方兩排房屋之間都是些半凍的水潭。街上沒有路燈，房屋裏面都是燈火管制了。米德迦碰碰我的衣袖，我們走進一個門口。我們所在的

這個門堂裏，有微微的光照着。我朝四周看，想要把這個地方在心裏記牢。牆壁是灰色的，無數人的手在那邊摸過，把它摸髒了，因為進來的人都要經過這門堂，再上木扶梯，上各層樓去的。牆腳在齊靴高的那一段，給濕氣侵蝕，已經顯得斑斑駁駁了。地板是石，或者是水泥做的；滿地都是黑黑的泥腳印，分明是在我們之前進來或出去的人留下的。但是我們剛才所穿過的那扇門，卻顯得很威風，好像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這是一扇粗厚的木門，幾十年沒有重上油漆了，精緻的浮彫圖案好幾處都已經磨蝕了。這種樸素的房屋有這樣一扇門是算講究的了，不過有一度俄國人是最愛講究門面的。

那晚我對於那座公寓房子知道得多了一點，我更能清楚的體會到屋內的密集無間的生活。我聞到煮菜的味道——煮熟的麵條和黑麵包的淡淡的甘香，我也嗅到晾着的衣服，嬰孩的圍涎，和許多人的腳味，還有「麥霍加」的烟味。也有人走動的聲音。我站在那裏的時候，我看見三個小孩子從樓梯上爬下來。他們看見我就停了一停，眼睛亮亮的，惡作劇似的，他們開始叫了：「護照，護照，證件，證件。」他們一下子都走了過來，拉住我的衣服，不讓我再往前走。

米德迦笑了。「他們在玩『查身份證』的遊戲，」他說。「你把你的護照給他們看吧。這是規矩。」我拿出我的身份證，交給他們。他們睜大了眼睛，但是很認真地看着我的證件，交還給我，然後再沿着扶梯，爬到地窖子去了。

米德迦又笑起來了。「那是我的同志吉斯底亞的孩子們，」他說。「他們就住在這裏底下。」我們再過一扇門，算是離了第一層的門堂。沿了一條黑的過道走了幾步，米德迦輕輕敲一扇門，我

們進去了。這就是我初會蘭吉和麗莎維德的小房間，但是現在裏面似乎人太多了，使人眼花撩亂，好像是在看一張馬克斯三兄弟的滑稽電影。蘭吉還在那裏，對我笑，伸出她的手；還有一位就是白皙的麗莎維德。另外有一個女人，他們介紹說是瑪莉。還有一個矮胖粗壯的人，名叫格萊哥。

小房間裏很亮。小火爐燒着，水壺直滾着，人跟人之間挨得太近了，走路都要在人身旁擦過，但沒有人理會這個。麗莎維德拿了我的大衣帽子，放到室外什麼地方去。

這一次室內有很多玩具動物。那隻象我還記得，此外還有一隻獅子，一隻老虎，和一隻斑馬。都是些很好玩的動物，狀態逼真，設計得是十分聰明的，材料都是些很平常的：零碎破布和幾顆鈕扣。

我稱讚了兩句麗莎維德的動物玩具。

「小孩子都是喜歡動物的，」我說，「不論是俄國小孩子或是別國的。」

「農民的小孩子喜歡它們，」麗莎維德說。

「你讀過『野獸世界』沒有？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讀到吉百齡時的高興。」

「我愛讀的書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種奇怪的人性的動物！」

「這倒是一種想法，」我說。「對於動物的愛把全世界的兒童聯結起來了。讓我們把這算做出發點吧。」

「對了，還有馬戲。」

「我們的童子軍有一隻歌，」我說：

「我進動物園，

有鳥也有獸，

一隻大馬猴，

月光底下坐，

正在梳他金髮的頭。」

米德迦聽了這隻歌很高興，叫我把它寫下來。我也覺得興緻很高。

牆上的照片使我很感興趣。在俄國通常看不到有什麼人家掛家庭照片的。我覺得我同蘭吉和麗莎維德已經夠熟了，我相信即使我細細的去那些照片，她們也不會見怪的。蘭吉看見我在看着，她也走過來，把圖上的人指給我。狀貌嚴厲的老婦是她丈夫的母親，大家叫她做「老婆婆」，現在住在尼古拉也夫，有七十多歲了。她身體很強壯，對待孩子們很兇——蘭吉說——她常用棍子打伊凡的。那邊一個人是她的丈夫，伊凡的父親，穿了一九〇四年戰爭中帝俄的軍裝。他是在內戰中被殺的。蘭吉又說，伊凡的父母出身是農夫，先是農奴；他們在田地上生長，但是田地是貴族所有的，貴族把他們稱做「靈魂」，算是地主財產的一部份。農奴制度廢除以後，他們進工廠去工作了。還有幾張是蘭吉的丈夫伊凡的照片，穿了紅軍制服，像所有參加過那次戰爭的人的照片一樣，看上去很奇怪的，好像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似的。但是這個伊凡無疑是個英俊漢子：瘦長，銳厲而結實。從牆上的幾張較新的大照片看來，他的兒子是另外一種人：那是個智識青年的樣子，長得像他的母親：長長的黑髮，大而黑的聰明的眼

睛，十分敏感的臉。這就是他們的一家。

麗莎維德打斷了我們。她端了茶進來，玻璃杯外面是銀套子。有一小碟方糖。茶葉和糖都是早些時候我送給米德迦的。糖是我從外交人員特種商店裏買來的，茶葉還是英國帶來的呢。但是誰帶來的這些厚禮，我當然不會提起，提起了太不成體統了；他們如此的熱心好客，正是俄國一般人民的樂趣所在；他們是在盛情的款待一個過路客人，他們把家裏所有的東西，全給搬上了，把客人馬鞍袋裏的乾糧也拿了出來給大家吃，也未可知。

我走過去，坐在那個她們介紹說是叫做瑪莉的旁邊。

「我叫福開森，」我說。

「我知道。」

「你不是個俄國人，」我說。「假如不嫌冒昧的話，請教貴姓？」

「瑪莉，安德森。」

「聽你的口氣好像是美國人。」

「真的嗎？」

「你是生在美國的，對不對？」

「在米尼蘇他。」

「那麼你是個美國人了。」

「我不是個美國人。我的護照是蘇聯的。」

「啊！」

「是的，我跟她們一樣。」

我對她看着，心裏很奇怪。她很樸素的穿着俄國衣服。她的頭髮是鼠褐色的，在腦後緊緊的束成一結。她長得並不出色，只是那對大大的灰色的眼睛，是很逗人注意的，可是她這時候盡量把視線轉移，不敢看我；除此之外，一點沒有打扮，看不出有一點胭脂口紅的痕跡。我猜她大約有三十二歲或者三十三歲。她看上去有點古板，受着生活的壓迫，心裏有着鬱結，那時似乎還擔着什麼心事；可是她就沒有俄國女人的那種頑強精神和拼死求生的力量，也許這就是她爲什麼仍舊是一個美國人，這點美國人的特性她並沒有喪失。她看上去一點也沒有搞政治的樣子。她好像從來就沒有做過什麼黨員。女共產黨員要更有自信的樣子，也更易聽信別人的話，而且，她們不會有這種拘束的神氣的，她就像普通一個美國工人的妻子，所嫁的丈夫是只知喝酒，不顧家務的。可是，也很明顯的，她在俄國住了很長的時間了。關於這個，早晚我總要知道。又是一個托我帶信的，可能是。

「這位是你的丈夫嗎？」我說，指着那個叫做格萊哥的矮胖粗壯的人。

她對我望望，眼睛裏充滿了鄙夷的神色，對於我的問題，竟不屑答覆，我想我一定大大的說錯了話了。

米德迦在對我做手勢，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說：這時候該把伏特迦酒拿出來了。我就乘便站了起來，

去拿我的大衣。

麗莎維德領我到門外的過道，她從附近一座壁櫥裏把大衣拿出來。

「我又說錯話了，」我說。「我剛剛問瑪莉：格萊哥是不是她的丈夫。」

麗莎維德輕快的笑了。

「到底他是誰呢？」

「他是『恩——凱——韋——代。』」

「什麼！就是NKVD嗎！」

「他是個老朋友了，」麗莎維德說。「他很會講故事。今天晚上我要替你做翻譯。」

「謝謝你，」我說。「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很有趣的。」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麗莎維德說，低聲的。「他現在不是恩——凱——韋——代了。他丟了差使了。」

「對不起，」我說，「我不大懂。」

「可是別人也都不懂。格萊哥是我們的保護人。我很相信他，我把什麼都告訴他，我知道他會救我們。格萊哥是很聰明的。有了他，天大的禍事也沒有了。」

麗莎維德的緊張的聲音，和鬼祟的神氣，使得我略為有點不安，我很快的往後看去。在過道的那一頭有一個門口，我覺得那扇門剛剛才關上。

「我們進去吧，」我說。

那個叫做格萊哥的人看見我們重新進來。他是個中年人，肩膀闊，臂膀短，頭是光頭。他的臉又闊又長，兩隻小眼睛之間距離很寬，假如距離好量的話，足有兩吋寬。他的眼睛是藍色的，眼睫毛是淡黃色的，長得很挺。他穿着一件深色的俄國式的便裝。他對我們看的神氣，就好像已經知道我們剛才是在講他。他看着我們的時候，塞了一塊方糖到嘴裏去，再喝茶，他就照農民的規矩，嘴裏含着糖把茶吸進去的。他看見我在用心的瞪目而視，開始大笑。我能夠看見他的粗厚的肩膀在動，可是他笑的時候不出聲，他的藍眼睛裏也沒有看得見的幽默。

我注意到那個美國女人和別人並不合在一起。她是獸獸的低頭看着衣兜裏的編結物。一針一針穿過的時候，她的瘦瘦的臂膀也很有韻律的動着，但是她的動作裏有一種緊張，以致我想她還是不要做她的活算了罷。

我轉過來看麗莎維德。要想出什麼話來談談，我就先講戲院。

「你以為不以為，戲劇已經成爲人民的鴉片了？」我說。

「也許吧，」麗莎維德說。她歎了口氣。

「在別的國家，電影是用來麻醉人民的，」我說，「這裏可是戲劇。」

「啊，」麗莎維德說，好像感謝我提醒了她什麼事似的，「電影！那不是一樣偉大的藝術嗎？」

「它可能在很多方面有大發展，」我說。

「你認識很多新聞記者嗎？」麗莎維德說。

「不很多，」我說，「幹嗎呀？」

「假如我們有部電影劇本，你想他們會不會發生興趣的？」

「我不知道，」我說，「誰都不知道他們會對什麼發生興趣。」

「假如有一部電影劇本，」麗莎維德說，「有人送到英國美國去，正式排演了，是不是很棒吧？」

「可能不錯，」我說。「俄國電影劇本會有電影公司要的。全世界人士現在都在注意俄國。」

「我真高興，」麗莎維德說。

「你在想起你的朋友卡爾了，」我說。

「是的。他會說英文，是我教他的。假如電影在英國美國排演了，他們要把原作者找去，是不是？」

作者不是就此出名了？」

「我想他們會請他去吧。」我對麗莎維德看看。她是否相信我會把這種無稽之談認真的來講，我也

不敢說。但是她的天真使人不得不認真。她是很認真的在看着我。燈光照在她編得光光潔潔的頭髮。

「好像你們說過他在一個集中營裏，是不是？」我說。

麗莎維德微微一笑。「他不在那裏，」她說，「他恢復自由了。」

「他越獄了嗎！」

「對不起，這是個秘密。什麼人都不許知道。」

「當然。」

這種話的意思我不懂。

「喂，」我說，「那個青年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麗莎維德又是一笑。「你要把劇本拿去嗎？」

我釘住她看了一回。我正是在給自己找麻煩。但是我反正沒有什麼事，而這種事對於我也並不難。

「好的，」我說，「讓我拿去好了。」

她的誠懇真使人無法拒絕。

「在你走之前，我會給你，」她說。

「可是作者呢？」我說。

「我們會很快樂的，」她說。

蘭吉一直在觀察我們，現在走了過來。

「你們在講我的兒子，」她說。

「是的，親愛的蘭吉，」麗莎維德說。

「你知道他爲什麼叫做卡爾嗎？」蘭吉說。

我略爲有點驚異。

「他是從卡爾·馬克斯得名的，」蘭吉說。

「啊，不錯，當然，」我說。「一個很好的革命家的名字。」

第六章 一個女革命家的幻滅

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回憶

誰還記得我們？只有那種從前怕過我們的人，現在假如還活着，他們會記得我們，因為我們都是死了。可是那些年輕人，那些另外一個時代的，從別一個國度裏來的年輕人，他們雖然帶來了善意和智慧，他們知道我們什麼呢？（可是我們是可能已經把這個世界改造了的！）現在他在這裏，誰都可以看出他的誠懇，他的替兩個不同時代做溝通工作的努力，他的超然態度和他的科學興趣；但是對於那種人，要把我們那時候的情感傳給他們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精神已經死去，已經被撲滅，或者是凋謝了，文字是不能使這種精神復活的。他們怎麼能知道我們那時是怎樣感覺的呢？因為那時我們是年青的；在我們裏面，有的是一股蘊積千年的朝氣，幾世紀來壓制下的力量迸發出來了；我們像是大海底下壓着的火山，突然一旦爆發，萬頃汪洋，盡成滾流。我們那時有多熾熱的力量！我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有的是力量，工人們的實實在在的力量；我們中間，有聰明，有才智，有技巧；整個世界就

是我們的。別人怎麼能知道我們那時所享受的自由呢？他們怎麼能知道在沒有饑餓剝削的威脅下過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那時不需要金錢，不需要財產，解除了迷信，也解除了階級的自卑感。你們呀，你們的生活是受束縛的，你們不得不賺錢，不得不聚財，不得不向權威低首，你們的心胸是給嫉妒和野心所窒塞了，給偏見的教條和拘泥所限制了，你們怎麼能了解我們當時是怎麼一回事？解除了一切布爾喬亞的壓力，不再感到缺乏，解除了一切宗教和道德的規律，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愛，自由地工作，一切照着我們的自由——這些你們怎麼能懂？誰曾經知道過這許多自由？誰比我們更快樂？

蘭吉在她的小房間裏，靜靜地出神地在回憶。

想起了當年的快樂，同凡雅在一起，他們如何在享受着這種自由的感覺，他們也覺得他們的使命就是把這種感覺帶給全世界，帶給被壓迫的和窮困的人。想起了當年的事也很好笑：他們的快樂太大了太天真了，因此波蘭的邊防兵士也上了當；他們臂挽着臂的穿過邊界，她還懷着身孕，兩口子十分的快樂，凡雅又像以前一樣的俏皮，對衛兵笑笑，衛兵也笑笑，從來沒有想到這兩個人可能是共產黨，他們就走出邊界，跨上去德國的大路了。

一九二三年的德國：她想起了初次進入德國時的印象是如何的使她激動：一個新的國家的美麗的小村莊和鄉鎮，整潔的農村風光，比之俄國的遼闊的起伏的草原和樺樹林，自是別有風味；小巧整潔的房屋，鋪得整整齊齊的路，是如此的潔淨，潔淨，潔淨；漆得很光鮮的小學校，樸素的小教堂（鐘聲是多麼的悅耳），肥肥的小店掌櫃們，一本正經的「老板娘」，她們的衣服是上過漿的，頭髮往後梳成緊緊

的髮髻；興高彩烈的「啤酒園」，宏偉的鄉村別墅，貴族們駕着馬車，後面跟着傭僚和獒犬。還有那些城市！她的想像之中從來不會有過這種偉大的景象，聳立的烟肉像香菇似的佈滿在地面，佔有不知多少畝土地的大工廠，黑黑的鋪石子的街道，還有那火車站的停車場——幾公里長的停車場。凡雅很漠不在乎，這一切他全知道，他不加理會，只說，「這裡有很多布爾喬亞。」在這些大城市裏，革命的意義在她的胸中擴大了：不值錢的貨幣，數以幾十億計的馬克支配了人的生活；軍人的寡婦到處都是，妓女（她們本來也是好人家吧）街頭賣笑，拉住了伊凡的手懇求他；乞丐，瘦得可怕的男人穿了敝舊的軍裝，瘦小的兒童，住滿了人的醫院。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裏走着，一對快樂的天真的俄國青年男女正有着十分堅強的信念：他們是在領導一個十字軍的。他們是來領導革命的。

柏林：伊凡在組織「紅色百人團」，她笑他新置的德國衣服，顏色灰灰的，太不像游擊隊的指揮官了。一家又一家房子的奔走，躲開那些房東太太，永遠留心着警察。伊凡每夜很晚才回來，他的那枝小白朗寧手槍從襯衫裏拿出來，攔在枕頭底下，她自己也幫着輸送武器和文件。她想起了那時她多麼驕傲，看伊凡如何在教德國青年們游擊隊的方法：如何應用各式大小武器，如何改裝不合尺吋的子彈，如何製造並應用手榴彈，如何炸毀鐵路線，橋樑，牆壁或是兵工廠，如何把炮彈當作炸彈用，伊凡對那些孩子們講着，一個天生的軍人：頭腦清楚，辦事有效率，喜歡自己的工作，也鼓勵起別人喜歡軍人的生活——這是爲了一個偉大目的的軍人生活啊！他們也是很親愛地，很尊敬地欣賞他運用武器的純熟，欣賞他的做事有把握和他的派頭——革命家的派頭……對那些從大城市裏工廠和窮巷裏來的，頭髮不梳，

身上油膩，臉上緊張的青年們講着，講着……

那時老是有罷工，老是給警察和資本家找麻煩，伊凡總是在那裏的，從警察的警戒線走出走進，鎮靜地，俏皮地，無畏地，甚至於竟大膽得和警察們點頭招呼；他穿過他們的警戒線——這一個革命青年的偶像。同那些德國同志們見面，那些精神嚴肅的人，用功讀書的人；她想起了她自己那時是如此的淺薄無知，心中常常私下慚愧；那些人討論着考茨基，馬克斯，恩格斯，般斯坦 (Bernstein)，許密德 (Schmidt)，列寧，布鄧 (Boudin)，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密歇爾士 (Michels)，一引就是長長的一段，分析得十分詳盡，同志們都是給革命的火點燃着，但是也給失敗磨鍊得更為成熟；在慕尼黑屢次受到挫折；在柏林，羅莎·盧森堡和卡爾·里勃克奈許脫 (Karl Liebknecht) 被暗殺了；在薩克遜奈，同志們充份的了解反對黨的力量：傭兵們，保王黨，貴族階級，已經重新恢復他們的地位，而且順利地活動，動力日益增強；同志們因此也相信了紀律和組織的重要，而且也很願意接受革命成功的俄國人的領導。

她想起了漢門·陸勃，嚴肅的拉小提琴的同志，那天晚上他拉着琴，伊凡跳着烏克蘭的土風舞，他們見着伊凡都十分高興，擁抱他，大家都喝啤酒，為革命而乾杯，他們都是些感情衝動的人，可是她知道伊凡感覺些什麼：跳舞對於他的心靈是沒有影響的，對於他，跳舞只是一種姿態，一種派頭，可不是感情。漢門和他的小提琴：這對於她是開關了一個新的世界，漢門所演奏的音樂是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奇妙的音樂，她突然的領悟到她需要音樂，突然的領悟到音樂道理的深奧；伊凡有他的活潑和靄的

態度，在他的冷酷的理智的俄國式的精神後面，也許也感覺到些什麼，但她相信他所感覺到的不會有她這麼深。

後來是漢堡：凡雅到了漢堡，發起了暴動，暴動撲滅了，他的下落也不明了；她十分焦慮，更增加了分娩的痛苦；卡爾生在一所清潔的德國醫院裏，那些日子天天等凡雅，可是凡雅不回來。搬回公寓去住，還是等待着，一天晚上他回來了；無疑她在睡着的時候他們都圍着看她，她醒來的時候看見他，他還給她開玩笑，說道，「你在囁語裏還是用俄文說話，」可是一句也沒有提起漢堡，只是看着卡爾，很高興。後來她聽見講起漢堡了，而且她也能到漢堡去看他了，她默默的立在一旁，那些德國幹部在指揮，這裏那裏的在囑咐命令，某一條公路，某一條鐵路，某一座工廠，他們堅決地相信革命已經開始了；在街上，在工廠裏，在鐵絲網阻礙物邊壯烈的血戰，工人們穿了深色污穢的衣服，提了步槍向警察衝鋒，拼命的衝，警察畏縮了，可是陸戰隊和陸軍開來了，工人紛紛倒地，死在溝渠裏面，血一條一條的在路面上流，死人只成了淒涼的一堆一堆的衣服；她回憶起伊凡就在那裏，走遍了一切危險地帶，在激戰中很有把握地也很閑散地各處走着，不顧危險，鎖定了戰士們的感情，使戰爭變得較為冷靜——因為他是個俄國人。「他們打得很好，就像我們以前一樣，可是這裏很難打，這裏的抵抗力強，而且都是有組織的；我們沒有活動空間，沒有樺樹林，沒有山谷，只是好的公路太多，汽車太多，鐵路線太多，對方反而容易增援，」只說了這個，一點也不提起失敗的事，不提起幾千幾萬的工人被送進監獄，並被處決，不提起在德國其他各處暴動的失敗，不提起「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失敗，莫斯科政策的失敗，這

些伊凡沒有對她說起，也沒有對任何人說起。有一天晚上，郭黎夫來看他們了；她想起了郭黎夫，英俊的面龐，淡黃色的頭髮像馬鬃似的披着，下頰很方正，黑黑的大大的眼睛；郭黎夫開口了，他說，「在蘇維埃裏面，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者，老官僚們太多了，也有太多人相信議會政治了。他們那些人一向給主子們餵養慣了，他們是捨不得放棄他們的特權的，我們要從工人階級裏把這些份子清除出去，我們要從內部下手，用宣傳方式來破壞他們所控制的陸軍，海軍和警察。我們必須要毀滅資本主義腐化手段的工具。」伊凡點點頭，不說什麼，她自己想說，「等等吧，」她知道郭黎夫的話就是指的是「切加」和恐怖政策，她想說，「等革命成功了再動手吧，列寧也是在舉行革命之後，再清算孟什維克反對派的；」但是她沒有說什麼，只是靜聽郭黎夫說話，她自己覺得慚愧，怎麼的她跟那些德國同志接觸之後，也變成愛討論辯駁了，她努力在她自己心裏恢復當年做游擊隊時候的單純的宗旨，專一的信仰……她對於自己心裏的新的感覺很奇怪，她自然就不敢開口；很快的，她覺得伊凡也有這種感覺，可能他比他更機警，更能體會別人的意思，他一下子就把握住了思想的路線，他因此也不開口。

於是列寧死了：這是一個大打擊，好像他們自己身體的一部份死去了，變成木乃伊了；但是他們想起了正有人把列寧的屍體用香料煉製，覺得非常討厭，認為是件荒唐之事，把好好的一個人變成偶像，只有東方的宗教才會這樣做，列寧知道了一定也要反對的。但是德國的同志稱讚這種事，他們早把自己算做三個L的信徒了——列寧，盧森堡和里勃克奈許脫（Lenin, Luxemburg, Liebknecht）。伊凡現在一出門就要好幾個星期，很少講起他的任務；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更多的挫折，更多的痛苦，但是對

於長期的奮鬥，已經不再抱空虛的樂觀的幻想，他有了一種新的冷雋的幽默。伊凡備了很多新的護照，他很得意，各式各樣的護照上，貼了他的各式各樣的照片，講起護照當局如何上當受騙，很是有趣，一切當局似乎都是低能的，總有些令人好笑的地方，但是那個「當局」呢？

活潑愉快的伊凡在大罷工的時候，工會正在發生分裂，到處都是失業的人，饑餓的女人和小孩子，但是紀律，更多的紀律，在軍隊和警察裏面展開宣傳工作，同志們被監禁起來被拷打，就像內戰的時候一樣，只是她比以前老了，因此一切也不一樣了：她心裏有了恐懼。英國的總罷工，中國的革命，托洛茨基被放逐了，齊諾維夫被開除黨籍了……。

爲什麼我要記得這些呢？

爲什麼我要記得頂傷我心的這些事呢？卡爾生出來，我怎樣痛苦，我不記得了，但是這個我記得。在我的心裏，也在伊凡的心裏，我們的快樂漸漸在溶化喪失；這件事情我們兩個誰都不承認，這是只有一個人可以知道的，秘密的，決不能暴露出來的；這是內心的羞恥，假如見到亮光，它就要在憤恨和死亡中焚化了。我們兩個人要說也說不出來的，因爲這不過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往日快樂之消失，一種徬徨，一種混亂，一種苦悶。

但是現在我想起來了，我想起那時所發生的一切羞恥的事。爲什麼我要想起這些事呢？爲什麼我的心不去想起那些比較快樂的事呢？

想起了我們的孩子卡爾，這個結實的俄國孩子，眼睛黑黑的，從來不像別家孩子那樣的會哭，凡雅

也開始喜歡他了；他本來爲了敷衍她，見了孩子總是嘻嘻哈哈的，現在變得真心關愛，可是一個當大兵的爸爸喜歡他的孩子起來，還是十分顧頂的。她想起了卡爾在坐車裏，春天的陽光照着，她在公園裏坐着看書，看馬克斯的「論革命與反革命」，看得出神，卡爾從坐車裏跌出來，躺在地上，她都沒有看見，旁邊的德國女人在批評她，說俄國人做了母親都是野蠻的。她更深深的想起「反革命」……

漢門·陸勃偷偷的把她帶去聽音樂會，漢門和他的小提琴給她的生命帶來了很多的意義，他們倆就成爲愛人了，因爲性慾畢竟不過是一杯水罷了。漢門是個很認真的也很小心的人，但是最後他把他的心事對她說了，他說他對於共產國際是否好好的在照主義工作，很表懷疑，他說工會如此的遭破壞，可怕的事一定要發生；她是替當局辯護的，她說工會裏的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人是資本家主子們用來腐化工人的，說的時候，覺得自己的立場很正統，可是也很軟弱；他說那個時候資本家主子沒有力量來實行工人所需要的改革，所以假如有真心一意的領導，工人一定會起來鬭爭的，否則恐怕資本家將要採取別種手段了；她說社會民主黨是我們的敵人，你們都是些機會主義者，是提倡議會政治的；突然她怕起來，覺得這樣辯論不很好，但是漢門只是悲哀，他們的關係也就此終止。想起這個，她愈來愈怕，她怕正統，怕說話，怕辯論，比起在烏克蘭那時候，她覺得自己又是老，又是軟弱，她的內心的感覺成了一種憤怒，她想起要公開譴責漢門，她告訴漢門她要在黨裏譴責他，後來可是沒有這麼做；可是幾個月之後，那個叫做葛斯塔夫的人來了，叫她做一張關於漢門的小報告，他說漢門是個法西斯間諜。突然她的憤怒發作了，她的眼睛裏冒火，她恨恨的要殺人，她跳了起來，大罵「切加」特務份子的殘害同黨，她

把所有罵人的話都搬出來了，把她的快要忘記了的教德薩猶太區裏的髒話全搬出來了，她歇斯的里的罵着，可是毫無結果。

這以後來了五年計劃。這是一件可以把握得住的東西。伊凡不再是革命軍人了，他成了個買賣人！伊凡替蘇聯幹起航運來了，買賣船貨。伊凡給一套新的繁複的手續包圍住，提單啦，保證幣值啦，保險啦，忽然成爲一個蘇聯的商人了，伊凡很愉快的應付着，他的譏諷的態度比以前更爲明顯，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之間開會討論，他還是十分嚴肅的。這一切都是夠悲傷的。但是在俄國所發生的偉大的事跡還是值得驕傲的，每張從莫斯科來的報紙都講起蘇聯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新的成就；這一切當然都很重要，可是有些事情也很令人不安：外國人和民主份子也一起來贊美蘇聯的建設了；烏克蘭糧食大量出口換取外匯；對於烏克蘭民族主義份子的鎮壓；還有些情報也不時從蘇聯傳出來：集體農場在進行着，農人把小麥埋在地下，把牲口宰了。伊凡的老母親也寫了封信來，「凡雅吾兒，速速回國，拯救爾母。共產黨徒竟欲強佔我斗室，驅我露宿街頭；想我暮年，惟此雅室，足以娛老……」伊凡笑着，寫信回去，說道：「母親請不必多慮，沒有人會搶走你老人家的房間的，因爲你是個蘇聯的良好公民。」他們倆就回俄國去了，回到伊凡的出生地。但是動身之前，老太太又來了一封信：「凡雅吾兒，彼等竟不認余爲蘇聯之公民，不准余登記，且謂將余名字從名冊上除去云。」到了莫斯科，伊凡去看「監察委員會」裏的一個老朋友，他要看看報告，他發現他的母親的公民資格快要被註銷，理由是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地主，伊凡說了，「豈有此理，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他後來在糖廠裏做工，賺六十盧布一個月；」監察委員會

叫下面再交一張報告上來，後來他知道當地黨部官員有好幾張宣誓證明書，證明伊凡的父親是個大地主；伊凡勃然大怒，監察委員會的朋友勸他不要生氣，說道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也沒有什麼可丟人的，何況你在海外替國家替「黨」做了這些工作；他授權給伊凡去調查這件案子。但是事情也沒有結果，當地黨部的證明書是確鑿整鑿，無法更改，這件事是不能翻案的了；可是也沒有人再去趕他的母親，她還是好好住在那間有陽臺的小房間裏。無怪人家都看中了那間小房間，那個市鎮人是太擠了，空氣太壞了，伊凡回去一看，比他記憶中的情形更壞，更是骯髒，更是蕭條，到處是饑餓，人們講起一年前的大饑荒，成千成萬的人死掉，都是談虎色變；伊凡在海外也曾聽說過關於大饑荒的謠傳，可是蘇聯報紙從來沒有提起過；他現在親自來調查了，知道了很多可怕的事實，可是他走遍各處，沒有一個人是記得他的父親的，他出生的地方，已經沒有一個熟人了，人口是在移動，整個村莊會走得一個人都不剩，成千成萬的人被裝運走了，因為他們反對集體農場。伊凡的怒氣還是不退：黨部的負責人員會如此顛倒是非，他是十分氣憤，他要求「監察委員會」裏的朋友再澈底調查，他的朋友突然不表示，而且不再接談……

等了好久，伊凡接到通知，說是可以到另外一個機關去調查；他容易找到那個地方，走過好幾間新式的寫字間，裏面掛了幾張面孔很熟的要人的石印相片；又走過好幾間滿是檔案櫃的兵營式的房間；一直走到內層的機密重地，雙扇門上釘了綠呢，地上是厚厚的地毯，那邊，一個穿着緊緊的OGPU制服（OGPU為「切加」改組而成，後又改組成NKVD），禿光頭的矮胖子。伊凡突然怔住了，「

就是格萊哥·索可！」「不錯，同志，是我。」寒暄過後，帶點譏諷口吻的伊凡說道，「啊，『切加』已經發展到這樣大的規模了。以前據說是過渡時期權宜之計，現在變了蘇聯的一個最大的機關了。」格萊哥微笑着說，「同志，你倒永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他笑的時候沒有幽默，他的小小的藍眼睛上面，淡黃色的眼睫毛刺一般的伸出來；伊凡突然的也看出格萊哥已經換了一個人了，他所受的那種訓練，那種教育把他改變了，而且格萊哥也不喜歡他再擺出老上司的面孔來，他連忙改口道，「好的，同志，我有一件小事要來麻煩同志；」格萊哥說，「沒有什麼的，同志，我什麼都知道了，」索可看見伊凡驚奇的樣子，突然大笑，他的厚厚的肩膀在搖動，可是嘴裏不出聲。「是的，同志，我們沒有事情不知道的，同志早年和無政府主義人士來往，我們也知道，可是請不要擔心，沒有人會來欺侮你的母親的，因為我們曾經表示過，我們要過問這件事。」「可是，索可同志，有一點情報是錯誤的，我的父親不是一個地主。」格萊哥又笑了，肩膀搖動着，說道，「啊，那些證明書！誰會把這種話用到我們的老同志身上來呢？我們的老朋友對地主們是太客氣了！」格萊哥又是大笑，伊凡也微微一笑，可是心裏覺得冷了下去，十分消沉。

後來站在那個廣場裏——廣場的名字就是用的他在西伯利亞的老同志：史維特洛夫——看着莫斯科：新的汽車已經代替舊時的馬車鋪得整齊的路，矗立的銅像，新的建築物，宏偉的地下鐵道——那裏挾着包裹的工人是不許進入的；他不喜歡這個，可是也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觸；他更不喜歡的是買麵包要排隊，人們的衣服都這麼破舊，任何地方，任何東西都比德國差遠了，可是在史維特洛夫之後，革命已

經到這個地步了。

回到漢堡，恢復做黨官的生活，工作很繁重，拼命的做，白天忙着，一直要忙到深夜；蘭吉現在很寂寞，她的卡爾已經是個大孩子了，留在莫斯科，麗莎維德在教他讀書；她看着時代的變遷，覺得眼力已大不如前，看着社會黨和共產黨間的鬭爭，心裏很是不安，看着納粹黨的游行，那個小布爾喬亞的希特勒，看着警察對羣衆開槍，可憐的人們倒在路上，成了一堆一堆的舊衣服；瘦細的腿在死人身邊爬過，子彈就往低處打來，打在鋪路石上，跳得很遠；可是什麼事也不發生，沒有人去領導工人，只是「五年計劃」，現在據說已經是第二個了。

有一天伊凡回家帶來消息，說是季洛夫被暗殺了，兇手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有兩百個人質從監獄裏拖出來，要被槍斃，伊凡說，算是報復。

我所記得的只是恐懼！

我所記得的只是那些引起我恐懼的事：莫名的恐懼，緊抓住我的心，可是我又沒法面對這個恐懼，因為這是不明顯的，不可捉摸的。在這恐懼的前面，我記得我們的精神破滅了，人格瓦解了；我們不能了解這個恐懼，可是不到末日，我們已經沒法解脫，無處呼援，無路後退，無地可容。現在我所記得的就是這個無名的恐懼，當時還不知道它的名字，現在是知道了。因為那時我們所愛的也就是這個恐懼。

（按指蘇聯大清黨而言。）

記得在這些年我們一直都等待着，不忍去看報紙，打開報紙總是審判和坦白，我們一看就知道那種

坦白，那種自我羞辱的行爲只是在革命精神腐化了才會產生的，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轉身，向哪裏轉身，只有拋棄一切——創造歷史的人反而向歷史低頭，我們的精神死去了，還是損害自己，鞭撻自己吧。不斷的恐懼，不斷的等待。

在伊凡的機關裏，一個又一個的工作同志被召回莫斯科去，伊凡板着臉，什麼都不說，可是別人心裏的痛苦，他也看得很清楚，他只是苦笑地等着，等自己也被召回去。有一天，年青的尼古賴也接到命令了，他流着淚來請求指教，伊凡雖滿腔血憤，還保持他冷靜的驕傲，什麼都不說，尼古賴出去了，第二天屍首在河裏找着。機關裏的舊人，只剩伊凡一個了，新來的都規避他，他也不跟別人說話。只是那些德國人還來恥笑他，有幾個德國人還陰謀利用他們自己的OGPU來陷害俄國人；伊凡對於那些外國人，本來只感覺到羞愧，現在羞愧變成憤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損害，要求補償，無論如何，不管用什麼方法，他總想出這口氣；因此他痛恨俄國的敵人；俄國人能如此忍受侮辱，而不發一句怨言，他覺得也很驕傲的。

最後，等了好幾個月，簡短的命令下來了，他們倆都要回莫斯科去了。

第七章 舊日的同志

福開森的故事

我們喝着茶，嚼着硬的絞餅。還有伏特迦酒和熱馬鈴薯。我們懶散地談着。

「此公又去看過戲了，」米德迦說。

「我是去看『夜店』的，」我說。

「他們是可以坐第二排的，」米德迦說。「看舞劇啊，看戲啊，坐前六排的總是英美盟邦人士。」

「他總是在宣傳，」蘭吉說。

「你去看過高爾基的戲了？」麗莎維德說。

「是的，」我說，「第二遍了。」

「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蘭吉說。

「你認識他嗎？」

「他每次演講我總去聽的。演講完畢後，我們還要同他談話。當時他是我們的靈感。他的每一個字，我們都要好好的吃下去。多麼漂亮的臉呀！頭長得多好看！他的運氣真好；他死得早，人家不會拿他怎麼樣了。」

「可是他的劇本還是上演的呀。」

「啊，可是請你注意，劇本裏的盧嘉這一個角色變得怎麼樣了？以前他是十分天真的：只要你能強烈的相信，你就有真理了：盧嘉是這樣的一個人。現在他講起真理來，似乎帶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氛。時代不同了，劇本裏的人物也改變了。」

「這個劇本是相當寫實的，」我說。「戲裏任何一個演員走下戲台，走到街上，沒有人會看出他們同現實生活裏的人有什麼不同的。」

突然蘭吉向我靠近，她的大眼睛發着光。

「不論」，她說，「不論高爾基想像得怎樣可怕，總沒有比現在再可怕的了吧。」

「現在真是危急存亡之秋，」我說，「我個人並不以為德國人將要在斯達林格勒突破。但是情形很壞。」

「每次我到麵包店裏去，對於門口那些乞丐，我總要施捨一點，」蘭吉說。「你看見過乞丐沒有？他們每天在麵包店門口要麵包吃。今天有一個撐拐杖的傷兵。他問我要一片麵包。我說，『走開。沒有東西給你的。給了你我自己要挨餓了。』我存心要他們失望；我存心不做好事，苦人讓他們苦下去吧。」

他們愈受苦愈好，這樣他們才會去思想！」

「你相信飢餓可以刺激思想？」我說。

「呸，思想！我要讓他們恨，我要讓他們好好的恨。」

「他們已經夠恨的了，」我說。「他們在恨德國人。」

「不錯。恨德國人比較方便一點，這是不會出亂子的。」

「德國人也該恨，」麗莎維德說。「你想想，他們做些什麼事！」

「是的，是的，」蘭吉說。「就是我也恨德國人的。」

「德國人是不可相信的」

「我以前很喜歡他們，」蘭吉說。「他們待我們多好。可是現在我恨他們了。真的，兩天以前，街上有個人碰碰我的手臂。我一看，那個人我不認識的。一個陌生人，穿了一件長的布大衣，帽子是燙平的，保藏得很新的樣子。他看見我不認識他了，他顯然很害怕。」

「『是我，』他說，『葛斯塔夫。』」

「我記起了。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看見了一個死人……」

「他媽的，」米德迦說，「你以為人都死完了，可是他們又出現了，看準了你的臉，問你道；『記得我嗎？』」

「我記得他，」蘭吉說。

「『原來是你，』我說，『我們漢堡時候的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對我看，又說道，『是的，是我。你記得莫亨街的房子嗎？這是多久以前了？十年了吧？』」

「我記得他，我說，『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他說，『我一直在莫斯科。』」

「我說，『啊，一直在莫斯科。』我賭咒，那時我這句話忍不住要說。」

「他說，『莫斯科是我的父母。我多麼愛莫斯科呀。』」

「我說，『莫斯科就是莫斯科。』」

「他說，『什麼都沒有改變。』」

「我說，『伊凡現在在參加紅軍作戰。』我真沒有辦法不說下去。」

「他說，『勝利的紅軍一定會把法西斯軍隊趕出去的。』」

「我說，『你一直是一個忠實同志，葛斯塔夫。你很機警。』他又害怕了。」

「『現在什麼都一樣了，』他說，『沒有人會來懷疑我的。』」

「我說，『祖國一定很感激你的。我相信庫都索夫，蘇伏祿夫，亞歷山大·奈夫斯基那些古代名將

的精神正在鼓舞着你。』」

「他說，『我們改日再談吧。』」

「我說，『請記得伊凡·葛洛次尼。記得他是一個偉大的俄國人。』」

蘭吉把這故事說完，米德迦眼睛亮亮的，很頑皮地高興。

他對我說：「不錯吧？誰都是來探人口氣，陷人入罪的。你看，真像演戲。」

米德迦把這故事用俄文重述一遍，告訴格萊哥。蘭吉並不注意他。

「他是個好同志，」她說。「在漢堡他很忠心的工作，服從黨規。他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記得他是一個德國人。這些日子，一個德國人在莫斯科是多麼的難受。」

「他恐怕在做對敵宣傳工作，」我說。「也許人家要他去廣播的。我聽說披克正在對戰俘宣傳，勸他們信共產黨。」

「宣傳，呸！等我們征服了德國，恐怕那些人要把以前的納粹黨都改成共產黨吧。」

「照目前看來，這是不可相信的，」我說。

可是蘭吉不答覆。這個奇怪的女人已經陷入自己的思潮裏了。

第八章 獄 中

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回憶

白天，他們在莫斯科街上走着，他的心胸開曠了一點，她也覺得快樂。可是晚上，在旅館的房間裏等着，通宵的等着，她的精神萎縮了，空氣變得很難受。有時候他靜靜的坐着，凝神看着檯燈上所發出的一圈光，有時候，他也說話，再從頭把他們替卡爾所做的安排，考查一遍；卡爾已經交給了麗莎維德，留在公寓裏，他們所有的幾件可以變錢的東西，也已經交給了麗莎維德。能夠做到的，是不是都做了呢？還有什麼別的要做的呢？可是同時他總是留心聽着。有什麼人進旅館，他就用心傾聽，他聽他們的腳步聲，聽他們上樓，他知道他們在哪一家門口停步。一天晚上，很多重腳步聲走上樓梯，到了他們底下的那層樓停步，他們聽見打門，接着又聽見「走吧！走吧！走吧！」兩聲。他們是來找一個鄰居的。有時候他會出汗。有時候，他拿起他的大衣，穿了上去，又戴起帽子，好像要走出去似的。可是等一回又脫掉。一天晚上，她不能再忍受了，她把那枝小白朗寧手槍拿出來，放在桌上，可是他說，「不，你不

能同他們打；」他誤會她的意思了，她只想兩個人一起死去，可是他沒有這種想法，他心裏一點不覺得他是個罪人，他只覺得有一種壓倒的力量，他只覺得歷史在轉變：一種不可了解的命運。

他們剛從德國回到莫斯科來的時候，也有朋友來看他們；但是他們一看見伊凡的脾氣，他們都不說什麼了。後來那些朋友們告訴了他們一些事情。這個人被抓去了，又是那個人被抓去；凡是做過「中央委員」的除了兩個女的，統統被抓去了；「監察委員會」裏的，還有好些別的機關裏的首腦人物，統統被抓去，到處有空的公寓房子，門上貼着封條；小孩子們各處亂走，關在門外，沒有人給他們吃的，沒有人照顧他們，現在誰都只好顧自己，小孩子們只好由他們去了。「你們聽見沒有？昨天夜裏黎谷夫被捕了！」（按黎谷夫（Lykov）為繼列寧任蘇聯總理者。）沒有人再在紅場上走路了，任何人都是遠遠的避開克里姆林宮；好像它的圍牆的影子，就代表着死亡。蘭吉記起了她以前所談過的關於西班牙異教裁判所的歷史，人類歷史裏，只有在那時候，才有那種恐怖的氣氛。

記起了他們的鄰居奈德金，千萬個庸碌的黨務工作人員之一，他們幫助了列寧在一九二三年的鬭爭，幫他拉來了許多選票，打垮了那時的反對派；那個傢伙做黨務工作，居然也過着比較安閑的日子，所有的口號標語，他都背得爛熟，他是一直感覺很安全的，而他的外表也正表示他的安全感；她記得，這樣一個人忽然有一天大為恐慌，他開始在街上公開的罵史大林，罵得很毒，就像在「革命」時期，她所記得的那些驚慌的布爾喬亞所罵出來的話一樣。那時的空氣就是這樣的恐怖。郭黎夫夫婦也從西班牙回來了，男的還是很英俊，像伊凡一樣，十足軍人氣概，馬鬃似的頭髮現在變成灰色了，但是因此更爲

英俊。像伊凡一樣，起初不信，充滿了自信，不切實際，只以為清黨是對的。但是幾天之後，他就變了，說道，「般金是個反革命，倒令人難信，」又說道，「怎麼庫卓夫也是一個敵人間諜嗎？」他的太太說了，「他們要是間諜，你也是間諜了；」又說道，「等着吧，他們會找你去的。」一星期之後，郭黎夫夫婦都進去了，他們的公寓也封起來了。可是他們還是等着，等着，到天亮四點鐘，屋子裏已經滿是青烟，到五點鐘，伊凡說道，「不會是今夜了，」說着也就去睡了。

這樣一夜一夜的過去，過了一九三七年——三八年間的冬天，她開始以為，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了。可是有一夜，他們來找他了，他幾乎是快樂的對她笑笑，同她擁抱過後，同那些毫無表情的衛兵一起走了。

那些月間，伊凡·羅曼威夫所受的監禁，盤問，拷打之苦，蘭吉·賽米亞諾芙娜也同樣感覺到的；他所受到的一切，事實上以後他也告訴她的；還有那些他不能說的——他不能說因為是太難說了，因為他有那種痛苦，因為他的理智已經不能表達思想了，——那些她憑直覺也感覺到了。

進入他的意識的，第一是臭氣；其次是很多人的聲音。當他的眼睛習慣於黑暗了，他看見囚房裏有五十多個人。囚房並不大，有幾個人是躺在靠牆邊的多層牀上，別人就躺在地上。在人與人之間，簡直沒有插足餘地，他站在那裏，他覺得人的身體就擠緊他的腳。他的眼睛在囚房四周看一遍，他發現了那個已經快要把他臭倒的臭氣的來源：那是一個裝滿了大小便的木桶。他進來的時候，鐵門「克拉」一響，驚動了那些襤褸的囚徒。「來了一個大個兒了，」一個聲音叫道。「來了一個大個兒，給大個兒讓

路哦，」另外一個聲音叫道。「歡迎進我們的『人民公敵之宮』裏來呀，」又是一個人這麼叫，還有人在笑，衛兵嫌太鬧了，便用鏈子來打門。「同志，這裏躺下吧，」他旁邊一個人說道，「後來的排班排在後面。老手才有床板睡。」但是伊凡並不躺下。他是準備住在一間單人囚房的，他被送到這裏來，他以為一定是弄錯了。囚徒中一個人，看見他在躊躇，說道，「老兄，躺下吧。我們是活人，請不要看不起我們。你的想法就會要改的。」「我是準備一個人一間的，」伊凡說道。「啊，」那人說道，「你還以為自己這樣了不起嗎？單人房間是給死囚的，從單人房間出來，就要送進地窖裏去的。對於那些住單人房間的，他們可準備了不少花樣呢。」另外一個人叫道，「我們這裏可沒有公理，」引起更多的苦笑。伊凡聳聳肩，在一排人的末一個位置上躺了下來。人們開始打鼾，有人在呻吟，他附近一個人靜靜的啜泣。那一夜，那第一夜，是他以後回憶起來記得頂清楚的一夜，另外那多少夜，多少天，以後在望遠鏡看來，只是一團可怕的惡夢而已。早晨，衛兵送來了黑麵包和水，高處有一個鐵條的窗洞，透進來一些微弱的灰色的光，他現在看得見他難友的瘦削的鬚髮蓬鬆的臉，和他們的骯髒破舊的衣服。有幾個囚徒圍着他站着，笑他的那身清潔的制服，有一個人說道，「同志，賣了它吧，值好多麵包呢！」另外一個人說道，「他們叫你去的時候，同志，你要坦白。」他記得他看看那個人，神氣很是不服，接着聽見又是一個人說道，「是的，什麼都要坦白。他們太喜歡坦白了！我把我的弟弟，我的父親，所有我的朋友，統統坦白進去了。能坦白的東西是沒有底的，同志。多坦白一樣東西，你的命就多留一分。」伊凡把頭轉了過去，那人叫道，「哦，你現在有這副神氣，過幾天再看着吧。喂，諸位同志有什

麼意見，等着這隻火鷄審判過了一次再說吧。」有十幾個人喉嚨裏沙沙的一響，算是同意了。

衛兵進來了，叫人出去，門「克拉」「克拉」的響着；門一響之後，跟着就是一片寂靜，每人都在等着自己的名字；發現門響不是有人出去，而是有人進來，那時真高興——這一些他都深深的感覺到。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吧，有五六個人叫出去，只有兩個人是回來的；第一個回來的，臉色蒼白，默不作聲，有一個人叫道，「瞧呀，坦白的人回來了，請看這坦白的人呵！」第二個人是衛兵用擔架抬進來的，扔到地上，外套上都是凝滯的血跡，有一個人叫道，「我願賭這個人沒有坦白。我願賭一公斤麵包這個傢伙沒有坦白。誰願跟我賭的？」囚房裏的囚徒現在都看着地板上的人，破爛的衣服上都是血跡，他們看他的手臂伸上來，有傷痕的身體慢慢的轉，頭靠在臂上，一隻受傷的眼睛睜開來，對他們看。那個打賭的人又叫道，「啊，他沒有坦白。你們的麵包呢？」他記得那天晚上挨着那個受傷的人睡，聽出那靜靜的不敢放聲的啜泣就是從他發出的，他要倒水給他喝，啜泣聲小了一點，受傷的人只是說，「謝謝你，同志，」停了一下，微微喘一口氣，說道，「我是一個教員，」說罷，也就睡着了。

他記得，門「克拉」一響，進來一個青年人，差不多還只是一個孩子，就站在他以前所站過的地方，照樣的那些難友們也是粗聲粗氣的給他開玩笑，伊凡說道，「提起精神來，同志。不要理會那些人說什麼話。他們苦受得太多，精神已經變態了。」那個孩子兇兇的說道，「別同我說話。我到這裏來是我們抓錯了人。我不像你一樣的是個『人民的敵人』！」伊凡不說什麼，下午青年人就被叫去，去的時候得意揚揚，頭抬得高高的，別人的玩笑話，一句不理。幾個鐘頭之後，帶回來了，靜靜的躺下，看看伊

凡，記得就是同他說過話的人，可是不說什麼，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他的感覺已經被打成粉碎了。第二天，或者是再隔了一天，青年人又被叫去，可是不再回來了。

那些事情他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他自己的痛苦，反而模模糊糊了。記得他總是很得意地在胸前掛着的「紅旗獎章」「列寧勳章」，那種瑣瑣瑣瑣的勳章，有一天給人從制服上撕了下來，撕下來而且擲開了；他記得這隻手，他也記得有個人對他說，「你要去的地方，是用不着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的！」他記得他心裏怒氣直升，可是臉上腹上，拳頭打上來了，打得發昏，上氣不接下氣的，四肢無力的躺在地上，那個聲音又說道，「你出賣了些什麼蘇聯的秘密給外國人？講！」那個聲音把問題重複的說，宏亮而波盪的聲音，好像是鐘聲，在他的心裏動着，動着。他聽見自己的聲音，熱烈地否認，否定的字眼不斷的說着。以致這些字說得只成聲音，沒有意義了；那個聲音又說道，「我們什麼都有了，證件都在這裏：你是同謀的，不容再辯！我們要知道：你到底洩漏了些什麼機密？講！」突然後面有人把他捉住，用勁的打，打在背上，打在腰上，打得很重，每打一次，全身直幌，好像靈魂都打了出去；每打一次，從肚子通過橫隔膜，一直痛到喉嚨口，喉嚨口好像在燒；他跌了下去，倒在牆上，問官把他拉起來，把他放在一張小檯上坐直，說道，「你看我們是如何的對待人民的敵人，對待間諜奸細的。這不過還是開頭罷了。」伊凡覺得鹹腥腥的血到他的嘴邊了，唾涎在流，連痰連血，和成一塊，「哇」的一聲吐在問官的臉上。以後的事就不記得了。

從昏迷中醒來，他的眼睛從腫起了的肉山——他的顴骨——望出去，覺得肉在跳，鼻子已經打斷

了，塞滿了血塊，以致他不得不用嘴呼吸；肋骨突然劇痛如割，他倒有點高興，因為從這個痛看來，他的肋骨還沒有打斷，只是有些地方或者打裂了，他的頭裏在跳，鼻子裏一陣臭氣，慢慢的胃在翻，口渴得發慌，全身在搖，可是吐不出東西來。他昏昏沉沉的說着，「我不招，我不招！」他知道這就是轉捩點。這樣當局的權威無所施其技，國家和革命也都完了，只有慢慢的死去。他對自己說，我招了，他們要殺死我的，我招了，他們要殺死我的。可是我不同，因為我不會變成一個奉承的人，我決不肯在鞭子底下做工作，我要殺人，我是個叛徒。因此，無論如何他們要殺死我的。說了這些話，不知怎麼的，從他的心的某一個角落裏，舊時的譏諷的幽默又爬上來了，他有勇氣去譏笑那些間官，作弄他們。笑在他的破碎的嘴唇上出現了，因此罰立在走廊裏，聽着一片呻吟聲，慘叫聲，衛兵在他身邊踱來踱去，每走到第五回，衛兵的皮靴腳跟就踏在他的腳趾上，他衝到衛兵的身上去，衛兵的槍托打在他肚子上，痛楚難忍，他又罰立在那裏了；現在衛兵每走過第三回，就把皮靴腳跟踏在他的腳趾上，他的腳趾給壓扁了，血從鞋底裏滲透出來；最後他倒下來，他的腳再也不能站了。

「你的同謀犯是誰？」話還在那裏說，不斷的說，心裏真想招了吧，招了可以不受罪了，可是招什麼呢？什麼都好，招了就完了，想起下地窖的臺階，倒也很高興，只消幾步下去，手槍一響，他的身體就可以直躺在地窖的地上，跟別的屍體一起裝上卡車，走上最後的靜靜的到墳墓去的路上。這樣想着，想着，愈想愈高興，可是從他的心底裏，那冷酷的幽默，那嘲笑的恨又爬上來了，以致他說，「普萊哈諾夫，克魯泡特金，史維特洛夫，列寧，我的同謀就是這幾位。」他們聽見這句話，似乎是滿意了，他

的臉雖然腫着，隱隱的還在笑；他們拿出漂漂亮亮，長長的供狀，放在他的面前，他讀了：「致葉索夫同志……」他心裏在好笑，他竟要服認這許多罪，罪名一項一項的佔了好幾頁，最後讀到「此懇恩宥」，到了他的簽字的地方了，他突然拿起筆來，把名字一簽，可是很快的在名字底下寫了這幾個字：「拷打後簽。」問官本來很得意的笑容，變成狂怒，好好的一張紙，給他糟塌了，又是拷打，這一次是四個人把他捉住，一隻酒瓶不住的往他的肚子上打來，無比的痛苦，突然間他的肚子痛裂，人往前跌，他的膀胱裂開了，卻是血……

神志恢復半醒了，身上痛苦難言，疝氣腫脹，渾身乏力，小便不通，更是難挨，又昏厥了過去。再醒回來的時候，他又意識到有人在關囚房的門，他總是聽見門「砰」的關上，有人叫他的名字，衛兵在他的身邊，一切又要重演一變，他自己對自己說道，是的，今天我要簽了，我要簽了。可是衛兵不來找他，長時間的躺在那裏，躺了無數的日子，一桶一桶的冷水，澆在他身上，給他退燒，心裏很明白，可是說不出話來。記得長時期的等待，囚徒們的聲音鬧了起來，愈鬧愈響，因此衛兵常常用鏈子來打門了。有一個衛兵拿一面鏡子進來，把鏡子釘在牆上，那些瘦削的鬚髮蓬鬆的人對鏡自照，都不認得自己了，又是說殘酷的笑話。他也不認得鏡子裏對他看的那個重傷帶病的人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他的頭髮全變白了。衛兵來了，把他帶到一個地方，是他從來所沒有到過的；身體在走動，身上的創痛更是發作；又該是老套的長篇大論，可是他聽不見什麼，他只是說，「讓我簽字吧，我願簽了……」坐在他那個地方，一直等到一個勤務兵來叫他再往前走。「可是押解我的衛兵呢？他們哪兒去了？我要到哪兒

去？」衛兵說道，「同志，我也不知道你要到哪兒去，可是你非走不可。法庭已經結束了。」他站起來，往外走，時間是黃昏，暮春的黃昏，莫斯科可愛的春天，街上的積雪全消，空氣清新宜人，而他是自由了。

第九章 逃 難

瑪莉·安德森的獨白

是的，福開森先生，我的名字叫做瑪莉·安德森，我是在美國米尼蘇他州出生的。可是我從來不是個共產黨員，現在也不是。我的父親的確是工會的一份子。他是個木匠，他在美國好多大城市裏做過活。可是也不是個共產黨員，我想我的父親現在還健在，可是我們好久沒有通信了，我有時候也想，假如我的父親在報上讀到俄國戰爭的消息，不知作何感想。也許他以爲我死了。我以前是同一位姑母一起住在紐約的勃魯克林，我在梅西公司任職。我那時很年輕，羅勃也很年輕。可是羅勃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他所講的那一套，同我的父親差不多。羅勃是生在俄國的，在俄國內戰發生之前，隨父母離俄來美。他們都是猶太人，但是羅勃已經歸化入美國籍，他進美國學校唸書，說話穿衣服，都同美國人一樣。可是他一提起他的父母離開俄國這一件事，他總是很氣憤的，他一直想回去。我老這麼想，他所以變成這樣厲害的一個共產黨員，同他的想家一定也有關係。羅勃在學校裏成績很好，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已經有了一個好差使。我們常一起去看電影，我們也總是到幾家固定的地方去吃東西。我們平常總是在那種靠在櫃臺上吃的那種小館子，但是我記得我們也去過一次綠州餐廳(Luchow's)。我很愛羅勃，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只有十九歲，他二十一歲。我們先同我的姑母住在一起，隔了一些時候，我們有自己公寓房子了，想起那公寓，我現在想想我們那時多麼快活。我想起了我的那間小廚房和我所有的那些罐頭食物，還有帶着淋浴設備的洗澡間，和冬天的水汀。我們的房間才只有一間，可是很講究，每月房租三十元。我的兩個兒子就在那時候生下的。生了強尼之後，我們的小房間就嫌太小了，但是我們勉強湊合下去，也湊合得很好。

羅勃生在俄國，應該算是俄國人，因此他在共產黨裏，竭力支持莫斯科路線：他常說「美國勞工協會」和別的那些人都是「社會法西斯份子。」在那時候，他已經是共產黨裏的一個組織人員，到處組織新工會。羅勃做事很認真，好幾次他都招了麻煩，回到家來，衣服撕破了，臉上也是傷痕。警察很快的知道他的名字了，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對於共產黨內部的派系糾紛，羅勃是很覺氣憤的，好幾次他都說要離開美國，到俄國去。他常常帶些報紙回來，裏面有關於「五年計劃」的圖片文字，我看見了總很興奮，總是勸他走。那時適當美國鬧不景氣，很多人失業，民生凋敝，我對於美國的現狀，也很不滿意。因此有一天羅勃回到家來，說道我們要動身到俄國去了。羅勃去莫斯科是黨裏有任務，我們要帶着兩個孩子一起去。我興奮得不得了。一九三三年我們到了莫斯科，我們住在樂士大飯店。現在樂士大飯店的門禁森嚴了，進大門出大門都要驗身份證，住在哪一層樓的客人，到了那一層，還有衛兵來查身份

證；可是那時候很自由，住滿了外國人。我們住在二樓的一間房間，那裏是沒有浴室的，起初很覺不便，但是我們見了這許多人，看見了莫斯科，紅場和其他的名勝，還有這許多俄國老百姓，日子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我們在樂士飯店住了六個月，我總想搬到別處去住，但是羅勃說，這裏同紐約不同，要搬家先得官方批准，不能隨隨便便去租一間私人公寓來住的。隔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心焦得快死了——我們在亞拔茲區租得一間公寓，我們搬去住了。羅勃的客人是來不完的，一討論就常常討論到深夜。但是我太忙，也沒有功夫去聽。我要照顧小孩子，我要整天的去排班買東西，在我們的小爐子上煮菜，替他們洗衣服，還要設法給他們找鞋字穿。我們沒有錢，而且，不必說的，羅勃也沒有職業。我們只有些配給證，還有些我們從前節省下來的美金。我要找職業，最後總算在無線電廣播局找到一個事情，替他們做翻譯工作。那時候我已經會說俄文了，把俄文翻成英文並不難，我就幫他們對外廣播宣傳。孩子們都大了，非常會鬧，人家都說就像美國小孩子。我也替他們得意，因為他們是生在美國的，好像的確與眾不同。現在想來，那時我太注意孩子，恐怕我是錯的，因為羅勃事事不如意，心緒變得大為惡劣。那時是一九三五年。照俗話說來，我們那時不再做夫妻了。我也很疲乏，事情也太多，而且俄國到底不是美國。那一年我們第一次大大的吵了一架。我們應該分居了，可是那樣辦不行，因為羅勃找不到住所。羅勃沒有地方睡覺，他只好仍舊住在我們的房間裏，同孩子們和我睡在一起。一九三六年他決心去西班牙從軍，我心裏大為安慰。在政治上，羅勃出了些什麼事，我並不知道；但是在莫斯科什麼樣的事情都有，在美國是決聽不到的。大官常常被抓去，說是犯了破壞罪，要受審判，假如你是個共產

黨員，連生命差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想那時一定發生了好多事情，羅勃暗底下在驚奇恐懼。當然，他還走絕對擁護克里姆林宮的，但是他們老不給他差使做，他心裏難免懊惱。所以有一天，當他回家來說他到西班牙去從軍，我很是高興，他也很高興，因為他想真真的爲一個理想去作戰。他走了之後，我很快樂。從今以後，我將要有更多的自由。我的俄文進步了不少，我非但能讀，而且也能寫。我有個好差使，生活得很安靜，而且我有孩子陪伴，頗享家庭之樂。可是第二年，局勢變得大爲離奇。公審本來是一直有的，反正總是審些俄國大官，我從來不十分注意。可是現在什麼樣的人都有了。我聽見街頭有人談論，有人說凡是老布爾什維克黨員，統統要殺掉，也有些別人說，大戰將要爆發，先要把外國間諜肅清。可是情勢愈來愈嚴重，隔了一些時候，沒有人再在街頭談起了。除了看報以外，別處什麼消息都聽不到。可是那時周圍的空氣十分離奇。我那時暗暗慶幸，沒有加入共產黨。共產黨的那一套，我總搞不清楚；羅勃和我在這一點上，最不能調協；他對我頂大的失望，也就在此。可是在一九三七年我慶幸自己沒有加入共產黨。我很害怕，但是我毫無表示。我不開口。每天我照常辦公，因爲我不能不要錢，但是我對局裏任何人都不能說話。他們一個一個的失蹤了——全部的俄籍僱員，和大多數的外籍僱員，他們的職位，都給新人來接替。他們又走了，又有一批別人來接代，有時沒有人來接代也有的，他們的職務就這麼擱下去了。公寓裏別的房客，我也不同他們交談，連那個管理員，我也不跟他說話的。我現在還不時很奇怪，我麼能僥倖逃過，現在想想，恐怕那時人家都不知道我已經領了蘇聯護照。他們都叫我「美國小姐」，恐怕他們以爲我還是個美國公民哪。我很高興，因爲那時莫斯科滿街都是些小孩子，同

我的差不多大小，乞討度日，因為他們無處可住，他們的爸爸媽媽都給捉進去了，他們的家也給封起來了。

想起來真可怕，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到一九三八年中，事情恐怕已經平靜了，因為我不再聽見什麼，報上也不提起什麼了。羅勃一九三八年從西班牙回來，而且因戰功還領到一枚紅星勳章。我相信他是一個勇士。可是他掛了一個星期勳章以後，就不再掛了。他並沒有同我們住在一起，是我叫他睡到別處去的。這是我自出主意的第一件事。在他出國期間，莫斯科發生了些什麼事，我沒有告訴他。他到我的門口的時候，我只是很驚慌的對他看看，叫他走開。他看見我的臉上的表情，我相信他該立刻就知道另有別因，與他無關，他該知道我是很歡迎他回來，我們還是好朋友，我只是不要他回到原來的公寓裏來住而已。他一言不發的走了，一星期之後，他回來了，我讓他進來。他要看看他的孩子。他說我把他攆走，我做得很對。這一星期以內，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的老朋友沒有一個再在人世的。他的舊日的友人，不論是俄籍的還是外籍的，統統被捉進去了。在有些地方，從某些人的嘴裏，他能知道的，他都知道。這個他沒有同我討論。我對於此事的感覺如何，他是了解的，我相信他對我很感激，而且很高興，因為我把孩子們保全了。可是我也看得出，他也大大的變了。他已經被開除黨籍。他在西班牙做了許多工作，還參加了戰爭，落得如此下場，對他是一個慘重的打擊。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罪名，可是我相信，「人民公敵」的雅號，也加在他身上了。假如他早三個月回來，他也要被捉去的。但是風潮已經過去，那時也沒有什麼人被捕了。他此次是來向我們辭行的，而且來看看孩子。他們都長大了不少，

大的那一個更是一天一天的像他。羅勃說，他將要離開莫斯科，到一家工廠裏去工作。此後我就不大見到他。大約每隔六個月，他要回來一次。我上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年以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像一個美國人。他就像一個俄國人，服裝都是俄國式的，英文差不多已經不會說了，我們只用俄文交談。他的鬚髮不修，除了麵包問題，什麼都不想。他已經不是一個智識份子，他就像你四周能見到的人那樣；同他們一樣，他也不喜歡開口。他們那些人不開口，是因為沒有東西可講，可是我相信羅勃是有話可講的，我相信他雖然不開口，他不會把過去忘記得這麼快。他告訴我他在駕駛卡車，要開到喀山去，因為德軍已經進抵凱姆基，只在二十哩路外了。他很想知道我將怎麼辦。他接替小孩子們擔心，可是他也不能幫我什麼，他是替政府某部辦理撤退，他的車子是要裝官員的。我告訴他，孩子們我會照顧，這不過是去年十月間的事，看起來好像已經隔了好久。

那時候的緊張情形，我永遠不能忘記。各區區黨部在招募人民義勇軍，這樣我們才知道形勢已經十分緊急了。德軍已經兵臨莫斯科，共產黨黨部儘量在招人去抵擋。義勇軍整千整萬的到黨部去報名，看他們出發，真替他們覺得可憐，可是他們很勇敢。他們連正步走都不會。裏面也有些老戰士——在內戰時期的老黨員，他們倒很容易看出來，因為他們還會舉了腿正步走，他們唱奇怪的舊日的進行曲，那些年青人們所不知道的。他們領到了些舊式的來復槍，老兵還教新兵怎麼使用。可是，他們說，他們沒有彈藥。當我看見那些老頭兒和小孩子開拔的時候，我的一切都完了，幾小時以內，德國人就要攻進莫斯科了。就在那個時候，NKVD已經開始捉人。他們有一張名單，他們怕通敵份子，把可疑的人通

通捉來，送到西伯利亞。你還記得德國人所建立的「伏爾迦共和國」嗎？可是德國人沒有來之前，NKVD已經把全部人口——我相信大約六十萬人——搬走，搬到在東方距此一千哩的喀薩克斯坦去了。可是後來NKVD自己也在搬了，那時我們才真的着急。各部機關都搬走了。只有軍人還留守職位。地底火車停止了，電車也不走了。全城很是安靜。人們背着包袱，走出城去，好像出去假期遠足似的。我們也可以說，那時真像一個大的假期。我們都覺得有一種刺激，一種新的騷動，同我們平常所過的日子是不一樣的。我猜想這是因為當局對於我們的統治突然鬆弛的緣故。有很多人讓公寓房子的門開着，也有人把公寓房子鎖起，門上還釘木條。有些人把財物隨便送人。「請隨便拿吧，」他們說，「否則納粹要來拿走了。」工廠裏混亂不堪。廠長打電話給部裏去請示，發現各部都已搬走。他們以為德軍已經進城，就開始把倉庫裏和原料貯藏室裏的物資隨便送人。後來他們中有不少因為犯了這個罪名給槍斃的。在伏拉第米亞公路上，我聽見人家說，步行逃難者川流不息，大轎車也一輛一輛不斷的疾馳而去。我後來又聽人說，在某處公路交叉點，有一個邊防軍的連長，專截汽車，檢查證件。據他們說，沒有證件的，就給拖到山後去槍決。又據說，公路旁邊扣留了一排汽車，坐車的猶太人和官僚們都是想逃跑的。莫斯科到處都可以聽見新的謠言。老百姓在街頭公開批評克里姆林宮。我聽見一個女人說，「該槍斃的就是那個壞東西！」她說了這話，也沒有人理會她。另外有一個女人聽見了這句話，說道：「啊呀，這種話該去報告的。」可是她沒有主意：「我去報告給誰呢？」我去工作的時候，我發現門都上鎖了。無線電廣播局已經停辦了。我回到家去，可是公寓管理員把公寓關掉，自己逃跑了。我沒有地方睡覺了，慌

亂得不得了。我想德國人幾小時以內就會進城的。德國人！當時我一下子就想起，我的孩子們的一半血統是猶太人。我不知該怎麼辦。（福開森先生，今天晚上我會有勇氣把我的生平講給你聽嗎？你聽見了之後，有什麼感想呢？這些年來，你是我所遇見的第一個說英文的人，可是我在你面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爲了孩子們的關係，我一定要告訴你。）那時，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我想起了美國大使。我牽了兩個孩子，到美國大使館去。那邊有衛兵把守，可是我只是說英文，好像我是不懂俄文似的，他們就讓我進去了。我看見大使館正在預備撤退。我想我是多麼運氣呀，我剛好趕上。發亮的美國大汽車擠滿了人，其中有幾個還是俄國人，因爲他們把家裏的僕人一起撤退。我問那一位是大使，他們指給我一個穿精美皮大衣的黑膚肥碩的人，他正站在一輛汽車的邊上。我把我的小孩子拖過去見他。

「大使先生，」我說，「請你把我的這兩個孩子帶走，好不好？」

他有點愕然。「你是美國人嗎？」他說。「我不記得你呀。」

「我以前是美國人，」我說。「但是我不要走，我說的是我的孩子。請把他們帶走吧。他們是生在美國——生在紐約的。請把他們帶走吧，」我請求着說。

在場的別人都顯得不耐煩。一輛大汽車已經開出大門。一個好像是秘書樣的人走來催促。

「準備都已舒齊了，大使，」他說。

「恐怕我們沒法帶你了……」大使說。他的話被車子裏一個女人聲音打斷。我朝車廂裏看看，我看見一個穿華貴皮大衣的美國女人，就像在紐約第五街我們常看見的那種女人。「濶姨子，」羅勃總是這

樣稱呼她們的。

「馬丁，」那個美國女人說道，「快一點吧。人家都等着呢。」

大使跨進停着的汽車，坐在穿皮大衣女人的旁邊。「那種人真活該！」我聽見秘書說。

他們坐汽車開走了。我同我的兩個兒子留在後面。那時候真可怕，福開森先生，但是有一件事情，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一段時期的，都不會忘記，那就是：克里姆林宮的人同我們一起留着。

第十章 敏感的青年人

福開森的故事

我想同那個叫做瑪莉的美國女人談話，可是無論如何，總講不起一個頭，因此我也不再有這個打算了。在那一羣粗壯的俄國人之中，看着她那樣的神經緊張，我心中難免惻然。我想她一定過過一段很壞的日子，不願意再講起它，所以我也由她去了。

那個叫做格萊萊哥的矮胖子正在用俄文講一隻故事，我聽來很吃力。蘭吉看見我有點不自在，就過來坐在我的身邊。她開始講她的兒子。

「對於孩子們，這個罪最難受了，」她說。「一九三八年，卡爾的父親算是人民公敵被監禁起來時，學校裏的同學都不理他了。是的，開頭是這樣；開頭，人家都瞧不起這種人；後來，這種人太多了，也沒有什麼瞧不起了，大家只有恐懼。可是人家都不理你，這也很難受的。我自己的經驗也是如此。我的丈夫被捕後，我被開除黨籍，人家都不同我說話。我每天去工作，可是也沒有事情給我做。在休息

時間，我的周圍總是空空的，人家不同我說話，他們也不願意我同他們說話，即使我的朋友，也是如此。可是我也滿不在乎。」

別人聽了格萊哥的故事在笑，她停一停。然後她接着講：

「我的兒子的情形就不同。請你注意，他同他這一代的人一樣，他是十分愛國的。他已經是一個青年團員，他希望成爲正式黨員。他怎麼能懂呢？這件事對於他的打擊，一定比對於我丈夫和我自己要大。他的父親被捕後，他在學校裏也受人指責，他的同伴見了他，好像見了斑疹傷寒似的，遠遠避開。他們不願同他說話，不願同他一起工作，他的教師也好像當作班裏沒有他這麼一個人似的。他的考卷上也不打分數了。他們頂巴望他輟學，可是我不答應。我每天照例叫他上學，因爲我知道，他非上學不可。」

「我以前聽說，一九三五年就把『社會出身罪』廢除了，」我說。「不是還有一個聲明嗎？老子犯罪，兒子不負責。我記得，我當時讀了還覺得很有趣。」

蘭吉對我望望。一種絕望的表情，越過她的臉。

「那是另外一件事，」她說。「那是一件和革命有點關係的舊事。你們不會懂的，你們這些布爾喬亞。」

「我很抱歉，」我說。「今天晚上我太笨了。看起來什麼東西我都把握不住。」

蘭吉用她的大而黑的眼睛看我，眼光的表情很是動人。她的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對我笑着。

「你就像我的兒子，」她說。她再往下說。「我的丈夫忽然釋放回家，那是頂大的驚愕了。那是個晚上，他來到我們這裏的公寓，我怔住了。我不認識他了。他的頭髮都成白色，鬍鬚也是灰白的了。他滿身病痛似的僵僵着，腿是拐的，臉上都是傷疤，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臉我不認識了。人家就把他對付得這個樣子。我餵東西給他吃，看護他。這在我的兒子心頭上的影響，是太深刻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頂容易感受外界的影響，你說對不對？可是你得記住，他是一個愛國青年。起初他不說話，可是他總是跟他的父親在一起，看着他，總是看着他，看着他臉上的傷痕和憂愁。我的丈夫也不開口。他好久什麼事情都不做。後來能夠起床，他就坐着晒晒太陽，什麼不說，什麼也不聽見，只是一個人在出神，有時候嘴裏還咕嚕咕嚕的說些什麼。我的兒子就一直看護着他，晚上攙了他的手，領他進屋子。」

那邊格萊哥所講的故事很成功，每個人好像聽得都很高興。即使那個美國女人也忍不住笑了一下。麗莎維德對我看看，點點頭，答應把他的故事等一回翻譯給我聽。蘭吉卻不理會他們。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她說。「一九三九年來了，接着又是一九四〇年。我的丈夫沒有人攙扶，也會走路了，我的兒子在一心一意的用功讀書。那個時候，我才認識了他的天才。是的，我雖然是他的母親，我還得說老實話。他先學的德文，那時進步非常之快，又開始學英文，進步的速度也快得驚人。同時，他的俄文很美，風格就同以前的大作家一路。他想加入『作家藝術家協會』，可是在那個時候，那是辦不到的。他對於電影，也很有興趣；因為他相信，只有電影是全世界都可以欣賞的，欣賞電影，不致於有文字上的障礙。他有重要的話，要給全世界的人知道。他要寫一隻電影劇本，把俄國的歷

史，源原本本讓全世界的人了解。」

「後來他怎麼了？」我說。

「有一天在一個政治集會上，他對一個同伴說——並不很認真的——他說希特勒的戰略很是狡猾。可是，在我們這國家裏，敵人永遠是錯的，永遠不許是聰明的。敵人永遠是笨的，敵人就是傻瓜。是的，敵人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門，衝到了伏爾迦河，還要算是個傻瓜！所以當我的兒子說希特勒的戰略很狡猾的時候，他的同伴跳起來了，指責他思想錯誤。指導員也高聲的對我的兒子叫。很明顯的，指導員是怕這種事情的。他大聲的問我的兒子叫什麼名字。因此卡爾的名字就上了名單。」

「上了名單？」

「這是一種說法而已。在我們國度裏，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發生的。每件事情，都有一個發源，因此就得追究這個發源，從根本上把禍根消除。當然，政治指導員本來就可以給卡爾說清楚了他的錯誤——那樣也很便當的。卡爾認一個錯，收回前言，也就完了。可是他們非追究不可，他們要調查卡爾的頭腦裏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卡爾不可能憑自己的觀察思考得到這種結論的，背後一定有一種什麼力量，在影響着他。」

「這種道理很難令人相信，」我說。

「並不難相信。我現在告訴你的，正是他們大家公認的方法。他們也從來不否認，這是他們的方法。適得其反，這就是實用的方法，合理的方法，巴夫洛夫 (Pavlov——俄國心理學家) 的方法。」

「巴夫洛夫？」

「別忘了巴夫洛夫是一個俄國人。」

看見她這種一本正經的神氣，我倒笑了。「好吧，」我說，「他們找到些什麼呢？」

「什麼也沒有。說他是人民公敵的兒子嗎？這也不算是一個理由，因為有好幾萬青年人都是人民公敵的兒子。他們什麼都找不到，可是那並不能使他們將他的名字從名單上除去，我們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的？」我說。

「他們那種人的方法，我知道。而且，戰爭已經開始在打了。他們沒有動靜，好久沒有動靜。我的兒子等着，心理太緊張，病了下來。他不是一個健壯的青年。他是很敏感的。真正是一個俄國式的智識份子。他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弱。他也不再去工作了，他就這麼等待着。」

「你們總是等待。你們爲什麼不想個辦法呢？爲什麼不逃呢？想個辦法呢？」

蘭吉對我看，在她的憂愁的眼睛裏，又有了那種絕望的表情。

「你們這種外國人啊，我們怎麼才可以使你懂呢？你是不會懂的。你還是一竅不通呀！」

「對不起，」我說，「可是請說給我聽吧。」

「一九三八年真理報裏登了一則小小的官方啓事。裏面說，任何一個紅軍空軍駕駛員，駕駛逃出國外者，他的親屬要全部逮捕槍決；他的妻子、兒女、母親、父親、兄弟、姊妹。」

「太可怕了，可是這是對付軍人……」

「軍人，呸！在俄國都是軍人。我們的『人質』制度，行了已經有好多年，現在還是行着，那段啓事，不過是第一次公開承認罷了。」

「因此，」我說，「你們就等着了。」

「卡爾等着。一年之前，他們來找他了。他們是早晨來的。他們先在門外等了一下，看見我到麵包店裏去了，他們才進來找他。他們知道我會跟他們拼命的，我會叫喊的。所以他們等我出門了才進去。他們進去了。就把他抓去。他那時正躺在這張沙發上。他們是早晨來的，我回家他已經不見了。他該替換的衣服都沒有帶。」

「可是爲什麼呢？」我說。

「他們把可能通敵的人通通搬出莫斯科。他們很怕人民和德國人親善，因爲在那個時候，他們已經知道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會有成千成萬的人歡迎德國人。他們有一張名單的。」

「可是爲什麼要捉你的兒子呢？他也不通敵。」

「我的兒子的名字叫卡爾。」「這個名字你不是說跟卡爾·馬克斯起的嗎？」我說，「這是一個好的革命家的名字。」

「呸！他們怎麼會知道呢。他們說這是一個德國人的名字。」

第十一章 幸運兒

格萊哥·索可的故事

有一天在薩都凡路上，我遇見郭洛德。沒有遇見高力·郭洛德，已經有好幾年，可是，真的，他還是穿的那一件大衣。是的，還是那雙氈靴。我敢這麼說，因為高力·郭洛德是個外省人，外省人是怎麼一回事，我懂。什麼東西，都改變不了他。他看上去老了一點，我注意到他裝了一嘴鋼牙。可是裝鋼牙的人這年頭兒也不少，也沒有什麼出奇。要是我，我是裝金牙的。可是高力·郭洛德招呼我的時候，還是那副微微的得意的笑容，我記得我一直很討厭他那種笑容的。我老對自己說：「喂，高力·郭洛德，你得意些什麼呀？我一動手就把你那副笑容打爛。」可是那時候我還年輕。那天我已經沒有那麼大的火氣，我就原諒他了。那天我什麼都可以原諒，那是我第一天穿上我的新制服。新制服我是直接從部裏的成衣匠那裏拿來的，鈕扣亮光光的照人。那個成衣匠胸脯肩膀做得很好，穿上去很挺。同高力站在一起，我看我只比他差半個頭，我心裏很高興，以前我好像還以為他比我高得多呢。

「好的，好的，」我說，「日子過得怎麼樣，高力·郭洛德？」

「還不壞，」他說，「比去年壞一點，比明年好一點。」

外省人總愛這麼說。我們講了好幾分鐘話。我問起他的妻子。他說她很好，而且還是那一個。此後，就沒有話說了。看上去我們真不像是老朋友久別重逢。毛病也許就在我那身新制服。這年頭兒，人家看見了制服就害怕。高力正在看我的金光澄亮的鈕扣和領子上的綠花邊。

最後，他說了：「格萊哥，我看你的官階跟以前還是一樣呀。」

「不錯，可是，」我說，「可是別忘了『恩·凱·韋·代』的上校，官階在陸軍少將之上。」我沒有告訴那鄉下佬，我的官階是戰爭爆發以後才昇的。那傢伙會這麼聰明嗎？當然，我還活着就是個奇跡。我昇官，因為我自動申請到前線去。我的要求是：派我到危險頂大的地區去。

「不錯，」高力說，「是一樣的。」他臉上又露出那種嘲笑的神氣。

他敲敲我的胸脯。

「你不知道，格萊哥，」他說，「我之有今日，全仗『恩·凱·韋·代。』」

「別在這裏開玩笑，」我說。我覺得討厭了，很明顯的，他是在作弄我。我想起了，在薩都凡大馬路上，同他這樣聊天，給人家看見了，對我有害無利。可是他不放我走，他的手指已經彎進我的上裝裏面去。

「千真萬確的，」他說。「現在我住在漂亮的公寓裏。是的，格萊哥，是很漂亮的。在二樓，有兩

間房間。就是我和我老婆一家住着。我還在廠裏做工，就是那個老差使。你說怪不怪？你看我還裝了一口美麗的牙齒。我的痛風病也已經好了。格萊哥，你奇怪不奇怪？讓我前前後後的講給你聽吧。」

「到我屋裏去吧，」我說。「我們不能老獸在這裏的。」

「不，我們站在這裏，你聽我說，」他說。他抓住我的袖子。當然，我要脫身也不難。我要把他臉上的笑容打掉，也很容易。可是，他終究是老朋友。

「請聽，格萊哥，」他說，「一九三七年我是住在我的老房子裏的。我的老婆和我，我們的兩個孩子，還有我的岳母。我們只有一間房子。我們也不在乎。有一天，我們地區的兵團司令來找我，問我肯不肯同他換房子住。我們地區的兵團司令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一位有一套很漂亮的公寓房間。他沒有說，爲什麼他願意拿他的漂亮公寓同我的破房間換。我也沒有問他。你會問他嗎？格萊哥。這種情形，你懂得，我也懂得。」

「把你的事情說明了吧，」我說，「別牽涉到別人身上去。」

「那時候什麼人都被捉進去，」他說。「兵團司令知道快輪到他了，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可能是個波蘭間諜，」我說。

「一點也不錯，」高力說。「你好聰明，一猜就着。當然，你自己也審問過不少這種人了。該殺的間諜太多了。」

「你錯了，高力，」我說。「我們所做的，是不得不做。就我私人而論，我救了好幾千人。今天還

有好幾百人活着，要不是有我，早就送了命了。」

「當然，」高力說。「可是這位兵團司令不知道會不會碰到像老兄這樣一個人去審問他。當然囉，格萊哥，你是智慧多高的人，這種人世界上太少了。可是因為兵團司令的公寓太漂亮了，他怕他的房子封掉，他的老婆小孩兒沒有地方住。這一切，他事前都想好了。他想像如他只有一間破房間——就像我那樣的房間，他們就會放它過去，他的老婆小孩兒就有地方住了。這一切都懂，雖然我們沒有講起。當時我想：『幹嗎不換呢？』過戶文件一切手續統統辦好，我全家就搬進那兩間漂亮公寓房間裏去住了。真非常漂亮。開頭我的老婆有點神經緊張，可是後來她看見這房子，愈看愈中意了。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們來找我，把我帶走了。」

「我不知道，你告訴我這個是什麼意思，」我打斷他的話。

「這是因為，格萊哥，我之有今日，全仗『恩·凱·韋·代』。我也知道你是個智慧極高的人，你的智慧太高了，就不容許我重提當年之事。可是他們把我帶進一間房間，格萊哥，叫我填一張表格。『你是黨員嗎？』是第壹個問題。我填『是』。『你在紅軍裏當差嗎？』是第二個問題，我填『否』。諸如此類的下去。問官讀我的表格了。不知什麼的，他大生其氣，格萊哥。『你這雜種還要撒謊，』他說，『你還想騙我們嗎！』他一記打在我的下巴頰上，我的臉上出血了，我手指伸進嘴裏去，掏出一隻壞牙齒。好了，倒省了不少麻煩，我自己對自己說。這牙齒早就該拔掉了。就在那時，另外有一個人進屋裏來了。『你看怎麼樣？』問官對他說，『這雜種說他從來沒有在紅軍裏當過差。』新來的人說道，

『到底在搗什麼鬼？我們拿點顏色給他看看！』說罷，就在我臉上打了兩下。這一次，我手指都不用伸進去，牙齒就可以下來了。我身子往前一衝，怕血落在我的衣服上，又是兩隻壞牙齒給我吐掉了。『現在，據實招吧，』問官同志對我說。『可是，你要我招什麼？』我說。『我什麼都願意招。可是我的確沒有加入過紅軍。我是十月工廠裏的一個工人。我一直是一個工人。在革命的時候，我也是個工人。』可是我知道我又說錯話了。他們中有一个人重重的打我，打得我什麼都不記得了。『把他帶走，』我聽見其中一個人說，『明天他就要改變主意了。』他們把我拖進一間囚房。裏面有很多人，我什麼人都不招呼。第二天他們又把我拖出去，問官同志對我說，『你沒有加入過紅軍？』『沒有呀，』我說。『別說謊了，』他說，『我們知道你是一個波蘭間諜。』『不是的，』我叫道：『我是一個工人。』我說，『我不是間諜。可是我什麼都願意招。』『好，』問官說，『你還要撒謊。』說罷，在我臉上打了一下。一會兒，又打了一下。格萊哥啊，那時我又吐牙齒了。牙齒太鬆了，早就可以拔掉了。可是，你知道，它們也該出來了，蛀得太壞了。我的臉打得好像豆莢一樣，豆就卜卜的跳出來。『請吩咐吧，』我說，從地上站起來，『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等到我們收拾了你，看你不聽話！』他說。『我們知道間諜該怎麼對付，你這個雜種！』我又吐掉一隻牙齒。眼睛也看不見什麼東西了。可是，就在那個時候，另外一個同志進來了。『住手，』他說。他對問官同志低聲的說，『那個傢伙放他出去吧。』『幹麼！』我的問官說。他拿起一大瓶『波戎』酒，在嘴裏喝了一大口，他們周圍總放滿了這種酒，工作辛苦的時候給提神的。『不要管幹嗎，放他出去就得了，』另外的一個人說。『你捉錯人了。』他們把我

帶到扶梯頭上，對我說，『聽着，你這個雜種，不要再回來了。聽見沒有？』他們踢我下樓，我跌到街上。這一跌，把我最後一隻牙跌掉了。我站起身來，摸摸嘴巴，唉，真的，牙齒一隻也沒有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麼高興。格萊哥，這一輩子我就害痛風病，這一輩子，我就害怕牙醫生。現在好了，牙齒掉了。我回到家裏，在我的新公寓房間洗一個澡，第二天我照樣去上班。大家見了我，卻好像是見了死人還陽似的。廠長詫異得不得了。『可是你已經去了』，他說。『可是』，我說，『他們不要我。』『請走開吧』，廠長說。『可是，同志，我不能離開我的職位』，我說。『你有證件沒有？』他問。『去領一張證件吧，否則人家怎麼知道你已經恢復自由了呢？』我可以看出來，工人黨員經常的會已經開過了。我算是一個間諜和破壞者，黨部的書記斥責黨部工作人員，說他們缺少警覺性，窩藏了一個間諜和破壞者。我的兩個朋友加倫科和米高洛夫因為缺少警覺性的罪名，已被開革，他們隨時可以被捉進去。我隨隨便便這樣的回來了，那是太可怕了。這一層我也懂，可是人怎樣維持生活呢？人必需要工作，而且這個差使也不壞。所以我回到『恩·凱·韋·代』去，問門口的人要一張證明書。他說他們不發證明書的。我老是在去。我告訴他對樓上的人說，高力·郭洛德假如沒有證明書，他的差使就沒有了。我給他看我的牙齒都掉了。門口的人問我。『審問你的同志姓什麼你不知道？』當然，我不知道。從此以後，我還是天天到廠裏去上班。隔了些時候，他們看見我也看慣了，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了。以後就一直沒有問題。後來，他們把廠長和黨部書記都捉進去了，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再來碰我一碰。』

高力拉着我的袖子。

「所以你明白了，格萊哥，我的好運氣都要歸功於你們。我的新牙齒，我的漂亮的公寓，我的老差使。這一切我都要謝謝你們。」

「有趣得很，」我說，「但是故事太長了。」

「我放你走以前，」他說，「格萊哥，請你告訴我一件事：你怎麼會活到今天的？你是個活見證，你怎麼會活到今天的？」

你們知道，他們那種人見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就會充滿了好奇心的來打聽。那時他又露出那嘲笑的神氣。

「說來話長，」我說。「有空改日再談吧。」

說來話長！我該怎樣來解釋我的倖免呢？有些人就有那種好運氣！

10k

第十二章 權位的爭奪

福開森的故事

那個叫做格萊哥的人，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他講他的故事的時候，就裝出某一種軍官的神氣，一本正經，沾沾自得，很逗人發笑。他所模仿的這一種人在莫斯科很常見，或者可以說，在任何國家裏，只要軍人得勢的，都可以看見這一種人。

「一九三八年環境特殊，我才會昇高官，昇到我一生最高的位置，」格萊哥說。他是用俄文說的，可是他只要說得慢，說得簡單，我還可以跟得上。

「總而言之，在『恩·凱·韋·代』裏當差，要昇官昇得比做姚各大的審問官更大的，是不可能的。」

「啊，他要講姚各大的事給我們聽了！」米德迦擦擦他的手。

「關於坦白的事，」格萊哥說，「那些蘇維埃奸細的坦白的事。」

格萊哥繼續用俄文講，他講得比開頭快，我因此跟不上。蘭吉看見我的困難，趕快來說明。

「你聽說過亨利·姚各大 (Henry Yagoda) 的，」她說。「審判列寧的幾個朋友的時候，『恩·凱·韋·代』的領袖就是他。」

「我記得我讀過關於這些公審的事，」我說。「我們都不懂，他們怎麼會全部認罪。我們都以為他們受了什麼毒藥麻醉，或者是別的什麼原因。」

「毒藥嗎？」蘭吉有不信的神氣，然後她搖搖頭。「世界上人知道我們得太少了。」

「很不幸的，真是這樣。」

「世界上人懂得他們的那些坦白嗎？」

「是的，」我說，「可以算懂得。我們認為那是很可以代表俄國國民性的，很有陀斯妥以夫斯基小說裏的作風。」

蘭吉突然變得很沈默。她全身似乎突然變得很軟弱，癱了下去。我什麼都不說。格萊哥開始講一隻新的故事，把別人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

「請解釋給我聽吧，」我說。「請原諒我的愚昧。」

「好吧，」蘭吉說，「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小羣老布爾什維克黨知道他們快要死了。他們知道，假如他們據理力爭，假如他們吵鬧公堂，那末關於他們的事，就不會被公佈。他們將要就此失踪，什麼記錄都沒有。他們有一個機會把他們的思想傳到全世界去。他們所以願意出席公審，坦白認罪。」

「是的。」

「他們知道老頭兒〔按卽史大林〕的脾氣，他就頂愛人家坦白。凡是反對他的人，他就要讓他們公開受到羞辱，他不願意在千秋後世，留個罵名，他一定要替自己的行動，找個理由。他們就計劃利用這個弱點。請你不要忘了，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都是精通辯證法，心思十分精細的。」

「我有點懂了。」

「他們都約定，一同坦白承認：說他們的政綱同老頭兒的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罪名是在黨裏爭權。」

「我們當時看來也是如此。」

「啊，這種事情同布爾喬亞們怎麼能講得清呢？你們知道不知道：黨裏爲爭權而內鬨，爲了權力問題而有意見不合，這對於老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一個問題？在列寧的時候，誰提起這種問題，人家要笑話的。列寧的朋友不會考慮到爭權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黨沒有一個人想起過這個問題。他們想念的只是黨。一天到晚只有黨，個人權位是太不重要了。也許他們太不把個人權位看得重要了。」

「他們這批人倒是很奇怪的理想主義者。」

「他們公開坦白說同老頭兒沒有理論上的爭執，他們只是在內部爭權，這樣就很明顯的表示，他們所以被處死，就是爲了阻礙了老頭兒。老頭兒想蟬聯做黨裏的書記長，可是他們在中央委員會裏的投票，就會把老頭兒的位置送掉，他們個人的生命是不碍誰的事的，可是他們這一羣人可能使老頭兒的地

位動搖。列寧的朋友竟然會說他們想爭奪權位，這無非表示他們是在權位爭奪之中被犧牲了，以後的一切，不過是個人權位之爭的發展的後果而已。這是他們的思想，他們想傳給全世界的，而事實上也已經傳到了。」

「恐怕在俄國以外，很少人能懂得吧，」我說。「在我們的資本主義的，或者說是現實至上的社會裏，爭奪個人權位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只是你們的刑罰似乎太東方式了。」

「列寧的朋友們，對於資本主義的世界是沒有興趣的。資本主義已經落在他們的後邊。他們的思想是要留給後世的歷史的，果然歷史上是把他們的思想留下來了，因為姚各大上了他們的當。姚各大本是負責草擬他們的坦白書的，可是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太厲害了，以致他和他的那批拍馬小人都上了當。他們把罪人的坦白書原封不動的抄了下來。他們照樣直抄，因為他們的想法是同你們資本主義政客的想法是一樣的。照姚各大看來，個人爭奪權位，沒有什麼不道德，在得勝者的一方面的，就像他自己一樣，當然論功行賞，在失敗者的一方面的，就像老布爾什維克黨一樣，拖出槍斃。因此亨利·姚各大把他們的坦白書，信以為真，而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就出席公審了。」

「事情就這樣簡單嗎？」

「我只講那些列寧的朋友們，在第一次公審中，而且是第一次公審中的第一個小時。」

「官方的紀錄……」

「啊，官方的紀錄！那是個謊話！」

「有一個英國人，名叫葛列德，那幾次審判，他是每場必到的，他說……」

「他說什麼？」

「他說官方的紀錄很巧妙的把證據歪曲了。他說從官方的紀錄看來，一點也看不出關於證人的心理狀態，或是當時的氣氛……」

「氣氛！」

「可是，你的理論該怎麼……」

「這不是一個理論。假如你能找到記載第一天審判的真理報和消息報，你就可以知道我講的都是實話了。你可以看見，整個宣傳機構都發動，大罵那些罪人，說他們竟然想暗算老頭兒，謀奪權位。你可以知道，姚各大的當是上得多大了。」

「那末呢……」

「可是老頭兒自己沒有受騙。他懂得。他也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我們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切齒痛恨，暴跳如雷！我們知道他立刻出頭干涉，因為第二天的審判亂七八糟，不知所云，再隔一天，報紙的言論都改了，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都成了賣國賊了。」

「兩次的混亂……」

「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的計劃已經揭穿了，已經攻破了。請想想那種審問：一個審問接着又一個，一刻也不停，電光把眼睛都照花，問題重複又重複的問，威脅，利誘，疲乏，還有，瞌睡！請你

想想這個，你就能知道這一點了：他們那些人，計劃已經失敗，不再能給世界上人什麼警告；歷史在走什麼可怕的路子，他們也知道，他們那些人所冀求的只有死了。可是他們真能得到解脫之前，他們受盡牢獄之苦，他們差不多已經不是過的人的生活了；他們的生命意義被殘酷的檢討着，他們的靈魂變得很是空虛，因此他們說這樣還是說那樣，沒有什麼差別了；看各人的性格不同，有人爲的是譏諷，有人爲的是絕望，有人是體力不支，總之人家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他們只求早日了事。以後的審判就是這麼一套了。」

「姚各大呢？」

「他把他們的坦白信以爲真，糊裏糊塗的讓老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留在歷史上，雖然時間不過只有一兩小時，可是姚各大已經犯了同謀之罪。他因此送了命。」

「這個錯誤的代價可不小。」

「他的生命倒不值多少的。更可怕的是『恩·凱·韋·代』受到教訓，改變作風了。從此以後審問官不要聽有關思想問題的坦白了。他們要的只是有關軍事破壞，情報資敵等等與他們無害的坦白，這樣又是簡單，又是安全。問官們都怕和姚各大受到同一結局，可是好多人還是難免。」

米德迦把注意力從格萊哥那邊轉到蘭吉這邊來，他站在我身邊上，俯着身。他把手指放在頸子上，嘴裏發出放手槍的聲音，響得嚇人。

「很多人 Gondeyay 了，」他說。

「坦白書一定要做得好，」格萊哥說。「當然我是昇官了。姚各大同志的坦白可以算是標準的了。」米德迦對格萊哥看看，他的圓臉上有點玩笑的神氣。

「格萊哥，請問我們怎麼叫人坦白的？」

格萊哥對米德迦看看，開始大笑。他的粗大的肩膀在搖動，可是沒有笑聲。

「接姚各大同志做『恩·凱·韋·代』的首腦的，是我們的領袖兼導師的得意弟子葉速夫同志，可是很多人都替自己的位置擔心，」格萊哥說。「所以抓到他們面前來的那批壞人，假如想拖延時間，或者要一個什麼花樣，他們是不能容許的。坦白都要和軍事有關的，他們才覺得放心。這也並不像大家所說的那樣難，很多犯人是能合作的。」

米德迦很莊重的看看我。

「有人說，把馬克斯恩格斯兩位放在同樣的環境裏去，他們也會坦白承認錯誤的，」他說。

「用這個辦法發掘出來的罪名是沒有底的」格萊哥說。「你們不會相信我們的國度裏有這許多破壞工作，這許多間諜工作。人們好像都願意幫助我們，告發新的嫌疑犯。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紀錄，追溯到好幾年之前，有時候一直追溯到沙皇時代的警察檔案呢。」

「在俄國人人都擔一個干係的，」米德迦說。

「舉例說吧，我們的有才幹的醫生和科學家，有好些都同資本主義國家通信，要調查一下一共有多少人，倒是很有趣的。有幾個常收到從德國、英國寄來的書和在外國印刷的雜誌。我們的年青的蘇維埃

幹部，對於這種書札來往，總是很留意的，好幾年來，替我們搜集了不少證據。這是很有用處的，尤其在偏僻地帶，因為我們常常要碰到些鄉村醫生，鄉村教員，他們犯了同謀通敵之罪，可是他們的坦白書倒是簡單明瞭，起草得很好，還要請求恕罪呢。」

「成千成萬的男人都坦白，告發他們的妻子有罪，」米德迦說。

「確是如此，」格萊哥說，「錯誤也難免，可是當一隻強有力的手在翻動歷史的冊頁的時候，也沒有時間去改正小小的錯誤了。我一直贊成柴姆利亞契加同志的這一句話：『寧可枉殺十個無辜，不讓一個罪人漏網。』」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有多少個冤枉的呢？」

這句話是蘭吉問格萊哥的，她的聲音顫動，語氣裏面，一點也沒有嘲笑的成份了。

「請告訴我們，在那兩年，無辜遭殃恐怕在兩千萬以上吧。」

蘭吉的神情雖然緊張，可是那個矮胖子仍然神色不動。

「說有兩千萬，未免是抄襲敵人給我們造的謠言了，」他說。

「那末一千萬吧。一千萬個無辜遭殃。」

「一千萬太多了。七百萬。說七百萬吧。」

「七百萬。」蘭吉慢慢的讀這個數目字。

「的確，當時有很多人，現在已經無案可考了。葉速夫同志後來發瘋了，罵起老頭兒來了，我們就

當他一條瘋狗，把他解決了。貝利亞同志來接辦「恩·凱·韋·代」的時候，他提議大赦，當時就有人相信，那些人即使在那時不是人民公敵，到現在也要成了人民公敵了。」

「有七百萬嗎，」我說，「無怪德國人可以長驅直入了。」

「好」，蘭吉說，「老黨員全部在內，是不是？那也沒有關係，那也不會出這麼大的亂子的。可是冤枉送命的，大多是新的蘇維埃智識份子，我們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還有我們的新的紅軍……」

「我國有句老話，」米德迦說，「我們這樣說的：主人們吵架，拔掉了農奴的頭髮——害的是好人。」

「我記得，」格萊哥說，「那時的重工業部長奧琴尼克茲太不聰明了，竟然提出質問。『你們去殺你們的黨員好了，那是你們的事情；你們去殺你們的將軍好了，那是伏洛希洛夫的事情；可是我不能讓你們殺我的工程師！』他是個感情衝動的人。兩天之後他死了，很奇怪的，同高爾基一樣，中毒而死的。」

「他也沒有救成他的工程師，」蘭吉說。

「統統 Gondevay 了，」米德迦說。「個個人都 Gondevay 了。所有的參謀軍官，所有的工程師，所有的醫生。都走安外國人負責的。他們為信和無辜的蘇聯公民，他們到處留下證據，他們替我們證明：每人都是波蘭間諜。當然個個人都 Gondevay 了。可是俄羅斯是個大國。我們的人死不完，我們可以成立一個新的黨呀，新的紅軍呀！」

「他的宣傳很笨，」蘭吉說。「這句話是在十八次黨員大會裏，賽特克說的，他現在就拿他開玩笑。他是在罵人。」

米德迦裝出生氣的樣子。

「我國有句老話，」他說，「我們這樣說的：跟一羣狗去打獵，不一定要吠，可是尾巴非搖不可。」

「七百萬」，我說。無怪你們的老板要同希特拉訂約了。他什麼都肯了，想想國內的情形已經弄得這麼糟。」

「在我們國度裏，」米德迦說。「有一件東西，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恩·凱·韋·代』也有它的理由？」蘭吉說。

「不錯，『恩·凱·韋·代』也有它的理由。假如列寧當年不把「切加」改組，我們的敵人也要把這一套加在我們的頭上的。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以對付他們的有組織的破壞？我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以追蹤布爾喬亞的奸細？我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以清算掉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派，無政府主義黨，右翼反對派，左翼反對派？」

「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以把共產黨也一起毀了？」

「頂重要的，我們如何能操縱指揮我們光榮的蘇維埃工人？真的，『恩·凱·韋·代』已經成了我們蘇維埃系統下主要的行政機構了。任何蘇維埃的機關，不論是工業機關，還是政府機關都有一個給特務機關核准的「幹部科」，「幹部科」專管人事問題，核發一切員工隨身必帶的身份證，也給他們宣

傳。在「幹部科」裏面，還有一個秘密小組，專門調查政治動向，應付不守紀律的『發牢騷主義』，壓制員工心理上的喜怒無常和一切暗中的反抗情緒。」

「就是要毀滅自由罷了，」蘭吉說。

「親愛的蘭吉，自由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幻覺。」

「自由，Gondevay, Gondevay」米德迦傷感地說。

我再也受不了了。

「Gondevay 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問蘭吉。

「啊，那個米德迦真是一個笨蟲。我們講起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常用一種特別的說法。我們的意思不便洩露，我們不便說『死』，我們就用一句英文成語：『Gone the way of all flesh』。我們說得次數太多了，米德迦這傢伙也學會了。可是他說不像。」

第十三章 黑板上的兩個字

格萊哥·索可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奉命去車里雅賓斯克省。那是在我官復原職之後。我曾請求調到前線去，調到危險頂大的地方去，可是我反而被調到烏拉山一帶，這是上峯對我信任的表示。在車里雅賓斯克，我是小心翼翼，爲祖國反法西斯抗戰而努力。那時工作很困難。你們記得，敵人已經差不多打到莫斯科的大門了。在比較邊遠的地區，發生了種種奇怪的事情。關於恐怖份子的某幾次暴動，關於工會裏的法西斯份子，貿易機關的貪污潮，搶麵包風潮，諸如此類的事情，你們後來都曾聽見過的。可是在車里雅賓斯克省，有一個小村莊，這是特別交給我注意的。鄉村的名字無足輕重。據報告，當地有一個女子小學出了一件事，使那個地區的人全都受到震驚。當時謠言都說，蘇維埃兒童的生活，受了外國人的影響，才有那種事情發生，假如你知道這個，你就會了解局勢多麼嚴重，一定要有一個認真辦公的官員才應付得了。我國的立國政策既然有我們的領袖兼導師規定好了，那種謠言竟會流傳，它的危險性也不用我說

了。事情一定要追究到它的根源，因為萬事有果必有因，這種事情，一定要澈底查究，連根拔除。那件事情在小村裏引起了很大的紛亂；以後娥迦·特洛非莫芙娜告訴我，她相信小孩子一羣一羣的用手指劃十字架的記號，並做種種別的資產階級的禮節；我聽見了，不得不警告她，這種事情不可以向人多講，而且蘇維埃憲法裏並沒有規定小孩子不許劃十字架，或者到合法的教堂裏去做禮拜。不過這些話都是稍為往後一點的事了。我在那樣邊僻的鄉村裏會碰到娥迦，也是怪事。她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嫁給一位重工業部部长，此人在黨裏也算是一個有數人物。在莫斯科，當然，她有她的華貴公寓，可是在那時，她帶了兩個小孩，從首都撤退到車里雅賓斯克區的一個小村莊。你們可以想像，她在那裏見到我，是如何的又是欣喜，又是詫異，因為我們好多年沒有見面了，她很自然地以為我已經死了。

「親愛的格萊哥，」她說，「見到你，我是多麼的快樂呀。我想你是來處理女子小學裏的一件事的吧？」

我未加可否。

「啊，格萊哥，多高興啊！能夠見到一位老派人士，不是那種一本正經，不解風趣的新人物，這是多妙呀！」

我立刻覺到，亂子一定不小，否則娥迦不會這樣擔心，而且她還說，虧得派來的是我，不是別人，因此她覺得很安心。你們須知道，娥迦的丈夫，很受最高方面的器重，在過去四年之中，從一個小小的木廠工頭，昇到今日的地位。因此娥迦對於她影響所及到的人物很是關心，她覺得她對於他們有一種責

任。我們一起喝茶，我們討論到很多事情，很多人物。我發覺她老在看我的新制服，我很驕傲，雖然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掛上我的新肩章，那是以後才有的。我看出來，她很欣賞我的肩膀和我的儀表，她看見我到這鄉村裏來，她是很高興的；真的，那邊沒有多少男人，她已經遠離了莫斯科的繁華生活，在見到我之前，她一定覺得很無聊。她老是講起小學校裏的那件事，那時我奉着公事，我不能承認我對於那件事情也有興趣，不過後來，我讓她照她意思把這故事講出來。她的話是這樣的：

「那件事，」娥迦說，「發生在二年級的小女孩的教室裏。那天早晨，教室裏秩序不好，女孩子們紛紛交頭接耳，因為她們的教師安娜斯塔霞·羅果托芙娜遲到了。可憐的安娜斯塔霞！好像遲到還不夠她受到的。安娜斯塔霞·羅果托芙娜來到教室，小女孩子全靜下來了。安娜斯塔霞抬起頭來，就在那時，她看見了黑板上的字。這是小孩子的筆跡，寫得大大的，白粉筆在黑板上寫的。只有兩個字。兩個字！那兩個字！

「安娜斯塔霞當場昏倒！秩序大亂，隔壁教室的教師匆匆跑來，把她攙扶到椅子上去。可是她看見了黑板上的字，她叫了一聲，逃出教室。很快的她同我們的政治教官高吉克同志一起回來。高吉克同志見了黑板上的字，並不像兩位女先生那樣的慌張。格萊哥，你會見到他，你立刻就可以知道他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當時兩位女先生離開教室，高吉克同志坐在教師的位子上。他就把學生的名字記下來。那些小女孩的名字，和她們的爸爸的名字，他都知道。有幾個小女孩子哭出來了。

「格萊哥呀，這件事情真丟人！」

「高吉克同志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她把小女孩子一個一個的叫到他面前去。到底是怎麼回事，很難知道，因為小女孩子們事後太害怕了，再也不敢講起這件事情。但是關於高吉克同志的用意，村子裏沒有一個人懷疑的。格萊哥，你也同意，這種事情應該從每一個可能的方面來考查的。舉一個例吧，有幾個小女孩子是從莫斯科撤退來的，她們受過些什麼壞影響，現在也無法知道。當然，對付這種事情，我們蘇維埃幹部是調查得十分徹底的。可是麻煩的是，格萊哥呀，有六個小女孩子都承認黑板上的字是她寫的。當然我們可以相信，高吉克同志把六個人都仔仔細細的盤問過，他問了每一個人，到底是誰寫的。也可能，某幾個女孩子突然發現自己有同謀罪的嫌疑，趕快招認，因此事情變得複雜。

「這兒，無疑高吉克同志是錯了。因為你是個老朋友，格萊哥，我才同你這麼說的，否前同我不相干的事，我也不敢多管的。可是我以為，像高吉克同志那樣的熱血青年，頂好到前線去，做些和救亡圖存有關的重要工作；叫他來對付小女孩女們的微妙的心理，還不如去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經驗多一點的人好。親愛的格萊哥，很明顯的，那兩個字不是那六個小女孩子寫的。另一方面，當然也很可能，那六個小女孩子也已經受到同樣的壞影響。甚至於我們可以想像，已經有了一種陰謀，一種秘密會議，一種搗亂的計劃！小孩子們是模仿性很強的，而且容易吸收印像。他們可能就把家裏大人的感想反映出來，你說對不對呢！

「我把一切的可能情形都告訴你，格萊哥，並不是想減輕一些高吉克同志的過失，而是要說明當地過去幾個月以來的一種特殊的空氣。過去六個月的事情，親愛的格萊哥，你不會不知道的。你總不會忘

記六月裏的公報吧，就在那險惡的法西斯強盜來進攻我們之前，我們的公報還說，關於德軍在波蘭集中的一切報導，都是西歐同盟國方面的造謠。可是，你是看見基輔，敖德薩，卡柯夫，斯摩倫斯克一處一處的失陷的。現在又是維埃茲瑪了！列寧格勒又被圍了！當然，我們這種人不難了解列強的大陰謀，也不難了解保衛我國的戰士的戰略。可是在這種邊僻的鄉村，親愛的格萊哥，空氣是有點不同的，那些鄉下人真以為什麼地方做錯了什麼事，或者是什麼人的領導錯誤了。而且這個鄉村裏，都是些老太婆。男人都應召到前線去了，這個村子雖然小，頂好的人也送走了。幹部已經大多徵調一空，很可能的，高吉克同志工作的時候，就得不到別人來代他設計和指導。他決定一個子來調查，是沒有前例的，他爲什麼會這樣做，也可以說明一些別的事情；假如上級要把他的粗心的調查來調查一下，可能他們要以爲他的行動是太莽撞了，而且在這種時局嚴重的時候，很擾亂人心的。

「可是，親愛的格萊哥，誰配來說高吉克同志是錯誤的呢？」

「先拿女教師安娜斯塔霞來說吧。高吉克同志會不會以爲，毒素是從她那裏發出來的呢？安娜斯塔霞·羅果托芙娜是怎麼樣一個人，人家知道她些什麼，還有些什麼該調查的，我也沒法猜測。她是小手腳的老太太，臉上很敏感，她也可能是屬於老一代的人。當然，我們的村子裏都知道安娜斯塔霞是個蘇維埃立國的功臣。在革命之前，有好多年她遠離了城市，到鄉村學校去教書，同農民的偏見相鬭爭，受盡了冷淡和歧視，要把知識帶到窮鄉僻壤不受歡迎的地方去。可是在那幾年，不正確的思想流傳很多，安娜斯塔霞可能受到影響。她現在年紀很大，當年的情形，就是在我們所應當感謝的快樂生活開始

以前的情形，她一定還記得，就是這一點，還加上了她是個智識份子，使她受到嫌疑。

「親愛的格萊哥，我看見你聽得很有趣。我們這裏離開莫斯科這麼遠，當然我們是沒有文化的了。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別的好談的，只好談談當地的新聞了。」

假如娥迦一定不放的要談這件事，道理也很簡單。我很快的就發現，她自己的女兒嘉蒂也是六個向高吉克同志坦白的小女孩子中的一個。我剛才已說過了，娥迦是部長的太太，在黨裏的地位很重要，雖然嘉蒂是和前一位丈夫所生。我把這事情也提一提，因為我想高吉克同志恐怕沒有好好了解他的任務。

「這事多蠢呀，」娥迦對我說。「這事怎麼發生的，再明白也沒有了。你只要把她們的課本打開一看，就知道了。那個字差不多就是她們要學的第一個字，每個書裏都有這個字的。」

我打斷她的話。

「黑板上有兩個字。關於第一個字，我同意你的說法，」我說，「那個名字是在我們國度裏頂常寫，而且公開的頂常說到的字。可是關於第二個字，我不同意。『笨蟲』這個字在我們的課本裏是從來不見的，」

「可是，親愛的格萊哥，」娥迦說，「這個字也是很常用的。你一定留意到，我國的語言近年來變得更多粗俗了。那些小女孩子，我們的蘇維埃女孩子，她們是多麼聰明，隨時留心學習，假如他們的父兄不在一起，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做，偶然做點錯事，也可以原諒的。而且，格萊哥，你一定也知道，在現在這個時期，我們是很寬大的。」

娥迦·特洛菲莫娜是個很聰明的女人。

以後幾個月內，我也有機會觀察一下她的嘉蒂，她是個非常特別的孩子，智慧在她的年齡之上。憑這一點，我已經猜想，在黑板上寫字該負責的，並不是另外五個女孩子，而是嘉蒂。

有一天，在高吉克同志離開這村子以後好久，我又同娥迦在一起，我很想知道，高吉克同志是如何的對待那些女孩子的。娥迦說，嘉蒂已經不談起這件事情，而且大人也不再向她提起，可是那天晚上，高吉克剛審問過她，她回到家來，見到她母親的時候，她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看上去好像在發燒。娥迦問她經過情形，嘉蒂只是繃眉撇嘴，就像莫斯科的一個壞孩子似的。大致情形，娥迦當然都知道，可是沒有一個人，連她在內，敢把寫在黑板上的字再說一遍的。當時似乎嘉蒂也不敢說。

「親愛的娥迦，」我說，「你用什麼方法勸嘉蒂把黑板上的字告訴你的呢？」

「我給她一張紙一枝鉛筆，叫她把它寫下來。紙還在我這裏。」

娥迦從胸口拿出一小張紙片，交給我。上面有同樣的小孩子的筆跡——兩個字。

「親愛的娥迦，」我說，「為什麼你把這張文件藏起來呢？」

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她不說什麼。可是她把那張紙給了我，現在我放在身邊，一直在我的口袋裏，有一天一定會被找到的。

第十四章 人的生命

福開森的故事

戒嚴時間已經開始了好久了。我有戒嚴特別通行證，憲兵會讓我通行的，可是俄國人那時候要出門，是太晚了。他們的習慣是再坐下去，等到早晨五點鐘戒嚴解除，再回家睡到天亮。

所以他們的談話繼續談下去，再要談好幾個鐘頭。

米德迦把最後一些伏特迦酒倒在杯子裏。他對我表示友意的笑笑，用英文向我舉杯祝福。

我站起來，敬大家香煙。我把我的一包煙遞給格萊哥。他拿了一枝，兩隻離得很寬的眼睛，慢慢往上一抬，算是謝了我了；他的眼睛是藍色的，長在淡黃色的堅挺的眼睫毛下面，好像是野豬的眼睛。他的眼睛裏有一種表情，表示他懂得我的姿態後面的意義。我看見他的粗壯的身軀，短短粗粗的肩膀，潤扁臉，剃得光光的腦袋。我看見他那種北方人特有的遲緩和審慎。

蘭吉也懂得我的姿態的意義

米德迦把那瓶剩下的伏特加酒，全倒在杯子裏。他轉過身來，舉起酒杯，咧着咀對我用英語說：

「你得拿證據給我看看，證明你不是駱駝！」

「看來我們又回到動物園了。」我說。

「這是我對英語的一點貢獻呵，」米德迦神色莊重的說。他又把那句話說了一遍，然後又問：「這句話很別開生面！對不對？」

「簡直是傳神阿堵。這全是我兄獨創的心機。」

「那是在明斯克，」米德迦繼續說：「我拿着手提包，正趕着走過廣場時，碰到一位朋友。」

「喂！你忙什麼？趕到那裏去了？」他問道。

「別擋着我，」我說：「我要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他問道：「你怎麼搞的了？」

「你難道沒聽到？」我說。

「聽到什麼？」

「當然是沙皇新的敕令，」我說：「你真的什麼都沒有聽到？」

「什麼新的敕令？」他說：「天天都有新敕令。」

「這個敕令說自明天早晨開始，所有在這地區的駱駝都要闖掉。」

「呵，所有的駱駝都得闖掉。」

「對啦。」

「那跟你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問。

「你得證明給我看看，你不是一條駱駝，」我說。

這笑話以前我也聽過的。可是沒有人像米德迦講得那樣有趣。

米德迦的幽默，並決有改變小房間緊張的氣氛。

「對於這位拉脫維亞人，你認識不多吧？」她笑着說。

「不多，」我說。

「在革命期間，沒有人比拉脫維亞人再堅定了；在內戰期間，他們是頂好的戰士。後來他們都被殺了，就是做克里姆林宮衛隊的也難免，在黨裏的被殺了，他們自己之間也自相殘殺，都死完了。對於一個拉脫維亞人，你不能用理論去說服他的，因為他是死心眼兒，腦筋簡單；你不能用刑罰去逼他，因為他的體格太好，不怕皮肉受苦；你也不能用任何方式恐嚇他，因為他是不懂恐嚇的。」

我們講的是英文，格萊哥好像聽懂似的，插嘴說道：

「在活着的人當中，我是唯一的在『切加』，和後來的OGPU，和再後來的N.K.V.D.當過差的，」他說。「我什麼都見過。」

他不把他的機關用俗話稱呼做『恩·凱·韋·代』，而是正式的稱它做Narkomvudel（內政人民

委員會)。「你送走了多少人呢，格萊哥？」米德迦問，同時對我眨眼睛。

「凡不是人民的敵人，我一個也沒有送走。」

「他們都這麼說的。」

「我說的是真話，我救了好幾千人的性命。好幾千人現在還活着，都是爲了我。雅各索夫斯基將軍和飛機設計師杜倍洛夫的性命，都是我救活的。現在掛在他們胸前的獎牌勳章，都應該是我的。」

「確是如此，」蘭吉說。「伊凡被捕，也虧得格萊哥壓了一壓，才遲緩幾天。」

她又用俄文對格萊哥說：「你也是一個見證，爲什麼你不同別的見證埋在一起呢？」

「那時我正有任務在各處調查，我正出着門。我回到莫斯科，就準備着。我等了好久，後來我等得不耐煩了，我自己跑去見他們，我說，『我在這裏了，』可是他們說，『也許我們根本不來傳你了。』寬大的時期已經開始。』

「寬大的時期，」我自己替自己翻譯。

「你聽得懂嗎？」麗莎維德問。

「懂的，」我說，「他的話我聽得上。」

我聽得上，可是他的話裏所含的諷刺的深意，因爲語言困難，我卻無法判知。

「一九三八年槍斃我是很合理的，」格萊哥說。「一九三九年或是一九四〇年槍斃我，就不合理了。一九四一年再來槍斃我，那就是蠢事了。」

「那正是緊急的時候，」蘭吉說。

「一九四一年，我說要獻身國家，他們用了我，」格萊哥說。

「那是不合理的，」蘭吉說。

「決定用我，那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所做的。緊急時期過去以後，我知道一定會有一個有經驗的人把我的地位，重新檢討一下的；來檢討我的就是『經驗最豐富的那一位』，以後他們一定另外有一個決定。兩天以前，果然有命令來叫我把制服繳還，還說明着，我的官復原職是不合法的。」

「現在他就等待着，」蘭吉用英文說。「格萊哥現在只有睡覺。睡又睡不着，他只好到這裏來；他很少開口，他只是聽人家說。他睡不着，因為他是等待着。」

「可是爲什麼要等待呢？你們這種等待的玩意兒，我總是不懂，」我說。

「你們不會懂的，」蘭吉說。「別的還有什麼好做的呢？他案子已經在調查，而且也已經有決定了。格萊哥是一個當年的見證，這種人現在太難得了。除了那些已經成爲偶像的人之外，當年的見證，恐怕只有他一個還活着，因爲在清黨的最後一個階段裏，統統都捉進去了，連我們領袖兼導師的得意弟子葉速夫同志都難免。天真的喪失，即使在粗陋的形式之下，也是不可饒恕，該要毀滅的東西。」

「你這個天真的意思，我不大懂，」我說。

「你四周到處都看得見，」蘭吉說。「每天你所看見的小孩子，青年，甚至於年紀相當大的人，都是很天真的；你也可能注意到，你假如如同他們談話，甚至於你只要站在他們面前好了，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要去剝奪他們的天真的，立刻緊張恐懼起來。可是喪失天真，並不就是喪失理想，因為像我那樣，我已經喪失天真，可是仍舊有理想。喪失天真也不是喪失忠心，因為像格萊哥那樣，他已經喪失天真，可是仍舊很忠心。這多少像是一種信仰的喪失，好像一個教士突然的不可解釋的喪失了對上帝的信仰一樣，這種事情有時會發生，倒並不是由於理論上邏輯上的緣故，這不過是因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作風他看得太多了。」

「天真常常就是力量，」我說。

「可是天真的喪失並不就是軟弱，」蘭吉說。「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天真的喪失可能引起狂暴的行為，深深的仇恨，和奇怪的變動。它能刺激行動。這一切人家都懂得，只是不說。」

蘭吉抽了一口氣。「啊，我的可憐的國家啊。七百萬哪！」這個數目字，她用俄文再說一遍。

她的聲音給格萊哥聽見了。

「你是受數目字的影響了，」他說。「你忘了我們國家有多大。這樣一個大國，在兩年之內，可以產生一批全部新幹部；由農民中產生一批新的智識份子，還不消兩年。假如你相信數目字的話，請你想在內戰裏殺死的八百萬人，在饑荒裏送命的七百萬人，搞集體農場，又死掉五百萬人。再看這次戰爭吧，我們要打進柏林，那時你想想我們要死掉多少人？請你記得，在莫雅斯克以西，蘇維埃有五軍人被圍，在伏洛尼殊，諾伏洛錫斯克，和頓河的幾次戰役，我們又喪失了一百萬人。請不要忘记，去年冬天列寧格勒已經在人吃人，在喀薩克斯坦和比露拜然兩省，整區的人就活生生地餓死。在俄羅斯和頓河流

域，幾百萬的人被趕去做奴工，另外好幾百萬人害了病沒有人照顧，就糟塌死了。我們攻進柏林的時候，要死多少人？假如你相信數目字的話，三千萬不好算是一個大數目吧。」

這時候格萊哥的聲音變得不清楚了。

「在歷史的不可避免的環境之下，我們要犧牲這許多人，我們自己犯一些錯誤，算是什麼呢？何況我們所以犯這種錯誤，目的也是努力要使我們的國家不為環境所屈服呀！」

那個拉脫維亞人停了一下。

「同那些人相比，一個人的生命算是什麼呢？一個錯誤算是什麼呢？」

「這要看這個人的性命是誰吧，」蘭吉說。

第十五章 伊凡之死

他穿着一件舊時的紅軍大衣，那身制服洗了不知多少回，補了不知多少回了。大衣和制服都該是一個高級軍官的，可是階級符號已經除掉。上裝的領子上有四條槓的記號，這照舊制算來，是個司令官的身份，左前胸上有幾條粗布，上面曾經掛過勳章，布上還有一條裂縫，是後來補好的。他的一頂尖頂帽子，俏皮的歪戴着，使他看上去好像年輕一點，雖然他的白頭髮，他的拐脚，他的多疤的呆板的臉，已經表示他的年歲已經不少了。他的身段輕快，眼光機警，有時一些諷刺的幽默，還在他眼睛裏閃耀出來。他提了一枝標準俄式步兵來復槍，把弄的時候，表現出一種老兵的熟練。他的全身裹了一條機關槍的子彈帶。他的上裝前面內部，插了一枝手槍，兩枝桿狀的手榴彈，插在靴筒裏。

他們一共十六個人，他是他們公認的領袖，雖然他現在並沒有這種官階；假如不是現在這樣的環境，他擅自領導士兵，可能要被槍斃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政治指導員同他們在一起，唯一的正規軍官只是一名少尉——哥斯底亞·巴洛夫，一個頭腦簡單隨隨便便的青年人。第六人民保衛師團，就剩他們這麼十幾個人了。德國馮保赫第五裝甲兵團在斯摩倫斯克公路上輕易地往前推進，碰上第六人民保衛師團，

交戰只一天，全師人就大部陣亡，有一些人被衝散了，只剩下他們這十六個人。他們這一師團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和十一月莫斯科呼籲招募義勇軍時招來的，駐防在葉爾那，波洛夫斯克和現在這個地方，他們延遲馮保赫的推進，頂多只有一個星期，現在德軍從爾捷夫，卡路伽和維埃茲瑪三條主要公路上會攻莫斯科。他們這十六個人，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殘餘，現在正在離伊斯脫披小鎮不遠的一座廢棄的廠房裏休息。他們是從伏洛克郎浦斯克公路上撤退來的，一路之上，他們看不見一點指揮所的跡象，或者半個殿後部隊。他們知道他們的部隊在九月裏倉卒編成軍，原是人民保衛師團中最末一師，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殿後，好讓正規軍在斯摩倫斯克前方把馮保赫堵住。可是他們吃驚的是，正規軍潰敗的痕跡，一點也看不見，而敵人已經長驅直入：他們看不見撤退的縱隊，看不見救護車，沒有任何敗兵殘卒或是難民。從西往東而逃：正規軍很快的已經被切斷聯絡，被包圍，德軍如潮猛進，那些正規軍反而落在很後了。第六人民保衛師團同正規軍失去聯絡，獨自作戰，沒有砲兵，沒有重武器，沒有交通線，沒有任何的掩護，就擋在德軍前進的路上，德軍很輕易的把他們解決了，而且還很瞧不起他們似的。

他們是在兩天之前打的仗，那時地面上的特異的寂靜和空虛，看去很不像是在戰場，現在那種特殊的空氣，又籠罩在伊斯脫拉附近，一片寂靜，沒有砲聲，沒有炸彈聲，他們所能聽見的只是在夜裏，飛機編了隊在他們頭上飛過，向莫斯科而去。那十六個人沿了建築精良的公路往東走，看見或聽見任何一點動靜，就找掩護，有什麼人走近，他們就跳出阻止。用這個方式他們攔住過好幾個農民，另外有一個人說是斯摩倫斯克來的送信員，還有一個穿了全軍制服，他說他的飛機被打下來了。那個自稱是送信員的

人，非常緊張，他報告一件大慘劇：在維埃茲瑪的五軍蘇維埃軍，都被包圍，全部被俘，配備全部喪失，官兵像牛馬似的驅策在一起，趕過大平原，往西趕到波蘭去。他說，在烏克蘭法西斯份子宣佈成立一個獨立共和國，很多村子裏的農民都用麵包和鹽來迎接侵略者。那十六個人中，有好幾個都氣得想把送信員打死了，可是那個空軍飛行員，證實了那個緊張的傢伙所說的話。法西斯軍隊開始攻擊後一小時內，紅軍空軍損失了一千二百架飛機；在波蘭和莫斯科之間的秘密機場，總統給法西斯空軍炸過。每座城市裏的穀倉和食物儲藏所，也給炸中焚燒。飛行員說，基輔，卡柯夫，斯摩倫斯克，庫斯克，都拉，奧萊爾，勃里揚斯克，卡路迦和爾捷夫的上空，都冒出濃重的烟柱。

聽見了這些謠言，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十六個殘卒相信法西斯在幾天之內，便可以攻進莫斯科。他們不知道，法西斯的無線電廣播已經說這是事實了。他們只知道敵人似乎並不匆忙。雖然馮保赫的兵團裏有兩個裝甲師六個步兵師，他們似乎慢吞吞的展開着。兵團的前面，在到莫斯科的三條公路上，只有簡單的搜索部隊掩護着，那只是些摩托車自行車和從法軍那裏俘獲來的輕坦克車。搜索部隊的上空，有斯多加俯衝轟炸機掩護。伊凡·羅曼威夫相信，德軍已經計劃好，在某一天攻進莫斯科，他們現在正是照平常一樣，按部就班的照計劃進行。他說可能是十二月六日或是十二月七日。苛斯底亞·巴洛夫說，一定是十二月七日，因為那天剛好是上次紅場大檢閱整整一個月紀念。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無疑將成爲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因為希特勒將要飛到莫斯科，站在列寧墓上，檢閱列隊而過的部隊，就好像他在巴黎凱旋門下參觀無名英雄墓一樣。希特勒是喜歡站在墳墓上的，苛斯底亞說。另外一個人說，德

軍一定正忙着擦軍靴，擦勳章準備遊行，所以他們慢慢的往前推進。十六個人之中，只有伊凡和苛斯底亞是穿着制服的，別的穿的只是多多少少像個軍人罷了，有幾個戴着舊時紅軍的便帽，穿着大衣，或者穿着軍靴，別的人什麼都沒有，還是在莫斯科工廠裏做工時的那套油膩的工裝和黑布帽。他們都是義勇軍，開拔出莫斯科的時候，沒有武器，沒有軍火，也沒有制服。走到路上，一輛卡車從後追來，給了他們一些武器。所謂武器不過是些很舊的來復槍，上面刻印的還是革命以前的年代。槍膛裏的來復線往往已經是磨損而且生鏽了的。可是那些人很爲那些武器而驕傲，擦着，撫弄着。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兵士差不多都是些工人，他們不是因爲年齡太大，不能加入紅軍，就是因爲別的理由被攆斥的。他們的軍官倒是從正規軍裏調來的。師長長着厚厚的脖子，潭勃夫地方的人，出身原是個農民，曾經在內戰中參加作戰，官階升到上尉，可是到一九三七年，很使他沮喪的，他奉命到富倫茲軍校去受指揮作戰的訓練。他現在離開學校來指揮這支烏合之衆的雜牌軍，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師裏的士兵們很快的就知道他過去的一段經歷；因此不久就有人給他起了一個外號：「一九三七級」，這話傳到弟兄們的耳朵裏，他們的臉上，都起了一絲苦笑，可是他們因此對於這位長官覺得特別親熱。他們這一羣人都是身材瘦削，狀貌猙獰，臉上多疤，鬍子花白的怪樣子，他們所以在這裏當兵，各人有各人私底下的理由。起初大家看見伊凡的那身制服，都有點對他敬而遠之的神氣，也有人看見他制服上曾經安過符號的痕跡的，就向他心照不宣的偷偷的點點頭。後來他們這一班人，沿着斯摩倫斯克公路，拖拖沓沓的往前開去，伊凡就開始唱歌了。他現在再度從軍，跨着步伐前進，他心裏充滿了快樂。他不加思索的唱起了游擊隊之歌，是

一隻內戰時期的老歌。很快的，到合唱的地方，有一個音色很美麗的男高音聲音接上去合唱，別的聲音也接上去，都是些生了鏽的聲音，可是這隻歌他們是唱熟了。一下子，全班都在唱了，步伐也整齊了，隊伍也成行了，他們因此覺得很驕傲。

後來，他們圍着伊凡，問他許多問題：他們問他關於內戰的事，和他在革命裏所擔任的工作，他們自己的經歷也很簡略的講了一講，他們告訴他，他們是哪裏人，有時候也很幽默的回憶起一件已經一半遺忘了的事。晚上全師人駐紮歇息的時候，伊凡和那些老兵就靜靜的教導別的那些人——那些以前做工人，公務員的，如何使用武器，如何投擲手榴彈（可是他們的手榴彈也並不多），如何裝置炸藥，如何掘壕溝掩護，如何在雪裏睡覺，和一切自有軍隊以來便有的行軍秘訣。那些老弱的新兵研究打仗，十分起勁高興。軍官們冷冷的看着，不說話，只有苛斯底亞是例外，他是個愛開玩笑的人，沒有什麼政治頭腦的。有一件事他們大家都不提，就是他們最近這幾年做些什麼事。有幾個很明顯的在軍隊裏幹過，很多是智識份子，學校教員，工廠工人，一個是醫生，還有一個是工程師；有幾個也很明顯的在黨部裏做過事。關於黨的事情，沒有人問起，也沒有人說起。他們的生活就是這麼過着，一直到十二月某一天，他們遭遇到德軍作戰為止。那時伊凡已經知道他們了，他知道他們能打仗。就是拿他們跟紅軍相比，他相信正規軍裏只有很少的單位有這樣高的個人智力水準；即使論勇氣吧，也只有很少的單位能在他們之上的。有砲兵就好了，他說，否則就是機關槍也好。後來事實證明，他們頂需要的是平射砲和白砲；可是是否有一種武器，可以挽救他們的命運，還是很難說的。德軍的偵察機很低的在他們頭上飛，駕

駛員看見那些隊形不整，服裝不齊的兵士，還對他們冷笑呢；他們也忘了要找地方掩護，瞪着眼回看在頭上偵察他們的人，也有人很緊張的朝空開了幾槍。他們還沒有開進預定的陣地，因為他們同德軍接觸的時候，他們是預計有正規軍的炮兵來寄護的。

偵察機過去後幾小時，敵人的搜索巡邏部隊同他們的兩翼發生接觸，可是沒有交鋒，就撤走了。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師長，匆匆的命令沿一條小河岸佈防。這樣的佈防，是合乎戰術原則的，他們也許可能會擊退敵人，只要他們有砲兵掩護就好了，不，什麼掩護都好，或者有些什麼別的武器，只要比舊式槍的射程在口徑大些的就好。目前的局勢，師長並不是憑他在內戰時的經驗來對付，而是他新近在教室裏學來的。師長派了兩小隊人，一小隊由苛斯底亞·巴洛夫率領，同在南翼的紅軍正規部隊取得聯絡，一小隊由伊凡·羅曼威夫率領同前方的正規軍取得聯絡，照原定計劃，他們可以取得那些正規軍的掩護，而此時正規軍也正該有秩序的撤退。第六人民保衛師團後來的命運發生在那兩小隊人派走以後，他們兩小隊人後來所以沒有死完，也虧得被派了出去。伊凡的一小隊無法同在他們前面的正規軍的殿後部隊取得聯繫，他們也不能同他們通訊，也不見前方有車輛往後撤。因此他們白天大部份的時間只好躲在樹林裏，晚上出發行動，又幾乎誤走進敵人的野營裏去。他們也往前進了三公里，可是他們越往前進越困難，前面都是敵人的哨位和交通線。很明顯的，敵人出動的實力很大。有兩次，伊凡看見好幾十輛坦克排列在樺樹林中，也有撞倒穀倉田舍的。第二天的下午，他們看見西方有一大柱黑烟，冲上天空。俄國兵一個也看不見。伊凡決定折回去了。

那天夜裏，他們走近了他們的師所據守的陣地，那個時候，他們聽見機關槍聲和臼砲聲。伊凡於是帶領他的弟兄，繞了一個大彎，向他的師團的南翼移近。一整天過去了，槍砲聲也停止了。他們在森林裏過的夜，早晨，伊凡往前爬到一個小丘上，那裏他們估計可以看得見戰場的一部份。一看之下，果然這場戰爭已結束了。空曠的戰場上薄薄的一層雪，有一百個他們師裏的弟兄，大部份都已經受了傷，排成一列，背朝着樹林。突然這一系列人的陣容動搖了，而且潰散了，那時伊凡聽見一陣輕機關槍的聲音。他看見一個德國兵手裏拿了那枝槍，紅色的火燄很平穩的從槍口裏噴出來，子彈就朝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這些倖存的人身上掃去。伊凡花了一些時間，仔細的把戰場看了一下，可是他看不見有什麼軍隊移動的跡象，只是德國人在把幾輛輕型車輛在搬過河。那天白天，他和他的一小队人，就在樹林裏躺着，晚上他們撤走了，很快的往東撤。第二天早晨，他們和苛斯底亞·巴洛夫少尉所率領的一小队人會合，後來又有四個從戰爭中逃出來，加入了他們。其中一個，就告訴他們，那一場仗是怎麼打的。全師人本來已經照標準的方式，挖好壕溝。可是所有俄國的河流，西岸都比東岸高。那個人看見對河高岸上來了德國軍官考察地形，用望遠鏡直對他們望，而且手還指點他們的陣地。師裏有幾個人對他們開槍了，可是沒有打中，他們只聽見那幾個軍官哈哈大笑，聲音又響，又帶着輕視的神氣，從河那岸，從田野上飄過來；向他們發射的不過只是些步槍，他們無疑是很得意的。敵人用一排臼砲火力，肅清了東岸陣地的一段，全師的人清清楚楚的看見他們這麼做，可是沒法阻止。然後敵人派了些人坐橡皮艇，開始造橋。敵人的意圖，師裏那時剛剛才明白。幾個長官就下命令把步槍火力，對造橋的敵人工兵發射，可

是火力不集中，而且也不準確。一小隊兵士到橋那邊去，預備擲手榴彈，把那些工兵炸死，可是敵人密集的機關槍火力，把那幾個人全打死了。第二批人也是同樣的給消滅了。第三批人在被消滅之前，擲出一個手榴彈，可是那個手榴彈並沒有擲中。師裏有三個人，跳下河去，在水底游泳，順流而下，游到橡皮艇那裏，用刀扎艇上的氣囊。有一個人居然爬上了半完成的橋，大叫一聲，他的刀刺進一個德國兵身體裏去，他的叫聲，全師人都聽見的。講故事的人說，他看見那個人裸露的身體，濕淋淋的在橋上發着光，可是幾聲手槍，那個裸體的游泳家跌進結着薄冰的河裏去了。他的身體給冰擋着，沒有全跌進水裏去，可是密集的槍彈，像冰雹似的打在河面上，把他打到冰下面去了。當他們照着課本上的辦法把木料從上游漂下來，在河中央掛起一根鐵鍊，把木料攔住的時候，德國人早已把橋樑架好了。

敵人一小隊，就此跨過橋來，後面還跟着一輛輕型坦克。他們所遇到的唯一的抵抗，只是東岸壕溝裏所發出來的散漫的時發時歇的步槍彈。可是那輛輕型坦克剛剛開到西岸，預備過橋，有一個俄國兵，戴着黑帽，穿着大衣（他一直躲在河岸的一個洞裏，造橋的工兵竟沒有察覺），突然衝出來，往前走幾步，擲了一個手榴彈，炸中了坦克的鏈帶，又開始放槍，他站得太近了，敵人一下子手足無措，等他自己經傷了好幾個德國兵，他們的自動武器，才把他打死。可是那輛坦克已經受了些傷，癱在那裏，一半在橋上，一半在岸上。俄國雜牌隊竟然如此的頑抗，德軍也暫時停止了他們造橋工程。白砲彈不住的飛過來，俄軍的陣地開始要不能守了。就在那時，一個穿着紅軍制服的軍官站起來了，向敵人的橋頭堡走去。那個講故事的人告訴伊凡，站起來的人就是師長。他無疑對於教範裏所規定的那一套，覺得不耐煩

了，而且看見敵人如此目中無人，他的火也冒上來了，他索性採取內戰時期的老戰術了。別的臥倒在地下的弟兄，睜大了眼看他走去，看了他有幾分鐘之久。於是又有一個人站起來了，一個，又是一個，後來差不多有一連人的光景都站了起來，抱着決心，穿過白砲火網，向橋樑走去。德軍好像奉到了命令似的，突然白砲停放了，同時站起來往前走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他們開始大踏步的走，後來他們就在奔了，其中有幾個還不致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張開嘴來，拉長了聲音，叫着俄國騎兵的衝鋒口號「胡拉！」敵方暫停放槍，機關槍手在調整他們的瞄準器；當俄國人一大羣走近橋頭堡的時候，密集的火力突然發出，把他們紛紛打倒，就好像一隊獵人把一羣鸕鶿打得紛紛落地一樣：有幾個跌得很重，有幾個跌跌撞撞，站起來，顫顫巍巍的走了幾步，又跌了下去。有一個人走近河岸了，可是仍被射中，撲通一聲，跌進河裏。那個時候，那個講故事的人說，大家所怕懼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大隊德軍坦克，後面跟着帶自動武器的步兵，在兩翼出現了；他們開始包圍，把俄國人一個一個的打死。沒有一個俄國人是投降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逃了出來，他自己就是一個。

伊凡把他們十六個人點了一下。外面可能還有別人，可是他無法同他們聯絡了。十六個人中沒有一個對於他的有權來數他們，領導他們，是有異議的；大家都還相信他們仍舊是第六人民保衛師團，他們的任務仍舊是拖延作戰，使德軍不致前進太快。伊凡說，他們這一小队人也可以騷擾敵人：破壞敵人的交通線，狙擊敵人的巡邏兵和斥候隊。可是他們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們要設法和別的部隊聯絡，假如可能的話，頂好還是同莫斯科取得聯絡。假如德軍已經攻進莫斯科，他們就在莫斯科市街之中進行游擊暗

殺活動。因此他們很快的向莫斯科走去，走在敵人的前面，敵人自以為勝利在握，進展反而緩慢起來。走到第二天，他們離開莫斯科只有三十公里；他們現在相信，在敵人和莫斯科之間，只有他們這麼一支軍隊了。打仗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樺樹和椴樹上，纓絡似的積了一些雪，地上也薄薄的鋪了一層雪，任何小動物的足跡都看得見的。公路上一點也沒有車輛經過的痕跡。中午雪融化了，再下了一場雨，把田地都化成泥淖。在一個村子裏，那些沒有撤退的農民，把茅屋的門鎖了，躲在裏面，死也不肯再開。可是那十幾個人在一輛丟棄了的軍用卡車上，發現一些麵包和幾瓶伏特迦酒。此時他們駐紮在一所不用了的廠房裏過夜，生了一個火，他們吃着，有人已經筋疲力盡的睡熟了，有人在各處找木柴，有人站着守衛。有幾個坐着，背貼着牆，腳伸到火邊上，很安詳的互談身世，討論他們現在的處境。一場戰爭之後所常見的情景之一就是那些沒有陣亡的人碰在一起，一點拘束也沒有了，彼此暢吐衷懷。在起初，他們只是用影射和暗喻的方法，各人對別人說自己有一度被斥為人民公敵的。可是他們現在的處境對他們是一種諷刺——曾經做過人民公敵的現在變成人民保衛師團的兵士了，而且還準備效忠而死，這樣，大家把話慢慢說出來了。大家認為這是一件好笑的事，把那一段的經歷大家比較着談論成了一種笑話，他們講起某段的時間，指出某幾個監獄和某幾個獄官，用內行才聽得懂的話講起不同的方法和所收的不同效果，講起各種坦白。這一切是突然發生的，自動發展的，伊凡並不參預在內，因為他那時腦筋裏滿是計劃，他的感覺時時都在提防着危險，全身隨時準備着行動，因此他四周的人這樣有興趣討論的題目，隔了好久他才聽進去。

「就我自己而言，」他聽見一個人說，「我是一個『個人無政府主義者。』」

伊凡很快的對這個人看看，這句話裏的諷刺他沒有聽懂，只是這幾個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另外一個人笑了。

「我是坦白過的，」第一個人繼續着說。「是的，我坦白我破壞五年計劃，洩漏紅軍動員計劃，破壞這一項工業，那一項實業；那些罪名都是我的問官提示叫我承認的，後來他又說了，一個人犯這許多罪，一定有同謀的人，我說沒有，我說我只是一個『個人無政府主義』者。」

好幾個人喉嚨裏咕嚕了一聲，好像又好氣又好笑的樣子。

另外一個人說：「我是一個唱歌的。我是訪問巴黎的紅軍合唱團裏的主要男高音歌手。我的罪名是陰謀炸毀巴黎鐵塔。」

又一個人說：「我是當間諜被捉去的。後來我的妻子被捉去監禁起來，罪名是缺乏警覺性，家裏窩藏間諜。六個月之後，我放出來了。我的妻子現在可還關着。」

別人還有別人的故事。有人講得很起勁，很顯然的，這是他們第一次敢把他們的那段經歷講出來。

一個黑黑的矮小的人說：「我的事情是這樣的。他們問我的同謀是誰，我就把羅馬大將的名字扯上去了，我說是：『朱利烏斯·凱撒。』第二天問官問道：『朱利烏斯·凱撒到底怎麼的了？我們已經查過，他真是一個反革命的法西斯份子。』」

一個瘦瘦的微禿的戴眼鏡的人說：「我所寫的論文題目是當代法國文學。誰知道不到一年，那個反

革命作家紀德的名字連提都不好提了。」

一個白臉的年紀比較輕的人，據他自己說，曾經做過一家工廠的廠長，他現在說了：

「一九三七年他們到我的廠裏來，」他說，「他們說是來捉某一個人的，因為他是個間諜。後來他們不斷的來了，捉了不少人去，大約有二十個頂優秀的工程師被捉了去。有一天我對我的妻子說：『這件事情我不懂。太可怕了。』我的妻子是個輩份比較晚的黨員，她說她不信他們真是間諜。忽然我明白了，說他們是間諜，真令人難信，假如說是為別的原因捉去的，也許合理一點。有一天黨部書記提議召開大會，我被開除黨籍了，理由就是我的廠裏缺乏警覺性。」

「以後的事情可以不必說了，我們都知道了，」一個聲音說道。

「同志，你坦白了些什麼？」

伊凡對他四周看看。屋子裏有十二個人。他突然覺得，那些人作爲個人而論，所經歷的同他是很相像的；他的痛苦不再是他一個人的了，別人同他一樣的在忍受着。他們不是當初跟他打游擊的農民，他們也不是以後和他同過事的那種官僚，他們也不是那種最近幾年才出科的沉默寡嚴守紀律的，從不理人，人家也不理他們的那種新同志。他們是一種新的俄國人，是有經驗的人，成熟的人，比起一般俄國人的愛國姿態，阿諛奉承，思想多所忌諱的幼稚作風，他們是大人了，他們的語調很沉重，可是也很自由，他們不怕給人家聽見，因爲他們的恐懼已經在戰爭裏煉化掉了。他看看他們，他們正嚼着大塊的黑麵包，小口的喝灰色土製伏特迦酒，他發覺他們正是頂合適的伴侶。他們的臉半隱半現的給火光照着，那

正是俄國人的臉；雖然鬍子沒有刮，臉上都是戰爭的煙灰油膩，也沒有洗過，可是那些是俄國人的臉：那個戴眼鏡的智識份子有一張過份敏感的嘴，那個戴着皮革帽子，臉龐瘦削的人的眼睛是像燧石似的，那個瘦子的眼睛周圍，有一圈一圈苦笑皺紋；高顴骨，堅定的眼光，緊張的嘴，在那些人的臉上，都是艱苦的命運所留下的記號和傷痕。突然的，伊凡找到了他一直所需要的那一種俄羅斯了——開明的，理智的，嘲笑的，看破一切虛偽的那一種俄羅斯，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是一樣的自由和無畏。

「我不能懂，」年紀輕的廠長說，「爲什麼有這許多人會承認他們所沒有犯過的罪？」
這一個問題引起一陣低低的笑聲。

「爲的是受不住痛吧，」有一個人說。

「有人會連他的母親都招進去的，」又有一個人說。

「在一九一七年，」伊凡說，「很多人受了酷刑，可是招的人很少。」

「可是一九三七年那些人就招了。看來人的志氣，只能在生命過程中維持一個短時期罷了。」

「大酒甌打上來，真了不得！」有一個人說，笑聲更多了些。

可是這個問題，也正是伊凡從盧比揚卡監獄裏放出來後，一直在他的腦筋裏盤旋的問題。他坐在和暖的太陽光裏，近處是小孩們遊戲的吵鬧聲，遠處是繁囂的市聲，他的兒子站在他的身傍，蘭吉也在不遠，他就拿這個問題來問自己；這個問題一直在他的心裏響着，可是沒有答案。

「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有信仰，」有一個人說。「心底下他們都還是信基督的。」

「你說得很對，」那個妻子還關在監獄裏的人說，「他們都相信撒謊，酷刑，殉道，吃苦那一套。」

「爲了一個偉大的主義，」伊凡說。

「總是爲了一個偉大的主義的。誰來判斷主義的偉大不偉大呢？」

「人民，」伊凡說。

「偉大的主義一套一套的換新的，可是方法還是老的。」

「革命帶來了它自己的信條。比基督徒所信的要高的信條，」那個「個人無政府主義者」說。

「沒有上帝，沒有道德，只有國家。」

「國家也可以成爲宗教呀。崇拜國家吧！」

「可是國家在消沉下去了。」

在黯淡的火光之中，每句話是誰說的，是不容易看清的。但是每個人說話，都有不同的腔調，聽慣了也知道是誰說的了。頂簡單的話是氣憤頂大的人說的；好像他們還沒有知道，他們的感慨，是可以有言語表示出來的。

「讓我來告訴你們，治理一個大國該怎麼辦，」有一個聲音說道。這就是那個瘦瘦的微禿的戴眼鏡的，忘了查一查紀德是不是可以討論的人說的。聽他的聲音很像是一個教授，腔調裏本來帶着很大的火氣，現在忽然加上一種理智的憤慨，聽的人更覺有趣，聚精會神的聽着。

「把反對你的人，都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然後你對大家說，戴這種帽子的人應該殺掉；你又更讓

別人去殺他們，你告訴他們，你們是同謀爲獲得自由而奮鬥的。你這樣做，他們也很高興，因爲你就代表國家，國家免了他們的罪，他們可以去殺人，可以發揮浪漫的獸性，良心上沒有什麼不安。當社會的基礎不穩定的時候，你就這樣做宣傳。後來，你把那些帽子換給別人戴，你要把誰清除，你就讓他們戴那些帽子好了，誰戴上了就可以殺掉了。後來，殺人的人，你也給他們戴上帽子，他們那時一點判斷都沒有，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就可以自相殘殺了。」

「啊，你這人心眼兒太多了，」一個聲音說。

「那是法西斯主義，」另一個人說。

「德國法西斯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有什麼區別呢？」說話的是把凱撒大將攀上的那個黑瘦矮子。

「沒有區別。」

「區別太多了！」

「在法西斯主義下，人是沒有希望的。在共產主義下，人總可以希望列寧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將重新確立。」這句話是陰謀炸毀巴黎鐵塔的人說的。

「即使現在也是如此？」

「假如我們打勝仗，我們的政權就穩固了，」那個黑瘦矮子又說。「可是假如德國法西斯主義打敗了，而且法西斯政權打得一敗塗地，德國人民將要有機會重新建設的。」

「他們要建設些什麼呢？」

「一個大的國家。」

「我來告訴你們，治理一個大國家該怎麼辦。」又是那個教授。有幾個人笑了。「第一，你取得政權，那是頂難的一步。此後，你保持一個效力高，手段辣的警察制度，而且把人民分成好多等級，每一等級有它的特權，比另一等級高；因此假如你的等級餓得快半死了，你下面還有一個等級，那是真快餓死了。不論特權是多麼的小，沒有人高興失掉它的。如此，你就成立一種新的階級制度，而效忠的酬報就是特權。」

他們那些人這樣交換意見，都變得活潑起來。眼睛發着光采，帶着一種笑意——一種諷刺自己，刻薄自己的笑意，話說得愈是巧妙，別人愈是要去改正它，使它變得更為巧妙。只有那個自稱做過廠長的年青人，還保持一種嚴肅的神氣。

「我們俄國人，」青年的廠長說，「好幾百年以來都是反抗壓迫的，我們造了無數次的反，為什麼今天就任人壓迫，在我們之中就沒有一個人敢說個不字嗎？」

「他說的是反對派，」一個人說。

「他說的是托派匪徒，」另外一個人說。

「他說的是死人。」

「不。我說的不是黨派。我說的是人民，是活人，」青年廠長一點也不肯放鬆。

「他說的是科學。科學把權力集中了。」

「普羅階級的情緒反應，統治者早就把它料到，而且先發制人了；普羅階級想做什麼，統治者就按他們的心意，似是而非的讓他們做，結果他們的注意力分散，他們的力量也喪失；近代交通工具這樣發達，普羅階級老給搬來搬去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普羅階級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是那個妻子被捉去的人說的。

「這不是科學，同志。這是人的不可壓足的權力慾。這只是一個人的慾望。」

「歷史創造它自己的領袖；領袖可並不能製造歷史。」

「歷史是人爲的。」

「只有權力才是實在的。」

「有了權力，人就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製造歷史。」

「他像一個雕刻家一樣的雕塑歷史，只是他的工具不是鑿子，而是死亡。」

「死亡和生命形體相同，只是實質不同。你把人殺了，主義也就消滅了。」

「如此殺人將沒有底了，因爲主義並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一種發現，一種佔有物。主義是主動的，它要把整個的人佔有的。」

現在說話的人多起來了，話也是一句接一句的，很是熱鬧。對於某幾個人，這種簡短的發言，很明顯的有一種魔力和神奇，很像天機被洩漏了似的。

「權力就是罪惡，」一個新的聲音說。

「該接受權力而不接受，也是一種罪惡，」另外一個人說。

「這就是我所想知道的，」曾經做過廠長的年青人說，他說話的神氣好像有無窮盡的時間，讓他研究似的。「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一定有一個階段，權力是不在有權力慾的人的手中的。一個人假如心裏不願意，沒有人會把權力硬交給他的；權力的獲得不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那些更有資格取得權力的人故意不要權力，或者自動放棄，那時候，權力會落到有權力慾的人的手中去。革命家懂得權力比任何別種人多，所以這種情形對於他們尤其適合。我講的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事，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按：指列寧逝世以後蘇聯之內爭。）

「爲了一個人的虛榮心，把革命都丟了，」在室內暗影處，有一個新的聲音說道。「偉人死去了，還留下兩個人，一個是二號偉人，一個是次一等偉人。第二號偉人自以爲偉大無匹，虛榮心太強，不去設法爭權，只是冷冷的站在一旁，讓人民把榮譽獻給他；不料權力反而給次一等的偉人偷去，他也被判罪了。以後一切所寫的文章，所說的話，無非是爲自己辯護，藉以減輕罪名罷了，在一方面是虛榮罪，在另一方面是竊盜罪。」（按：指托洛斯基和史大林）

「這不算是虛榮心，」伊凡說，「不過是那個人太天真罷了。」

「真是這樣，」歌唱家說，「在那些日子，我們的行爲所表現的，好像黨裏個個都是好人，不會有陰謀篡竊這類事的。」

「虛榮！天真！這些不過都是假面具，當我們預知要失敗的時候，我們就藏在那些面具後面，不再

正視現實，自己騙自己。」聽陰影裏的這個聲音，這個人一定是習慣於行使權力而且頗有學術修養的。伊凡奇怪這個人是誰。

「一個人的使命什麼時候終止，他自己知道的。」

「一個時代什麼時候終止，人也知道的。」

「也許他的氣餒了吧，」伊凡說。

「那時任何人的氣都會餒的，」那個招認相信「個人無政府主義」的人說。「俄羅斯沒有列寧會成怎樣一個局面，列寧在一九二四年，憑他手頭的情報和他的想像力，不會不看到的。」

「因此呢，因此呢，」另外一個人很興奮的說，「故意的避免獲得權力，寧可帶了他所有的那點光榮和成就，渡一個流亡生活。」

「他所留下，」陰影中的聲音說，「讓次一等的偉人和他所知道不很夠格的人去執行的，是一個集體化的計劃，一個工業化的理論，和一個軍事化的教訓。」

「還有和德國人在勃萊斯脫·黎托夫斯克訂和約的先例。」

「是的，還有對於恐怖心理的分析。」

「還可以用無碍的辯才，替這些事情在道德上找根據。」

那個黑瘦矮子開口了。「我們之間，誰不會不知不覺的這樣選擇呢？還是自己繼續做下去，終究失敗（因為這路線注定是要失敗的）呢？還是擁護共產主義的理論，自己流亡被殺，而讓別人去做違反共

產主義的工作呢？」（按：指托洛斯基固執舊政策而被逐，史大林建設俄羅斯，違背共產主義而言。）

緊張興奮的談話那時似乎已告一段落。火「必剝」作響，搖晃不定的火光在靜止不動的人的臉上，添上許多小小的搖動陰影；他們的死板的臉部後面，正藏着他們內心的憤恨。

「可是，」有一個人說，「我們這位第二號偉人還是被暗殺了，那時已經一九四〇年了，我們的政權也已經鞏固了，那時居然還有殺他的必要，足可證明人家還是忌憚着他，他還是可能參與活動的。」

「隔了這樣長的時間，經過了這許多宣傳和幻滅，經過了這許多世事的變遷，誰相信主義還能號召得動人呢？」

「他的名字已經被遺忘了。」

「也不再拿他的名字來做罵人的稱呼了。」

「不是的，那次暗殺是爲了歷史的緣故，爲了紀錄的緣故。振振有辭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非加以制止不可。」

「有決定性的時刻就在我們這一代發生的。那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可是這些猜測，都是書生之見，」伊凡說。「若是以爲『他』比我們多一點選擇的自由，那個想法太笨了。他同我們一樣，陷入於理想而不能自拔，爲革命的成果，爲光明的遠景所陶醉着。」

又是幾分鐘的沉默。可是話還沒有完。

「可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那一刻是緊要關頭，那時我們向現實妥協。」說話的是青年廠長，他還堅

持着他剛剛的看法。「在那一刻，我們把給革命添活力的理想目標廢棄了，代替它們的是人民的短淺的目標。」

「我們管什麼世界革命呢？」

「我們一向是愛國的。」

「一九一七年，人民要和平，我們就喊『和平』；他們後來要土地，我們的口號就變成『和平與土地』了。」

「當時只有我們這個政黨是說俄文的。」

「列寧開口來，總是這麼說，『俄國同胞們……』」

「只有我們這個政黨是不憑外援的。」

「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只有我們這個黨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目前的民族主義同一九二一年的也沒有什麼不同呀。」

「可是目前的味道不如當年了。」

「讓我來告訴你們，統制世界的公式。」教授又說話了。別人聽見他那種學究式的尖銳的聲音和他的一本正經的語調，統統笑了。「第一步，你用自由平等的口號，號召一切在野黨派同你聯合，推翻在朝黨的壓迫性的統治。等到你自己握權了，你把那些幫助你的人統統消滅。可是你的國家周圍，有些小國，因此你用自由平等的口號，號召他們來組織成一個大的聯邦國，他們各國特殊的制度，你允許予以

保留。等到他們加入了你的聯邦，你派使者和秘密警察到他們的國家裏去，把他們的制度推翻，建立起你的制度來。可是你的小國所組成的聯邦周圍，有些大國，比你更強，因此你用自由平等的口號，號召那些國家的人民跟你一起來參加世界革命，因此那些國家裏的人民自己對立起來了，只有你是統一而強盛的。」

這樣談着玩兒，那些人也覺得厭倦了。有幾分鐘沒有人說話，後來又有一個人說了：

「我們這裏既然都是法西斯，爲什麼我們還要去打法西斯呢？」

另一個人說：「爲什麼我們要爭先恐後的參加義勇軍呢？」

「就我說吧，」伊凡說，「我從軍是要殺法西斯。既然不可能殺死俄國法西斯，我只有去殺德國法西斯了。」

大家哼哼的表示同意。

那些人有好多年沒有暢快的談一談了，這次的談話對於他們是很興奮的。他們的話出人意外的從他們的嘴裏掉下來，不是警句，便是口號，因爲在事情混亂的時候，人們是這樣用警句口號的方式，把思想保存下來的。他們的思想是頂悲憤的一種，發源是他們心裏的「恨」：他們一度所愛的東西，他們現在只覺得可恨；他們覺得被人出賣了，心裏便恨，但是恨在心頭焚燒，只是毀壞了自己；他們的恨，不能好好的在玩世不恭或是巧言詭辯的態度得到出路，只是成了一種傷害自己的行爲，一種內心的譏諷，就好像心甘冒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一樣。

「我們這些人民保衛師團裏的人，以前都是人民的敵人，這太巧合了，」一個人說道。

「這個我也想起過，」又是一個人說。「無疑『他』是了解我們的。」

「我們一定要感謝，」又是一個人說，「總算有機會能這樣死掉。」

伊凡是已經睡着了。這是在準備一場會戰以前的倦極而睡，睡得很淺，並沒有深入意識的下層；疲乏重重的壓在腦筋上，頭裏面昏迷盤旋，仍舊像是現實的生活，並不像是在休息：這是一個判了死刑的人的睡眠。

一下子他是在同他的兒子說話，一下子他是在同游擊隊的同志們說話，一下子又回到他現在所在的廢棄的廠房裏來了，但是他所說的話都是很清清楚楚的，在他的心裏總是有疑問：人的行動到底能夠對歷史有多少影響呢？人有時是受冥冥中力量支配的，這種力量，人所不能辨認，可是人以理智加以解釋，還以為這是自己意志的產物，把自己不可避免的行動，在理智上予以解答——既說不可避免，那末人受冥冥中力量的支配到什麼程度呢？什麼東西造成了俄羅斯的歷史？歷史是先定嗎？有計劃的嗎？假如有的話，它在那裏？或者我們並不知道歷史的計劃，我們的文字恰巧能配上歷史預定的發展罷了，我們所有的不過是文字而已？人是否可能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點上，把歷史轉變過來？是否可能用一種行動，就把歷史過程轉變了？假如有的話，那末暗殺，狙擊，戰爭都是說得通的了。把阻礙歷史進展的人消滅了，誰能說這原則是不對的呢？（這種行動你相信是你自己做的，可是你明明知道有種更大的力量在迫使你這樣去做。）死亡就是答覆。凡是存在者，就是對的。此外，便都是失望，幻滅，無用——對

于歷史迅速的發展是一種負擔。一九一七年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我們那時是絕對相信的！

在這輕淡的狂囂之中，他的詭辯的話又回來了，在他的腦子的空隙處，發着回聲，不可逃避的一遍又一遍的說，壓力重得難受。在夢境中，他又在同N·K·V·D的審問官奮鬥，心裏本有意要認罪，可是硬是自己壓制，他想把自己終究的罪名講出來，把話全說了，好使他們這幾個少數人所崇拜的上帝高興，去洗淨良心，可是他的罪太大了，不管他能把自己的罪說得多大，多兇，多惡，還配合不上；因此當大酒瓶打在他的肝上腎上的時候，他反而爲自己的痛苦，發出喜歡的笑，愉快的笑，以後便是一片黑暗籠罩，緊張愈來愈加強，海底下的壓力愈來愈加重，好像快要爆發了，好像步槍子彈的突然發出一樣。

一排步槍子彈的發射聲。

在廠房裏的每一個人都站起來了。在廠前面的路上，一輛敵人的機器腳踏車歪倒路傍的積雪裏去了。車子的駕駛員，和坐在他邊上車兜裏的人，都死了。伊凡來看的時候，巴洛夫少尉走到機器腳踏車那邊去，把死人拖下來。他開始把德軍的手槍皮袋解下來，看看那枝手槍，咧開了嘴，好像覺得很有趣的笑了一笑。

「我們伏擊了他們，」他說，伊凡走上前來。

「後頭的人還多着呢，」伊凡說。

「坐在車兜裏的人還有一枝機關槍呢，」苛斯底亞說。

「聽！」

遠處可以聽見坦克車的鏈帶聲和一部重的內燃機的軋軋聲。

「他們要接近我們了，」伊凡說。「你識得這枝槍嗎？」他問苛斯底亞。

「跟我的老婆一樣，」苛斯底亞說，鬆鬆的把這枝機關槍握在手裏，「真美。」

「拿着它，到那邊的矮樹裏去。這些人你一起帶去。」伊凡指着那些剛才伏擊得手的人說。「你們的地位要能夠掩護這座工廠的。他們派兵來突擊工廠的時候，你們把他們切斷。可是不要早放槍，到了那時候才可以放。你們的槍放過，你們就要轉移陣地。我們會拖延他們，我們會從廠的後方撤退，到凱姆基的公路上，我們再聚集。」

「遵命，老叔，」苛斯底亞說。

伊凡把機器腳踏車和兩個死德國人，推到路旁的溝裏。兵士們在廠裏也各就各位，準備應戰。

「他們會設法用手榴彈和白砲來肅清這座房子的，」伊凡說。「用我們的火力，使他們不敢走近。形勢太惡劣了，我們就退到後面去。他們還不過是先頭部隊罷了，要包圍我們，他們的人還不夠呢。」

坦克車的聲音，現在很清楚的能聽見了。一下子，他們能夠看見它笨重的在路的拐角處轉過來。那是一輛輕型坦克。車頂塔的蓋開着，坦克車長站在那裏，半個身體在車頂的上面。他往前看着，耳朵上戴着耳機。坦克的後面矗立一根高高的無線電天線，像是一根馬車的鞭子。

在距工廠一百公尺處，坦克停住了。

「他是在注意機器腳踏車的輪跡，」伊凡說。

在這樣近的距離，看見了敵人，伊凡不由得覺得頸子後面熱得癢刺刺的，舌頭上也覺得有點乾燥。離開一百公尺，也許可能，他想。我假如現在把他解決了，倒是一樁事情。可是也不行。對付這件事情，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他並沒有考慮多久，因為他的殺人的慾望是不可遏制的了。

他提起步槍來瞄準，放了。

他的槍一放，別人的槍也都放了。

坦克車長的身體縮到車塔裡面去了。他們能聽見步槍子彈打在坦克上反彈出去，颼颼的發响。

暫時坦克不動。等一會，車塔頂碎的關上了。坦克往後退，轉過去，循老路開回去。開了大約五百公尺，已經開出步槍有效射程以外，它停止了，轉過來，蹲好，用她的二十糧的小鋼砲向工廠打去。

工廠裡的人覺得打了一個勝仗。

「他們是等步兵來接濟，」伊凡說。他很興奮，希望爽爽快快的打一仗。

有一個鐘頭之久，毫無變化。他們聽見遠處有大砲聲，偶然也有飛機聲。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

飛機的聲音愈來愈近了。本來是散漫的聲音，現在變成一個持續的漸漸增強的聲音了，現在又添了一種新的聲音——尖聲怪叫，音節和音量都在增高。

苛斯底亞抬頭一望，看見飛機就在他們頭上。它正是在直線下降，愈飛近，機身顯得愈大。苛斯底

亞又對工廠看看，在這一片田野雪景和樺樹林之間，那工廠突然的顯得大而觸目。

「俯衝轟炸機！」苛斯底亞對工廠裡的人叫喊道。可是他的警告沒有什麼用處，飛機的響聲已經是足夠的警告了。

苛斯底亞再抬起頭來，頭往後仰，他看見炸彈已經下來，飛機頭朝上，本來是俯衝的，現在改往上鑽，同時發出尖聲怪叫。苛斯底亞趕快臉朝下，身體貼近地，嘴張開了，手指堵住耳朵。

炸彈的震風，把樺樹林像一堆草似的震坍，小樹的樹枝，抽在他的背上，像藤條一樣。遠處有較小的震塌物體下墜的聲音，嘩啦啦的磚瓦叮叮噹噹的鋼鐵，就他的已經震昏的耳朵聽來好像是在幾公里路遠的地方，實際上是在他的四週塌了下來。

起初一陣乾燥的顏色的塵土，使他什麼都看不見。塵土慢慢的澄清，他看見那座剛剛還顯得很大的廠房已經不大了——已經被澈底炸毀，舊時的磚瓦突然的變成粉碎，木料都變成火柴梗了。

苛斯底亞再抬頭看，飛機已經不見蹤影。

他再看看灰塵漸漸在澄清的工廠的廢墟，可是一點生命的痕跡也看不見。

苛斯底亞站在那裡，驚魂甫定，慌亂失措，忽然聽見本來停在路上的坦克開動了。他看見坦克往工廠那邊開去。苛斯底亞隱蔽好了，他把新得來的機關槍往前推一推，等待着。他還記得伊凡給他的命令。

坦克漸漸在走近，苛斯底亞看見工廠廢墟裡有人在動。一個滿身是灰塵的人，灰太多了，以致他的

顏色形狀同他的背景簡直打成一片，那個人側着走，爬着走，從廢墟裡抖一抖身體，起來了。苛斯底亞看不清這人是誰。每一個地形有點突出，可以供隱蔽的地方，那人就停一停，好像要恢復氣力似的；可是他還是往前走，一直走到公路旁的溝裡。

當敵人的坦克開到對着溝的一個地點的時候，苛斯底亞看見那滿身灰塵的人站起來了。同時他看出那人原來就是伊凡，白髮上面厚厚的積着灰塵，但是機關槍子彈帶還繞在他的身上。苛斯底亞還看見他抱了一大把桿狀手榴彈，他的目的是什麼，苛斯底亞猜出來了，但是他剛猜出，他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伊凡一聲「衝鋒」，撲在坦克的前面，坦克的鏈帶往前爬，恰巧壓在他一身的彈藥上面。苛斯底亞看見手榴彈的白烟；看見坦克側倒了，靠近他這一面的鏈帶斷了下來，像一個有錢女人的手鐲一樣；看見那個人還是滿身灰塵，躺在那裡，現在是不動的了。

苛斯底亞在等坦克的瞭望塔的蓋開開來。那時要用上他的新武器了。

可是他的機會還沒有來到，他又聽見一聲尖銳爆炸聲，坦克震動了一下。又側了一側，瞭望塔上露出一個大窟窿，窟窿裡開始冒出明亮白色鎂光似的火燄。當時苛斯底亞還以為坦克內部發生爆炸了，可是不到一秒鐘，他聽見另外一輛坦克隆隆的開來。他聽見了，他也看見了。那是從莫斯科那邊隆隆的開來的。那坦克漆成白色，鏈帶很寬。它繞過了焚燒中的敵軍坦克，往前挺進。一下子，又來了第二輛，又來了第三輛，第四輛。第五輛坦克上載了好些步兵，穿着羊皮大衣，戴着羊皮鑲裏的帽子，每人手裡都是一枝手提機關槍，都貼緊了瞭望塔和車頂。坦克開得很快，聲如雷鳴，後面又來了很多坦克，都載

了步兵。再後面的步兵，排成縱列單行，急步前進。看看他們，看他們的溫暖的服裝和新穎的武器，看見他們的朝氣，看見他們的棕色的臉，和黑色斜豎的眼睛，哥斯底亞興奮得過份了。

「西伯利亞兵團！」他叫道。

他帶了他的三個同伴，走到公路上去，看着人和車輛水流似的往前進。後面砲也來了，大砲，小砲，還有滿卡車的彈藥。更多的人，更多的坦克。那些人向他叫，他也叫回去。在頭頂上是好幾隊漆成白漆，翼子上有紅星的飛機。

哥斯底亞站在敵人的燒毀了的坦克旁邊。他看看那個穿着沒有記號的高級軍官的制服，可是同他們一起作戰的人的屍體，現在是炸得骨肉狼藉了。他很嚴肅的也很悲傷的看看這個人。

「不愧是一個莫斯科人，」他說。

「一個俄國人，」一個同志說。

「他叫什麼？」哥斯底亞問。

「不知道。」

「假如我知道他住在那裡，我會答應去看看他的妻子，告訴她他是怎樣死的。」

那時候有一輛載滿紅軍兵士的卡車開過。他們對哥斯底亞叫着。這一下哥斯底亞受不了了。他對伊凡看看，他又對載滿了士兵的卡車看看。他奔向卡車那邊去，輕輕的跳上了車的後面。

第十六章 雅各索夫斯基將軍

第一次凶訊

攻勢開始以後，一直下着大雪。公路上蓋着深厚的積雪。可是要找到那輛坦克也不難。那根馬鞭似的無線電天線，現在是結滿了冰，可是仍舊是指着天空的。將軍的汽車開到這裏，司機把車停住。將軍和政治指導員走下來，將軍的勤務兵和司機後面跟着。司機和勤務兵把坦克瞭望塔上雪踢開，留出一塊空隙，好讓將軍和政治指導員來考查。

「這是馬克第三型坦克，」政治指導員說。

「我以為不是，」將軍說。「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輕型偵察坦克罷了。」

「這裏離莫斯科多遠？」政治指導員問司機說。

「我們離凱姆基五公里，」司機說。「離紅場該是二十五公里。」

「這就是他們攻到離莫斯科最近的地點了。」將軍說

「他們再也不會往前進了，」政治指導員說。

「夠近的了，」將軍說。「再有一天，兩天，他們可能已經攻進莫斯科了。」

「我們的戰略設計早就防到他們這一着了，」政治指導員說。

政治指導員頓頓他的穿氈靴的脚，他的戴無指手套的手打自己的手臂。溫度正以超尋常的速度往下急降。他想進車子裏去，開到他們的新的指揮站去，蘇別卓夫的決戰，是要他們到那邊去指揮的。

可是將軍還是繞着坦克在走，走到坦克炸毀的地方，他停下來了。炸毀的正是坦克的陰面，在陰影的底下，躺着一個凍屍。將軍看見他懷抱着一大把手榴彈，有好幾顆還沒有爆發。但是將軍能看出來：那個人是自己投身於坦克底下，幾顆手榴彈的爆炸，把坦克停住了。引起將軍的興趣的，是繞過那人全身從兩肩繞過來的機關槍子彈帶。將軍俯下身去，把那人頭上肩上的雪刷刷開。他發覺那人的大衣領子上曾經釘過四條橫槓，照舊制那是司令官的符號。

「一個紅軍弟兄嗎？」政治指導員從將軍的肩上看過去。

將軍對政治指導員看看。

「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一個義勇軍，」他說。

將軍和政治指導員再爬進汽車裏去。將軍的勤務兵和司機，跳進汽車的前座。司機加快速度，車子往前直駛而去。

他們之前十五公里的地方，大戰已經開始。在爾捷夫之東的廣大平原上，在蘇別卓夫小鎮附近，馮

保赫的裝甲縱隊，暫時因西伯利亞兵團的反攻，而被迫向後略退，可是現在得到增援之後，重新集結，向莫斯科大舉挺進。可是西伯利亞兵團已經通過莫斯科沿爾捷夫公路進達伊斯脫拉，他們的統帥雅各索夫斯基將軍對於即將來臨的交戰，並沒有全神在想。在他以北幾哩處，有伏拉沙夫的縱隊，他們已經開到沙爾奈契諾斯克；在伏拉沙的北邊，有庫次奈卓夫指揮的另一縱隊；再往北，萊魯申柯的部隊已經包圍了克林。在他的南翼，雅各索夫斯基將軍知道，有郭伏洛夫在洛可德尼亞同他呼應，再往南去，培洛夫和鮑爾廷已經把德將戈德靈的四個裝甲師團的箭頭攻勢粉碎。而且，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快要變成冰天雪地了。德國人現在還不知道，但是每個俄國兵的骨髓裏全知道。他們可以預計，溫度很快的就要降到零下五十度，風雪交加，有六個月之久戰爭是無法進行的。

這一切，雅各索夫斯基將軍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當時他並不在想這個。他所想的是坦克底下的凍屍。他所想的是他身上很明顯的內戰時期游擊隊的符號，還有那現在沒有找到的官方的符號。他在想那個人，可是他的想法不是傷感的，他的回憶被勾起來了，他的心頭熱起來了，因為他知道他不再是孤獨的了。

五個月之前，雅各索夫斯基將軍還是關在監裏。他已經監禁了四年了。他覺得自己幸虧是關在監裏。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他在列寧格勒，他準備自己要被槍決了。他已被捕，正在受審訊。審問官說他是波蘭間諜，他的罪名長長的有很多條呢。雅各索夫斯基（那時他還是一個上校）一條也不承認，他指

給他們看：他的那些獎牌勳章，都是在對波蘭作戰時領到的。審問官說，雅各索夫斯基和還有些別人根本都是波蘭人，他們在內戰的時候，混入紅軍，目的就想藉此昇官，等到掌握大權的時候，就可以把蘇聯的軍事計劃，賣給波蘭高級指揮部了。雅各索夫斯基完全不承認。審問官吩咐他靠牆壁立着，如此他就立了兩天。後來進來了一個穿GPU上校制服的矮胖子，他問他爲什麼這樣站着，這個問題問得很隨便，就像普通一個問題一樣。他請雅各索夫斯基坐下。他把有關他的案件的案宗帶來了，仔仔細細的看過一遍之後，他對問官說，這件案件所根據的情報是不正確的。說完，GPU上校也出去了。審問官很生氣，可是那時候不能夠頂撞他的上司，所以他把雅各索夫斯基關進監裏去，一直到德軍發動進攻，他才被釋放。

雅各索夫斯基說起了這些，心裏可並不恨。他的臉是清瘦的，眼睛的神氣會使別人以爲隨時會莞爾而笑的，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他的眼睛只是睜大了，很天真的看着他周圍的一切。他是個有才智的而且很能幹的參謀軍官。他是給沙波舒尼哥夫帶回來的。一九三七年紅軍高級幹部一共有八百二十名軍官，整肅之後，只有十八名是保全殘生的，他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活着的共有十八個。他只以爲沙波舒尼哥夫之後，只剩他一個人留在人世了。那些「人民保衛師團」被派出去抵擋馮保赫的進攻，想去擾亂敵人的計劃，遲延敵人的進攻，他本來還不十分明瞭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可是現在他看見了坦克底下的人，他懂得十分清楚了。他知道現在人心已經變了。他們把他從監獄裏放出來，再給他一個軍職，他那時毫不猶豫的，就下了一個決心；他現在知道幾千幾萬個俄國人都已經下了同樣的

決心。還不止幾千幾萬吧，有幾百萬，幾千萬吧，他這麼想。

「就要這麼幾天功夫，」他說。

「什麼！」政治指導員說。

「西伯利亞兵團從火車上下來，需要幾天功夫，」將軍說。「有了這幾天功夫，軍隊才可以會合集中。」

「那都是有計劃的，」政治指導員說。

「人民保衛師團給了我們這幾天功夫。」

「老頭子是胸有成竹的。」

「敵人並沒有計算到我們這樣快就把軍隊從西伯利亞調來了。他們預計我們把兵調來之前，他們已經攻入莫斯科了。」

「西伯利亞兵團的調動，敵人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政治指導員說。

將軍不說什麼。他是十分不喜歡同政治指導員說話的。可是他的論點，他要證明。

「不知道嗎？」他說。「你看，這件事你該怎麼解釋？」

將軍從地圖袋裏抽出一張紙。紙上說那天日本進攻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和菲律賓。

「無疑日本人是知道我們的行動的，」將軍說。

將軍本來還可以多說幾句，可是他對於政治指導員，並不十分瞧得起。他在政治指導員面前怎樣說

話，他也不管。當然囉，他所說的一言一語，政治指導員都要一字不易的報告上去的。他知道現在所行的新政策就是報告要正確，凡事都求正確。可是將軍也不十分在乎。紅軍軍官現在是太缺乏了，不久那些政治指導員也要去帶兵作戰了，那時他們就可有所作爲了。戰勝之後，頂強大的就是紅軍了。

政治指導員看見日本的消息，似乎很吃驚。

「這不算一回事，」將軍說，「戰爭還是要在俄國打的。我們已經打勝了。明年他們還要進攻，利用伏爾迦河來掩護他們的右翼，可是他們要失敗的。他們是注定要失敗的。」

將軍覺得氣運已經轉變了。

第十七章 莫斯科的雪夜

福開森的故事

我說時間不早，我該回去了。聽見我這句話，小房間裏各人都不開口。我覺得大家都不好意思開口。

「米德迦不必來陪我了，」我說。「我自己認得回去的。」

蘭吉對米德迦很快的說了些什麼話，又轉過來對我說米德迦要帶我到另外一個出口處，那邊他可以把回去的路指給我看。我對蘭吉，對麗莎維德，對格萊哥，對瑪莉，對他們一一都道了晚安。瑪莉最後總算振作起來，託我替她的兩個孩子想想辦法。我走出去了，他們還在小房間裏坐着，小火爐裏的火跳動着，他們在悶氣的房間裏坐着，一直要談到天明。麗莎維德幫我穿大衣，一面拿了一個大信封，塞在我的手裏。我本來已經忘了我答應把卡爾的文稿帶走的，可是現在我想起來了。這無疑就是那重要的電影劇本了。我把她的手握得緊緊的，讓她知道我懂得她的意思，然後我走在米德迦的後面，跟他到外面

的門堂。米德迦並不去開我們進來時所走的大門，他領我走另外一道過道。我們所走過的地方，人都睡着了，我聽得見沉重的呼吸聲；我們又走過一個地方，從氣味上聞起來，似乎是公共廚房；進了另一個過道，不知從那一個看不見的縫裏吹進來的晚風，突然吹得人毛骨悚然。最後我們到了另一個門堂，米德迦拔門開了一扇門，往外望望。他轉過來對我說：

「往左轉，」他說。「你就會看見你所熟悉的地方了。」

「謝謝你，」我說。

「你必須要證明你不是一隻駱駝，」他說。

「我有證明文件，」我說。

「再會，」他說，臉上笑了一笑。

我走出去，走上一條寬闊的街。晚上一直在下雪，可是現在天氣已經開朗，遲出的月亮昇上天空，發出淡淡的光輝。比起莫斯科內城那些縱橫交錯的大馬路，這條街不好算很寬；可是它似乎也是根據新計劃，穿過舊住宅區的一條新路。也許它就在『克魯尼特金門』區裏。我奇怪爲什麼米德迦以前沒有帶我到這裏來過。

我往左轉，開始步行了。街上是空空的，死一般的靜寂，看不見一點行動，一點有生命的東西。雪已經積得很深，可是也很乾，我的脚步下去，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火車頭的汽笛，大約在我的北面幾哩遠的地方，是唯一可以聽得見的聲音。溫度在急速下降，寒氣襲人，我也忽然覺得冷起來了。我把帽

子拉下，把耳朵蓋好，把大衣領再翻好。我呼出來的熱汽，噴濕了我的圍巾，立刻凍成冰塊。可是夜景宜人，晚風爽利，我走出了剛才的那間空氣緊張的小房間，此刻大踏步往前走着，心裏倒很有點輕鬆之感。

下弦的月亮，已經昇上屋頂，光輝下照，使街道的一邊都落在陰影之中；只有屋簷屋尖上的積雪，用平板的線和面和單調的黑白，反映出房屋的形狀，看上去猶如一張照相的底版一般。街道的陰影面，正是馬路加寬翻修時新修的一邊。那邊的房屋是相當高的灰色水泥的公寓房子，門面上毫無裝飾，只有旗竿插子，和新古典派的雕塑圖案。可是在向着月光的那一面，我看了倒很滿意，那是老的一邊，大約經過五十年沒有更動了。那都是些古怪的老房子，有些房子縮在裏面，外面另外做起專用的鐵門，有些房子有漂亮的前廊，有些建築是簡單的英國喬治王朝式的，有些是義大利式的，有些是圓拱的羅曼尼斯克式，有些是尖頂的哥德式，各式各樣，建築的時候，無非是要投合十九世紀暴發戶的趣味；可是也有幾幢房子是本地木工自己的式樣，窗櫺門框都是照匠人祖傳圖式，很精巧的用松木刻成，鑲嵌得很精緻，不用鐵釘；裝飾圖案，複雜得很天真，好像小孩子把一張紙摺成八疊，用奇怪的剪法修剪所得的圖案一樣。無疑我是在亞拔茲區附近了。只有在這一區，街上房屋的式樣頂多，看上去頂有趣；只有這一區把革命以前的那一段時期明白的反映出來：那時的毫無掩遮的個人主義和毫無節制的貪慾。在這裏，那輩小人（他們是堅信憑了他們自己的才幹）做小麥、羊毛、木材、皮貨買賣，剝削廣大的農民羣衆，發了大財，然後學起沙皇來了，用木頭石塊灰泥造起房子，想把他們的發財的本領，傳諸永久，後世都

可記得：房子是形狀不同，大小不同，是慣於欺詐的義大利建築師給他們設計的，財主們看了，自我陶醉，覺得很是舒服。可是沿了這條街，獨個子靜靜的散步，倒真是很舒服的；在那裏可以自由的想像當年豪華的宴會，燦爛的招待會，掛着叮噠響鈴的雪車，噴着熱汽吼吼作響的駿馬，這一切有一度一定使這條街有聲有色的。那些幾時才可以恢復呢，我在問自己。

老天爺下了這場雪，我很高興，因為雪把當年豪華住宅的卑鄙相，窮酸相，冷落相都遮住了。房屋的凸出部份和雕塑的圖案很親密的，依附在乾而軟的雪上，只有在負擔太重的時候，才放走一些，我就可以看見白白鬆鬆的雪飛舞出去了；可是屋上的雪終究有不少，把看來不舒服的裂痕，褪了漆的缺陷，歪曲了的接筈，破舊的臺階都給遮掩起來了。雪下得很大，全莫斯科都蓋沒了：舊創新傷，都被掩蓋；黑的是烏黑，白的是白得耀人，只有黑，只有白，強烈的一對照，一切醜惡污穢都顯得美麗悅目了；人行道上的窟窿給填沒了，污泥給凍固了，破碎的街邊石給彌補了——排水溝成了廢物。一眼望去，層層疊疊的房屋，在天上勾勒出起伏的線條，像是立體派圖畫上的曲線，很是可喜；葱球似的圓頂建築，這時才顯得特別美麗；街道盡處的廣場，前兩天還是一片淒涼，現在成爲廣闊的美景了。

莫斯科是感謝這場雪的，可是它的百姓恐怕並不十分欣賞。任何地方看不見一點生命：沒有車子，沒有男人，沒有女人，沒有做晚班的工人吹着口哨回家，沒有沿街吵鬧的醉客，沒有狗，沒有貓；沒有盞路燈是點着的，門縫底下，窗簾邊上，都躡不出像刀鋒那樣薄的一片光；沒有聲音。可是在每一家的屋頂底下，都睡着一百個或更多的人，在釘死的窗，門緊的門的背後，密密的雜亂的住滿了人，一間房

間裏有五六個乃至七個，一張床上睡着兩個三個乃至四個，要取暖大家擠在一起躺着，倦極欲死的睡着；輾轉反側的也有，有的要臨盆，有的在生病；重重的呼吸着，打着鼾，咳着，咳着永不停止的嗽；或者是躺着醒着，空着肚子的躺着，小孩們因爲夜餓在哭喊；幾千幾萬的人在那柴屋頂底下躺着，無數人的熱氣，在不生火的零度以下的房間裏，像雲霧似的噴着，已經在牆上結成寒霜。或者，在生着火的房間裏，黑黝黝的整夜的坐着，談着，永遠的談着，戰戰兢兢的或者是不顧一切的談着，談着來消磨時間，談到明天，如此，好像是被人獵逐，肚子受傷的野獸，把現實忘掉，可以展望將來了。

這樣一座大城市，只有我一個人動着，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地，茫然無知地走着，我的外國護照和戒嚴通行證在我的口袋裏。

外國人都喜歡莫斯科就是爲的這個：因爲大使館一個頂窮的書記，比起任何俄國人來，吃得好，穿得好，房子又暖，住得也好，權利也多，生活也安全。外國人的安全，他自己知道得不大清楚的，因此他總覺得斯拉夫民族很神秘：他看不清在俄國所特有的恐懼的徵象，他看不清俄國人的自尊心已經因長時間的生活在恐懼裏而變成麻木了；俄國的官僚政治造成了恐懼，可是外國人就在官僚政治的邊上生活，因爲他的地位特殊，並不覺得恐怖，他反而把這點事實看不清了。他解釋起俄國所特有的恐懼來，他總覺得這樣講很合適：不是說東方人天生猜忌，就是說俄國人傳統上是孤獨的；俄國人的性格如此，改不了的，而且俄國人從來就不懂什麼叫自由；這種浪漫的幻想，對於唐努吐伐或是西藏，該比對於莫斯科更爲合適。因爲莫斯科（請聽那火車的汽笛！）只是在距離日益縮短的工業世界裏的另外一個人

口繁密的工業都市，比起美國的明尼阿浦立斯，英國的曼徹斯特，印度的麻特拉斯，澳洲的墨爾鉢，只是稍爲偏僻一點，旅客暫時不容易走到，可是它和那些大都市一樣，同樣的有失業問題，生產問題，分配問題，它的人民也有同樣的需求，同樣的才能，同樣的希望，所不同者，只是他們所受到的壓力和別人不同而已。他們所受到的壓力，難道就不會加到明尼阿浦立斯，曼徹斯特，麻特拉斯，和墨爾鉢上去嗎？假如認爲不會，那想法就是錯誤的了。

還有些外國人，從未來過莫斯科，偏喜歡把這個城市牽涉到他們的理論中去；他們講起社會主義的成就來，不是替莫斯科的人民多說一點，就是少說一點，他們就不知道他們實際成就有多少；他們要證明這一套或是那一套的革命理論到底對不對，就把莫斯科的進步搬出來；明明有時也有退步的地方，他們就說這是暫時的，而且歸咎於莫斯科所遇到的實際上的困難。這種爭論使得莫斯科人的生活成爲世界政治中的一個神話，使得莫斯科人的負擔更爲加重。因爲他們那些人在雪蓋的屋頂下是如何生活的，莫斯科的當局是不想讓人知道的。

街道通到一條寬闊的馬路，路中是兩排樹木的快車道。我沿着大路走了一段，我要看看周圍有什麼我認得的地方沒有。我看見一座銅像，我就走過去，站在它下面。雪很平穩的停在銅像的頭上，鼻尖上，大衣上；可是雖然披了一身雪裝，銅像人物的神威仍是虎虎然的表現在外。那是座戈果里的銅像。他的名字的幾個俄文字，很挺拔的凸出在座基的邊上。在這寒冷寂寥的街頭，這位偉人瞪着眼睛，朝下對我望着，好像我這樣一個人，也可以收進他的小說似的。我想不到他是這樣威厲的一個人物，我總以

爲他的神氣要比現在那樣溫和一點，但是我想起了「塔拉斯·波爾巴」（按：爲戈果里名著小說，紋哥薩克人大義滅親，父親殺子事。）和別的事情。就在那時候，我想像自己是上一世紀的一個莫斯科的學生：我戴了一頂打壞了的高帽子，穿了一件襤褸的大氅，花背心，破皮靴，我在一條廣闊的大馬路上走着，兩旁都是偉大的銅像，柔軟的雪積在我的腳下，也積在偉人的袍子上，那些偉人正瞪着眼睛朝下向我望着：戈果里，屠格涅夫，普式金，萊蒙托夫，奧斯脫洛夫斯基，托爾斯泰，貢察洛夫，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高爾基，戈浦靈，鮑洛廷，列姆斯基·郭薩克夫，墨索格斯基，柴柯夫斯基，還有廿個別位人物，都俯首望着我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浪蕩學生，他正用破靴踢着雪，不貪舒服，不求閑差，不愛享樂，他所關心的只是他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如何能把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

這樣的幻想倒很有趣。可是這位衣衫襤褸正在閑散地用破靴踢着雪的學生，突然吃了一驚。

「站着！」

兩個憲兵，穿着深青大衣，羊皮幅子拉下來把耳朵都蓋沒了，全身禦寒配備，他們就站在我的後面，俄式輕機關槍朝着我，按着掣機的手指從手套上的窟窿裏伸出來。他們剛剛是輕輕的從我後面走來的，因此我沒有聽見他們的腳步聲。

「對不起，身份證，」一個憲兵說。

「OK，」我說。

「外僑嗎？」

「是的。」

「再要護照。」

我把我的證件遞給他們，手套脫下了，手上冷如刀割。

兩位憲兵低下頭來研究我的證件，仔細的研讀上面的字，查勘日期，印花，和各種我從來所不屑花功夫一顧的文句。他們慢條斯理看着，我站在那裏，開始覺得冷。

「姓名？」

「詹姆·福開森，」我說。

我這個名字他們讀不出來，拼也拼不出來。他們在竊竊私語。我猜他們之間有一個正想把我帶到附近的區警署去調查。這樣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

不過那個小一點的，矮的，眼睛像豬眼似的憲兵顯然不想有麻煩。「沒有甚麼，」他對那個較高大的也是年輕的人說。

最後那個較高大的較年輕的人把文件還我。我把它們放進口袋，掉轉身去要走了。可是那個青年憲兵把我一手拉住。我覺得他的手臂同鋼鐵一般的堅硬。

「你剛才站在那裏幹嗎？」他說。

「我在看銅像，」我說，指指戈果里。「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座像。你瞧，這是大作家戈果里的像。」

「這樣深更半夜看銅像是不合適的，」青年憲兵說。他非常嚴肅。我的解釋不能發生什麼效果。另外一個憲兵對他說了些什麼話，我沒有聽見。

「好吧，你可以走了，」青年憲兵說。

沒有什麼可以爭辯的了。在上一世紀偉人的注視之下，提起破靴的腳踢着雪，那個衣衫襤褸的學生橫過馬路，走入另一頭的街裏去了。

這條街很醜陋。街上都是革命以後的機關官署，大而灰色的水泥建築，比起那邊的商人公館，看上去一樣的氣派，一樣的不合時代，可是這邊的建築沒有那邊的耐人玩味。在機關之間，是些舊時的大幢下等公寓房子，造來就只預備收取貧民窟的房租的，自從最後一塊磚鋪好後，就沒有整修過。

可是剛剛給這麼無禮的一打岔，那個倒霉的學生的幻想給打斷了，他這時正在想，那兩個傢伙畢竟還是承接着上一代的。那些青年人，眼睛裏沒有靈魂，瘦瘦的臉，凹陷的太陽穴，他們是有權利活着的。誰能說他們的思想不是真理？他們的行為不是人生的正路？因為歷史是不管錯誤的，歷史不管那些不跟歷史的主流前進，而留在漩渦裏無窮盡打轉的人，歷史不管這一派那派的道德教徒，它只知道一種道德，那就是：不被淘汰就是對的。那些人就是沒有被淘汰的人，那些無知無覺的年青人，他們的思想就是反映他們的領袖心裏的一喜一怒，他們非常驕傲，也非常嚴肅，他們的身體就像鋼鐵。他們不記得甚麼，因為沒有東西可以供他們記憶，讀書不是爲了要理解，而是爲了要考問自己，堅定信仰；可是他們有行動的力量，他們知道行動的意義，他們把行動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生命假如只是生命，沒有

別的意思，他們是看不起的），他們吃苦先於享受，他們取人家的性命，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他們這一代本來是預備犧牲的。歷史就是這樣進行的，那個衣衫襤褸的學生這樣想，別的一切都是塵土，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廢物。

同警察發生了小小的交涉，一個人會變得那麼氣憤！

在這個「死靈魂」的城市裏，精神屈服在農奴制度之下，不論多少人，只是紙上的一個統計數字，在交易的桌子上可以買來賣去，現在當然是在戰爭中可以隨便犧牲掉了；「靈魂」成了農奴的別名，當然那種沒有靈魂的，沒有感情的，純憑體力見長的人是會起來了，他們根本沒有感情可言，沒有倫理上的顧忌，也不顧一切落伍的道德觀念，他們只是維持自己的肉身，可是肉身外面所包的一層皮是如此厚，他們的主人的鞭子落下來，他們是不覺得痛的。

那條街突然走完了，對着我的是一片大廣場。在我的面前就是克里姆林宮！

同時下弦的月明亮的照着，勾劃清楚的黑影，落在這座古城上面。雉堞的城牆上所凸出的每座城垛，上面都積着雪，敵樓上也都是雪。城牆後面是烏斯賓斯基和阿凱琪爾斯克兩座大教堂的球狀圓頂，上面也蓋着一層雪。還有恐怖伊凡的鐘樓，另外一頭是斯巴斯基大時辰鐘的尖頂高塔。在這座靜靜的古城裏面，一切都靜靜的站着，月影和積着雪的線條畫出了拜占庭式，哥德式，羅曼尼斯克式，佛羅梭斯式，喬治式，維多利亞式各種建築的奇怪的混合。在每座尖塔頂上，都是一顆大黑星。這裏面有的是亞洲的神秘，東方與西方的會合：有的是大主教的宮殿，十二使徒大教堂，德倫宮一名「婦女宮」，歷朝

沙皇的陵墓，沙皇的兵器庫，沙皇的火礮，化成木乃伊的列寧，接待貴賓的格拉諾維底亞宮，電影放映室，也有放滿了留聲機器的房間，秘密政府機關的房間，各式檔案，曲曲折折的地底房間，電梯，匿名告密信箱，人民政治委員的集會——這一切都藏在那高高的磚牆後面；設計那城牆的是一個有眼光的義大利人，他設計了假的城垛和敵樓，好像是設計歌劇的佈景一般。可是現在這一切的上部，都靜靜的舖了一層雪，扁的圓頂建築和細的尖頂建築上面都附着一層雪，看上去好像是巨大的糖果，只是那糖果店老板的糖霜不很夠，只澆上了那些比較凸出的部份。

可是這景象是奇麗的，而且很自然的我們會聯想下去，覺得這景象是有惡兆的。

月亮漸漸西沈，我憑着落月的微光，對着這座古堡看着，那時忽然一輛黑色轎車從鐵柵門裏開出，向我急駛而來。

後面又跟着第二輛，第三輛。

古堡裏面今夜的會議是開完了，我對我自己說，明天的計劃已經決定了，元帥們人民委員們都散會回去了。

我站在那裏默思，忽然又聽見一聲喊。

「站着！」

我周圍都是穿着深色大衣的衛隊。我沒有看見他們來，可是他們在我周圍站滿了。好幾個帶着自動武器，可是多數人只有手槍。他們的武器沒有拔出來，他們也沒有碰到我的身體。

他們站在那裏，黑色大轎車一輛一輛的開過，就朝着我來的那條街開去，輪胎在新雪上輾過，吱吱作響。

我把我的證件拿出來。

一個軍官拿去細細的研究。這一次不還給我了。我知道這一次我要到區警署去走一遭了。

第十八章 恐 懼

瑪莉·安德森的獨白

他們這樣談法，使我的神經緊張。他們這樣談，是很壞的。這就表示他們甚麼都不在乎了。這就像一年以前，德國人攻近莫斯科時候的情形；現在情形更壞，因為好幾百萬人已經死了，到處是飢餓，工作沒有休息，另一個冬天又來了；我們的軍隊撤退，衆河跟着伏爾迦河流下去，外國資本家看着我們流血到死，還是袖手不動。所以那幾個人就這樣放肆的談了，他們現在是冒着險在談，可是所冒的險就是這點點：他們還有甚麼辦法對付他們嗎？他們還能從他們那裏拿走什麼嗎？

他們談着是要放鬆自己的緊張，可是那個外國人是一點不能了解的。他是從外面世界來的一個好人，他就同我過去一樣，他甚麼都不知道。因為他自己是安全的，他不會有我們這種感覺，而且也不能告訴他。他可能替我的兩個孩子做些什麼情事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他們沒有什麼希望，可是總有一種力量在驅使我替他們想辦法。他們是美國孩子，他們應該接受美國的文化，過美國人的生

活。那個外國人不知道（我也沒有告訴他），我的兒子羅勃，現在十二歲了，幾個月之後，就要被遣送到一家職業學校去，我將要永遠看不見他。他們將要把他帶走，就像製造機器一樣的，把他造成一個機器匠，他將要被遣送到烏拉爾山去，我將要永遠看不見他。假如我已經入了黨，情形也許可以不同。假如我是個高級黨員，小羅勃就可以進一所特殊中學了。但是我可能變成一個黨員嗎？入了黨我將要甚麼都做，我將要從頭學習起，我將要刻苦工作，我將要遵守紀律，我將要過一種單純的生活，我將要把整個生命奉獻掉。怎麼的？現在還可能嗎？一個外國女人，而且是外國人的妻子！我一定得控制自己。我快變成歇斯的里了。

可能那個外國人能救我的孩子。外國人在上級方面可以說得通，有幾個甚至還可以走進克里姆林宮去。說不定可以代我向要人面前說幾句話。而且大家都在說蘇聯完全是「特權」人物的世界。我一直想着我的孩子們。蘭吉也對那個外國人講起她的孩子。可能她也想起他可以救卡爾？那不是她所想的。她太聰明了，不會做這種事情。而且她也太驕傲了，她不會找外國人來幫助；她是十足的俄國人。那麼他們談話的後面藏着些什麼呢？爲什麼他們要講起卡爾呢？他們有些秘密。他們心裏都藏着些秘密：蘭吉，格萊哥，麗莎維德，還有這位米德迎心裏都是一樣。事情就在那裏，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對他們自己，也沒有對別人講起過它。是的，有一個陰謀！我敢說一定有。我覺得到那種空氣，在俄國人的性格裏，是不難覺得到那種特別空氣的——那種暴風雨即將爆發的空氣。可是那個外國人能替他們做什麼呢？他們故作神秘，那個外國人也能想像到有件秘密在那裏，可是他們也知道：人家已經全知道了。

這是不是算一種瘋狂呢？是不是算一種無政府狀態呢？

我一定不可以再到這裏來了。我一定得把我的房間同別人交換。假如他們真在陰謀什麼瘋狂的行動，這個地方是待不得的。那個外國人現在正沿着「官道」回家，他知道不知道呢？當然，他不知道任何關於「官道」的事的。他是從一個和平的國家裏來的，那邊人家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暗殺。他不知道那一條街造得特別寬，特別直，好讓克里姆林宮出來的人很快的就可以回到他們鄉間的公館裏去。他不知道沿着「官道」旁公寓裏的人，都要有蓋着特別印章的派司，都要受到「他們」的審查和核准。他不知道這個。他不知道這個國家，因為他是從一個民主國家來的。可是假如有什麼陰謀的話，人人都要牽連進去的！難道真可能他們心裏有這個瘋主意嗎？這樣一件事情要送掉幾百個人的性命的。不止這個呢。幾千個，幾百萬個。一鬧了就沒有底的。

哦，我害怕極了。我也要被槍斃的；可是我不算什麼。我的兒子要怎麼辦呢？我們的房間貼了封條之後，他們將要在街頭流浪，討東西吃，借人家一席之地過夜？他們將要成爲「無家孤兒」了，這一件事情鬧出來太荒唐了。只有一個瘋子，不論是男是女，才會做出這種事來。趁還沒有動手以前，制止了它吧。制止它也有辦法。專門爲這種事情，不是設了有告密信箱嗎？沒有人會知道信是誰寫的。

可是，不，我不能：這樣牽連下去到哪兒才停呢？

第十九章 小妖精

福開森的故事

我起得很晚。烏達諾伐太太來替我上俄文課的時候，我還穿着晨衣。老僕拖着脚步，端進茶和餅乾，我們坐下來，開始我們的早晨閑談。我很高興烏達諾伐太太來陪我，因為獨個子過早晨是很難受的；窗外透進來的光是灰色的，神志很清醒，可是清醒得有點淒涼；再則想起了看守所裏那個吃醉酒的兵，被人踢打，踢在肚子上，踢在腰裏，踢在胸口，踢在屁股上，正正經經着着實實的踢着，想起了這個更是難受。

烏達諾伐太太啜吸着她的茶——好的錫蘭茶在玻璃杯裏直冒汽，非常精巧的咬嚼着她的甜餅乾，餅乾屑沒有一粒會從她的手指縫裏掉下來的。我不忍去看她。她也許並不鬧飢荒，也許她領得第三號配給，那就是說，午餐她可以希望有稀的麵條湯，和一片塗上紅色魚子醬的黑麵包，晚餐可以有半磅麵包加紅茶，第二天的早餐可以有另外有半磅麵包。我一直想問她，她對於這種「幹部配給制度」有甚麼意見

，可是我知道她一定會拿官樣文章來答覆我，而且她有親戚在列寧格勒（那裏吃得更好），這樣一個問題未免太殘酷。俄文名詞各格字尾的變化，我還沒有好好讀熟，她是很失望的。她想我並不在認真的對付她的功課，在這種想法的後面，當然還有丟掉差使的恐懼，因此她早晨的紅茶餅乾就要成問題了，而且我給她的盧布，也足夠使她到農民市場去買牛奶喝。

「我昨夜在看戲，」我說。

「你上藝術大戲院去了？」她說。

「是的，去看『夜店』。」

「很藝術化的，是吧？」

「我相信他們是特別擅長自然主義的，」我說。

「這對於人生是真實的。」

「我想提供他們一些意見。」

「是的。」

「關於如何對待苦人，我可以補充一點意見。舉個例吧，警察踢醉漢的肚子，這樣一幕可以添進去的。」

烏達諾伐太太看上去很不舒服。

「戲院是人民的鴉片，」我說。

「那是甚麼？」烏達諾伐太太掉了一粒餅乾屑。

裝着卡爾電影劇本的信封，擱在我的書桌上。看上去大約有一萬字。都是俄文。我起初想要不要找烏達諾伐太太替我翻譯一下。後來想又不必了。這要使她多窘呢！而且天曉得裏面內容是些什麼。

「喂，」我說，「爲什麼不把剩餘的餅乾帶回家去給小孩子們吃呢？」

「哦，不，謝謝。」

「不，我一定要請你帶回家去。孩子們一定喜歡吃的。」

我把剩下的餅乾，用餐巾包了，打成一個小包。烏達諾伐太太從來不肯把早茶盤裏剩下的點心帶回家去的，我倒要看看她幾時才肯帶。今天早晨我有點討厭烏達諾伐太太。我們的談話沒有談好。今天是星期五，她要休息兩天再來，我很高興。

我幫她穿上大衣。她重重的同我握手。她快要走的時候，我的房門砰的推開，小維姐莉亞進來了。

「阿囉，詹美！」她說。

「哈囉，」我說。

那時維姐莉亞見烏達諾伐太太站在那裏，她的眼睛裏的表情變了：她的表情不是怕，而是在恐懼前的勇敢，這一切不過只有一秒鐘。維姐莉亞把手從門柄上鬆掉，站在一旁。烏達諾伐太太也不朝維姐莉亞望一望，就此走了出去。維姐莉亞眼睛裡的表情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情，現在她走進我的房間來，神氣在自信之間，帶着有點撒嬌。

「她是誰？」她問。

「我的俄文先生，烏達諾伐太太，」我說。

「啊，她教你俄文的，」維姐莉亞說，她的金髮的頭往後一仰。

「你是由那裡跳出來的？」我說。

「我夜裡同查理在一起，」她說。

「怎麼成呢，」我說，「這不是違反使館規則的嗎？」

「怎麼？」

「這是違禁的。」我說。

「誰說的？男人都有女人陪着睡的。」

「是的，可不是在使館裡，」我說。

「這不是使館，」她說，「這地方是讓人睡覺的。」

「你的知識倒在長進，」我說。「是查理告訴你的嗎？」

「當然。」

「你喜歡查理嗎？」

她不回答。她走到我身邊來，兩隻手臂圍着我的脖子。這個動作她是從電影學來的。

「你在學俄文，」她說。「你喜歡同俄國女孩子說話嗎？」

「是的，」我說。

「我教你。這是 *Clasé*，這是 *nose*，這是 *Röt……*」說着，她把她的手指先放在我的眼上，再放在我的鼻上，嚙上。

「請聽着，」我說，「你是查理的姪兒。不是我的。」

「詹美，你這個人很好玩兒。」

她把雙手從我的脖子上卸下來，走到我的房間角落的牀邊。她坐在牀邊上，底下是彈簧，她輕輕的搖着，然後倒下去，躺在我的枕頭上。她對我看着，可是並不笑，她的眼皮下垂，蓋住她的深棕色的眼睛。這個姿態太做作了，太像一個「妖姬」的派頭了，我不禁想笑。這個姿態很笨；她年紀這樣輕，偏偏要賣弄性感；她既欠手腕，又無魔力，又缺神秘；而且她又生得這樣粗手大腳的。可是我並不笑。說老實話，我忽然全身衝動，迫切的想佔有她。這幾個月我在俄國，這是第一次我對於女人有這樣的感覺：而且現在我的感覺很強烈。

維姐莉亞今年十六歲。查理·索末斯的鼻子長得雖然高貴，可是老是在東嗅西嗅的，他在都城大飯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遇見了她。她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穿着紅軍女青年團的粗布制服，可是她現在穿了一件絲衣服，一雙玲瓏的漆皮鞋；那套行頭不是查理或是別的外僑買給她的；她的塗紅的指甲，和染色的頭髮，卻不是任何外僑出的錢。一個女青年團很快的就變成一個尤物，使查理和他的朋友覺得非常有趣。一個對生活覺得厭倦的女青年團員，忽然嘗到了都城大飯店的神秘禁果；對於外國人的放浪生

活，她本有一種天眞得令人難信的觀念；對於外國人本身，她先是鄙視，後來變得跟他們一起享樂去了；後來突然的，有了新的衣服，新的認真的態度和矯揉造作的姿態：這樣的改變本是很平常的。可是這樣的改變也很好，那些姑娘們總很嬌嫩，而且她們不求報酬。

維姐莉亞躺在我的床上，眼皮下垂，凝神的看着我，年紀還太輕，自己還不知道誘惑力有多大，還想測驗一下；可是我已經在軟化了，她的自信心也增加了；等一會她就要變成蠻橫了，可是這樣做她始終是覺得刺激的：她的結實的肉體——是的，她的肉體還沒有沾到邪惡——她的年青的，結實的，肌肉發達的身體，她將要迫切地使用：沒有儒怯，沒有恐懼，也不缺乏自知之明，可是總是很熱烈的；她相信女人的魔力就是她的一股子勁，她沒有隨機應變的那一套的。

我走到牀邊去。

「你來這兒幹嗎？」我說。

「查理要香烟。」

「今天沒有香烟，維姐莉亞。」

「詹美，讓我們到外國店裏去買吧，嗯？」

「今天店不開門。我的配給都用完了。」

「你的香烟都給了誰，詹美？誰都知道詹美有香烟。」

「我自己抽的。」

「詹美的香烟給了維姐莉亞，黛娜米亞了？沒有！誰都知道詹美只抽美國香烟的。沒有俄國香烟了，嗯，詹美？」

「不要多管閑事，」我說。

「詹美到店裏去買了伏特迦酒沒有？」

「沒有。」

「你的伏特迦酒送給誰了？」

「沒有的事。」

「詹美有個秘密女朋友了，嘿？」

「沒有的事。」

「你有烏達諾伐太太呀？」

「你這小婊子！」

我的生氣同剛才的談話沒有什麼關係，可是維姐莉亞已經吃不消了。她不笑，也沒有照我預料那樣把頭往後一仰。她臉上的表情是孩子似的不知所措；她的那套迷人姿態畢竟是一戳即破的。

那時門上敲了一下，查理·索末斯進來了。

「我想我在這裏找到你的，」查理說。

「喂，」我說，「我願你不要再讓這位瑪姐哈莉到我房裏來。」（按：瑪姐哈莉為著名女間諜。）

「怎麼一回事？」查理說。「她愛上了你了。」

「我以爲她是你的朋友，」我說。

「我愛得她要命，」查理說，「可是她說她愛的是你。」

「真的。我愛詹美。」維姐莉亞把背轉過去，不看我們。她走到我的書桌邊，拿起一本生活畫報（一共有好幾本，我要讓烏達諾伐太太帶回去，她不要），她開始翻着看。

「好吧，事情很簡單，」我說。「我把她從你那裡接收過來。就像這樣。你另外找新路線發展。米亞或者別一位。」

「不是米亞，」查理說，「有一個新人，叫做朱麗亞。小桃子這麼一顆。說來說去，你沒有女朋友嗎？還是有了？」

「真的。詹美沒有女朋友，」維姐莉亞說。她坐在我的書桌後的椅子裏，看我的那本生活畫報。

「你好像什麼都曉得，」我說。「喂，查理，我要修面。你不在乎嗎？」

「沒有關係，老朋友。」查理跟我進浴室。「這間房間不錯呀。真的，相當的好。好厲害的傢伙，你真是。」他坐在化粧檯子上，我把脖子漿往臉上一塗。

「你要你搬來住好了，」我說。「對於整個這一套，我覺得厭倦了。我討厭莫斯科。間諜呀，告密的呀，老在四周轉，我覺得討厭了。我在這裏待得太久了。」

「不要侮辱那些辛苦工作的女孩子們，」查理說。「你知道人家把你指定做『特別任務』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舉例說吧，你昨夜在哪裏？像你最近這樣躲來躲去，人人都受你累。」

「別多說了。誰要知道我昨夜在哪裏，可以到藝術大戲院和亞拔茲區警署去對證。我昨夜就在那裏過的。」

「哦，明白了。你給逮起來了。」

「他們逮我是逮錯的，可是我看見他們怎麼樣收拾一個喝醉酒的兵。他們穿了他們的那種大靴，有條有理的踢他，把他的五臟都要踢出來了。」

「總看不見一件好事的。」

「後來他們記得我是一個外國人，就把我推到另外一個部門去，有一個警官叫他們統統行敬禮，在四周正步走。他們把我的證件拿去。他們知道我的證件沒有毛病。可是他們還把我看守到解嚴為止。」

「講得響一點，慢一點，」查理說，「讓她也聽懂。」

「管她的，」我說，「你以為即使她聽懂了，她能好好的記住嗎？」

「記不得更好。因為在第一幕戲的終結——是的，我看見你出戲院的——和後來的一件事，上午兩三點鐘那時候，這兩者之間，有一段小小的空白，是不是？」

我把脖子漿刷子攔下。「查理，我告訴你……」我才說了一個開頭。

「你知道，」查理說，「有時候我自己對自己說：『老福那傢伙一定是屬於反對派的，因為他對於

周圍的事情，無疑是不贊成的。別人誰都很高興，因為殺掉的都是俄國人，不是我們，可是老詹美是個有心眼兒的人，所以老天爺在上，誰都猜不透他在搞些什麼。」

「哦，別胡扯了，查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我剛才所要說的，我總是說得很巧妙的囉，我所要說的，就是我知道你心裏感覺到些什麼。空氣太壞了。斯達林格勒的事情，誰都聽見了不好受。」

「我心理已經煩了。我要休假。」

「哦，不，你不可以。你不可以比我先休假。」

「好吧，只要人家不來理我就得了。假如他們跑來問我，我就把我對於他們那個該死的國家的意見，一是一二是二的告訴他們。」

「『該死』這個形容詞用得頗有深意。可是我總以為他們對於你的高見，是不在乎的。老實說吧，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你這個人。他們所担心的，是他們的俄國人。他們所想知道的，是你到哪裏去了，你跟誰說了話。」

「見他們的鬼！」

這樣說話是很笨的。我覺得我常常一不小心，就說了些蠢話。我不愛說下流話，可是心裏不想說，嘴裏一下子就說出來了。有時候我心裏煩得要命，我自己也想壓制，可是我要出氣也沒處出，除了查理·索末斯那個糊塗蛋。

「好吧，不要讓那件事誤了你，」查理說。「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每個男人總在什麼地方藏了一個女人。聽我的忠告吧，假如你要太平過日子，找一個娘兒們藏起來，那末好好的應用這位維姐莉亞吧。」

「多謝，」我說。「說來說去又到了老題目上來了。」

「你是個怪人，福開森。」

「也許。」

「恐怕你不見得是去找娘兒們的吧，我不這麼想才怪呢。可是不是娘兒們，事情更糟，因為這樣要牽連到政治了。」

「別讓這事煩了你，查理。把事情看得簡單一點。」

「很對，簡單一點。你知道我的原則，是給他們一些線索，讓他們追蹤。告訴你一件我的小秘密吧。在我的屋子裏，有一本舊版的珍氏『兵艦年鑑』。多有地位的書。可是我在書裏面到處用紅字印上『極度機密』這幾個字。我還問老傢伙借了橡皮圖章來蓋的呢。好，每次我同小娘兒們上牀睡覺，我就把年鑑裏撕一張下來，交給她。有時候一夜要撕兩三張。我同她們解釋，圖裏是一艘英國戰鬥艦，還有全部性能配備的說明，那些小娘兒們見了，趕快要收起來，你在旁邊看見她們這樣老實，難免感動。戰鬥艦已經統統送走，只剩了一艘KG5。KG5我要慢慢送走，還要詳細的畫『圖解』呢。我手頭還有好幾艘巡洋艦，而且還有全部輕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請你想想看，她們拿到了潛水艇，更不知

道是多麼重要了。英國拿完，還有美國。就是巴西海軍也不錯呀。多重要的情報。我想那些小姑娘們把它們帶回去，會交給魯皮揚卡機關裏那些傻瓜的。太成功了！她們就成了蘇聯愛國女英雄了。好吧，老朋友，聽我的忠告吧，也來這麼一下吧。拿些事情給那些狗做吧。讓他們忙着，讓他們高興，讓他們嗅錯了路吧。」

「你以為他們這樣就真會上你的當嗎？」

「不。」

「查理，你除了找娘兒們睡覺以外，還想些什麼別的？」

查理想了一下。「有時候，」他說。「有時候我想整個的事情，都太糟糕了。可是也沒有什麼好處。沒有好處。早就看到這一點了。也許你以為你可以有點辦法。」

「我並不。」

查理從椅子上站起來。「那麼別這麼道學吧，」他說。「請記得，荷爾蒙是在她們那一邊的。」他走出浴室。我把臉同手用水沖一沖。水還不夠熱，不好洗澡。

突然查理又把頭伸進門裏來。

「剛才我來找你，就是要問你還有伏特迦酒沒有？」

「沒有，」我說。

「沒有關係。你來吃飯，好不好？就在底下我的房間裡。早一點來。我在佈置晚餐。」

「很好，」我說，「可是我得到美國大使館去找一個傢伙。」

「別擔心，」查理說，「史密賽會在那裡。問他好了。他什麼臭事都知道。」

「多謝，」我說。「我要去找的就是史密賽。」

「別忘了把瑪姐哈莉也帶來，」查理說。他已經在開門，準備出去了。

「什麼！」我叫起來了。「你現在不把她帶走嗎？」

「辦不到，」查理說，腳已經跨了出去。「記得她給你迷住了。」

維姐莉亞還坐在我的桌子後面的椅子裏。那本生活畫報還攤在她前面。她全神貫注的一頁一頁的看
着。

「你要，可以借給你，」我說。

「怎麼？」

「你可以帶回家去，」我說。

我從她的肩膀上望過去，看看她在看些什麼。她將這冊雜誌翻在一頁廣告上面，廣告上登些什麼，
我看了兩次才看清楚。

「你懂嗎？」我說。

「我不懂。」

「很難解釋，」我說。「女人用的東西。」

「是不是女人月經時用的？」

「是的。」

廣告裏講些什麼，裏面那種巧妙的轉彎抹角的話，維姐莉亞憑她所知道的那一點破離支碎的英文，居然一下子也猜到了。她似乎很驚奇。她把手按在廣告上，好像要把它遮起來，不要看見它。可是等一回，她的手拿開，她又去看了。

「很下流。」她說。

「美國也有些人認爲那是不文明的，」我說「可是那種人是落伍的了。」

維姐莉亞把雜誌推開。我檢了起來，再把那幅廣告翻出來。以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此刻在莫斯科，沒有一家雜貨鋪，一家藥房，一家百貨店買得到這種東西的；同樣的，連一塊肥皂都沒處買。這種貨不知有沒有，即使有的話，只有在政府各主要機關的特種商店裏才買得着。

維姐莉亞把雜誌再拿起來，翻着看看。那些廣告似乎很引起她的興趣。

她指着一幅圖畫。畫裏是一個身材苗條的少婦，正在使勁的玩網球。

「美國是這樣的嗎？」維姐莉亞說。

「是的。」

「美國女人是這樣的嗎？」

「是的。」

「講話，宣傳！」

「也許是不可能的。我也不知道，」我說。「也許美國女人都是超人，非常強壯。」維姐莉亞對我看看，想知道我是在說正經話，還是在開玩笑。

「俄國女人也很強壯，」她說。

「她們非強壯不可，」我說。「請看她們工作多着力。」

「俄國女人很強壯，但是很多人都沒有 Mesyachny。工作太重。沒有吃的。」

「就這樣厲害，」我說。

「這是廣告嗎？」

「是的，」我說。「她們勸人買他們的小玩意兒。」

維姐莉亞仔細的研究廣告。那一頁的角上有某工廠出品的一幅不大使人注意的小圖畫。

「這也是嗎？」

「我想是的，」我說。

「在這裏，」維姐莉亞說，「我們只有真理報，」

「你說的是報紙，」我說。

維姐莉亞不答覆。

「你們這裏女人排了隊買報紙，就是爲了要看廣告嗎？」

維姐莉亞用很鄙夷的神氣看看我。「報紙到處有用。生火。鋪牀。披在身上。」

「不錯，」我說（這句話我不想不說，可是還是脫口而出），「我很高興聽見你們官方的黨總算有這樣一個功用。」

雜誌上的廣告還是吸住了她的注意。我發覺她的心裏起了一種欣羨可是又自歎不能到手的模糊的感覺，這種心理是她以前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她心裏本來早就讓人家做好一種防禦工事，專對付這種意外的誘惑的，我希望再過一秒鐘，那種豪華富麗的美國式生活的意義，不但能夠使她懂得，而且能夠發揮力量，克服她那種抗拒的成見。

可是突然的，她的嘴唇繃緊，她的年輕的眼睛，喪失了光彩，呆呆的什麼都看不見了，假如眼睛是靈魂的表記，她那時的表情，正可以代表她內心的愚昧空虛了。

「全是謊話，宣傳，」她說。

「也許是對的，」我說，「雖然美國人可能不會這樣想。我想假如你住在美國，或者住在別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你會起一種抗拒廣告的心理的。」

「我們這裏沒有廣告，」維姐莉亞說。

「正是這樣，」我說。「可是你們也沒有消費物品買呀。」

「太多謊話不好，」維姐莉亞說。

「你們的謊話是另外一套，」我說。

「怎麼呢？」

「無線電裏，」我說。「每條街上，整天的你聽見斷命的無線電嘩啦嘩啦的叫。」

維利姐亞似乎不明白了。「無線電是謊話？」她說。

「多厲害的謊話！」我說。

「不是謊話。我聽見老頭子的話。他親口所講的話。不可能是謊話的。」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

她對我望望，她的表情是困惑的，她不知該如何答覆。她已經忘了她是來扮演妖姬的角色的，她眼睛裏的表情是一派天真，很是可愛。她的那種稚氣而認真的態度——她不懂虛偽，叫她怎麼樣裝矜持都裝不像的，心裏怎麼想，眼睛裏就怎麼表情，這是她所給我的印象；這一切使我相當感動。可是同時她是勇敢的，情感很堅定，不容易動搖。

她對於世界上事情，茫然無知，這當然是人家給她支配成這樣的，可是我覺得我這個外國人，偏偏來斷傷她的天真，改造她的無知，我本來不願意這樣做，可是幾乎不知不覺的我就這樣做了。我怎麼才能夠同她開始討論民主政治的優點和諸如此類的問題呢？我到底不想這樣做呢？說來說去，同我什麼相干呢？幹麼不讓她把上帝的話就這麼相信下去呢？誰有特權把懷疑主義的毒蟲放進她的心胸裏去呢？我就這麼想着。

「爲什麼不看看社論頁呢？」我說。「就我個人而論，叫我看那些廣告，我是受不了的，不管是不

是謊話。那種裝得滿滿的冰箱，那種番茄湯的罐頭！我們來看圖畫吧，維姐莉亞。」

我就這麼翻着，一翻翻到罷工暴動時所拍攝的一連串照片。拍得很清楚很好，這種好勇鬪狠的照片，是美國人所愛看的。

「你看，」我說，「這是罷工暴動。警察在用棍棒把工人糾察隊打倒。看倒在地上的。」

維姐莉亞似乎不感興趣。

「你對於別國工人的命運，不感興趣嗎？」我說。

「工人？哪裏有工人？」

「這些人就是，」我說。

「不是工人，」維姐莉亞說。

「當然是工人，」我說。

「謊話，宣傳，」維姐莉亞說。「看那些人的衣服，看那些人的皮大衣。」她的笑聲就是揭穿了一個別人的騙局後的得意的笑聲。「那不是工人的衣服。那是資本家的衣服。」

「美國的工人就穿這種衣服的，」我說。

「穿了給人照相的嗎？對嗎？」她在遷就我。

「不是，」我說。「真的，美國很多工人都有汽車。」

「不對的，」維姐莉亞好像不容我再分辯的說。「只有資本家才有車子。我看見好多黑人的照片。」

衣服同蘇維埃工人的衣服一樣。美國工人多半是黑人。誰都知道的。」

「媽的，」我說。「不跟你爭了。天曉得，我才不替美國生活方式辯護呢。」

維姐莉亞笑了。

「怎麼樣，看看你自己吧？」我說。「看看你的鞋吧。蘇維埃工人不是穿那樣的鞋的。你的階級就比工人高了。」

我的話說得很快，又很激昂，維姐莉亞是聽不懂的，可是她聽見「鞋」這個字，就把她那雙穿漆皮鞋的腳舉起來。她穿了新皮鞋很得意，也很高興我能夠注意到。她的腳很大，襪子裏面鼓起了粗壯的小腿肌肉。她看見我的看她的腿。她嫵媚地一笑。

「農人的腿，」我說。

她立刻很生氣。我傷害了她的自尊心，從她滿臉怒容上我看得出來。我觸犯了她了，我初意不過要輕輕的惹惹她而已，但是我所觸犯的，竟然在她心裏藏得相當深。

「維姐莉亞不是農民，」她說。「瞧，農民沒有這個。」她把雙腿踢起來，皮鞋照着光，閃閃發亮。

「到底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她不理我的問題。她仍舊是在生氣。

「我不是農民，」她再說一遍。「我是蘇維埃幹部。」

「那也誰都看得出來的，」我說。

「什麼？」

「不去管它吧，」我說。「看這些圖畫。這裏是美國階級鬭爭的故事。只是美國人不知道那就是階級鬭爭，而且畫片是登在一本資本主義的雜誌裏的。」

「什麼是『階級鬭爭』？」她說。

她對我，神氣很天真和順。

「你們另外有一個名稱，」我說，「也許叫做『階級 boreba』或是什麼別的名字。」

「哦，」她說。臉上的表情是漠不關心，也有點厭煩。

「好吧，我們不必多談那一套，」我說，「可是這件事情的不合理，你看了難道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嗎？看那躺在地上的人，頭上都是血。警察的棍子都拿在手裏，這張畫裏的一個警察，連手槍都拔出來了。」

我怎麼說都改變不了她臉上的表情。也許因為是我自己不誠懇。那種暴行對她毫無所謂。也許照片裏的行動，還不夠緊張。

「我想這種情形你一定看過很多的，」我說。

她聳聳肩。

「那種情形俄國沒有。」

「胡說，」我說。「昨天夜裏我明明看見一個警察踢一個紅軍兵士。他喝醉了，你們的一個憲兵就

把他肚皮上胸口有系統的踢個周遍。」

她臉上露出困惑的神氣。

「詹美，」她說，「你很滑稽。」

「那不是滑稽，」我說。「我親眼看見的。」

「紅軍兵士嗎？」

「是的。」

她搖搖頭。「那個人該交給懲戒大隊的，」她說。

「什麼東西是懲戒大隊？」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的？」

「在亞拔茲區的憲兵隊。」我看出來她在用心把地名記住。「你假如想記在簿子裏的話，」我說，「我會給你寫下來的。」

「詹美，昨夜你到哪裏去了？」

「別管閑事。」

「很晚很晚你還不在這裏。我看見的。」

「我戒嚴時間在街上走路，給警察捉去了。」我說。

「戒嚴？你看朋友了？嗯？」

「維妲莉亞，聽着，你假如多管閑事，莫怪我跟你翻臉吵架。我不喜歡間諜。我不喜歡有人來窺探我的私事。」

這話一說，她又想起她的任務是來做小妖精的。她把眼睫毛低下來，抬頭看我，算是做出一個迷人的表情。她把她的青春肉體向我靠攏，她的熱的青春肉體靠在我的身上。我想笑出來，可是她的青春的性能裏面，倒的確有種挑逗的力量，因此我笑不出來，我停止了呼吸，全身突然慾潮奔騰，想佔有這個肉體。

「維妲莉亞，」我說，「你該走了。我要換衣服。而且假如知道你通宵在這裏，人家要說閒話的，對你的名譽不大好聽。」

「說閒話！」她重複我的話。

「是的，」我說。「人家不許你再到這裏來了。」

這一下子，小妖精又垮了，又成了農家女兒了。她那點妖法一碰就破，我反而同情起她來了。

「請走吧，」我說。

農家女兒有點垂頭喪氣。她乖乖的站了起來，向門走去，脚步拖着，好像個不願意上學的女學生。

「雜誌不帶走嗎？」我說。

「不。」嘴撇起來了。

「你怕帶回家去，」我說。

「爲什麼？」若無其事。

「恩——凱——韋——代。」

她忽然轉過身來。「你知道恩——凱——韋——代？」她說。

「當然，」我說。

「哦。」她已經走到門口。又垂頭喪氣了。

「再見，」她說。

「再見，」我說。

她出去。門關上。

把她這麼揮出我的房門，我很覺痛快。對付那輩人，假如我的態度堅定，我總是划得來的。

我正在想這些，門又砰的打開。維姐莉亞衝進來，奔到我的面前，唇對唇的對我熱吻了一下。

「不來做你間諜了，詹美，」她說。

一下子她又衝出房門。

我繃繃眉。我又開始笑了。我對於自己很滿意。可是現在我知道，因爲我碰到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因爲這接觸是既很挑逗，又很熱烈，我才有這種滿意之感的。

我自己繼續的很覺得意，可是一轉眼，我發覺放在我的桌上，藏着卡爾的電影劇本的信封已經不翼而飛。

第二十章 斷腿的人

苛斯底亞的故事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德軍大砲的射程達到了苛斯底亞的砲隊。他的那幾尊臼砲整天就藏在樹林邊緣的一排樹木裏。那邊的樅樹替他們在上空建了一陣掩護。德國人揣摩了半天，還不知道臼砲彈是從哪裏飛來的，這個使他們這位上尉很高興。可是後來德國探測隊一定注意到：臼砲每發一次，樅樹枝上的雪就要震落下來，或者他們是有『探聲大距機』的，他們把臼砲隊的方位查明了，大砲彈也就在臼砲的前後左右落下來了。

第一顆砲彈落在距臼砲隊二十公尺處，苛斯底亞說道，「啊呀，媽呀，他們來了……」上尉正在用望遠鏡注視砲火發射情形。他走到測距機那邊，把德軍的砲位距離告訴了部屬。敵方是一二〇釐口徑的榴彈砲，離開俄軍陣地又是這麼的近。上尉計劃好了用砲火反攻。第二顆砲彈落在他們後面的樹林裏，苛斯底亞聽得見樅樹樹枝上的雪軟軟的滑下來的聲音。第三顆砲彈把第二號臼砲打毀了，安德烈哥和彼

德洛夫兩人送命。砲彈一塊碎片鑽進了上尉的太陽穴，像是一根針。苛斯底亞走到測距機那邊，把剩下的臼砲的距離再調整一下，再發射時就可以打準了。「再好好的發一下，」苛斯底亞在說，「再好好的發一下，就可以把他們打垮了。」他開始重重的咒罵一句，可是話未出口，第四顆砲彈把他打倒了。

苛斯底亞恢復知覺的時候，是黑夜，在下着雪。他在發着高燒。他的嘴裏很乾，熱得火燙，他的頭不動，就近吃了些雪。他只覺得他的身體是木木然的一塊。他記得他曾經脫了一隻手套，去調整測距機的，他現在想起那隻手快凍僵了。他把那隻手移上來，伸進羊皮鑲裏的大衣的開縫處。他又失掉知覺了。

第二次他醒來是白天。光線太亮，起初看不見東西，他想他的眼睛出了毛病。等到看清楚時，他是躺在一顆大樹底下的小樹叢裏。樹叢上面和樹叢周圍都是雪。他覺得對於這樣一個地方很滿意。他又吃了點雪，又暈過去了。第三次醒來也許只是半個鐘頭之後，可是他以後賭咒說他又過了一天。他說得很冇把握，因為他想這一次醒來鐘點反比上一次早一點，太陽也不那樣刺目。十分的靜寂。他聽不見砲聲。戰爭往前推進，把他落在後面了。這一次他想轉動，可是他的身體不能動。他不知道他的腿怎麼了，不免着急起來。最後他的頭能抬起來一點，他在肩膀周圍看了一下。他的右腳已經不見，在小腿腿肚的地方，他的靴靴被打爛了進去。他不懂得他的左腿是怎麼攔的——已經歪開來了，好像是別人的腿。他想到那個，眼睛閉上，不理會發燒這件事了。他想，「腿凍僵了。好。不會出血了。」

在神志清楚的時候，他想他多麼運氣。他的運氣一直很好。在「第六人民保衛師團」的時候，他運

氣也不錯。真不錯！那是很久以前了，六個月以前了，他還活着。多數紅軍戰士在戰場上的壽命只有六個星期。當然不錯，他已經重新編過隊，他的作戰中止過一個時期。現在，他受到傷，傷在腳上。那不算什麼。腳上受了傷的好，他們再不會叫你去編隊了。他可以回家，回到安娜和他的小孩子那裏。他要把莉娜，沙俠和巴蒲加抱在懷裏，還有那個小安妞霞，他在離家之前剛生的。他們要多麼歡迎他！在他神志清楚的時候，他就想起那些愛他的人。

第二十一章 查理·索末斯的派對

福開森的故事

查理·索末斯和我住在這座「邊屋」裏（房屋邊上添建的房屋），和公使館在一條街上，相距約一百碼。屋子本來是昔日一個貴族的產業，新近曾經給一個義大利的貿易代表團借用。裏面的佈置很精美，防寒設備很夠，還有空房間，偶而也可供客人留宿，有一個俄國老當差照料一切。在我們這座邊屋裏所舉行的「派對」，在外交團的一些年青人間，很受歡迎。我們的圈子很小，關得也很緊，主要的是英美兩國人，可是住在都城大飯店那些記者們是不招待的，查理說他們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查理的意思是說，假如你把新聞記者們找來，他們會把你的女朋友偷走的；新聞記者們給我們的威脅的確很大，因為他們所寄宿的那座在史維特洛夫廣場的悶氣的暗沉沉的舊旅館，對於那些娘兒們很有引誘力；全莫斯科都知道那是「罪惡之家」，有說不出的放浪形骸，有分不清的醜惡邪行，那個誘惑力太大，我們的那座樸素的邊屋雖然也算特殊階級的住所，是不能同它抗衡。我這裏特別提起女人，因為莫斯科不像別的

我曾經到過的有外交使節團的外國京城，在這裏除了外國人之間自己互相來往以外，別無其他任何社交生活。俄國女人是交際不到的，和你地位相等的固然沒有，就是連娼妓也找不到：這種困難外國人不論地位高低都感覺到，上至大使，和他的顧問秘書，下至小職員，都是一樣，事實上，小職員同家庭僕役常常廝混在一起，偶而交結一兩個外國朋友的機會反而多。這種異性荒的情形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有一批俄國少女，年紀很輕的，對於最近的歷史不記得什麼，可是很勇敢，通常都是沒有什麼頭腦的，她們要找外國男子，因為外國男子有一種異國的情調；因為外國男子送給她們的禮物都是她們前所未見的奢侈品；因為同他們來往是有趣的，冒險的，刺激的。外國外交界中，不想做和尚的人是有的，可是能有招待那種姑娘的便利的卻不多。我們這座邊屋，和它母體的公使館不連在一起，而那公使館本身也不大，這樣一個地方，來作招待姑娘們之用，是太合適了。

這座邊屋的業主，住戶，管理人，招待員都是查理；沒有幾個人知道我也住在那邊。「派對」都是查理設計的，他去借伏特迦酒，偷人家的配給物，問人家去討唱片，找姑娘們來，拍來賓的背，替喝醉酒的人找交通工具，而且我猜想，誰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醜史，他也替人家遮掩起來；公事上誰有什麼牢騷，他也想法子來消人家的氣。他的時間都忙在這種正經上了，我也很高興。

這天晚上，我遲到。當我進去的時候，派對似乎已經開場好久。

「進來吧，老朋友，」查理叫道。「維姐莉亞愁壞了。她怕你不來。」

突然兩隻強有力的手在我後面把我抓住，一個聲音叫道：

「親愛的詹美大令！」

屋裏個個人都笑了。

我把維姐莉亞的手鬆下，很僵的笑了一笑。我看也不看她，就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去，康脫威爾·史密斯和米亞坐在那邊。

「哈囉，」我說。「今天我想到你那裏去找你來了。」

「好極了，隨便什麼時候好了，」他說。他還在那裏笑。「詹美大令，」他說，「她那邊有什麼東西呢。」

史密斯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現在在史巴索大廈美國大使館裏當一位秘書；臉色是鷄蛋殼色的，穿着勃魯克斯兄弟裁剪的粗花呢西裝，外套很長，身材本來大大鬆鬆的有點像個運動員，可是現在正開始發福，要定型成爲買賣人的樣兒了。他的參加外交工作，是因爲戰爭被徵調去的；他沒有職業外交家那套繁文縟節，因此人緣很好。

米亞是他的女朋友（至少今晚是如此），她的膚黑身高，比起「派對」裏常出現的那些姑娘們，年齡要大一點，眼光裏似乎還帶一點心事，可是容貌俏麗，舉止大方。

「我的事情現在就可以對你說，」我說。「請你告訴我，我到史巴索大廈去該找誰。」

「好的，詹美。」

那個時候，維姐莉亞過來，打斷了我們的話。她伸出手臂，將我的腰抱住；她的身體靠着我的身

體，又施展她的妖精手法了。

「你要喝點酒嗎？」

「怎麼不好？」我說。「我能喝一點。」

我走到放着小碟和玻璃杯的一張桌子邊上，我倒了兩杯伏特迦。

「替『恩·凱·韋·代』乾一杯，」我說，「願他們的陰影永不減少。」

維姐莉亞聽見這個名字的聲音，臉上就露出驚惶之色，朝四周望了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聽見我們的話。

這樣喝酒，我覺得乏味之極。我把杯子放下的時候，我看見了鮑立斯·戈登。他向我笑笑，點點頭。戈登是英國大使館裏的三等或者四等秘書（我已經記不清是哪一等了），查理·索末斯很欽佩他，常常模仿他的派頭。他的父親是當年英國外務部派駐聖彼得堡的參贊，據說娶了一位俄國貴族的女兒。鮑立斯雖然十足是英國人（據說是伊登中學和牛津巴立奧學院出身），但是俄國作風也很強；你看他總覺得他有種討人喜歡的輕浮，覺得他精明，口才流利，而且態度是強烈的愛（英）國的。這種人絕不會受人家的信託，雖然外交界中人物差不多是個個如此。他是個瘦子，中等身材，棕色的眼睛亮亮的，鼻子長得像個鈎。他的俄文很流利，帶着一種聖彼得堡的古典腔調。查理的『派對』只要對來賓資格是有限制的，他很願意參加。這天晚上他同黛娜米亞算是一對（她是一個嬌小的黑髮的眼睛亮亮的姑娘），他正滔滔不絕的用俄文在同她說話。

黛娜米亞和維姐莉亞兩人互相看看，臉上是同謀犯罪的表情。她們兩人都很年輕，都很勇敢而有自信。

鮑立斯很快的看了這一個，再看那一個，看到了她們互相之間在施眼色，又轉過來看看我，表示他在一剎那之間，把她們的花樣都看透了。

「偉大吧，是不是？」他說，笑笑。「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能找到這樣純潔的天真嗎？當我想起我在那些憔悴的德國女人和疲倦的法國女人身上所浪費的時間……你的意思怎麼樣，福開森？」

「這種身體多麼年輕有力，」我說。

「啊，天然淘汰的結果呀，」鮑立斯說。「幾世紀的農民世家，腿自然變粗了。」

「我要說了，她們喝起酒來就像莊稼漢一樣，」史密斯說。他站在桌旁，替他自己和米亞各斟一杯酒。

「她們一下子就會喝得神志不清，輾洋洋倒在你的手裏的，」鮑立斯說。

鮑立斯說話的時候，維姐莉亞撅起了嘴，拉長了臉，等他說完，就拿起伏特迦瓶，倒了兩杯。

「維姐莉亞，親愛的，」鮑立斯說，接着很快的說了一大套俄文。他勸她不要多喝酒。他說話就像一篇文章，而且還用的是舊時典雅的形式。

維姐莉亞把背朝着他。她把她的杯子拿了起來，拉了我的臂，走到離桌子幾步遠的地方。

「不喜歡他，」她說。「太資本主義了。」可是她的態度，假如用更強硬，更通俗的話說來，也許

表達得可以更好一點。她把杯子放下。「跳舞，嗯？」

查理·索末斯已經在留聲機器上擱上一張唱片，屋子裏充滿了跳舞音樂。我想我同維姐莉亞跳舞的時候，我也許能把正在傷我腦筋的一件小事，向她提一提。可是她死也不開口。她緊緊的靠着我，又在對我施展妖精解數了；有時候，她全副精神來灌米湯，忘記了步法，踏痛了我的腳趾。我想我該停了。

「鄉下佬的腿，」我說。

這個使得她很生氣。她把我的手臂摔下，走到屋子另一邊去，她的朋友黛娜米亞就站在那邊。我走到史密斯那邊去。

「在大家沒有被伏特迦酒灌醉之前，」我說，「我想要提起一樁小事。」

「說吧，詹美，」他說，咧開了嘴笑一笑。

「喬，我要問你，美國人領了蘇聯護照的，你們怎麼辦？」

「哦，那些雜種，」史密斯說。

「那種人不少吧，」我說。

「據我所知有好幾千。這輩人真傷我們老頭子的腦筋。他怕有一天局勢真壞了，他們會包圍他，請求保護。無論如何，他們總要有東西吃的。」

「你們計劃怎麼樣呢？」

「見鬼，我們怎麼樣？假如我們送東西給共產黨吃，你能想像我們的幾位議員老爺要說什麼話。」

「可是你們有了租借法案，就是在送東西給共產黨吃呀。」

「那不一樣。他們是俄國人。你剛才所講的那種人，是不屑住在美國的共產黨。」

「他們不全是共產黨。他們的生在美國的妻子兒女怎麼樣呢？」

「假如他們領了蘇聯護照，我們是沒法可想的。你想想莫洛托夫會說什麼話，假如他們的公民此刻不要做蘇聯人了，而我們開始去收容他們？照目前情形，一個俄國女人，嫁了我們的一個職員，想同丈夫一起出境都辦不到。」

「也有幾個例子，」我說。「弗萊第·舒華茲那件事怎麼樣？」

「那是特例。假如你能找得到一位大使替你出頭的話，機會也不是沒有。而且舒華茲最後能出境，也是好僥倖的。你不知道不知道，詹美，英美文武官員娶了俄國女人的大約有六十位，其中沒有一個人能把老婆搬出俄國國境的。」

「我知道，」我說，「我本來就知道沒有希望的。」

「我告訴你，他們就怕他們的人民出國去。他們怕他們把俄國的真相向全世界人去說。」

「當然囉。」

「我甚至於不會自找麻煩，到大使館去打聽的。」

「謝謝，」我說。

我是坐在史密斯隔壁的一張圈手椅子裏。我們講話的時候，留聲機還開着。現在留聲機停了，查理

走過去，放上一張新的唱片。維姐莉亞過來了，什麼也不說，就在我身上一坐。我覺得她的結結實實的小屁股重重的壓着我，我覺得全身不舒服，要把她推走。她也體會到了我的感覺，突然我看見她的妖精手法又瓦解了。她釘住向我看，她的深棕色眼睛又露出很誠懇的眼光。

「你不喜歡我了，詹美？」她說。

「那疊紙到哪兒去了？」我說。

「不喜歡我了？」

「請你頂好把那疊紙送回來。你知道你可能吃虧的。」

她臉上的表情不變，可是她開始用她的指尖來摸我的臉，她這種衝動裏可以說也帶一點思想的成份。她把她的指尖照着我側面的角度摸下去，輕輕的把我的嘴摸一個遍，再摸我的鼻孔，我的眼睛，我的眉毛。然後速度稍為加快，手躡到我的耳朵裏去了。

「別弄了，」我說。

查理把朱麗亞摟在懷裏，正在跳舞，對我們看看，笑笑。

「我早對你說，她愛得你發瘋了。」

「啊，天哪，」我說，把維姐莉亞推開，站起來。

「別緊張，老朋友，」查理一面對我喊，一面轉到屋子的另外一頭去了。

「讓我們來一杯吧，」我說。

我把維妲莉亞帶到酒吧那邊，滿滿的倒了兩杯伏特迦。維妲莉亞毫不猶豫，一飲而盡。我正開始在想，我也能一口氣把那點酒喝完。

史密斯和米亞在跳舞。唱片每唱完一張，查理·索末斯就換上一張新的。再等一回，他們恐怕就要沒有興緻換唱片，只是把唱頭再撥到唱片外圈就算了。米亞和喬兩人很親熱的擁抱着。查理和他的新交朱麗亞搞得也很好。

「總而言之，」我說，「這個時期對於罪犯是寬大的。」

鮑里斯站在我的身邊，正在我的身邊，正在吃剛才端進來的冷盤，聽見我這句話，對我看看。

「你的話很有意思，」他說。

「我一定快醉了，」我說。

「你的話非常有意思，」鮑里斯說，他的棕色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眼光裏幽默中帶着機警。「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些研究工作，多知道了些俄國人民的情形？或者難道是我猜錯了？」

「我聽不懂你到底什麼意思，」我說。

「我也覺得那些人非常有趣。」

「誰？」

「哪，老朋友，當然是那些布爾什維克黨。至少是現在還活着的那些。」

「他們人數有這麼多嗎？」

「他們的家屬到處都有。」

「我至今還弄不清楚，」我說。「我本來以為大青黨清掉了大約幾千個人。我想不到數目會有幾百萬的。」

「我的好朋友呀，你知道你太天真了。你什麼時候到這兒的？」

「一月裏來的。大約吧。七八個月以前。」

「還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

「他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鮑立斯？是不是一種瘋狂呢？」

「事情不是一天的了。我想事實真相是：我們既然不願意打德國人，他們也不願意呀。」

「這個我能懂得。」

「你能？那我很高興。你知道很多人都相信，是我們在慫恿德國人去打他們的。要結束共產黨對世界的威脅，和諸如此類的話。」

「我自己也總是這麼相信的。」

「你並不贊成慕尼黑協定，那多怪呀？」

「『和平今世降臨，』我的上帝呀。」

「老朋友，報上的話你不能都信的。照我們的計策，希特勒和他的那一幫人當時是該以爲我們已經上了他的當的，那一點很重要。我們親愛的老百姓對政府紛紛指責，反而使希特勒中了我們的圈套。」

「你是想說，你們那時想爭取時間來準備。」

「剛剛相反，我們把戰爭引發起來，比希特勒所準備的還至少要早六個月，或許早一年。這個計策很妙，因為假如希特勒沒有準備好，打起來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要使全世界警醒，要使人們都覺悟局勢已經多麼惡劣，非得實實在在的宣戰而且進入戰爭狀態不可。」

「尤其是對於美國。」

「尤其是美國，老朋友。假如我們對德宣戰的時候不宣戰，假如我們再等下去，等到一九四〇年中，那時希特勒已經準備好了，那末不但美國，就是我們本國人民都要戰慄不知所措了。」

「這一切都是權宜之計，鮑立斯，沒有一條可以解決問題的。」

「天下沒有一個固定的問題的，老朋友。歷史是流動的，老教授就常這麼說。你知道歷史不會停下來，讓你們好好的去對付的。我們的政策總是隨機應變，這在我們也是不得已。我們非臨時找辦法不可。」

「布爾什維克黨對於這問題，可有一種看法。」

「那些布爾什維克黨自以為能解決德國問題的，他們的辦法是先鼓動革命，然後加以控制，可是德國人並不響應。列寧老爹計劃輸入大量德國的工程機械人才，去實現他的電氣和別種計劃，他講起這一點，總是很坦白的。德國人多少在猜疑他們的革命是受了俄國的影響，我想這種猜疑不無道理。這一下就替布爾什維克主義敲了喪鐘。」

「請解釋一下，鮑立斯；請解釋一下，教授。」

「俄國人被迫採取一種綏靖政策。是的，老朋友，他們的綏靖政策的開始，是遠在一九三〇年，那時俄人在這裏葉雷茲附近替德國空軍訓練第一批飛行人員。凡爾賽和約是多麼不平等的一個條約，也是俄國人解釋給德國人聽的。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人不許有空軍，所以俄國人便來替他們訓練了。德國人的教官都是俄國訓練出來的。俄國人就得到一些德國的工程機械人才作為交換。」

「這事很難使人相信。」

「我說，老朋友，我們來講些別的什麼吧。這裏是在開『派對』呢，你知道。」

「不，鮑立斯，還是講這個。我對這個有興趣。」

「在希特勒崛起以前，德國發生什麼事，任何人只要有半隻眼睛還睜開的話，都看得見。你知道那時共產黨在做些什麼？他們一聲也不作，讓希特勒掌握政權了。因為俄國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用革命手段可以控制德國。他們已經看清楚共產主義在德國並無前途。不管誰上台，他們都願意和他妥協的。他們自己的問題已經夠多了。他們的工業化程度比人家要落後一百年。傷腦筋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的討論是以清黨為開始的，這一切都說明不了清黨呀。」

「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非清算掉不可。你知道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真相信他們自己所宣傳的那一套。可是他們只代表俄國的一小部份人。那時基本的俄國國策抬頭了，所以他們那班人非被清算不可。那些老布爾維克黨對於俄國政府的親希特勒政策，已經頗不滿。你記得，他們都是些反妥協份子。所以

克里姆林宮把他們一個一個清算掉。在這個國度裏，事情不做則已，一做總是很徹底的。」

「如此說來，你相信一九三九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是真的了。」

「列寧死後，俄國就被迫採取一種權宜應變的政策，這個條約不過是這種政策的達到最高峯而已。他們是願意再進一步，同希特勒全面軍事聯盟的，只是德國人不相信他們罷了。可是他們相處得也不壞，他們把波蘭和波羅的海小國分掉了。」

「交易就這麼成功了？」

「他們的交情是多麼的好。你瞧，老黎賓特洛浦把全套慕尼黑會議的錄音拷貝帶去，獻給克里姆林宮。他們聽見，樂了。他們說，你能聽見親愛的老張伯倫對希特勒說，假如他在東方發動攻勢，在西方決無後顧之憂。」

「反間計中，還有反間。」

「我的好朋友呀，你以為我們是怎麼樣的人？看看以後的事實吧。可是克里姆林宮整天的想暗算人，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很容易就上了當。」

「你以為他們上了當了。」

「當然，他們同黎賓特洛浦接吻，還賜給他『列寧勳章』。他們開始從烏克蘭裝糧食到德國去。他們准許德國軍事工程師參觀他們所有在烏拉爾的工廠。我們宣戰之後，他們讓德國潛艇停泊在列寧格勒港口內，大船勃萊門號就給他們藏在茂曼斯克。他們把波蘭和波羅的海小國分掉之後，你若在這裏就好

了。你能看得見他們帶回來多少戰利品！『恩·凱·韋·代』裏的人的服裝從來就沒有這樣挺括過。這裏這幾位姑娘的行頭，料子你猜是從哪裏來的？下一次她們爲了你要脫衣服的時候，請看一下廠家的牌號吧。」

「他們能這樣大規模的上當，也很難相信。他們的心思多麼猜疑，我們總以爲他們是能看得穿的。」

「猜疑就是糊塗。一個猜疑的人，頂容易受人家的支配。他是有偏見的，你就抓住他的偏見來要好」

「舉例說……」

「哦，他們那時多恨我們。他們稱英國人是老奸巨猾，你知道。他們甚至於把教英文的先生，都送進監獄裏去。我們屢次的警告他們，德國人在動員對付他們，可是在德軍發動進攻的上一天，他們還不信。看看那紀錄吧——那些塔斯社的公報。他們在波蘭的前哨，可能真看見德軍在調動，可是他們不敢報告。假如他們事前有百分之五十的準備，他們不會敗得這麼慘。」

「還不是最後的失敗。」

「兩個冬天救了他們。波蘭的泥濘和這裏的大雪。德國人自信太甚了。」

「現在他們要打勝了。」

「德國人已經看到這一點。你注意他們從俄國平原的撤退。他們經過之處，把什麼東西都破壞得乾乾淨淨。他們要損傷俄國的元氣，至少讓它三十年不能復原。」

「那末呢？」

「可是這樣對於他們也無補於事。俄國人在一九二一年到德國去發動革命，沒有成功，這次他們可以去征服德國了，上次沒有成功的，這一次換一種方式可以成功了。他們將要佔領德國，統制德國。他們要把那些短命鬼的納粹份子，加入共產黨裏來，再用『恩·凱·韋·代』的紀律制裁他們。兩批頭腦機械的壞傢伙要搞在一起了。」

「這一種猜測，我也聽見人說起過，」我說。

「哦，你同一些老布爾什維克黨談過話了。」

「是的。」

「啊，歐洲不是一天的事情了。進行了好幾百年了。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插曲。」

「前進中的一個小歇。」

「前進到哪裏去？」

我笑了。「你自己這麼說的。」

「我說，喂，你們這班人爲什麼也要插進去呢？你們自己在那邊有你們的美麗小國。爲什麼你們不管自己的事情，管他什麼歐洲呢？」

「可是，我們是統統有份的。」

「也許你正在寫一篇關於俄國民心士氣的簡單報告吧？」

「不，」我說，「士氣是屬於查理的部門的。」

「這倒很有意思。但是假如自己要寫什麼東西的話，聽我的勸告，少注意那班人。我說的就是老布爾什維克黨殘餘份子。德國人的錯誤就是太注意他們了。」

我同鮑立斯說話的時候，維姐莉亞走開了。不知爲什麼理由，她很討厭他。她在同黛娜米亞跳舞，俄國女人會成對的跳起來的。她跳男的，我注意她的步子走錯了。我想她看來有點喝醉了。史密斯和米亞合坐在一張圈手椅子裏。喬在吻米亞的脖子。米亞似有點不好意思，眼睛直往我們那邊瞟。查理和朱麗還在跳着，查理很快樂的在笑。

「事實上，」鮑立斯說，手再伸過去去吃冷盤，「我們的朋友查理來寫士氣的報告，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他有接觸，」我說。

「別看不起她們。那些女孩子雖然態度粗得嚇人，可是比起我們親愛的朋友那班老布爾什維克黨來，她們有意思得多了。」

「在哪一方面呢？」

「她們已經覺得厭倦了。」

「厭倦了！」

「一點也不錯，老朋友。你知道不知道她們都是青年團——青年共產黨，可是，老朋友，她們已經

厭倦了。一個厭倦的青年團員有什麼政治上的意義，你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讓我們再喝一杯吧。」

「你要知道，共產黨就是由這些材料組成的。她們是優秀份子，她們這一千二百萬人，就是產生統治階級的。假如若干年前，德國人少去聽他們的老朋友那些布爾什維克在說些什麼，假如他們多聽聽當時的青年團，他們早就會料到有今日的局面了。一九三七年清黨剩餘下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並不能幫德國人挽轉局勢；可是一九三七年的青年團，現在都成了男女紅軍了，他們把局勢扭過來，打擊了德國人。」

「可是你說他們已經覺得厭倦了。」

「啊，現在這一批一九四一——四二的青年團，在幾年之內也可以決定大局的，結果是對我們有利或是不利，那時再看吧。」

「替厭倦乾一杯，」我說，把杯舉起。

「當然這個你也知道。這些小東西在十三歲左右，正是腦筋發育的時候，他們就把他們帶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黨——無產階級那一套話灌輸進去，把他們變成狂熱的信徒。可是你知道，我總以為狂熱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少了。你瞧，他們聽那一套東西聽得厭倦了，厭倦得厲害，很短時期之內，他們會到各處去找尋新花樣的。」

「爲什麼幾年之前，他們不厭倦，今天他們就厭倦了呢？」

「他們的師傅對於那一套東西，也覺得厭倦了。有其師，必有其徒，今天的情形就是這樣。馬列那一套東西，全是枯燥得要命。而且沒有人再信它了。它變得像教會裏的教義問答一樣，你得把它背熟，可是同現實生活毫不相干。」

「你的結論呢？」

「下一代的人要變得有人性了。」

我再替自己倒了一杯，喝掉了，離開了鮑立斯走過去。真是鬼聰明，我在想。英國外務部裏這種聰明的天主教徒很多，他就是一個。美國人，例如史密斯，有魄力，能做事，可是這些英國人是鬼聰明。太鬼聰明了；聰明得過份了，對於人生差不多就有一種索然無味的嘲弄的態度；把他們心裏的國家主義戳破了，看他們還剩些什麼？他的理論是根據什麼？就是派對裏的幾個姑娘！他們是什麼姑娘！該死的小婊子問諜！還會偷東西。他以為我在幹什麼？每件事情都寫報告？他們要譏笑馬克思是多麼的方便。他們至今還恨着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黨。他們倒真是喜歡這些新興俄國人。他們了解他們，道理就在這裏。他們懂得國家主義，這個他們能對付。

我知道我喝得快醉了。我想喝醉，現在我是醉了。可是喝醉了，還趕不掉心頭一腔枯燥空虛，無根無底，無意義的悲哀。

派對差不多已經到了一個高潮。當然，爲的是伏特迦酒，情形就是這樣，一下子把你醉倒了，就像這樣。

我看見維姐莉亞站到中間去，當衆表演一幕俄國舞。

她非常愉快，舞跳得也很有趣。她的強壯的細小的腿把她帶得很快的滿屋轉。每一個人都在注意她。查理按着舞蹈韻律，開始拍起手來，一下子，史密斯和別的姑娘也拍起手來。

「你的小維姐莉亞也是厭倦。」鮑立斯說。他站在我的邊上，在看她跳舞。他的明亮的棕色的眼睛，銳利地看着她。

「可是她不會維持長久的，」他說。

「長久什麼？」我說。

「舉一點來說吧，她太年輕，而且她是一個大胆的少女。就以她自己的作風而論，她的個性倒挺強的。」

「雖然她的態度粗得嚇人，」我說。

「這都是連在一起的，」鮑立斯說。他笑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能詳細的預言這位小姐的未來，一天都不會錯。當然，查理一挑中了她，就有人找她談話，魯皮揚卡的幾個『恩·凱·韋·代』傢伙，就會跟她長篇的談論，勸她做一個『蘇維埃女性』，讓她調查那些外國鬼子——祖國的敵人。對於一個少女，這種事情是多浪漫多刺激。做間諜！尤其是他們替她在魯皮揚卡的店裏定了鞋子和襪子和一兩件衣服。可是很快的，他們給她的壓力加重了；他們要這樣那樣的問她；他們好色陰謀的心胸，想要確確切切的知道她是如何執行任務的；那時她們要表示一點不高興了，難免要撒一點謊。突然她會發

現，差不多有一整營的人，在四處調查她的行動。她要說更多的謊話；因為她年紀太輕了，不懂到底是些什麼事；可是她總算是個性堅強的人，她將要開始用不屑的神氣對待他們。這樣，當然，就是她的結局了。」

「你以為他們會槍斃她嗎？」

「天哪，不會的，不採取這種形式的。你不是自己才說過，這是寬大的時期了嗎？」

「我是說過的。」

「他們將要把她送走，送到伏爾迦河上的一個集體農場去，在那邊的田野裏，她要渡過漫長的歲月，犁田，耕種，從早到晚的工作，她本來已經放棄了的農民生活的習慣，局部的又要恢復了；她要貪錢，貪小東西，對動物很兇狠，身上弄得很髒；可是補償也不是沒有，偶然總有一個男人會出現，冬天睡在坑上，春天在陽光下坐着，同別的女人閑談，互相捉頭上的虱子。還是挺好的生活；俄國人所做的事情，大多有意義的。」

「無怪她不喜歡你，鮑里斯。」

「你說她不喜歡我！詹美，我不知該怎麼說了。」

「再喝一杯吧，」我說。

維姐莉亞在跳舞，可是現在是在地板四周搖搖擺擺跳跳蹦蹦的了。看她的怪樣子，史密斯和查理都在大叫大笑。米亞和朱麗亞靠近他們坐着。她們在格格的笑，互相的看着。只有黛娜米亞的眼光是正經

的，看着她的朋友這樣亂跳，神氣中頗爲不滿。

「維姐莉亞！女強盜！」她生氣的說。

我又想到了，整個的事情是多無聊。那種枯燥的痛苦的空虛之感又在我肚子裏作怪。我想起了這個世界是多麼淺薄沒有意義，要找一點正經的事多難！伏特迦酒喝到差不多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覺起來。我正在這樣想着，忽然維姐莉亞跌倒在地板中央了。

黛娜米亞在她的邊上，可是維姐莉亞把她推開，跌跌撞撞的站了起來，她的頭髮披了下來，散在臉上，她的衣服已經歪斜不整。她站在地板中央，蠢笑。她的臉忽然變白了，勉強要走到門口去。黛娜米亞在她邊上，扶着她。

「可憐的小心肝兒醉壞了。」查理說。他在幫助黛娜米亞去攙扶東倒西歪的維姐莉亞。別人都在笑着。

「假如天下有件事情，我是絕對受不了的，」鮑立斯說，「那就是一個醉倒了年輕女人。」

「把她編進 *shtrafnaya rota* 〔懲戒大隊〕去好了，」我說。

「那是什麼東西？」鮑立斯聽不懂我說的那個俄文名詞，問道。「那是什麼。……」

查理的頭在門口望望。

「喂，鮑立斯，聽我的話，再放一張唱片上去吧。我們不能讓這樣一件小事情，掃了我們派對的興，」說罷，他走開了。

鮑立斯跋跋拉拉的在搬唱片，史密斯走了過來，預備再喝一杯。

「喂，」他說，「假如莫斯科大大的公開一下，那多美呢！」

「大大的公開一下，是的，就該這樣，」我說。

「喂，這些俄國人多麼愛喝酒跳舞。想想看，一公開之後，要有多少舞廳夜總會。」

「還有妓院，」我說。「你不知道不知道，喬，在革命以前莫斯科有三萬個妓女？」

「我不是開玩笑。可是別管妓女不妓女的。只要讓我公開買到鞋子，我只要這一點。或者是罐頭食物。只要罐頭食物不統制，我就心滿意足了。」

「你以為他們會恢復新經濟政策的嗎，嗯？」

「他們總得有個辦法。他們把以前所有的那點輕工業，全丟完了。普通消費物資，他們一點都沒有，要有，就是我們給他們的了。」

「假如他們能打進德國，」我說，「他們就可以想辦法了。」

「他們永遠攻不入德國的，」喬說。「你以為我們會讓他們攻進去嗎？」

這樣的談話，我覺得厭倦了。再講下去我看沒有什麼意思。罵罵那些狗東西，也沒有什麼樂趣了。我覺得心頭的空虛麻木之感，又躡回來了。

「我說，讓我們開開無線電，聽聽英國電臺的最新消息看。」

最後就是這麼一着了。別的也沒有什麼了。

「……提摩盛科元帥……」無線電沙沙的叫着。

天哪，他們知道些什麼呢？那些可憐的盲目的狗東西，用粉筆在坦克上畫符號，可是坦克已經不用了。提摩盛科，我的天哪，不聞提摩盛科者已六月於茲矣。他們在那裏到底在搞些什麼？

查理和黛娜米亞回來了。

「她在一間空房間裏躺着，」他說。「老酒喝得太多一點了，你知道。」

他把無線電關掉，在留聲機器上又放上一張唱片。

我的天哪，無聊的事情還不肯停嗎？他們爲什麼還不把他們的女人帶去睡覺呢？

「再喝一杯，福開森。」

「來得正好。」

「你在哪裏聽過『懲誡大隊』的？」

「懲誡大隊是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嗎？照字面講，是『處罰大隊』。原來是沙皇時候的遺制。七月間，諾伏洛錫斯克一仗垮臺之後，共產黨把那個制度恢復了。各種不同犯罪的人都編了進去，把他們派到前線戰事頂猛烈的地段。」

「機關槍在前面搖，機關槍在後面搖，衝，衝進死亡谷。」

「真是這樣，丁尼生所歌詠的輕騎兵，在巴拉克拉伐，還不是一樣？真可憐。」

「喝醉酒的人也放進懲誡大隊裏去嗎？」

「喝醉酒的，開小差的，上班遲到的，詐病的，還有你的老布爾什一類的人。」

「還有別種嗎？」

「老朋友聽着，關於懲誡那玩意兒，你有什麼材料，我非常感激。我也得寫些東西，講講他們的。」

哎喲，今晚上我們似乎談了不少東西。明天請光降敝處，怎麼樣？我們可以長談。我看你是已經……」

「醉了。」

「啊，朋友，我可沒有說這話。」

「不管，我總是醉了。而且我知道我醉了。再有一層，根本我就想喝醉……」

他們在談各式各樣的事情。

時間隔了很久，舞老在跳着，跳着。我問自己：幹嗎我會在這兒的？就這麼的單調。

我走出房去。我覺得我是相當醉了，可是沒有大醉，沒有，我走樓梯還是好好的！沒有大醉，可是醉得回去睡覺正好，明天事情又要重演一次，明天早晨，可是反正明天的事……。

我把門打開進我的房間。電燈開關就在那邊，可是有沒有燈也無所謂。我還沒有醉得不能替自己脫衣服。不能脫衣服就糟糕了。我把衣服脫掉。還有襪子，可是幹嗎再把身體那麼彎下去脫襪子呢？可是衣服脫下來在地板堆了一堆。於是……

我上牀去睡了。

一隻強壯的年青的手，把我腰部一把抓住。

「親愛的詹美大令。」

當然，我一直知道有這麼一着的。

第二十二章 夫與妻

安娜與苛斯底亞

安娜有一年沒有聽到苛斯底亞的訊息了。沒有信，也沒有人傳個口信，也沒有官方的情報，他到底是死是活，沒法知道。安娜是個粗壯冷靜的女人，可是在她的心頭深處，總有這麼一件憂愁。有時候她努力想他已經死了，有時候她希望他已經死了，因為死了乾脆就了了；可是猜雖猜，把握可一點都沒有。這一天，她在廠裏打造成了她的第一千件炭化器的壳子，黨裏的書記特地在她的工作檯上插了一面小紅旗，表示她是一個『劳模』，只有超過原定生產額百分之一百的才有這種榮譽，她就是其中一個。安娜是個理想的工人，是個胸寬腿粗的俄國女人，兩膀有力，精神卓絕。黨部的書記要她在工人中間做一個榜樣，這樣做，政府所需要的炭化器產量才可以實現。安娜·彼得洛夫娜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一個月有一天的假期。她每月掙五百盧布。她上工從不遲到，因為遲到每滿一小時，就要罰去一個星期的工資。她拚命的工作，以求超過她的規定生產額，因為超過了規定生產額，可以在食堂多吃一頓午飯，這

是別的工人所沒有的。安娜因此也可以把大麥麵包或是麥糊用眞理報包起來，帶回家去給小孩子吃。

那天晚上她把一包麥糊緊緊的捏在手裏，穿過了燈火管制的街道，走進地下鐵道，在人堆中擠回家去。她的家是在克魯泡特金門和亞拔茲間的一條街上，一座房屋的地窖子裏。安娜到家的時候，她的母親正在弄小鐵爐子裏的火。煙囪已經有點毛病了，又從一個低處的窗口出去，因此屋子裏有煙了。安娜罵她的母親。她的母親五十五歲，可是她已經乾癟背彎了下去，頭髮變白，指甲是灰色的而且很長。一週歲大的小安妞霞躺在小床上，裹得緊緊的，像個埃及小木乃伊，只有小臉露了出來，不作聲，也不哭。安娜對她的小孩望望，看看生病了沒有，凍壞了沒有，可是沒有去親她。比她大一點的巴蒲加，今年三歲，走到母親那邊，開始拉她的裙子。安娜俯身下去，把巴蒲加抱了起來，餵她奶吃。以前給小孩吃奶，是防止自己懷孕，可是現在爲的是饑餓了。懷孕嗎，安娜冷冷的自己說，這件事是永遠不會麻煩我的了。兩個大的，莉娜和沙俠在街上同別的孩子在玩。他們在玩「查身份證」的遊戲。這兩個孩子藏起來，等別的孩子走過，就衝出來，大叫「護照，護照」，或者「證件，證件」，嚷着要看別人的通行證或者證明書。另外還有一種遊戲，他們找一個較小的孩子，在他上裝上，用粉筆畫上鐵十字勳章和肩章，然後叫他逃，大家去追。他們還有一種遊戲：他們排成一隊，假裝是排隊領配給，然後憑了小孩天賦的模仿本領，他們學他們大人的爭論吵架和發牢騷。安娜以爲那些遊戲大多沒有意思，可是玩玩遊戲，小孩身上也可以暖和些。她在門堂口叫了一聲莉娜和沙俠，她又進來，幫她的母親準備晚餐。

她們祖孫三代就住在這間小房間裏，只是嫌配給不夠，日子過得倒還快樂。苛斯底亞是個好工人，

在他從軍之前，家裏糧食很富裕。可是現在苛斯底亞不在了，家裏糧食就從來沒有夠過。今天晚上，晚餐有黑麵包和一點鱈魚。安娜的母親排了一整天的隊，現在牛奶也有了。小孩子狼吞虎嚥的吃。莉娜是老大，十歲。沙俠八歲。她們生下來時，日子還好。安娜記起了那時，會發笑，因為那時似乎誰都在懷孕。那時莫斯科到處都有懷孕的女人。

突然沙俠問了：「媽媽，我們爲什麼沒有牛油？」

「少說話，」莉娜。「你不知道牛油要兩千盧布一公斤嗎？」

「那末，」沙俠說，「我們爲什麼沒有馬鈴薯呢？」

安娜的母親答覆道：「因爲那要一百多盧布一公斤呢。」

「他媽的，」沙俠說。

安娜說：「你這話從哪裏聽來的？不許說的，沙俠。」

沙俠說了一句，比剛才的更下流。他就像他的父親，安娜想。幾年之後，他就會要錢到戲院，和電影院去。他就會追求女孩子，就像苛斯底亞當年一樣。啊，是的，安娜知道。他把他的麻煩都會帶到家裏來。以後他會結婚，把他的妻子帶到家裏，一家人還是擠在這間小房間裏。不，也許他會住到他妻子家裏去。

莉娜說：「媽媽，我今天看見一樣東西。就在麵包店裏。媽媽，有一個男人在把他的麵包包起來。來了一個女人，搶了他的一塊麵包，塞進嘴裏去。她搶得真快，就像這樣。她也不逃走，就這麼睜大了

眼看那個男人，麵包一半還伸在她的嘴外面，她不停的在嚼。那個男人生氣了，從她嘴裏把麵包搶下來，再放在他包裏。可是媽媽，麵包還沒有包好，那個女人又搶回去了，放在嘴裏。她就一直站在那裏對他望着，也不走開。那個男人大生氣，他打她，挾了紙包回去了，嘴裏還罵着。」

莉娜停一停，換口氣。

「你去麵包店幹嗎？」她母親問。

「那邊總是有人的，」莉娜說。

「做叫化去了！」她母親說。

「人家說，明天要配給麵條或者通心粉，」安娜的母親說，「我們就可以煮湯喝了。」

安娜開始算這個月的支出。這個問題她總是丟不開的。她有她自己的五百盧布，還有小孩子每人六十盧布。小孩子每人有六十盧布，因為苛斯底亞在紅軍裏當差；除此以外，他不能再寄錢來，因為每個蘇維埃女人都得自己工作維持生活的。安娜在工廠裏的食堂吃午餐，這樣可以省不少，雖然這樣也要用掉她很多配給證。可是她的鞋子呢？她沒有鞋子……苛斯底亞，她對自己說，我要鞋子怎麼辦？苛斯底亞，寄雙鞋子來吧。她說起三年前他帶回家的那雙漂亮鞋子，她從來不曾有那樣的鞋，可是到今天已經穿破了，而且要補也沒有料子。黑市一雙新鞋要賣四千盧布，可是假如買黑市貨查到了，要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一雙鞋補一下，就要花掉三四瓶伏特迦酒的錢。

九點鐘，公寓管理員來了，安娜和她的母親走到街上去，把人行道上的雪掃掉，鏟掉。莉娜也出來

幫助她們。別的鄰居也在工作。做玩具動物的女人也在那裏。她曾經送給巴蒲加一件玩具，做得很像一頭象。她們掃了一個鐘頭，又進屋裏來了。雖然屋子裏也很冷，安娜睡得很熟，好像死去一般。

苛斯底亞沒有寫信給安娜，因為人們都說，寫信也沒有用，總是寄不到的。進了醫院，他也沒有寫信，那是爲了另外一個理由。

苛斯底亞在醫院裏逢人便說他在被救回以前，已經在雪裏躺了三天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俄國大砲最後把德軍砲隊趕走，在左翼前進的一團人迫使敵人向後撤退。他在被救起和送回到基地醫院這段時間裏，也有些時間是有知覺的，可是他後來連貫不起來了。他滿口囁語，痛苦得不可名狀，還有一種臭味，一種腐爛的臭味，臭得直攻丹田，有時候聞到，有時候聞不到——那是壞疽病的臭味，雖然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第一個清楚的回憶，是在麻醉藥性過了醒來的時候，只覺得心頭空虛煩燥，直想作嘔。隔了一會，他才知道他們把他的雙腿齊股下統統切去了。後來他們把他在床上支起來了，看見床的中段以下，床單平塌塌的鋪着，看上去覺得很奇怪。醫生和護士都非常忙，沒有功夫來回答他的問題。

動手術後幾個星期，他們把他送到另一家醫院去。這家醫院以前本是一所學校，房間比較小。一個女僕替他們擦地板，刷牆壁，她出去後總留下很濃很刺鼻的消毒藥水味道。苛斯底亞房裏還有三個人。他們的傷都在腿上。他們變得很要好，而且定計偷運「麥霍加」淮醫院來，雖然照院章是禁止抽煙的。他們所講的東西，有些是苛斯底亞從來沒有聽見人講過的。他們都受過傷了，人生沒有比這更慘痛的事了，他們連這個都見過了，因此都有一種自以爲是老資格的感覺。他們講起戰爭。

「爲什麼我們這樣慘敗呢？」苛斯底亞問。

「請你記住，」隔壁床上的亞力西說，「我們的戰爭是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的。」

「可是現在戰爭是在伏爾迦河上進行啊，」苛斯底亞說。

「國內奸細太多了，」維克多說。他是個高個子，臉龐瘦削的人，躺在離苛斯底亞最遠的一張床上。

「可是奸細在一九三七年都清算完了，」苛斯底亞說。

「奸細有大有小，」維克多說。「我們忘了清算大奸細了。」

「一九三七年，」亞力西說，「他們所槍斃的人都是德國人願意他們走路的人。這個我是聽黨裏一個很高級的同志說的。」

「不是奸細作怪，」葛列哥里說，他靜靜的躺在角落裏的一張床上，他的腿上中了兩顆芬斯基自動步槍的爆炸彈，炸成碎片。「都是猶太人的不是。」

「那是希特勒主義了，」苛斯底亞說。

「然而我們的國家掌握在猶太人手裏。猶太人就是官僚政治。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是官僚政治。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支強大的俄國軍隊，使猶太人聽話，少來管閒事。」

「也不是猶太人，應該怪將官們，」維克多說。「很明顯的，戰爭打得這個樣子，將官們應該負責的。」

「我見過一個將官，」苛斯底亞說，「他連東南西北都辨不清的。」

「很多將官是沒受過教育的，」葛列哥亞說。

「我會經替他們分成七類，」苛斯底亞說。

「很多沒有受過教育的，都讓指導員給槍斃了，」維克多說。

「我們那個將官就是笨蛋一個，」亞力西說。

「一個將官只要知道兩件事情，」維克多說。「他該知道敵人在哪裏。他該知道自己在哪裏。一個小兵所求於他者，不過如此。這樣就夠了。」

「他該知道什麼時候給他的兵士洗澡，」苛斯底亞說。

「還有什麼時候給他們麵包，」維克多添一句。

他們現在笑了。這樣他們一天復一天的聊着。大地春回，冰雪解凍，護士替他們把窗子打開，（雖然是違反院規的），陣陣新鮮的春風吹來，帶進了樅樹的香和抽芽中的樺樹的香。四個人中每一個人偶然都會被搬出去動手術，那個人回來的時候，就帶來了令人難受的麻藥的怪味。

葛列哥里動手術的次數頂多。每一次他們要替他舀出一碟的碎骨，再替他縫好。每一次回來，葛列哥里說他少了幾根頭髮。他說這種麻醉藥使他掉頭髮的。可是反正他們的頭髮都是剪短的，也沒有人注意葛列哥里的話。

「可是，」葛列哥里說，「我將要能走路了。」

「腿上受傷恐怕是頂好了，」維克多說。

「我一直希望腿上受傷。現在真的來了，我在膝蓋以下也就光光的了。」

「可是苛斯底亞的情形頂壞，」亞力西說。「他已經沒有腿了。至少我還有一條。」

他們說了個下流笑話，取笑了一下苛斯底亞的腿。

「我記得我們村子裏有一個人是沒有腿的，」葛列哥里說。「他躺在一塊板上，底下有輪，他用木柄推動，行轉自如。冬天他不裝輪子，他裝上滑冰條，在冰上來往得也很靈巧。他常常喝醉，跌進地窖子裏去。他的怪動作我們見了都很樂。」

「他做什麼工作呢？」苛斯底亞說。

「他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我們村子裏，有腿的人才能工作。」

「『凡不工作者，亦不得其食。』這是我國新憲法第十二條，」維克多說。

「他的母親養他，」葛列哥里說。

他們都寫信，除了苛斯底亞。他寫一封信，這樣開頭的：「親愛的安娜，只有我的一半在這裏，可是我還活着。」他又把信撕了。他下不了這個決心，他不能告訴她。可是他在醫院裏講起了安娜和莉娜，沙俠，巴蒲加和小安紐霞；因此維克多出院的時候，他說他要去看安娜。傳信的人就是他。

維克多到那間地下室去拜訪的時候，安娜還在廠裏。他就告訴了安娜的母親，因為他看出來他們的食物不夠留一個客人吃晚飯。安娜回來的時候，老婆婆把消息告訴了她。

「我還以為你要告訴我他已經死了，」安娜說。

「不，」老婆婆說，「他的腿鋸掉了。兩條腿全鋸掉了。」

「那樣更壞，」安娜說。

「還是讓他死了的好，」老婆婆說。她哭起來了。「哥斯底亞沒有腿了！哥斯底亞要人給他端來端去了！」她哭着說。

安娜沒有哭。突然的她心裏浮起了一幅塔斯社招貼的圖畫，這種招貼莫斯科到處都貼着的：畫的是安華的德國家庭，門打開來了，門檻上是睜大了眼睛的半身人——從俄國前線回來的無腿德國兵。

「看看他們這些宣傳，你真要以為我們這裏是沒有痛苦的，」安娜說。

「別說了！」老婆婆說，「哥斯底亞是不在了，但是記得那些孩子吧。」

「哥斯底亞是不在了，」安娜說，「可是孩子們都還在。未來的這幾年，孩子們總是在的。」
安娜哭不出來。

繼維克多之後，葛列哥里和亞力西都出院了。哥斯底亞搬到另外一間房間去，那裏的病人都是害重病的，話都不會說的。哥斯底亞開始擔心，怕再也不會出院了。他現在瘦得不得了，護士可以把他的半個身體抱起來，就像抱嬰孩一樣的，可以抱了他走路。

「我退役之後，」哥斯底亞對病房裏一個人說「每月可以領到一百盧布的恩俸。」

「算了吧，」那人說，「不值半文錢的。上菜市去還買不到一公斤馬鈴薯呢。」

「那末我要回家去，同我的妻子一起住，她去上工的時候，我可以餵小安紐霞吃東西，我也可以煮菜。」

「你太太要不要你還成問題呢，」那人說。

「總比我臉上受傷好一點吧，」苛斯底亞說。

「不見得，」那人說，「並不好。因為那樣你能去工作了。」

最後，苛斯底亞寫了封信給安娜，告訴她他已經丟了兩條腿，可是很快就要出院了。他沒有提起他現在變得這麼瘦了。

維克多來拜訪後不久，安娜收到了這封信；事情她已經知道了，收到了這封信她也震驚一下。她的想法開始變成絕望的了。她想起莉娜，沙俠，小安紐霞；她想起她的母親，很有用的老太太，菜市上還用得着她，排班韻配給也娶她。後來她又不想了，她不再想什麼了。她沒有對小孩們說起這件事，雖然她的母親（她已經看見這封信了）儘目暗暗啜泣。一天晚上，安娜問公寓管理員借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

她寫着：「親愛的苛斯底亞，你的遭遇是太可怕了。可是我很高興你還在人間。苛斯底亞，請你不要回家。我們的食物不夠吃。小孩子老是挨餓。你是他們的爸爸，你懂得這是怎麼回事。爲了對小孩們的愛，苛斯底亞啊，你不該回家來把小孩子的麵包從他們嘴邊搶走。母親們整天的排班，上菜市。苛斯底亞啊，小孩子頂重要。我親愛的丈夫啊，我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

政治指導員不在，醫院院長把信拆開，然後把它毀了。軍人苛斯底亞·巴洛夫的兩條腿都被鋸斷，而且曾經在雪裏睡過，受過凍傷，現在他已經死了。他們還搞不清他是怎麼死的，因為從醫學的觀點看來，那次手術動得很成功。

第二十三章 蟑螂和麻雀

福開森的故事

沒有光亮；可是已經是早晨了。醒來第一件事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小小的恐懼，記憶喪失了，問題是：我在哪裏？我在哪一國燈光管制的首都？後來我就覺得我身旁的安靜溫暖的肉體。這是誰？一下子什麼事情都湧回心頭來了：黃濁的伏特迦酒，陳舊的「麥霍加」的臭味，頭裏隱隱作痛，是酒在作怪，也許心裏也有點悔恨。

我探身出去，把牀畔的電燈開開。

維姐莉亞睡着了。她的染過色的頭髮披在枕上。她好夢正酣，恬靜靜的睡着，臉上顯得特別的年輕。她似乎不在呼吸，在那一片刻，我有一個幻覺，覺得她已經死了。

我側睡著，對她望着，她的眼睛睜開了。眼睛一睜就睜開了，不眨一眨，眼光不昏不散，直看着我。我看見她的眼光裏慢慢的認清她在看的是誰。眼睛是棕色的，亮亮的，非常之美。

我俯身過去，吻了她一下。她的表情不變。

我們互相對着看着，有相當長的時間。然後我把我的手放在她乳房的裏面，我的手心凹了進去，很穩定的順了她的身體摸下去；在手心底下，我感覺到那種精緻的溫暖，感覺到她的橫隔膜的確的輪廓，緊緊的綳着肚子，慢慢起伏着的維納斯山，漸漸沿坡下去，到了大腿。

突然她把我的手打開。打得很重很脆。

我對她看看。她的表情裏有的是生氣，憤慨，還有挑戰。

我的血液裏酒性未退，在刺激之下，我把我的膝蓋伸進她的腿中間去，把她的兩股分開。她不拒絕，她接受了我了。可是當我要把我的嘴唇放到她的嘴唇上去，她卻把她的頭轉過去了。

但是她的身體並不推拒。

過後，我的腦筋清楚了，只有在腦袋角落裏還有一點酒意，我說了：

「你蹦得太厲害了。」

「蹦？什麼叫蹦？」

「別管它吧，」我說。「抽枝煙吧。」

「詹美，是駱駝牌！」

「你很年輕，是不是？」

「明年 Semnadise。」

「你說十七歲。」

「你多大了，詹美？」

「二十七，」我說。

她很認真的看着我，看的時間很長。「你有很多女人，詹美，」她最後說。

「不很多，」我說。

「哪種女人？」

「有些英國的，有些美國的。」

「你有很多妓女？」

「沒有。」

「你從來沒有過嗎？」

「從來沒有。」我撒謊了。

「資本主義國家很多妓女？」

「是的。」

「我想做一個妓女。」

「你走的路子就是這一條。」

「你以為我愛查理。我不愛查理。」

她對我看着。「我真喜歡你，」她說。突然她把手伸出來，摸摸我的臉頰，「愛人」她說，很輕輕的。她的眼睛裏的表情，溫柔得真要滴出水來，只有俄國人才會有這種表情。使我很窘。

「聽着，」我說，「那疊紙還我。」

「什麼紙？」很快的她臉上的溫柔沒有了，代替的是一種冷酷淡漠的表情，這也是俄國人的特點。

「你在我桌子上拿去的那疊紙。」我說。

「沒有拿紙，詹美，」她說。她的表情是稚氣的天真。

「好吧，」我說，「我不知道。不可能是烏達諾伐太太或是老當差拿走的。」我再轉過去看着她。

「聽着，」我說，「你真記清楚沒有拿嗎？像這樣子的一疊文件。裝在一個信封裏的。」

「沒有，詹美。」

「我真猜不透是誰拿的了，」我說。「麗莎維德要急死了。」

「麗莎維德，哼！」

「你不認識的。」

「麗莎維德是你的秘密女朋友嗎？」

「不是，」我說。「按麗莎維德的年紀，可以做你的母親了。」

「就是那瘋話的紙。」

「哦，畢竟是你拿的。」

「文件裏都是瘋話。沒有愛情。」

「你以為它是封情書嗎？」

維姐莉亞點點頭。

「現在在哪裏？你沒有把它送進魯皮揚卡去嗎？有沒有？」

她對我看着，她在研究我的心情，用冷靜的衡量的態度看着我。她笑了，她笑的是我的煩惱，我的關切，和我的愚蠢。

「天哪，」我說，「你偷我的東西，我一定要把你送進『懲誡大隊』去。」

維姐莉亞哈哈大笑起來。我也笑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笑話，可是現在是成了一個笑話了。

「管美，你這人很有趣。」

「喂，聽着，維姐莉亞……」

「『懲誡大隊』是給男人的。女人是送到塔什干去開運河。」

「你怎麼知道？」我說。

她對我看着，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喂，聽着，維姐莉亞，文件在哪裏？」

「瘋話的文件。」

「你已經說過了。為什麼你說是瘋的呢？」

「關於 Tarakan 的。」

「什麼是 Tarakan？」

牀邊有一本字典，我伸手過去拿來。

「蟑螂！」我說。「那真有點瘋了。你看清楚的嗎？」

維姐莉亞點點頭。她用兩個手指，像蟲腿似的，很快的在牀單邊上爬過。然後她又假裝去摸兩根伸到空中去的兩根堅硬的觸鬚。

「文件在哪裏？」我說。

維姐莉亞看來好像什麼錯事都沒有做。「啞！」她說，指指我的桌子。

我走下床來，走到桌子邊上。文件果然就在桌子上。我檢了起來，再帶到床上來。

維姐莉亞在尖聲大笑，笑的時候把被單塞進她嘴裏去。

「笑什麼？」我說。我裝出威嚴來。

「看！襪子！」

一點不錯，我還穿着我的襪子。我很快的回到牀上去。在這種場合，一個人是會有點「尷尬」之感的。我坐在牀上，把信封打開，把文章拿出來。稿子很大的一疊，紙質惡劣，用普通俄文字體寫的。稿子的後面，附着一本書，四開本大小，沒有多少頁，有幾頁的書角是摺起的。

書名叫做蟑螂王 (Tarakanishche)。這似乎是一本兒童童話集，作者名叫楚客夫斯基。封面第一

頁畫的是一隻蟑螂，長長的鬚，黑黑的眼睛帶着殺氣，筆挺的站在那裏，態度很是傲慢，遠處有一隻獅子，一隻老虎，一隻象，乖乖的躲着。

維姐莉亞看見這本書很開心。

每一頁都有圖畫。很精緻的鋼筆畫，附有俄文的詩句。

維姐莉亞開始把裏面的詩句，朗朗的用俄文唱給我聽。每唱完一節，都停一下，高聲的大笑大樂，在牀的彈簧上忽高忽低的蹦着，就像一個小孩子。

「告訴我，裏面講些什麼？」我說。

「可憐的詹美，不懂俄文，唉？」

「請解釋一下吧，」我說。「俄文詩我還吃不消。」

「瞧，」她說，她立刻變得很正經了，好像是母親同小孩說話那樣的認真。「瞧，這裏是一隻蟑螂，你們叫它做『蟑螂』，是不是？這裏是世界各種動物，獅子，老虎，你瞧，還有這些這些，」她指着鱷魚，駝鳥，和別種動物給我看。（那個俄國畫家把它們畫得都很像人，都有人情味。）「世界上一切都很快樂，很美麗。後來來了一隻蟑螂。他來了。他是領袖！」我看着那些圖畫：羣獸紛紛驚懼，蟑螂趾高氣揚的走着。他們的表情先是驚疑，後來成了慌張，最後是恐懼。「領袖蟑螂告訴獅子做這樣，告訴老虎做那樣，告訴這些這些。告訴他們自己吃自己。告訴他們很多東西。告訴他們在他領袖前面鞠躬。」

維姐莉亞開始用俄文把那些詩讀出來。她讀得太高興了，讀着就笑；這本書能這樣出其不意的交還給我，她也有一種稚氣的高興。這本薄薄的摺着角的書的出版期，恐怕比她出生還要早二十年，她現在把它抱起來，按在胸口。我知道革命以後，俄國兒童的生活裏幻想的成份是不很多的。童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一種宣傳，是要不得的。他們的兒童時期是很短的，兒童生活差不多剛開始，就要過大人生活了，他們本有的想像發明的天才，因此很難得到滿足。

她在看着書裏的詩句圖畫，笑着，我把原稿拿起來看看。這是根據這本書的電影劇本的本事。

「我的天哪，」我說，「給狄斯耐去拍卡通片太合適了。」

電影劇本的標題，跟童話的名稱一樣：蟑螂王，副標題上說明是根據楚客夫斯基原作故事改編的。卡爾的名字沒有寫上去。

我草草的看過去。字是用鉛筆寫的，字跡僵硬拙劣。不用字典，單憑我的俄文程度，我唸不快，也唸不流暢。但是我也能看出來：卡爾在原来的故事之外，又添了不少。蟑螂不單使獅子，老虎，鱷魚都臣服於他，而且讓他們坦白過失，坦白他們意識形態中的歧見，他們被搞得狼狽不堪，他獨個子冷冷的得意，最後把他們流放，殺死。在電影劇本裏，還添了不少小蟑螂，他們不常出現，只是躲在地下曲曲折折的暗窖裏，只因為他們的主子的保護，他們才敢露面。劇本故事後來的發展，我懷疑也是那本執在維姐莉亞手裏的原書所不載的。蟑螂領袖有了這樣大權，更是不可一世，他想要在動物世界之外，把勢力伸展到別的世界裏。他似乎總是害怕有一天會給人類厚重的皮靴踩死，因此他陰謀計劃把他的統治擴

充，把人類世界也包括進去。

俄文讀不下去，我很不耐煩。好幾節，好些詞句，我都看不懂。裏面有幽默的詩和滑稽場面。大獅啃着平凡的餡餅，神氣也顯得特別的平凡；諸如此類。我能看出來書裏的內容很豐富。

「讓狄斯耐來把它畫成卡通，一定十分精彩，」我說。「這裏面就有着狄斯耐卡通中所常有的那種恐怖的性質。可定這個比狄斯耐深刻。這裏有沈痛的諷刺。幽默的裏面有骨子，有種結實的沉痛的……天哪，我爲什麼看不懂俄文呢！」

「什麼事？什麼事？」維姐莉亞說。她又聚精會神的看這本書。她一遍一遍的唸着詩句，看着圖畫裏的事物，她不住的笑，圖畫畫得倒很有趣，使人忍不住的要笑。

「讓我們來看看怎麼結局的，」我說。

我們兩個一起翻着這本故事書，維姐莉亞重新指給我看那些動物的狼狽相，指着那隻趾高氣揚眼睛烏黑的蟑螂就笑，她管他叫「老頭子」，他的大觸鬚在嚇得魂不附體的龐然大動物面前，閃閃發光，——這隻矮小的兇惡的「世界之主」。看到最後一頁，她把書放下，放在牀單上，她的手把書頁攤平，她說：

「好了。」

在倒數第二張畫裏，這本書的畫家把蟑螂的命運畫出來了。

一隻麻雀從樹上跳下來，也沒有留意到蟑螂的猙獰的面相，就把他一口吞下去了。

最後一張畫表現的是全世界的動物在地上歡喜跳躍，他們又快樂了。

「很好，」她說，「好得很！」她說的時候，表情很是滿意，滿意之中，帶着莊重，帶着感激。

「書是很好，」我說，「電影劇本也不錯。」

維姐莉亞的眼睛對我手裏的稿本瞥了一下，隨即不理它了，她的手摸着楚客夫斯基的摺着書角的薄書。

突然她把姿勢改變一下。她若有所求的看着我。

「維姐莉亞餓了！」她說。

「好吧，」我說。

「現在。」

「喂，」我說。「這裏是一塊肥皂。趁水還熱，去洗一個澡吧。」

她把肥皂嗅嗅，很喜悅的嗅着，好像當它是塊巧格力。她就奔進浴室裏去，一下子我聽見她砰砰澎澎的把聲音鬧得很大，她是一個小野人，也不必怪她。

我披上晨衣，點了枝香煙。

我把卡爾的原稿和這本詩畫集放回信封裏去。我對於這位卡爾起了一種新的尊敬之感。我覺得我想會會他。同時，我覺得有一種強自壓制住的興奮。

我想他不是就是這隻麻雀。

第二十四章 安娜的轉變

那天晚上安娜上教堂去了。她從來沒有去過教堂。有一天晚上，她們一起在掃人行道上的雪，那個做動物玩具的女人，對她提起了教堂。這個女人和她同住在一幢房子裏，她說起話來好像是個舊時代的人，她說她該到教堂去替哥斯底亞點一支蠟燭。她說，在戰爭中丟了丈夫兒子的女人，現在整千整萬的都到教堂裏去。她說這樣使她們快樂一點，心裏寬舒一點，教堂的用意就在此。安娜從來沒有進過教堂，有些教堂改造成為博物院了，舊時的牧師還散發反宗教傳單，即使那一種地方，她也沒有去過，可是現在她的好奇心動了。事實是：安娜不知道她要些什麼，或者她是在做些什麼。整天的她不開口，晚上除了罵她的母親或是她的孩子，她也不說話。她可能想哭過，但是她不是喜歡哭的那一種女人；她可能想說話過，但是她不是愛說話的那一種女人；她可能想禱告過，但是她不知道該如何禱告。她這一輩子從來沒有禱告過。她記得她小時候，她母親有塊「聖像牌」，老是藏起來不讓人見的。她那時是個小孩子，也曾經去找尋那塊牌，而且也找到了，可是那塊奇怪的牌對她毫無意義。她同別的小孩子也會經替自己劃過十字架架鬧着玩，但這不過是看越而已，頂多還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在做壞事，此外什麼意義

也沒有了。她的青年時期很快樂，想不到有什麼宗教，結婚以後，她同苛斯底亞常在一起，也想不到有宗教儀式，何況那時宗教儀式根本就不時行了。他們志在一起跳舞，工作，談愛情，生孩子，不需要有什麼禱告。可是現在她非得做些什麼不可。有時候她覺得她心快爆炸了。

她的憂愁，她的內心的燃燒，影響了她的工作。她的壓縮機上本來老插了一面小紅旗，表示她的生產額超過預定的一倍，現在這面小旗不見了，她的產量已經降低。她的壓縮機常常壓錯了，她的機器邊上的廢紙窠已經裝滿。委員會的書記很不滿意。他監督她高聲的講社會主義工作競賽的意義。在別隻壓縮機和剪裁機上做工的女工，偷偷的看看安娜。她們不同她說話。她的生產量降低了，安娜中午吃不到一頓加餐，因此也沒有多餘的麥糊帶回家去。獨個子在工廠的餐廳喝着薄湯，嚼着黑麵包，安娜開始了解工廠裏另外有一間特別餐廳，同工人餐廳是隔開來的。廠長，黨部委員會的書記，幹部人員和委員們那一些人，就在那裏進餐。那地方早就有了，並沒有什麼秘密，可是今天安娜才注意到它。她聽見黨部委員會的書記在笑。她知道（廠裏誰都知道），特別餐廳裏是吃「二號飯」的，那就是說，鱈魚，紅色魚子醬，泡菜，常常還有鹹黃瓜和茶。這也沒有什麼稀奇。這叫做「幹部保健飯」，意思就是說，他們保持政府的元氣，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安娜對這種幹部保健政策，從來沒有發生過疑問，這對於她是太遠了，她想都不會想到的。可是今天她想起來了，她的憂患重重的心開始又多了一層憤怒的負擔。怒氣慢慢上昇，很快的就要佔有她整個的生命，那時就要出大亂子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她同麗莎維德去教堂的理由（她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教堂的光景驚醒了她對於

外物已經麻木了的感覺。她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象。門前有整百整千的人，太多了，不能一下子都進去，很多人只好在門外寒風中立着。他們把安娜和麗莎維德一會兒推到這邊，一會兒擠到那邊，安娜不得不用出全身氣力來對付，她覺得這樣對於她很好。她開始對教堂看。這是一個大教堂，天花板很高，裝飾待金碧輝煌，很美。聖像她全看見了。她知道那是聖像，因為她記得她的母親私下藏起來那塊聖像。可是這裏的太多了。它們看上去很富麗，很奇妙，在雕花的框子裏，有金色的圖畫和小的雕像。安娜看看這一些，心裏覺得奇怪。她再看看那祭司。他有黑大鬍子，大黑眼睛。他戴一頂美麗的帽子，繡着金，鑲着珍珠和別種寶石。珠寶在燈光中發亮。他的堅挺的緞子道袍也繡着金。他的嘴闊大如山洞，唸經的時候，他的嘴就老張着。很多人的手裏都有小蠟燭；沒有蠟燭的人把五盧布的鈔票從前而人的頭頂傳過去，等一回就有蠟燭交給他們了。一會兒幾百枝蠟燭點着了，景象十分美麗。小小的黃色火燄照亮了那些人的臉：蒼白的瘦骨嶙峋的女人的臉；有些低着頭在禱告，有些想得出了神了，有些在流淚，全堂的人暫時肅然無聲。寒風吹來，黃色的小小火焰跳動着，燭油從邊上流下來，可是那些瘦瘦的飽經艱辛的手都是很定很穩的把蠟燭捧着。祭司唸着經，每唸到神的名字，老太婆們就要劃一個十字。

麗莎維德找到一個角落，她可以跪下的；她就跪着禱告了好幾分鐘。她站起來，對安娜笑笑。安娜不知該做什麼。她看見別的老太婆臉上，都有一種平靜氣象，她也想做一件什麼事，使自己的心平靜下去，但是她不知道該怎麼做。她就這樣站在那裏，忽然麗莎維德在她手裏放一枝蠟燭。安娜看看這枝蠟燭，細得像一枝鉛筆，黃色的小小火焰跳動着，蠟在夜風中流着淚，——她看着，她不懂了。她聽見祭

司在唸經，她看見麗莎維德對她笑，點頭示意叫她跪下，安娜跪下了，可是她的頭沒有低下。祭司唸經的單調聲音中，她聽得出一個字：「神」，因為唸到那裏，老太婆們都要劃一個十字的。這是她第一次聽見「神」字受到人們這樣敬崇。她跪在那裏，她開始覺得四周的事物同她很不合不來。她覺得這裏正在演出着一幕大規模的欺騙，一個大謊話；這是一件罪惡，可是是很大的罪惡，大得使她不能了解。她四周看看，她看見那裏所有別的女人，好幾百個女人，不是死了丈夫的，就是死了兒子的，都跪着，捧着蠟燭，喃喃自語。這是她所看見的，而她所看見的，她就認為是真的。這樣的受委屈，這樣的受侮辱，這樣的受欺騙，她突然覺得非常慚愧；慚愧變成憤怒，心底深處本來有一股怒氣在燃燒着，在擴張着，現在充滿了她的心，壓倒了她的理智。

安娜站起來了。蠟燭掉在地上，微弱的火焰熄滅了。安娜掉轉身去，揚長走出。她推開了拜神的人羣，前面是兩排乞丐。他們就像在麵包店門口或是在薩都凡大道上鶻候的乞丐，只是他們的衣衫更襤褸，而且這裏他們是不開口的。他們在教堂的入口處站着，伸着手——所謂手不過是從鶻衣百結中伸出來的黑爪而已——默默地求着。有幾個穿着破制服的紅軍兵士。其中有一個是沒有腿的。

安娜看見那個人，她停住了。那個人的全身坐在一塊小木盤上，盤下有小輪子，就像跑冰鞋似的。他戴着一頂舊的紅軍突擊隊帽子，低着頭。他也伸着一隻手在前面。她站在那裏，她的身體一下子定住了，那時他抬起頭來看一看她。他的眼眶和臉頰，都陷得很深，他也沒有修過臉，可是他的臉還年輕。她正在用恐怖的眼光對他睜着，他的視線同她接觸了一下，他又低下頭去了。

安娜一路奔回家去。可是她沒有哭。

第二十五章 快樂的一夜

福開森的故事

她從我的房門裏奔進來，帶進一陣尖刺的寒風。她滿臉容光煥發。她的頭髮上肩膀上都帶着星星雪花，但是她的眼睛發着光亮，很是快樂。我突然熱烈地愛着她，那就是說：我很高興她到這裏來；我的眼睛釘住她看，放不下來；我看着她的身體在大驚裏面呼吸起伏，忽然得到了啓悟。我突然覺得莫斯科終究還要得；寂寞已經減輕了（天下沒有比這個再寂寞的國都的了）；我有這個感覺，因為我整天想着她。可是，事情並不很嚴重，不過只要這件事情，還繼續着，總是很快樂的。

假如換了一個地點，換了一個時間，我要替她買一朵蝴蝶蘭，買一朵仙女足，去配她的淺棕色的眼睛，而我們倆將擠在一輛出差汽車裏，手握着手，車子就開到人頭濟濟的戲院進口處。照現在這情形，我們只是在燈火管制的黑暗裏跌跌撞撞，要找戲院也很難。進了戲院，存大衣，存套鞋，照例又得忙半天，手續辦好，幕已經開了，門口的老太太就不讓我們進去了；我得同她講英文，她看見我是外國人，

才肯通融。她讓我們擠過去了，可是後面有幾個俄國人要跟着進來，她又在大發雷霆。我們的座位倒不難找，那是在第四排，同別的外賓坐在一起。俄國人看戲總是十分與高彩烈，維琪莉亞每一分鐘看得都很有勁；而且她能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裝像一個神秘而重要的貴婦，她對於自己扮演這樣一個角色也覺得很高興的。

歌劇的名字叫做「鮑立斯·戈特諾夫」，一齣豪華的戲，原定在波爾昂戲院上演的，可是現在被擠到「附屬戲院」來了。相形之下，倫敦和紐約的戲都顯黯淡，因為莫斯科的戲劇演出人用錢是不受限制的，演員可以儘量挑選最好的，可以儘量多用，他們的服裝也是用頂美麗頂講究的：美麗的毛皮，絲絨、綢緞，統統都是真貨，不用膺品來充數，也不借用戲院的現成衣箱的；皮貨是俄國貂皮，緞子是中國來的，絲綢是日本來的，羊毛是從開什米或是喀茲培克來的。舞台上的服裝如此富麗堂皇，戲也別有風味了：這並不是草草排練，演出一個短時期，騙觀衆的幾個小錢就算了事的：這種戲是供帝王欣賞的。維琪莉亞的反應是十分的高彩烈。這恐怕是她平生一大經驗。演員的一舉一動，歌手所唱的一字一腔，她都覺得好到極點，不加半點批評的贊好。你假如帶過一個孩子，不論是男是女，看他的第一次的馬戲或是啞劇，你會知道維琪莉亞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了。你會發現這種出神稱奇的神態是如此之美；你也會記得：在這種時候，她的雙眸凝視中所露出的愛情的光彩，在傳達給你時，是多麼崇高，又是多麼謙卑。俄國人是有一種體會生命的能力的，好像小孩子似的，看見簡單的東西也會有一種戰慄的欣賞，他們很少做作，因此當我們反省自己，看見我們自己是這麼樣一種的人，我們難免心頭慚愧。

第一幕演畢，我們到前廳去；每個俄國戲院都是一樣：在休息時間，男女雙雙，好像排了隊做兒童遊戲似的，都是繞了前廳順了反時針方向走路，我們現在也參加在一起。行列中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多數是官僚，心曠體胖的老爺們帶着他們的太太小姐；可是軍人也有不少：上校，中校，少校，身邊都帶了武器；木壳毛瑟槍或是盛在黑皮袋裏的俄國標準手槍，差不多就插在腰後。也有好幾個肥碩的紅軍女同志，寬闊的腰帶上插了小巧的「殉節」手槍。有一位當參謀的將官，身傍沒有武器，可是胸前掛滿了瑤瑯質的勳章，穿了紅條的褲子，黑皮靴，挺括的軍衣，狀貌很是英俊。也有些年紀比較輕的軍人，是些下級軍官，制服敝舊，大約經歷的戰役也有不少，腰幹很挺，狀貌嚴峻，可是正在設法使自己同環境調和，也正在控制自己，不要把驚奇的表情，流露得太多；我看見他們都掛了小金星，這表示他們是「蘇聯英雄」，他們爲什麼能到後方來看戲，就是憑了這一點。幾個年輕的姑娘手挽着手也在走，眼睛注視着英雄們，竊竊的在笑。前廳的中間，向例就是這一批外國人。史密斯也在其間。他對我笑笑。還有兩位新聞記者，其中一位本來是認識維維姐莉亞的，那時查理·索末斯還沒有把她帶到我們這個「邊屋」來。那個記者對維維姐莉亞笑笑，然後兇兇的看了我一眼。突然我覺得我向大家隔膜了。他們的笑容中間，所包含的還不止是友誼。我注意維維姐莉亞並不理會那些人的笑，這樣使我更窘，好像他們的笑是表示他們和我們同謀似的；我對維維姐莉亞望望，不過一秒鐘的時間，她的魔力喪失了。我只覺我是手挽着手，同這個俄國小女青年團員在走路——這個所謂「尤物」，十六歲的外行間諜。我看她打扮得並不漂亮，沒有風度，也不美，只是粗俗而已。一下子這種感覺過去了。但是還留下一點，一點飄忽的印象，

一點關於我同維姐莉亞之間的距離的感覺。我生起氣來了，我在對自己生氣，他們這樣惡意的笑笑，我爲什麼就會這樣的窘呢？

休息時間將滿的鈴聲響了，維姐莉亞抓了我的手，匆匆忙忙的拖我進場：戲是一秒鐘她都不能錯過的。幕往上升時，她滿懷熱烈的相望，十分緊張：將要有什麼新的奇蹟展現出來呢？一陣冷空氣，從沒有生火的後台吹來，帶一點舊帆布佈景的霉味，從台下吹過，使我感覺現實世界的存在而渾身戰慄，可是這一點也不影響維姐莉亞的快樂：燈光，佈景，服裝，演員，把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吸收住了。這樣的看着她，我又感動了，我覺得我不如她。這使得我對她的愛大爲增加——伴侶似的相愛，而剛才在戲院前聽的一剎那的幻滅和窘迫，都被忘卻。而且，不管我心裏如何的想反對這齣戲，我對於「鮑立斯·戈特諾夫」發生起興趣來了。

這齣歌劇主要的是發揮男音，尤其是男低音的，俄國以外既然沒有什麼好的男低音，所以在別處聽起來總不大過癮。在莫斯科聽這齣戲，非但可以聽到好的唱，而且還有別的收穫。戲裏面所描寫的克里姆林宮裏的暗殺和陰謀的氣氛，同外國的秘密勾結，沙皇的良心的譴責，忠心的俄國教士，羅馬天主教入侵的威脅，密謀不軌的親波蘭派貴族，蠢蠢欲動的農民，哀苦無告的飢餓大眾在痛恨着中產階級，在他們和他們的親愛沙皇之間是官僚階級：這一切可能是十七世紀初期的俄羅斯，但是這一切同現狀也有無可否認的巧合，我微微有點吃驚。這一點，聽衆無疑也該看出來的？俄國人了解一件事情，大多是粗枝大葉的，我想他們的了解也不過如此：戲劇是藝術，這裏痛苦被描寫成爲光榮的事物，權力被證明是

合理的，神（可並不是人）是命運的決定者；可是，即使沙皇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叫囂索格斯基（按：俄國作曲家）把這些道理替觀眾說明白了。到最後一幕所謂是革命場面，我看得很清楚了；我早就聽說過有這麼一幕：一大羣農民包圍了去羞辱一個貴族，而且把他聚毆致死。從支持上演的的人的立場說來（以前誰支持的我們不管，我指的是現在支持它的人），這齣歌劇的道理就在這最後一幕。排演裏面要了一點小小的手法，在這裏多加了一點份量（或者並非如此，是觀眾對於這一幕特別注重？），這一幕顯得非常有力量；這裏用過度殘忍的方式，把農民鬱積的怒氣疏通了，而出氣的對象，是一個私通外國的奸細。這是高潮。在我面前演出的是這幕冷酷而火熾的謀殺，我想起了，將來俄軍反攻，收復大批失地，每個小村莊裏的每一個小小的通敵份子恐怕都要遭受到同樣的命運。可是實際的通敵是一回事；在今日的俄羅斯，思想上稍有點偏差，或者同政府當局稍為有點不一致，或者是不聽話，罪名可同通敵一樣的大，所受的刑罰也是一樣。我懂得了，這齣歌劇，同他們很多別的戲一樣，目的是要成爲一種威脅，一種指導；威脅的對象是在「領袖」和羣衆之間的各式人等，指導者是使得醞釀爆發的人民的怒火，得到一條出路；當我想到這裏，我的心冷了半截，難過萬分。我把我的頭轉了過去。突然，從舞台上的亂糟糟之中，起了一陣呆子的歌聲，把別的聲音，都蓋罩住。鄉下的白癡，頭上套了一個鍋子，坐在那裏，唱將起來；他所唱的，既無字句，也無意義，只是純粹的聲音，一種完美的男高音，把一切男低音和男中音都蓋罩住了。那個時候在我聽來，這是我所聽見的頂悲慘的歌，俄羅斯生活裏的一切無言的，束縛的，幽禁的，無望的情感都表現出來了——那種澈底的絕望。我看看維姐莉亞，她看看我，我們倆都懂

得了。那一刹那，我們之間有了一種默契，一種聯繫。我在莫斯科這幾個月來，我第一次找到一個伴侶，她對於那種說不出傳不出的情感，有和我一樣的反應。我的那身孤寂和頹唐的甲冑，已經戳破了，末一場的戲上場，台上擠滿了人，看來竟有五六百人，背景是克里姆林宮，維妙維肖的矗立在那裏，好像飛過了那廣場，給什麼人搬來似的；加上富麗的服裝和聒耳的鐘聲，這裏傳出了戲裏主要的教訓：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是永不動搖的，是永世確立的。整個俄國戲劇界所以成爲秘密警察的一個支派，不是沒有理由的，想起這個，我心裏倒覺輕鬆一點；可是他們使戲劇同你的生活這樣接近，你會覺得他們的戲劇真是戲劇，比起他們的來，我們的戲劇是要黯然無光的。幕降下了，維妲莉亞站起來，鼓着掌，尖聲的「布布」的叫——這是官方所認可的喝彩聲。幕昇降了五六次，答謝觀衆的彩聲；劇中主角從幕縫裏出來，深深的鞠躬，然後又進去；維妲莉亞奔到樂隊的欄杆處，（那邊已經聚了一百個左右的年青人），他們一起對劇中人物高聲歡呼。最後，維妲莉亞又回到我這邊來，滿臉抱憾的神氣，好像全世界的光明都已經消失了；可是她的遺憾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因爲她一看我，她的眼睛又發出歡樂的光；她拉着我的手臂，感謝地看着我，好像這些奇景好戲，都是我個人所賞賜給她的。

爲了謝幕的耽擱，我們搶回大衣呢帽，又落後了。戲裏的緊張情緒，觀衆出場之後，每人多少都還反映着一點，就是那胖胖的官老爺也難免。我們帶上帽子，披上大衣，穿上套鞋，心中不無悵悵：戲劇的幻景已經完了，現實世界又要開始，觀衆們又要回到陰森寒冷的房間裏去了。這種感覺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因爲有很多人，就像我們自己也是一樣，都可以回到專供大官和外交人員居住的暖和舒服

的房間裏去的。我給了衣帽間的老太婆一點小帳，我們匆匆忙忙的穿過街頭，轉回家去。房間裏多暖和，回來了很是舒服。我們把手貼在爐子外面的白色磁磚上，很覺暖和。吃的東西不多，可是很不壞。我先開了一瓶伏特迦，我們喝了兩杯，祛除寒氣。茶鍋已經準備好，我在底下點上了火，一下子水就可以開了，我們可以有茶喝了。我們還有麵包，牛油，新鮮的黑色魚子醬，兩個煮蛋，一個洋葱。維姐莉亞責備我不照規矩，喝酒的時候沒有吃東西，所以我把麵包切好，塗上魚子醬。蛋塗在魚子醬的上面，洋葱切碎了，也塗在魚子醬的上面。這些食物我都是從外交人員特別商店裏買來的，他們把我們同他們的高級官員一樣待遇。水沸着，幾分鐘之內，我把茶煮好了。我們再喝了兩杯伏特迦，然後我們加了糖喝茶。

我開始把我的生平講給維姐莉亞聽。我知道這樣講是很笨的，而且她也聽不懂我在講些什麼東西；但是人難免愛講自己，我也忍不住要講，因此就講起自己來了。這一個晚上過得很好，我覺得我們之間的矜持已經打破了，我儘管講自己，也不致有自我標榜之嫌；而且，當然囉，男人說話總是該女人來陪着聽的。我告訴維姐莉亞我是生在哪裏的，畫了一個小小的地圖給她看，因為她從來沒聽過這個地名。我告訴她那邊的情形，她似乎聽來不大相信。可是她現在的心情，和以前我同她一起讀生活畫報時所表現的，已經大不相同了。她心中所有抗拒的力量已經都撤銷了，我這樣想。她小鳥依人的靠在我身邊，靜靜的聽着，神氣有點肅然起敬。我講起我的父母，告訴她他們是怎樣的人，我父親是怎樣奮鬥出頭的：起初是一個工人，後來怎樣自己置辦了一個田莊。我說我的父親相信農耕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合

作或者集體經營，他對於蘇聯又是多麼的同情。

把過去事情這樣回憶，不由的勾起了我的心事。我止住話頭，俯身下去，吻了她一下。

「把你的家裏的人也告訴我吧，維姐莉亞，」我說。

她看了我一眼，神氣中充滿了譏諷。

「你想要情報了，嗯？」

這好像是猝不及防的兜心一拳。

「你要寫報告了，嗯？」

「不。」

我想這也對的。我自己想，我說了半天，講到這裏，當然就是想聽聽她自己的故事。我要聽聽她講自己。可是她已經道破我的心事了。不，這不是這麼一回事。

「詹美生氣了？」

「不。」

她笑了。我突然又覺得孤單了。天哪，我差一點把我自己徹頭徹尾的造成一個大傻瓜。查理的話一點也不錯，荷爾蒙是在她們那一邊。男人是多麼受內分泌支配的一種怪動物呀！

「把家裡的人對我說說有什麼不可以呢？」我說。「這算是個秘密嗎？」

「都死了。」

「雙親？」

「沒有父親。沒有母親。」

「兄弟姊妹呢？」

她聳聳肩膀。這算是已經定局了。

「詹美，」她說，「把蟑螂王給我。」

「不。」

她撅起嘴來了。她拿起我的手，開始玩弄我的手指。不，我想，要板臉就得在這時候板。她們就是這樣拿人當傻瓜耍的。別看那些婊子，外表溫柔，嗲聲嗲氣的，心可硬得同鑽石一般。

「爲什麼你要蟑螂王那本書？」

「我喜歡蟑螂王。」

「你以爲它滑稽嗎？」

「很滑稽，像今晚一樣。」

「不，」我說。「這不是我的。」

「詹美，」她說，「再多講一點。」

「多講一點什麼？」

「家裏有個女人吧？」

「我有過一個女人，」我說。

「不錯。叫什麼名字，詹美？再多告訴我一點關於她的事。」

「她的名字叫做喬吉娜。你要猜想我們是已經訂過婚的了。不管怎麼樣，我們是預備到美國去度蜜月的。」

「蜜月月？什麼是蜜月月？」

「蜜月，」我說，「不是蜜月月。媽的，我說不明白。就是當……」

她對我笑。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我說。

「詹美把蟑螂王，交給維姐莉亞吧。」

「不成。」

「你要的話，我多給你些情報好了。」

「不要。你不懂嗎？我不是個間諜。」

「壞間諜。」

「我甚至於也不是個壞間諜。假如我的國家要我做那類的工作，我要拒絕的。懂了嗎？」

「你是個滑稽人，詹美。外國人都是間諜。」

「哦，不跟你辯了。」

我又倒了些伏特迦酒。屋子裏很暖和。或者是因為我喝了酒的關係嗎？

「我在俄國這許多日子，」我說，「我只碰到這兩三個人是拿我當大人看待的。別人麼，不是希望我對他們撒謊，就是希望我會相信他們的謊話。」

「你有俄國朋友嗎？」

「有啊，」我說，「可是你假如以為我會告訴你他們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裏，那你才真是瘋了。」

「你帶東西給他們吃嗎，嘿？」

「才一點兒。不多。」

「好罷。他們給你什麼？」

「什麼也不給。一點也沒有什麼。」

「他們要你是有意思的。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冒那麼大的險的。你小心呀，詹美。」
她說話的時候，神氣是很奇怪的急迫。她不會已經猜到了什麼東西的。

「你替你自己發愁好了，」我說。

「你喜歡俄國人嗎？」

「喜歡？」

「你有秘密女朋友，有沒有？」

「不，不。我和我的朋友不是這種關係。」

「我相信。」

「維姐莉亞，聽着……」

「詹美大令，我愛你。」

她的眼睛有點斜視，眼光裏露出熱烈的情慾，表示想要被人愛。

「你把蟑螂王給我。」

「媽的，」我說。我看看桌子上的信封。我在盤算這份東西到底會不會帶出國境的。

「不，」我說。「我不讓你拿。」

「詹美大令。」

「你想要做的，無非是把它交給秘密警察而已。」

聽到秘密警察這個名字，她把眼睛睜大了，但還不致於顯出受驚的樣子。

「原來就是秘密警察，那些社會的渣滓，」她說。

「當然。」

突然她對我看着，雙目圓睜，惱人的事湧上心頭了。

「秘密警察什麼都要曉得，」她說。「他們還問起『我們』的事呢。他們要知道我要不要生小孩了。我怎麼知道要不要生小孩呢？怎能呢？」

「他們連這個都問！」我吃了一驚。

「呸！秘密警察……」我聽不清她說些什麼話，不過她的話裏是帶一點下流的。

「什麼時候問的？」

「沒有什麼，詹美大令我愛你。十分愛你。」

她的小而硬的手圍抱着我，她的青春的肉體貼緊着我的——那個奇妙的肉體——天真的，熱情的，就於享樂的，現在正挨到我身上來。

「十分的愛你，詹美大令，」她說。「我們結婚，嗯？我們去美國。大蜜月月，嗯？」

「維姐莉亞，聽着……」

但是我所聽到的只是她嘲弄的笑聲——我也不知道她笑聲裏到底有多少譏諷的成份。一下子我也忘了去想這個了，因為她不慌不忙的，開始把衣服脫掉。很安詳很鎮定的，她把她的寶貴的衣服攤在椅子上，然後用她的手擦擦她的小肚子，看見我在出神的望着，笑了幾聲，奔到牀上去了。

我的衣服我沒有好好的攤在椅子上。

過了一些時候，正是熱情奔放的當口，她對我說了。

「詹美大令，把褲褲王給我。」

「哦，好罷，」我說，「也許成。」

第二十六章 一篇報告

特務高吉克的故事

高吉克同志在寫一份報告。他在這張報告上面，已經花了好幾個鐘頭了。他正在工作的時候，人民委員馬洛夫已經來了一個電話，說他們正在等着要看這份報告。高吉克現在是拼命的寫，頭往下傾，鼻子差不多已經碰到紙。他非常近視，他戴着夾鼻的無架厚玻璃眼鏡。假如有什麼人正面對他直視（這樣的情形不常有），你會覺得你所看見的不是一副眼鏡，而是一副雙目望遠鏡，在這一頭是兩塊厚厚的玻璃，在玻璃的後面，遠遠的某處，你可以看見一對縮得很小的眼睛；可是假如你從側面看他，而且看到了他眼鏡的背後，你會看見他的眼睛相當大，鼓起來的，帶着紅絲，在眼鏡背後不住的竄動，像關在籠裏的白老鼠似的。全神貫注的工作是很費力的，因此高吉克不由自主的把嘴半開半閉的張着。他的前額上有尖尖的一簇頭髮，本來挺得很直，現在倒到前面來了。每過一分鐘，他的瘦瘦的鼻子的尖端，必定會露出一大滴液體，掛在那裏，搖搖欲墜，好像是跳水家作勢欲跳，可是剛剛要掉下來的時候，他

氣吞牛斗的一吸，立刻像閃電一般，這滴液體又吸了回去，回到高吉克鼻腔裏的玄妙深處去了。

現在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叫他放下工作：他的細小扭曲的字體，填滿了一頁又是一頁。剛才的電話和人民委員馬洛夫的冷冷的聲音，在高吉克的心裏，引起了一點小小的恐懼；可是他還是運筆如飛的寫着，有一種衝動在驅使着他。他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他從來沒有寫過這種東西。他一向在採行動之前（不論是事情如何的緊急迫切），一定先要從他長官那裏得到一張書面訓令或者是特別的口頭通知；不但如此，一定要上面准許了，他才會把別人的請求書就是陳情表轉遞上去；沒有上面的命令，他決不設計什麼，擬議什麼，他決不答應什麼，他無所可否，他從不作任何決定，總之他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等上面的命令。更甚於此者，上面的訓令，不論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他總是澈底遵守，不加絲毫更動，不以己意揣測，而且照原來的命令全部做到；人家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不多也不少。他這種作風，使得很多人都討厭他，他的下屬之中，甚至有不少人是恨他的，還有些機關是要同他們競爭功的，它們的官員也有不少是他的敵人；他看見了反而很高興，反而常常要設法使別人討厭他，這成了他的習慣；他對於下屬很粗暴，因為他知道：人家討厭他就是他忠心的證明，他不致於被猜疑了，別人有什麼陰謀詭計，他不致於被牽涉在內，這樣子反而可以博得有關緊要的人物的歡心。他這種行為方針，配上了他的才具，他的對於小枝節的不懈不倦的注意，他的夙夜匪懈去仔細研究一切紀錄，報告，檔案，文獻——這使得他在他機關裏地位昇得很高。可是這一回，特別的事情發生了，在某種衝動之下，他丟開了他往日的謹慎，他憑着自己的意思做事了。當然，他這樣改變作風，根本上也不是沒有道理；

假如他所提議的辦法，得到上面的恩准，那末他就將一躍而爲人民委員馬洛夫的高級顧問之一，地位大致可和米特金同志差不多，這樣一陞算是很高的了，可以接近克里姆林宮了。但是賀貿然去提議一種辦法，也難免要冒不少危險，所以高吉克同志前顧後，心裏十分緊張，尤其是在人民委員馬洛夫夫親自打了一個電話給他之後。起先高吉克還當這份報告是一種例行公事，但是電話一來，這表示這件事很受人注意，而且很不平常的，人家還迫切等着要看，這件事只能有一種解釋……這樣使得高吉克同志很害怕，他本來一面在寫，一面還在想可以有時間給他修改重新考慮，最後也許他可以謹慎行事，把自己的意思放棄了，呈上去一張完全照官方所認可的路線的純形式的報告。可是他現在做了一半，可以說辦子已經被人抓住了，他因此很害怕。可是，他的計劃他是不能放棄的。

問題是關於兒童心靈的薰陶。對於這個問題，高吉克同志是特別敏感的。關於這個問題，他總想有意見發表，這個衝動他想遏制也遏制不住。高吉克自己有兩個孩子：一個是個白癡，非常敏感的低能兒，這一類型在俄國也很常見；假如高吉克的職位沒有現在這麼重要，這個孩子待在鄉下，憑他的惡作劇的怪聲叫喊，也可以使大家樂一樂。也許因爲是這個孩子的關係，高吉克自信他對於兒童心靈的不守規和它的容易受到惡勢力的影響這兩點，有特別的認識。以前有一次，高吉克同志對於兒童心理學太關心了，以致他做事做得過份熱心一點，那時有一度，他似乎還可能惹禍的；但是非但沒有惹禍，他反而因此得利：在位者注意到他了，在莫斯科給了他一個差使。也許這一次他的憑衝動行事，可以再給他帶來一次快樂的結果吧！高吉克同志自己也沒把握；人民委員馬洛夫的冷冷的聲音並不能提高他的勇氣。

可是這個問題在他心裏橫了已經好久，高吉克不把它說出來是不舒服的。

他已經從每一個角度把這問題研究過。他注意這一件事實，就是某些觀念假如被不懷好意的人放進兒童的心靈裏去，就會像瘟疫一般的傳染開來。他從檔案裏找到很多的例子，可以證明他這一點。他指出來外國的宗教團體對於影響兒童的心靈和想像力這件事，是如何的注重。他引證了耶穌會的一句話。蘇聯當局廢止男女同學，讓女孩子去注意家政，讓男孩子多受軍事教育，這一種賢明的措置，他也提到。可是這問題裏他發揮得頂多的這一點（也就是報告中的核心），是外國動物在蘇聯兒童生活中的影響。據說蘇聯兒童，尤其是農家子女，很喜歡模仿外國動物所做成的玩具。這種傾向以前早已有過詳細報告。非蘇聯產動物的全部問題，是和外國宣傳問題有關的。小孩們聽說了外國所出的奇禽怪獸，就想多知道些關於這些動物的事情，而且也想多知道些出產這些動物的國度；很自然的，因此他們也想到那些國度裏去游歷觀光，因此他們對於「領袖和導師」所賞賜的蘇聯快樂生活，要覺得不滿足。兒童心中所潛藏的這種浪漫主義，一定要在幼年就開始整肅，否則等他們再大幾歲，可以加入「少年先鋒隊」了，工作將趨複雜。因此凡是非蘇聯產動物，若是做成玩具，或是畫成圖畫，甚至在言語中講起，都該嚴厲取締。獅子，老虎，象，袋鼠，都該取締，蘇聯儘有很多好的動物可以代替牠們。為什麼不提倡描繪熊和馴鹿呢？把白熊和駱駝做成玩具，畫成圖畫，這真是替蘇聯在北極區和遠東區的偉大成就做絕妙的宣傳；小孩子假如看慣了豬和牛，可以培養他們對於集體農場的興趣。此外還有莫斯科動物園的問題，該另行討論。動物園一向不受人歡迎，因為蘇聯人有一種慈心的偏見，認為把動物囚禁籠，是不

台人道的。高吉克建議可否限制動物園的游客，只有特種學校裏的兒童才准許去參觀的。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旗幟紋章上的動物形相，幾百年來都是反動封建主義的象徵，習用既久，影響尤為惡劣。即使到了今天，資本主義也採用了封建主義的象徵法，把舊日的動物圖案借用作商標牌記。舉例說罷，獅子就成為帝國主義的象徵，而鷹的圖案（為到鷹的問題，高吉克同志停頓了一分鐘，然後再把它擦掉：沒有人敢說克里姆林宮的上空，永不會再飄揚起沙皇的「雙鷹旗」來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奇禽怪獸的形相，引起無數描寫動物的故事傳說；這種故事都有一種帝國主義的意義，都同征服殖民地國家有關。象，老虎，袋鼠就屬於這一類，代表被征服國家人民的受壓迫，這是不該給蘇聯兒童看的。帝國主義作家吉卜林就是這一種宣傳文學的主要代表。可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對於天生的動物，還覺得不滿意，還要發明他們自己的動物，例如麒麟和龍。假如兒童們習慣養成，想要看獅子和老虎，他們幹嗎不要看麒麟和龍呢？蘇聯假如真有人講起麒麟和龍來，那就是外國宣傳的勝利了。

高吉克同志用這一種筆調一共寫了好幾頁，假如電話第二次不再響；沒有人知道他還會寫多少。高吉克同志舉起聽筒；人民委員馬洛夫冷冷的發怒的聲音，聽得他大為恐懼。

「是的，是的，立刻……」

可是人民委員馬洛夫那邊已經掛斷了。高吉克同志滿口答應立刻來請安的這種話，他已經不要聽了。

高吉克奔到人民委員馬洛夫的辦公室去。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當他躡手躡腳的走進那間長房間的

時候，他蒼白的額角上在出汗。人民委員馬洛夫坐在一張供給委員會開會用的狹長磨光的桌子的上首。高吉克進來，走了一兩碼，又停止了。他的嘴在笑，一下子又不笑了，他不笑的時候，神氣是很卑賤的；他的頭和肩膊不住的僵硬的往前屈，鞠躬是不由自主的鞠得很淺，他的動作還沒有做成像一個敬禮之前，他的頭驀地又收回去了。他的近視眼睛只能看見遠處桌子那一端坐着的肥碩穿黑上裝的人民委員的身形，至於他是喜是怒，心境如何，用意如何，他可看不出了。

人民委員馬洛夫舉起一條沈重的手臂。看到這個記號，高吉克搶步上前，一面走，一面還不由自主的點着頭，一下子笑，一下子不笑。人民委員馬洛夫是個肥漢，他的一身黑色俄式上裝蓋住他的肥胖。他不掛勳章，也沒有符號，只是身段中束一條寬黑皮帶，穿了一雙黑色皮靴。他有一個圓圓的孩兒臉，面上鼓起不少痤瘡疙瘩。臉雖然是個孩兒臉，看上去已經不年輕了；這一種的臉有時候在兇橫的瘋人中間也可以看見；只是人民委員馬洛夫有一種很自然的志得意滿的表情，既沒有受驚擔怕，也沒有鬼祟閃避的樣子；他另外有一種狡猾和冷酷的表情，這是青年人所不可能有的。使高吉克頂害怕的是人民委員馬洛夫的眼睛；肥肉中間圍着的黑黑的小眼睛，絕對的殘忍，遠離一切感情，也不爲任何思想所左右。每當這一對眼睛落到高吉克身上，他就全身戰慄，頭開始點起來，兩隻手在胸前緊緊的抓住。人民委員肥肥的手伸過來，高吉克把寶貴的報告塞過去，一面這樣做，一面覺得好像他一舉手之間，已經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給別人了。一切都完了，高吉克的靈魂在叫，一切都完了。在喀茲培克斯坦一條未完成的運河要等他去掘，——這個景象掠過了他的腦海。

人民委員馬洛夫同志拿起文稿一看，當他看見這是用筆繕寫，而不是用打字機打成，臉上很明顯的露出一點驚奇之色。他慢慢的把頭抬起來看看高吉克，然後再低下去看那份文稿。他把第一頁讀完。他把其餘各頁翻過，再看看文後作爲附錄所附上的一本圖畫詩歌的簿書。他的眼睛再抬起來——那對黑黑的殘忍的眼睛——再對高吉克看着，仔細的看著，好像高吉克是人間的一個怪物。他看了高吉克幾秒鐘之久，然後再開口。他的聲音很柔和。

「這是什麼？」

聲音這樣文靜，高吉克知道大禍將臨，立刻頭亂點，手亂擦。

「這是什麼？」

人民委員馬洛夫再問一遍。他的肥手把這張紙一把捏起，報告立刻彎折扭曲，好像捏在他手裏的就是高吉克的苦難的靈魂。

「你以爲你在幹些什麼！你在跟我開玩笑嗎？你在作弄我嗎？高吉克先生？」

「不，不，不，」高吉克氣喘吁吁的只能說出這幾個字。馬洛夫正式的稱呼人爲「先生」，好像是替他判了死刑。

「這到底是什麼？」

這份報告，送上去時間沒有湊好，現在已經團纏得不成樣子，飄飄的落在桌子上。

「我要知道的，他在同什麼人陰謀搗鬼，你給我這個算是什麼意思？」

「陰謀……」高吉克結結巴巴的說。

「是的，一個外國的陰謀，高吉克先生。」

「我不知道……因為你當初沒有說陰謀……我還以為……」

人民委員馬洛夫對高吉克看着。高吉克聽見自己的句子在耳邊響着，就像聽見喪鐘一般。當時一剎那他忘了他的身份是不能替自己辯護的。按他的身份，他只許靜聽認錯。替自己辯護，好像是把自已指明是通同犯罪的。他已經看出來，猜疑之念已經進了人民委員馬洛夫的心頭了。

「你不知道！高吉克先生，我們的任務就是詳細細細知道外國人的一舉一動，這還得要對你說嗎？」
「是，是……」

「也許你還不懂得，高吉克先生。也許你以為叫你給這個外國人寫個報告，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個外國人正串通了莫斯科的幾個俄國人，在進行着一種陰謀，也許你不懂這個情報的意義吧？也許你以為這是我平平常常聽來的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吧，高吉克先生？尊意就是如此吧？高吉克先生？」

當他講起他情報的來源，人民委員馬洛夫的孩兒臉氣得變了樣，成了猙獰可怕的怪相。

「不，不，我是錯了，」高吉克只能喘出這幾句話來。他顯得十分卑屈：頭往前伸，嘴張開着，眼睛瞪了出來。

人民委員馬洛夫身子一半轉了過去，不去看他。

「高吉克同志，」他沈思着。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似乎在動腦筋，淡淡的一點也不帶什麼感

情，這種語氣使高吉克聽來更爲懼怕。「高吉克」，「高吉克」。我們哪兒把他找來的？誰把他介紹進來的？」他的聲音一變，更帶了一種新的殺氣。「也許你在葉速夫同志時代就在這兒的吧？」他說。

「不，不，」高吉克喘着氣說。「我是從車里雅賓斯克來的。」

人民委員馬洛夫再對高吉克看看，他的明亮的黑眼睛注意到他的不由自主的動作：高吉克嘴角邊上已經流出點點白沫了。然後他慢慢的說：

「如，關於這件事，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這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發生，可是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從最高當局那裏知道：這個外國人在從事陰謀活動，可是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所有的就是這個，這個……」

人民委員馬洛夫舉起一隻肥肥的食指，敲打着這疊已經壓皺捏爛的文稿和本薄薄的附錄。

「也許你覺得你想改換一下任務了吧，高吉克先生，」他溫柔地說。「上前線去服務一下吧，嗯？」高吉克點點頭，絞絞手，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你在這裏太閑散了。沒有什麼事情做。這跟動物有什麼相干呢？我們要管什麼動物呢！」

「那個外國人……」

「啊，他們都是一樣的，那些小布爾喬亞的外國人。你還不知道他們都愛養狗的嗎？」

馬洛夫像一個小天使那麼的笑着。

「他在跟些什麼人來往，快替我找出來。我今天晚上就要知道。」

高吉克差不多是奔出他的辦公室的，人民委員馬洛夫看着他的神情，心裏頗覺安慰。高吉克其人很可信任：他覺得高吉克靠得住。

他剛才把事情故意誇大了說，他覺得很滿意。這不是一件大事，可是這件事他不能一下子搞清楚；這件事他當作是一件測驗；當初人家把這情報告訴他的時候，那種譏諷刻薄的笑容，他覺得很難受的。當然，那人就是薛別雅可夫。只有他所受的聖眷隆盛，才會這樣。哦，薛別雅可夫憑他的「情報局」也已經自己搭起線來了。或者這是外交部的代加諾索夫嗎？或者是航空部嗎？現在是軍隊高於一切了。好吧，他要等着瞧。到底誰對於神聖的祖國是頂真心，頂忠實，頂謙卑，頂服從，將來事實總要表明的。

那一刹那之間，人民委員馬洛夫把他的恨意轉移到克里姆林宮北門口的信箱上去了。一定又是一個寫匿名信來告密的。很快的，立刻把這種感情又打消了。

他把高吉克的報告檢起來，把捏皺的文摘再慢慢的讀着。報告裏有幾段意見是可以採納的。薛別雅可夫不是辦了一個幽默刊物叫做「鱷魚」的嗎？

他把那附在報告後面的一薄本詩歌圖畫的書檢起來。他自己思忖了一下。「他」看了會不會覺得有趣呢？他把書裏的內容看看，看看圖畫，看看那些引起高吉克的靈感的那些動物，看看螳螂，看看麻雀。他知道這本書是以前出版的，對於他的腦筋，並不起什麼印象。

他把書擱在一旁，預備歸檔保存。

總之，「他」也許不會覺得有趣。有時他覺得不有趣，他看起來來另外有種看法的。可是高吉克有些主張倒可以用的。

第二十七章 安娜的結局

福開森的故事

我在伏克洪加路上近美術館處，遇到了米德迦。我們向前走去，過了列寧公共圖書館。我對於這個圖書館和它的浮誇的近代化的門面上部裝璜，有一種惡感，因為有一次我想進去，給人家攔了出來；我想去弄一張書面許可，進去參觀，也到處弄不到；我猜想這是因為裏面藏書四百萬冊，現在大部份都成了禁書。我問米德迦爲什麼似乎沒有人走近這個地方的。

「書都不在了，」他說。他聳聳肩膀。「婊子養的。」

他開始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他知道是一位教授，專收藏禁書——一切舊的黨規黨綱，還沒有經過修改的，一切舊日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一切一九三八年以前出版（現在可已成了不合法）的黨報，一切違禁作家像巴必爾（Babii）和好幾十個別人的作品：這位老教授似乎專心一意的收藏這一些，他正預備做一個經久耐用的大袋，把這些東西放進去，然後深深的埋在地下，等後世來發掘。我想這個故

事同米德迦許多故事一樣，是靠不住的，可是很流行。我不相信書全不在了；也許因為怕轟炸的關係，給撥開了。我想起這一點，因為大學堂的彈痕累累的校舍已赫然在目。我們已經穿過上次我在那裏被捕的伏慈狄申加路——那是什麼時候？四五個晚上以前了——我們已經沿了摩訶伏耶路走了一段，過了舊日沙皇的騎術學校，現在我們正在大學堂的面前，赫榛 (Herzen) 氏石像被炸裂的碎片，還散得一地。大學堂的受彈傷的門面，他們已經用三大幅人像，給遮起來了。人還是這麼三個，一個是絡腮鬍子，一個山羊鬍子，一個是兩撇黑鬍子。

米德迦說我們應該去坐地底電車，所以我們靠革命廣場莫斯科大飯店那邊穿過去。抬起頭來，往紅場那邊看看，我見成堆的紅旗，在牌樓上面飛舞飄揚。我那時想起了，我們已經接近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的前夕（他們現在是根據新歷在十一月七日那天慶祝）。當我們走近史惟特洛夫廣場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已經陳列出好些人的肖像，每張都有一幢房屋那麼大。人都在那裏：老一輩的人，不用說，那些所謂「老銀鼠」；可是新人也在那裏，那些年紀比較輕的：日丹諾夫，馬林喀夫，薛雅雅可夫，伏慈奈申基，克魯昂夫，還有那個兇惡惡的胖胖的馬洛夫，他的臉我不知怎麼的看見了，就討厭，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也同他毫無關係。那些年輕傢伙看上去都是兇狠得很。他們可真是兇狠。全世界恐怕沒有人比他們再兇狠的了，連德國人也不行，因為德國人那一套是後天培養的，可是這些俄人是天生的兇狠，不用費力氣的兇狠，因此他們不會走錯路，而且因此常常合乎邏輯的。我們常講起他們。史密斯說等他們的老板一死，這些年輕傢伙要來一個自相大殘殺——恐怕將是歷史上最大的持久決死戰。無疑他

們現在是互相猜忌的——這很多人都知道——每一個人人民委員會有它自己的權力，他們的老板能把這種政治推動，也許也就憑了這一點。但是這種預言會不會實現，也很難說：一種神秘的力量會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因為發明那種神秘力量的人的頭腦，比他們的高明。而且把各種不測的因素都估計一下，他們之中誰敢說能比他們的老板壽命活得更長呢？大家都這麼說，喬治亞人都是享高壽的，即使他們腳上生瘻，手臂殘廢了，還不會死。

當然囉，除非有人來把他幹掉。這個想法，不是沒有人想起，前前後後，總有一兩千萬人想這麼幹一下，就是他們的相片大大的掛在那邊的那輩忠實同志也難免沒有這種想法。可是他還活着，國家在他身上罩上一層光華，他好像是成聖成神似的，可是他從來不行險僥倖，從來不碰運氣。鮑立斯有一次是怎麼說他來了？他說高加索各部落間本來互相仇殺，一個高加索山地人能夠長大了出去流浪，小時候已經有一百次死裏逃生了：我們可以想像他睡在山邊上，毯子蓋上，敵人悄悄的爬過來，刀子舉起，那時他會本能地覺醒，同時他立刻先下手為強，打得快而又打得準。可是假如別人先下了手呢？情形會有什麼不同嗎？我看看這些陳列出來的照片，我不會相信這個國度假如換了主人，國內情形會有什麼大的變動。

我們進了地底電車站，擠上了活動電梯。我站在那裏，我們的梯子輕輕的下去，同時我看着另外一邊的人，他們的梯子正在輕輕的上來。在任何國家裏，你把他們的人民來細細的視察，總是很有意思的，可是在莫斯科，看他們的臉一個一個的昇上來，前前後後，套成一幅代表俄國國民性的圖畫，看起

來特別有趣。他們在往上昇，眼睛看着太空中某一點，他們身體的緊張暫時放鬆了（爲此他們是覺得感激的），他們這些就是俄國人。裹着圍巾的女人，乾瘦的老太婆，瘦瘦的軍人，穿着制服的胸部豐滿的農村女郎，戴着脫毛的皮帽，蒼白臉瘦細的老頭兒，高顴骨和骨溜溜的眼——這種臉型本來是當年地主的，光滑的圓臉的官僚們，像祭司似的黨員們，衣服收縮臉容尖瘦奔奔跳跳的小孩子們；所有這些人的臉上都有一種疲乏衰竭的神情，可是同時也表現一種不顧一切矢志求生的意志，這一種的表情只有在俄國人中間才看得到。

米德迦粗手粗腳的打斷了我的思潮。月臺上擠滿了人，電車進站，人都往車門上擠。我曾經坐過倫敦的，紐約的，和巴黎的地底電車，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爭先恐後的混亂，而莫斯科在這時候是夜如此的。下車的客人非得拼命殺出一條血路不可，用膝蓋，用皮靴，用肩膀，用手臂，連踢帶撞的才能在想衝上車的客人中間開一條路。在上車下車客人掙扎之際，各人只好顧自己，假如有什麼女人撞倒了，踩在腳底下了，現在用手用膝在月臺上爬了，人家也不屑去一想的。我本來想站在一旁，不料米德迦用他全身之力，從後向我一推，推得我兩腳騰空，也擠到人堆裏面去了。車子的門剛剛要關上，米德迦再一使勁，在我邊上擠了進去。我們在車子裏，東搖西擺，好像掛在上面的一包東西似的，下頰抬得高高的，好多吸些新鮮空氣，可是周圍臭味撲鼻：沒有洗過澡的身體，發有霉臭的衣服，「麥霍加」，是的，還有大蒜，每到一站，又得拼命掙扎，身後的人如潮湧來，一不小心，就會給他們衝下車去。最後，到了一個站，我覺得米德迦扯扯我的手臂，正好門又快關上的時候，我跨下了電車。我想這該是邁

可夫斯基站，因為四周有很多不鏽鋼，可是我不敢確定。下車的人潮把我們帶到前面，我們爬了幾層臺階，走入黑夜之中了。

「噓！」我說，「總算有一點新鮮空氣了。」

「婊子養的，」米德迦說。他是用俄文說的，我知道他的意思叫我不要開口。

我覺得他的手扯住我的袖子，我就跟着他走。很快的我們離開了車站附近的人羣，我們現在所走的那條街，我是不認識的。我們在車上的時候，黑夜已經來臨，現在在黑暗之中，天氣是冷而不舒服。米德迦不作聲。他走得比上一次快。也許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四面沒有一點標誌是我所認得的，我想我們所以去坐地底電車也許是一種策略，假如有什麼人在跟踪我們的話，這樣也許會使他們跟不上。可是無論如何，我可沒有把握，我們一向搭車總是挨着最後才上，最後才下，地底電車人太多，我們上下不由自主，難保沒有人跟蹤。我們大約步行了一公里，米德迦突然停住，我差一點踩上他的腳後跟。我們在一個門廊底下站了一會。我傾耳細聽，可是沒有腳步聲向我們這邊走近來，米德迦攙了我的手臂，我們匆匆走過街去，走到一個門口，那是我認得的。我跟米德迦進去。他也不打門，也不叫喚，只是很快的順了狹過道走去，進了那間小房間。

這一次，屋裏沒有燈。裏面熱得很，有剛剛煮過菜的氣味，煮過麵的氣味，又是「麥霍加」的氣味。小爐子點着火，借鐵格子裏發出來的淡淡的火光，我看出了蘭吉。她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所以我只看見她的白手臂和她的喉和臉。火光暖和她往上照，映出了她的圓嘴唇的笑容和她的大眼睛。

我咕嚕了一聲，打了一個招呼，蘭吉照樣回禮。

她拿了我的帽子大衣去放好。我的眼睛慢慢的看得清楚了，我在黑暗之中看見了那個美國女人瑪莉·安得森和那個叫做格萊哥的漢子。他們沒有同我打招呼。可是我沒有看見那位和霽可親的麗莎維德。我來就是來看麗莎維德的。我本來計劃好要把楚客夫斯基的那本書的事情告訴她，可是我已經來到這裏，我想頂好還是下一次再談吧。

我問蘭吉：麗莎維德是不是快要來了。

「是的，快來了。」

我覺得空氣中有點緊張。我覺得發生了什麼事了。我坐在那裏要細細的體會到底變化出在那裏。我仔細的看看瑪莉，可是她的頭俯倒了，我所能看見的只是她的緊緊的一束金髮。屋裏雖然黑，她的十指還在靈巧的做編結工作。每隔大約一秒鐘，她的骨針就要發出「克立，克立」的聲音——在這屋子裏也只能聽見這一種聲音，我聽起來心裏很覺煩燥。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康脫威爾·史密斯所講的美國官方對於瑪莉這種人處境的態度，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她。這種處境是一點希望也沒有的。我想她也許在指望着我會給她一線光明，替她的小孩子找條出路。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不能把史密斯硬心的話再說一遍；勸她去找大使館也是白費。無疑她現在是根據我的默不作聲來替自己找一個解答，也許她把我同她自己國家的駐俄外交代表看作一鼻孔出氣的，她既然恨他們，她也許也恨我。她所以不抬起頭來看我，道理也許在此；我懂了她為什麼只是把頭低着，看那看不見的編結物；我懂了她的手為什麼運用得

這樣緊張，爲什麼她什麼話也不說，只有她編結針儘自發出「克立，克立」的聲音。

爐子裏的火光忽然跳動了一下，隔了桌子我看見格萊哥的閃閃的眼光：兩隻大的菱形眼睛，中間相隔距離據我估計有兩吋。火光照了上來，他的眼睛慢慢的映着，就像牛眼睛一般。

「你最近去看了戲沒有？」

蘭吉說。「看了。昨天我去看了『鮑里斯·戈特諾夫』。」

「啊，看了這個戲，你該明白你們外國人給我們多少麻煩。」

「不完全是我們的錯。」

「當然不是你們的錯。」

討論文學思想的談話，今晚上很快就完了。討論這個好像很不對勁似的。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在俄國的外國人大多有同感的），就是剛才我一進來好像打斷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談話似的；他們也許在開一個秘密會議，一個秘密小組會議。已經到了嘴邊的話，現在因爲我來了，也許永遠不會再說了。這是我的一個印象。

「令郎那邊聽見什麼消息沒有？」我說。

「我的兒子！」

「我想你也許聽見什麼消息了，」我說。

「沒有消息。」

我希望麗莎維德快點來。我希望米德迦也開口。我突然覺得這間小房間缺了麗莎維德或米德迦，跑來就毫無樂趣了。因為我已經答應好了維姐莉亞，在戒嚴之前，同她在我的房間裏見面。

我轉過去看看米德迦。我叫他把伏特迦酒從我的大衣口袋裏掏出來。米德迦站起來，走出去了。我等他回來，可是他回不來。我開始覺得情形不妙。這樣的沉默使人很窘。我開始在想他們也許有什麼事情要反對我，也許我給他們帶來了什麼麻煩。我想可能就是那本蟑螂王。蘭吉不知道這本小書和電影劇本的下落呢？我不知道麗莎維德交給我的時候，是得到蘭吉的同意的，還是她一個人偷偷的做的。無論如何，我答應過不同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所以我現在不能把這件事提出來。

我開始覺得坐立不安。房間外面有匆忙的脚步聲，我猛的跳了起來。可是來者就是麗莎維德。看見她我心裏立覺輕鬆。我看出來，別人也活潑起來，不再那樣悶悶的坐着了。他們對她看着，好像等什麼消息似的。

她很快的用俄文講了幾句話。然後她拿起我的手，握了一握。

「看見你真高興，」她說。「這個時候你來，我真感激。」

「看見你也高興，」我說。「我剛才很擔心。」

「沒有什麼，」麗莎維德說。「莉娜真了不起。她簡直像他們的媽媽。」

「哦，」我說，「誰是莉娜？」

「他們沒有告訴你嗎？」麗莎維德說。

「沒有，」我說。「沒有。」

「哦，」麗莎維德說。

蘭吉用俄文很快的對麗莎維德說了些話。麗莎維德再回轉來看我。

「哦，這事很不幸，」她說。「我們一個鄰居送進去了。」

「怎麼呢？」

「我們的鄰居安娜，她同她的一家就住在這幢房子的地窖子裏，」麗莎維德說。

「她病了嗎？」我說。

「沒有。總算還好，」麗莎維德說。

「她是給恩·凱·章·代捉去的。」蘭吉說。

「哦。」

「是的，真是這樣，」麗莎維德說。「隔壁街上一個女人告訴我們的。那人同安娜在一個工廠裏做工。她們不在同一部門工作，可是她從一個跟安娜同一部門工作的人那裏聽來的。今天安娜在工作的時候，突然大喊大叫。」

「這是歇斯的里亞病，」我說。

「歇斯的里亞！」蘭吉說這個字的時候，神氣十分的瞧不起我的看法。

「安娜開始叫喊起來，她說就是德國人來了，待老百姓也不會這麼苦。她又叫着說『他』該槍斃，

她咀咒『他』的名字，後來他們就把她逮去了。」

「可憐的人，」我說。「他們要拿她怎麼辦呢？」

蘭吉開始說了。「什麼時候他們才懂得我們是人。他們才不要拿我們當牛馬，當機器！一切爲了祖國！一切爲了黨！一切爲了官僚！犧牲！犧牲！犧牲！工作！工作！工作！拿我們的血肉去補償他們的愚笨的錯誤！無疑『他』的名字人們是要咀咒的。這是一個該天打的名字。」

我不說什麼。

「他們的下一步是什麼呢？」蘭吉說，很安靜地。「刺激工人做工的，先是理想；後來是宣傳和各種諾言；再後來用錢了，工資有高低，差別比你們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大；再後來便是競爭：斯塔霍諾夫工作法，社會主義工作競賽那一套；現在可是用飢餓和恐懼來鞭策工人了。下一步是什麼呢？會是排猶太人運動罷？」

「不會的！」我說。

「天真的外國人呀。」蘭吉的諷刺很兇。「你知道不知道布爾什維克黨人總被認爲是和猶太人一二，二而一的？賣國賊托洛茨基就是一個猶太人。一九三七年，在烏克蘭，審問官一面打他的犯人，一面叫道，『招認罷，猶太人！』」

「那麼特伐德的大屠殺呢？」

「完全是造謠。你四月裏在這裏吧？」

「不在。我們都搬到庫壁什夫去了。」

「啊，四月裏，正當猶太人過復活節，莫斯科滿街是謠言，說要殺人祭神。你聽說過這件事嗎？一個女人的小孩子丟了，她根據他的衣服碎片的線索，衝進一間屋子裏去（這幢房子離這裏還不遠呢），她看見一個瘋婆子在她爐子上煮東西吃，煮的是一個小小小孩的肝和心。」

那個美國女人猛的抽一口氣，顯得非常痛苦。我很快的對她看看，我看見她在哭。

「啊，我告訴你，在那一個月裏，小孩子都關在家裏不讓出去。莫斯科到處是謠言，因為我們沒法知道什麼是假的，什麼是真的。可是在莫斯科並沒有專爲了放謠言才去造謠言的。」

「也許這來源就是從列寧格勒人吃人的報告那裏來的，」我說。

「我告訴你，」蘭吉說，「在紅軍裏充滿了排猶情緒。假如人民的火氣怒氣和怨氣，非出不可的時候，政府會犧牲一部份官吏供他們出氣的，這一下又得是猶太人倒霉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小房間裏的空氣很緊張。麗莎維德很悲哀的低下她的頭。瑪莉已經停止了她的編結。一點聲音都沒有。蘭吉又開口了。

「在我們國裏，」蘭吉說，「現在逢到一切適當的場合，都得要小小的禱告一番，這成了規矩了。兒童們每天早晨在上課之前就得做這一個小小的禱告。讓我們一起來把這個禱告唸一遍吧。」

「不，對不起，蘭吉，」麗莎維德說。

「感謝領袖同志給我們這個快樂的生命。」蘭吉的聲音裏又充滿了憤恨。「安娜送進去的時

候，一路之上就該唸這個禱告。」

「你們的鄰居安娜將要怎麼樣呢？」我說。

「她要被送到東方某處去。送到一個集體農場去。我知道，因為他們剛剛有人來取她的行李。可是事實上她沒有什麼行李可取。頂困難的問題是她要餵一個小孩吃奶。」

「她有孩子嗎？」我說。

「一共四個呢，」麗莎維德說。

「她的丈夫呢？」

「她剛聽到他已經死了。他是受傷死的。可是她家裏還有一個老婆婆，別一位鄰居可以幫忙她餵小孩。她們家裏的大女孩莉娜，可以照看她們一家。」

麗莎維德的臉上又發出光彩來了。

「總而言之，」她說，「情形還不太壞。假如他們把她的小孩子同她一起送走，那就要糟多了，她怎麼可以在喀什克斯坦的一個集體農場裏餵小孩子呢？」

「你說他們就這麼把她送走，一點也不顧到她的小孩子嗎？」我說。

蘭吉笑了。「你以為他們還會注意這種小事情嗎？你這個外國人，還有這種人道主義的想法！你以為在唯物主義哲學裏面，還有地位留給感情作用嗎？」

「在伏爾迦河一帶，情形是不太好，」麗莎維德說。「昨天有人從喀山來，他告訴我那邊的飛機工

廠有三萬個工人，可是每天只有兩百分的麵包。他說很多人因為飢餓，肚子腫了起來，就在他們的機器旁邊倒了下來。」

「德國人把伏爾迦河的接觸線切斷了，這消息是確實的，」我說。「我們聽倫敦廣播聽到的。」

「在莫斯科就好一點，」麗莎維德說。「在莫斯科一直總比較好一點。」

「什麼地方有官老爺的，總比較好一點，」蘭吉說。

「我很替你們的朋友安娜難過，」我說。

「他們把這個叫做『防疫逮捕』，」蘭吉說。

「在俄國沒有人身保護法，」我說。

「防疫逮捕是一個好名字，」蘭吉說。「意思就是說：毛病沒有傳佈以後，他們就下藥了。」

「歇斯的里亞是可能傳佈開來的，」我說。

「呸！歇斯的里亞！他們所害怕的不是歇斯的里亞，而是這一種的思想。在這思想跑到別人的腦筋裏去之前，他們非得把它撲滅不可。否則的話，人民可能找到他們的自由的。」

我覺得蘭吉有點神經失常了。「好吧，」我說，「現在情形是不太好了。德國人可能打勝的。」

「你這個外國人！你專替恐怖辯護！只要這種事情不在你們國裏發生，而在這裏發生，你總是喜歡的。現在好吧。你看我們，當我們好像是個土人國家的人民，當我們是些野蠻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恐怖來統制。這樣使得你很高興。你覺得自己很優秀。你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看上去就很大了。我們

是失敗了，你們便是對的了。」

這樣一連串的爆發，我不知道該怎麼答覆。

「你們把我們當作野蠻人，那是你們的錯誤。當你們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了，你們將要過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難關的時候，你們就要想把你們的國家弄得跟我們現在的情形一樣。那時候，這問題也變成你們的問題了。」

我不說什麼。突然蘭吉看出我在她攻擊之下的窘相。她笑笑，向我靠近，伸手放在我臂上。

「別理會一個老太婆的事，」她說。「這是一個防疫逮捕，如此而已。」

我看出了她話中的意義。

「可能不可能，」我說，「他們會，譬如這麼說吧，會來追究疫病的來源？」

蘭吉笑了。「現在你懂得我們周圍的鬱悶了。當然會，因為在我們國內，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倖倖的。」

我想了一想。「你們的隣居安娜是個智識份子嗎？」

「不是，」麗莎維德說。「她是一個蘇維埃工人。很結實的女人，你決想不到她會垮的。她除了領孩子以外，別的什麼興趣也沒有。」

「那末……」

「你又太天真了，」蘭吉說。「你看見沒有？他們決不相信人會有自己的思想的，他們決不相信」

個平凡的女人憑了她自己天生的觀察力和推理力，也會得到一個結論的。從他們看來，每樣東西一定從別樣東西發生的：有花必有種子：因此安娜在無可奈何之中所表達的思想，一定是有某種影響或是宣傳先灌輸到她的腦子裏去的。」

我得要細細的想一想。

「那就是說，」我說，「他們要調查安娜的環境了。」

「不錯。」

「他們可能把四周鄰居每一個人都調查一下。」

「正是這樣。」

「這對於你們很不利。」

「對於誰都不利的。可是一下子可能還不會來。他們很忙。」

「我懂了，」我說。「那末你們同一個外國人來往，就顯得不大妥當了。」

「不，不，」麗莎維德說。「沒有關係。不要擔心。沒有事情。」

我弄糊塗了。我又想起來了，麗莎維德最後一句話，恰好表示他們因為我來了，都弄得不知所措。而且這間小房間裏空氣仍舊很緊張。格萊哥和瑪莉都沒有開口，蘭吉滿口氣憤話，也不是歡迎我的表示。我因此很快的起身告辭，說我另外有個約會。麗莎維德堅持要米德迦陪我一程，送我到城裏我認得回家的地方為止。

我說了聲再會，重新走回寒夜之中。

這是一個昏冷的黑夜。一絲絲微光都看不見，冷氣打在骨節上，好像是醫院裏的冰袋貼上去一樣。我走出那幢房子，往前走，對於莫斯科又起了一種愁悶的感覺：那種孤獨，那種寂寞。我愁悶的根源，是我爲了那本小書而起的良心的責備。

米德迦緊緊的抓住我的臂，帶我繞過街上的許多雪堆。走了幾分鐘，我才覺得他有點醉了。

「米德迦，」我說，「我的伏特迦還有沒有？」

他也不作聲，只是用力的抓住我胳膊上的肌肉，緊緊的抱住我，重重的在我的雙頰上吻了兩下。

這是一隻熊的擁抱。我覺得他的力大非凡；我覺得他的毛糙的臉貼在我的臉上；我聞到了伏特迦酒的濃烈的可是暖和的氣味。

「你是一個漂亮的朋友，」米德迦說。他是用俄文說的。然後他記起他的英文來了。「婊子養的！酒在這裏！」

他從他的口袋裏把酒瓶掏出。我聽見他在搖，聽見他在拔木塞，我接觸到瓶的光滑表面：他在把瓶塞進我的手裏來。

我喝了一大口酒，立刻覺得好多了。我要的就是這個。我把瓶交給米德迦。他牢牢的一把抓住，放到嘴邊，我聽見他重重的在喝着。然後「拍」的一聲，他把木塞插好，瓶仍舊放回他的大衣口袋裏，他把我的臂膀抓住。我們繼續往前進。

「今天晚上，」他說，「老子加入紅軍了。不錯，是我去自動報名的。」他拍拍胸。「老子米德志願上前線。」

「真的嗎？」我說。

「糊裏糊塗像個大王八！這就是米德迎。」

「這是你的義務，」我說，「別說那樣的話。」

「漂亮朋友，你的話有理。當兵是人的義務。光榮的。偉大的。是不是？」

「可是也有收穫的，」我說。

「他媽的收穫！」

他停住了。他要同我講機密話了。他湊到我的耳朵旁來說話。

「該是這個時候了，是不是？明天，也許再隔一天，許多恩——凱——韋——代傢伙要來麻煩了。今天上前線正好，嗯？」

「你以為情形就這樣嚴重嗎？」

「嚴重？他媽的嚴重。前線好多了。」

「你是打着『懲誠大隊』的鼓聲上前線的。」

「啊，你也知道『懲誠大隊』了。你是個聰明的間諜，我早就說了。」

他又挽住我的手臂，我們一面走着，他一面唱着歌。我怕警察出來干涉。

「你要叫他媽的憲兵來干涉了，」我說。

「他媽的憲兵，糊裏糊塗像個大王八，」米德迦說。「他們不懂事。我喝醉了，我什麼話都說。是的，我連老頭子都罵。什麼都說。他們也不管。踢我的肚子，可是說什麼話他們不管。可是我要是沒有喝醉呵，他們不踢我的肚子了，他們送我上西伯利亞。是的，糊塗得像個大王八。所以，我總是喝醉的。你喜歡伏特迦嗎？」

他又站住了，對我望着。在黑暗之中，我看見他在冷笑。

「是的，我喜歡伏特迦，」我說。

「漂亮朋友，」米德迦用俄文說。他又把我雙臂抓住，按在兩旁，在我每邊頰上重重的一吻。

「你要在俄國待久嗎？」

「我不知道，」我說。

「走吧，漂亮朋友。俄國是個悲哀的國家。等到情形好一點，再回來。快走，快！外國人在俄國待久了就不走了。快走。」

我們把伏特迦酒喝完，米德迦把空瓶擲到雪裏去。我們現在成了生死之交了。

我們再往下走。我想我們是到了吐威斯克大道的某處了。米德迦緊緊的握住我的手臂。他在唱着歌。

當我們到了吐威斯克耶路的時候，他突然停步了。他又重重的吻了我兩下，站在一傍，把腰幹挺

直，畢恭畢敬地行了一個敬禮。

「再會。」他說。

然後他向後一轉，大踏步走開了。我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也許是到一個紅軍兵營去。我想。好吧，我丟了一個朋友了。可是他沒有關係。他是所謂「福將」一流人物，他上前線去，你儘管可以放心。他本來是「觀光局」的一個司機。他在別處也可以找到一個閑差，不是伙夫，便是軍需。我非常喜歡他。不管你對俄國人的意見如何，總有幾個俄人你是心嚮往之的。

第二十八章 擇地而死的悲哀

瑪莉·安德森的獨白

我現在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

我以為再也看不見他了。可是他來了。他們不知會怎麼想？他們爲什麼讓他來呢？他到我們這裏來，使我們人人蒙受嫌疑，我尤其難免，因爲我也是出身在外國的呀。他不能幫助我什麼。他根本不理我。他就同別的那些人一樣，心裏篤定，洋洋自得，看着我，心裏在想，「你嫁給了共產黨，活該！」我討厭他這種神氣。他們這班人，我都恨。他們把人家攪得心神不寧，替人家找來了憂慮煩惱，何況他們還是老是在暗算我們！我本來以爲這個傢伙不會再來了。我自以爲是看準了的。可是他還是來了。怎麼會讓他來的呢？

也許他們在釘他的梢罷？也許他們要調查他的行蹤罷？

哦，天哪，我早一點怎麼想不到這一層呢！

現在又出了安娜這件事。他們將要以爲安娜是受了我的影響。一切猜疑都要落在我的頭上。他們會決定把我送走。那末小羅勃和小約翰將要怎麼辦呢？他們要留在後面，安娜的小孩不是也帶不走嗎？所以，假如他們把我帶了走，小羅勃和小約翰就要成爲流浪孤兒，同成千成萬個別的流浪孤兒一樣，流浪街頭討飯吃，坐火車這裏流浪到那裏，然後警察帶了警犬來圍捕他們，把他們先關在囚犯營，最後送去做苦工。哦，天哪，我該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該辦的就是搬出這幢房子。我一定得離開這幢房子和這種空氣。可是我已經同別人說起換房間住，沒有換成。房間再壞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不挨着這條「官道」就好了，可是沒有人肯同我換。沒有人願意住在一個地方老是有入監視，每個月身份證上還要蓋一次印。在莫斯科要租房子是租不到的，只有上代死了，下一代去承繼；或者是同別人去交換。所以事情這樣麻煩。當我問這裏的公寓管理員不知道有人要換房間的沒有，她已經起了疑心了。她會想到我爲什麼要搬開這裏。可是她不是一個壞人，雖然她替每人都打小報告。她最喜講長講短，所以我想她可能聽說過什麼人要換房子的。

她說住在『官道』上也不一定是不利的。她講給我聽，有一個女人，同她的弟弟合住一室。他們的雙親死了，房間就歸他們承繼。弟弟是個軍人，有個女朋友。女朋友待他很好，他要報答她，因此他去前線的時候，他把他房間的那一半讓給他的女朋友。可是姊姊不願意同弟弟的女朋友一起住，尤其是假如弟弟在戰場上捐軀，她們兩個人要一輩子住在一起了。因此她來找我們的公寓管理員，她們兩個人就商量好，她把原來的房間讓出，改租我們這幢房子裏的一間——衝着『官道』這一面的一間。她的弟弟

的女朋友一看，搬到這間房子來住，老是受到秘密警察的注意的，她寧可放棄權利，讓姊姊一個人住了。

公寓管理員說他們特別小心，因為莫斯科壞人太多。她說搶案也有不少。就在隔壁的那幢屋子，一天晚上來了一個漢子，提了大棍，把一個女人的麵包配給證搶走了。他們所要搶的就是這個：麵包配給證。公寓管理員說，做這些事情的都是軍隊裏的逃兵和罪犯，他們的身份證是從死人身上偷來的。要偷身份證也不難。很多人生着肺炎，肺癆，和別種病症，隨時可以死去。斑疹傷寒也很流行。醫生總不肯承認，只說是瘧疾，可是這種話只是預備編統計之用。醫生說醫院裏收容不了病人了，因為都給傷兵住滿。誰都沒有藥，很多人害白喉這一類的病也都死了，人死了，家裏就把死屍停在牀上，用死人的配給證去領東西吃。他們把死人蓋起，看上去就好像睡着了一樣。現在天氣這麼冷，死人很快就會凍僵，不會發臭味。在我們附近的一幢房子裏，現在有十個死人。有些人是幸運的，她說，因為他們都在月初死的，今天才十一月六號。到了月底，要領到新配給證了，死者的親屬或是管理員，就得把死人報上去，因為死人不能爬起來，到登記處去領配給證的。有時候活人也可以冒充死人去領。管理人的責任就是要防止這類事情發生。據說去年冬天在列寧格勒，剩下沒有死的就是些房屋管理員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那裏還換得成房間呢？假如我換不成房間，我怎麼能離開這個環境呢？

也許有人會死，我就可以搬進他們的房間裏去了。公寓管理員說今年冬天很多人會死，可是要承繼一間房間，事先得在死人斷氣前和他商量好。她說假如我答應替死人好好掩埋，死人會在斷氣之前把

房間讓給我的。她意思說我可以先同一個垂死的人去拼房間，以後那房間就成了我的了。可是我也怕這未做。假如是斑疹傷寒，小羅勃和小約翰就要有危險了。管理員說，這年頭兒死人下葬也不容易。僱掘墳工人來挖凍土，就得花一瓶伏特迦，而且因為木料缺乏，棺材就只好再用以前裝過死人的那具。可是叫我等一個人去死，死後還要把一口白木棺材裝在雪撬之上，拖過街頭——這件事是不能想像的。而且叫我那裏去找一瓶伏特迦？

管理員說，現在很多人都怕死去，假如誰答應替他們好好埋葬，他們是很歡迎。他們尤其歡迎美國人，因為他們知道美國人那種事做不出來的。美國人決不會做的。她的意思是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美國人，決不會吃人肉。管理員說，那些將死的人，就是怕這一點。尤其是生在舊時代的老年人。這是因為去年冬天列格寧勒人吃人的關係。他們說，在列寧格勒沒有餓死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幹部，一種是吃別人的。列寧格勒的口糧是一天一百公分的麵包。任何人都只吃到這麼一點點。可是成千成萬的凍屍都堆在倉庫裏和城裏的空地上，因為活人都沒有力氣去埋死人了，死人就堆在那裏，等春回地融的時候，再山女人去把他們掩埋掉。剩下沒有死的人中間，據說五個裏倒有四個是女的。可是有了這許多凍屍，人吃人也並不奇怪。在那些可憐的凍骨上面，也沒有肉了，所以無需窮兇極惡的把死人宰割，飢餓的人只是把死人肚裏的心，肝，腎挖出，別人也看不見的。可是在莫斯科，情形大不相同。我們每天有四百公分麵包而且還有別種東西。可是將死的人總是害怕的。

管理員說我可以找到一個既老且病的人，他們會歡迎我，我可以等他們死，他們會把房間讓給我

的。可是我找新房間要快。我不能等下去了。她說在這幢屋子的一間房間裏，就有一個人快要死了，可是這對我有什麼用呢？我還是住在「官道」上呀！管理員說，現在常常有兇案，還有種種別的罪案，警察正在努力破案。報上這種事情是不提的，什麼事情都是口頭傳開來的。打勝仗的公報還沒有發表，大家已經都知道了；可是謠言裏面好事少，大致總是些倒霉事情。管理員說，我們中間有很多法西斯的間諜，他們就是給人收買了散佈謠言的。說到這裏，她笑了，因為這是一種官定的宣傳政策。

可是我並沒有笑，因為我知道她是在探我口氣，她在逗我。

第二十九章 等死的人

格萊哥的獨白

我常常問自己：假如手槍放不響，我要怎麼辦？

我要不要轉身過去，從劊子手手裏把手槍奪過來呢？我要不要衝下臺階，盲目的從這邊的牆，轉到那邊的牆，像老鼠一般的找一條出路？這件事是我常想起的，因為我準備視死如歸，我不要人攙扶，自己會走下臺階，進那個黑地窖去；我準備好一彈飛來，打得我腦漿迸裂，而彈子本身膨大了，從我的面部穿出去；我準備好一交跌在地下，把我胸口的惡心止住了。這一切我是準備它發生的，可是萬一這話兒不靈了，我可沒有準備。

一個人能臨危不亂，視死如歸，也就是把自己的死看清楚了。把自己將要怎麼死的，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相信一定是這樣死的，這樣也就是對這件事有了信仰。劊子手於是只是替宇宙間一種更大的力量做工具，跟執行死刑的命令無關的了。在劊子手和等槍斃的人之間，有一種奇妙的聯繫；等槍斃的人

對於劊子手，偷偷的有一種感謝之感；假如誰覺得慚愧的話，那也是等槍斃的人；在劊子手之前，他或她不會東張西望，因為等槍斃的人已經忘了自己。能預先看到自己的死，能相信一定這樣死法（即使只是在死前幾分鐘的事），也就是相信了命運，也就是能預知未來；可是假如命運來開一次玩笑，把事情弄得顛倒一下，那時那個人要無法應付的。

我記得在內戰末期，在克里米亞，很多人站在那裏等待槍決，有人在祈禱，有人在劃十字，可是大多數只是靜靜的站着，眼睛不朝我們這幾個劊子手看，不理我們，好像看一看之後，弄得大家怪不好意思的；那樣一個局面我當時很懂得，那時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命運也將如此。可是我記得，有一次有兩個人在我們放槍之前，忽然拔腳逃跑。我們很愕然的對他們看看，我們（米海爾和我）開始笑了，我們笑得很響，可是我們沒有趕在他們後面放槍，因為我們槍斃人的事情很忙，可是別人站在那裏等死的，並沒有注意逃跑的人，也沒有聽見我們的笑，他們只是靜靜的等候着他們的命運。

我看見過很多人被槍決。在克里米亞就有好多，有幾個劊子手工作太緊張了，靠着可卡因（Cocaine）來鎮定神經，可是逃跑的人，我只記得這麼兩個。後來劊子手的工作成爲一種苦事了，我們就先嚇他們，把等槍斃的人趕着跑，跳過岩石往前逃，我們就像打獵似的在後面，那輩等槍斃的人是很恨這種辦法的。經我槍斃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懂得劊子手和等槍斃的人之間的聯繫，憑了這點心靈上的聯繫，劊子手的罪名被化除了，下令處死他們的不是由於人間的恨，或是由於人間的偶然事實，而是由於冥冥中的命運或是主宰。人總是自大的，他們自己內部的生命和他們周圍的生命，人總是感覺得很清楚的，

因此他們所相信的宇宙，也以他們自己爲終始，這就是「體系」，也就是「法規」。一個人相信了「體系」和「法規」，那末本來委諸「命運」的各種事情，他就會相信也是在人的意料之中，該派給「命運」的，現在轉派給人了，如此而已。可是發生了意外之後便怎麼辦呢？假如手槍子彈放不出便怎麼樣辦呢？那時人的無法逃避的命運忽然被打破了，而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命運的一次作弄，成了一個象徵，或是一件因緣。

我在想這個，因爲我才聽見有這麼一回事。這事關係到一個青年人，名叫塞琪·史提芬諾維支。戰前，塞琪是一個學生。他的父親母親本是潭勃夫區的農民。在內戰時代，他的父親給白衛軍捉去槍斃的。他的母親到莫斯科來同她的一個姊妹合住，這位親戚也是一個孤孀。兩個女人合住在一間房間裏，看塞琪漸漸長大成人。他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少年，讀書很用功。那時他還不是一個黨員，也不是一個團員。剛剛在戰事爆發之前，他被徵調去參加紅軍，他曾經進過學校，一下子便成了一個下級軍官。

有一天，就在最近加里寧前線作戰的時候，他的一個單位，捉到九個敵軍，都是說俄文的。他們都是烏克蘭人。他們穿的是德國制服，只是袖子上有白色的記號，連長把這些俘虜交給塞琪中尉，另外還有一個提輕機關槍的紅軍士兵幫着他。仗打得很激烈，他們就在戰爭的要道上，塞琪不知道拿這些俘虜怎麼辦。假如他們是德國人，他對那個士兵說，我們就可以押他們回去，因爲我們必須要顧到紅軍的榮譽。可是他們是俄國人。他就讓自己這麼想着氣惱起來了。慢慢的他更惱起來了，後來他大爲氣惱。

「你們統統得死，」他叫道。

那些人站在他面前。他們光着頭，冷風把他們的耳朵都凍紅了。他們並不對塞琪看。其中有一個人笑了。這是烏克蘭作風。塞琪把手槍卸下。

「你們統統得死，」他兇兇地說。

其中一人，就是剛剛笑的那一個，點點他的頭。

「你們都是賣國賊，奸細，渣滓，」塞琪大聲的叫，想起了這幾個字眼。

那些人不作聲。他們都不朝他看。塞琪不知道該怎麼打死他們。

「把你們的靴脫下，」他說。

那些人挪動了一下，先舉一隻腳起來，再舉另一隻，把一對重重的德國軍靴脫下，靴放在他們面前。他們站在雪裏，腳上有破布包着，腳趾上生了凍瘡，有綑帶裹着。

「不要想逃，」塞琪說，「否則這位同志就要打你們的肚子大腿，這樣死得更痛。」

那些人站在那裏。其中一人動了一下他的凍腳。

「躺下，」塞琪叫道。「躺在這裏。」他用他的靴在雪上劃出一條線。

有幾個人朝塞琪看看。他們懂了。他們先跪在雪裏，然後再躺下，好像是躺在牀上。其中一人，就是剛才笑的那一個，伸了一隻手出來，抓住他的同伴的手。

塞琪沿了這條線走，他走到每一個躺下的人的身邊，就把手槍放在那人頭顱上，再按機槍。槍聲被壓住了，並不很響。各個人的身體先顫動一下，然後更深的陷入雪裏面去。到第七個人，手槍「括」了

一下，沒有放出。塞琪退回去，插了一排新子彈，再去打隔壁的那個人。不消一分鐘，九個人統統解決了。除了子彈對準腦壳打進去的「橐橐」聲以外，此外就沒有什麼聲音。塞琪很小心地把手槍又送回槍袋裏去，從「行刑線」上退了回來。他問提輕機關槍的紅軍要煙抽。紅軍拿了一個小聽出來，搖了些「麥霍加」出來，放在從眞理報上撕下的一角上。

塞琪抽着粗製的香煙，一面開始咒罵起來了。他罵人的話又長又惡。「那個該死的伍長，」他說，「偷找煙的就是他。他媽的，老子總有一天會收拾他，等他瞧吧。我不把他的皮打爛才怪呢。該死的混帳東西。王八養的。他想他這樣就逃得掉嗎。他把我當作什麼了？等我來收拾他那個王八養的……」塞琪不斷的罵着。

忽然站在他身邊的士兵猛的一動。塞琪也猛然全身一冷。在他的身體後面，在死人中間，傳來了一個聲音。

「同志，」聲音說，「請不要打死我。」

塞琪轉身回去。那是一排中的第七個人。那個人兩手兩膝着地，跪在那裏，眼淚直流。

「同志，」他又叫道，「請別打死我……」

「見他媽的鬼！」塞琪說。「我上子彈的時候，把他忘了。」

「他以爲你是在罵他，」士兵說。

可是塞琪的手槍又捏在手裏了。他很快的走上前去，對着那人的前額就打，那人本來跪在那裏的，

現在倒在雪裏死掉了。眼睛裏的眼淚立刻凍冰。

我提到他的眼淚，因為我相信這表示他已經在怨他的命了。

第三十章 卡爾的囚犯生活

每天晚上，他靠窗口坐着，看着路上。窗是在這公寓房子的二層樓，看路上正好清清楚楚。他已經能辨明各式各樣的汽車，現在他知道要人的汽車前面有衛隊，而且只在晚上才來。早晨，蘭吉會到他房間裏來，端來麵包，鯡魚和紅茶。他吃着，她就守着。他們現在很少說話。看見他的牀，看見他的衣服，她不免有一兩句閑話，可是他們很少交談。他看了她，心裏很難受。她只有一種聽天由命的表情；她的皮膚白而且軟，她的大眼睛是無可勸解的憂愁；在她的黑色衣服裏面，肌肉已經鬆弛，她的身體已經在衰老了。可是他知道她是相信他的：她是贊成的。

他到了有一個星期了。現在，他在窗口這麼等着，看着路上，好像他回到莫斯科已經不止這麼久；他的流亡的階段很快的消逝。他記起他在「白俄羅斯車站」如何站了幾分鐘，把他所喜愛的莫斯科的景色和市聲，儘量的看一個飽，聽一個飽。他看着來往如潮湧的男男女女，從這一邊，從那一邊的上火車，他又看着立在那裏等候的人，或者躺在火車站地上睡覺的人。正有一隊軍隊要開到前線去，很多兵等在那裏上火車。他看見這個，很驕傲起來。那時他想起他的任務來了。當他揹起行李，正預備慢慢吞走

出車站的時候，一個兵士，在他身邊走過，叫道：

「喂，同志，該洗一個澡了。」

他剛才在身上搔癢。他搔癢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他現在所在的地方，搔癢是不成體統的了！這裏有地方可以洗澡了，走到街上，他深深的爲四周的生命所激動。這個大城市在他看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美麗。到處都是動：汽車，吹着汽笛的火車頭，四邊走着的人們。他好久沒有看見這許多的人了；這許多精美的房屋；這許多漂亮的街道。他想把手伸出來，摸一下這可愛的城市。他對自己笑着，扛着行李往前走，那時他想起那個軍人叫他洗澡的話來了。洗一個澡！想起洗澡，他心裏萬分歡喜。他記得在吐威斯喀耶路上有一個澡堂子。那邊他從未去過，可是一找就找到了，門口的女人對着他笑，一個和善而美麗的笑。他們把身份證看了兩遍，他們看看他，他們知道他是從前線回來的。

是的，他是從前線回來的。他穿的是「邊防軍」中尉的制服，衣服上的斑斑駁駁，都是參加過實際戰鬥所留下的痕跡。長大衣下幅滾邊的地方已經脫了線，好像是很多次他都是穿了大衣睡覺的。他的羊毛帽子已經滿是塵垢，成了灰色的了。他臀後掛了一枝標準手槍，肩上斜掛一條狹皮帶，繫了一個地圖袋。他扛了一個縫得很密的行軍袋，內藏自動步槍一枝——已拆成兩半，全套子彈，還有四個手榴彈。他的身份證上說他的名字叫做伏拉特密·康斯坦丁諾維支·埃夫累莫夫，他是到莫斯科「政工人員學校」去報到的。他還有一張黨證。他們看見他是前線來的，都朝他笑。

澡堂子裏有胰子。小片的胰子。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熱水。蒸氣在冒着，鼻子裏聞到樺樹葉的香味。

很多人自己替自己擦洗。他下水以前，先在衣服裏搜查虱子，內衣的連縫處，他都用手指甲用力按過，褲襠裏的虱子他都一一捉了出來。到了水槽，別人都朝他看。他們看出來他是從前線來的，他們也不說什麼了。他很瘦——瘦得他簡直奇怪他自己的力氣是從哪兒來的。可是他覺得身體裏邊藏着很大的力氣。澡堂裏有一片破鏡子，他給自己照了一下——這是一年以來的第一次。他初一看，以為裏邊的是別人的臉，因為好幾個人圍着他，爭先恐後的從別人的肩膀上往鏡子裏張。他把頭動了一下，把地位放正了；他露齒一笑，他看見自己在笑。這就是他：瘦陷的臉頰，高聳的顴骨，頭髮已經剃光，露出凹凸不平的頭顱，瘦得如雄鷄似的頸子，頰下深陷的凹痕，黃焦焦的牙齒，為塵垢所污的鬍子；這就是他，可是他還有他的一對大而黑的眼睛，發出智慧的光芒，顯出堅定的毅力。

在以前，這樣一個人是要用單人房間的：澡堂裏的單人房間據說是為兩種人預備的：給跛子掩醜，給害相思病的去做夢的。可是現在來的很多人，都帶着戰爭的傷疤，有些人的傷疤還是紅紅的很新鮮的，別人身上也只是看出來病痛和營養不良。可是那些別人假如知道他怎麼會瘦成這個樣子，他們一定會瞠目而視：他身體上所受的災難比戰場上掛彩還要光榮，假如修道之士對於自己身體的折磨可以覺得驕傲的話，他也該很值得自傲的了。這些人中間也許有好多位都在集中營鐵絲網後面待過：誰知道？也許他們也曾聽見在高高的木製瞭望塔上，衛兵高聲的叫他們不要走近鐵絲網，也許他們也曾聽見衛兵步槍子彈上膛的聲音，他曾感覺到聚在底下的那羣男男女女的疲乏的恐懼。就在那裏，他點起他的怒火，下了他的大決心：在牢獄圍場中所過的那些日子；想着，不停的想着，「他們拿野獸待我：我就要做得

像一頭野獸。」他向周圍看看，看難友之中有誰跟他有同樣的感覺的；可是他看誰都不像。他們看來都是些可憐蟲（他看不見他自己），而且沒有人準備隨便說話。那是因為他們之中就有很多人會去告密的：到處總有這種賣友求榮的貨色！可是他們還有什麼別的什麼希望呢？除了四周的冰和雪，什麼都沒有，前面的一條冰河（他至今不知道那條河叫什麼名字）是逃不過的，逃過冰凍的大草原更不可能。不能逃；除了在他自己心裏想想，逃是不可能的。他本來就這麼想着，可是有一天他們提了六個犯人出去，其中一個還是女的，衛兵的步槍指着他們，在全營囚犯面前，強迫他們在河冰上坐下。囚犯們只是站在鐵絲裏看着，他們看見那六個人分開坐在那裏，在白雪上面只是黑黑的六小塊，坐着，不動，也不作聲，等他們活活的凍死。可是並不是營裏每個人都來看；後來大家明白了，這種刑罰一下子還完不了，後來六個人中的一個人的臉白得同四周的冰一樣了，大家都往後轉，低着頭，不開口，心裏都是恐怖。這都是因為那六個人陰謀想逃，給營裏別人告了密的緣故。

出了那件事情以後，他整個的身心都充滿了恨；起初那恨還是一種外力，對着一個目標，蠢蠢欲動；後來那恨變得精巧了，成了心靈在幽禁之中的一種特殊作用。整天他們做着工，清理河岸，以便春天裝運木材，他就整天的想着那六個凍死的囚犯。以前他是不容人道主義進他的心頭的；人道主義的想法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在俄國，這種想法會使人軟弱，使人怠惰；在俄國，人該只想到一個大目標，非這麼不可。他的想法，本來只是一個共產黨徒的。可是現在，像野獸似的關在籠子裏，強迫做苦工，沒有審判，也沒有上訴，他想得了這樣一個結論：追求一個目標就是論題犯了基本錯誤。因為這目標到底是

什麼東西？幾時能達到呢？革命已經有了四分之一的世紀了，目標是否近一點呢？所謂無階級的社會不過是一個夢想吧？所謂把政府縮小的理論，不過是霸道政治學家瑪基雅弗利式的發明吧？即使這些目標有一天實現，不知有些什麼樣的低等人能保得殘生去過這種好日子呢？這樣想着，他突然明白了；他的思想從這一點出發，大大的往前邁進。沒有所謂目標，因為一切都是「變」：不論你到達哪一點，都不好算是終極的目標，不過從那裏可以換條路更往前進而已。目標也者，只是一種幻想。因此這一種政治哲學是成爲必需的了；活人先得要照顧，顧到將來也得要顧到現在，因爲將來就在現在裏面。這樣很簡單的他達到了這個結論。

春天來了，他們被押送着，離開這條大河。他們這隊悲慘的人，步行走遍俄羅斯（這樣的隊伍多着呢，不止他們一隊）：大約一百多個衣衫襤褸的人，踏着已經湮沒的路基前進；在後面和左右，有六個到八個衣衫差不多一樣襤褸的衛兵，平提着步槍，一起走着。幾天之後，他們被趕進了一個也是圍着鐵絲網的囚犯營。這裏的食物更不如前。番芋湯沒有了。只有五百公分黑麵包一天。囚犯們知道這是要餓死他們了，可是誰都不說。卡爾開始覺得餓火的利爪的力量。假如附近有草，有葉，有樹皮，他也會去吃的，只是把肚皮塞飽而已。人變得像野獸一樣了，整天的張望着，偷偷摸摸的去找東西吃，互相不信任，總是怕力氣比自己大一點的人來欺侮自己。可是囚犯之中有一個人沒有忘記自己還是個人。卡爾已經看出來了。那是一個烏克蘭人，滿臉亂叢叢的鬍子。那人跑來找卡爾，提議兩人商定一個辦法，就是每人輪流一天不吃東西，另外一個人就可以吃雙份，因此兩天之中就有一天可以吃飽，不致於永遠不

斷的肚裏空空的難受。那人說，他曾經想過把一天的口糧麵包藏起來，第二天好吃雙份，可是這樣辦不到。照他現在這個辦法，他說讓他先放棄一天。卡爾同意了，他們每人每隔一天吃一公斤麵包，中間就不吃東西。那烏克蘭人的名字叫巴夫倫科。他是從卡科夫來的。德國人進城的時候，他逃出卡科夫，後來在莫斯科警察發現他身上證件不齊。巴夫倫科和卡爾氣力都不夠，不能多說話。他們發覺：他們心裏要說什麼，舌頭說不出來，只是使唾液腺增加分泌而已；因此嘴裏唾液很多，嘴唇留不住它。可是卡爾和巴夫倫科惺惺相惜，頗有志同道合之感。他們就這麼互相讓東西吃，吃總是偷偷的吃，不要讓另一個人看了心裏難過。

有一天在這個新營裏面，他們正在做工——替一個大工廠築屋基，忽然發生了斑疹傷寒。一星期之後，有十個人在木牀上死去。衛兵也不進他們的草屋裏來了。他們也不覺得少了什麼人，可是別人開始像狗一樣的吵起來，要分死人的口糧；那時衛兵才知道死了人，也許死了還不止一個，他們把人數一點，便下令叫囚犯把死人葬在營場地裏。那時候，卡爾一直在思索（飢餓會刺激思想的，這個事實本來只有隱士和聖人才知道）：他覺得他的思想是頂銳利頂純粹的一種。在他的思想之中，一切人類生命已經獲得的成就都被剝去外套，顯出原形：一切大的字眼，一切了不起的字眼，都變成一個巨大的諷刺，一個笑話：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人性，人類，黨，國家，革命，幹部，「國家機器的衰亡」，這些字他可以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的念，自己也不知道念些什麼。他心裏起了一種反叛的衝動：就是列寧所謂的「無意義的俄國式暴動」。這是農民的拼命；一種盲目的意志，要求殺，殺，殺；毀滅

又毀滅；每樣東西，任何東西，只要是屬於壓迫一方面，權威一方面的，都要毀個乾乾淨淨；只有把人殺得血流遍野的時候，這一口氣才會平。想起這個，他的因飢餓而變得更爲敏銳的頭腦，得到一些快慰；在他的敏感的想像之中，他看見地上流着血，利斧砍破了腦袋，一下子火線沿着他所寄身的草屋的正樑上跳躍，他就看着它燒，並不恐慌，只覺得快慰。

有一天，他們還在做築基工作，做得總是這麼慢，休息好多次，忽然他們之間有三個人撒手不做，站了起來，什麼暗號也不做，就這麼向衛兵走去。做工隊裏的人，也沒有聽見什麼暗號，突然大家都停止了。衛兵也是俄國人，他們也覺到這一種的情緒了。步槍「砰，砰」幾聲，那三個向衛兵走去的人，立刻當場倒下死去。其餘的人好像沒有聽見槍聲似的，還是做他們剛才在做的工。

後來衛兵叫人去埋死人，卡爾也被叫到。他們就是葬在他們中槍倒地的地方。卡爾慢慢的，施着大力氣，挖出了一個淺溝，他把一個死人滾進溝裏去的時候，他朝他看了一下，心裏在奇怪。死人的眉毛上耳朵上已經爬滿了虱子，它們明明要搬出這個冷身體，大舉出發去找新東家。那個人的衣服破而且髒，頭髮亂得結成了塊，他的腳是破布包着，上面浸透了泥漿，泥漿都已經冰牢了。身上的臭氣，卡爾早已聞慣，並不在乎。可是這個人——這個人是曾經「行動」了的。在他的現在已經停止了跳躍的心中，也曾激起了一陣衝動，一聲抗議。卡爾近來不斷的思索，現在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清楚的結論：被壓迫的被欺凌的人的唯一可能的行動，就是一個單人的行動；他的唯一可能的武器，就是個人的生命。他現在看得清清楚楚了：一直在混淆他的思想的，就是他老是在想找理由，使得這種行動成爲合理的。無

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和別的人都曾發明一套理論去配合這種行動，可是他現在認為這是不必需的；人就得去幹，這才是必需的。他們現在壓迫的手段多新式，多高明，再要組織秘密團體，搞陰謀，組織反對力量，那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行動必需是個人的，決心也必需是個人的；人類就只剩下這條路了；有史以來，這一種行動，被壓迫的羣衆已經做了不知多少次了。要做這一件事，個人就得犧牲自己的性命，這是必需的，而且很適合的：我們並不希望他能活着，來享受他的行動的果實——懲惡；這種行動的要義就是犧牲。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該用理智來考慮的，也是值得用心一想的，那就是：行動假如是對付壓迫手段的行使者的，那末豈不比盲動來得好呢？盲目的無意義的反抗，也有它的價值，可是有計劃的有目標的反抗來得更好；因為這樣反抗的範圍比較大。以後發生些什麼無甚關係；假如像蒲魯東那樣想法，以為暴力行動可以轉化成一個行業工會的制度，那太笨了。世界已經超過了那種階段，世界已經進入了大的集權國家的時代了。一個人可以聽命於國家，有時候要想聽命而沒有機會，但是假如他要反抗，他只能把自己的性命犧牲掉，做一件深思熟慮而與大局無補的事。他是一個俄國人，也是一個共產黨徒，因此照他看來，人類除了走蘇聯已經走過的路子以外，沒有別的路。他知道這次戰爭的結果一定是來一個革命，無產階級因此完成它的歷史的使命。假如戰爭結束的方式不是這樣，那末不過把革命的爆發稍稍往後移而已；否則的話，衰頹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日趨混亂，最後必定走上法西斯主義的路，那是「舊秩序」的最後一件法寶，結果還是殊途同歸，仍舊要走到同一的目標：大的集權國家。他覺得這套道理是要說給全世界人聽的：要阻止暴政，是沒有辦法的，可是人們該知道，每個人自己還

可以幹一下，而且只幹一下才是唯一的辦法；人的行動永遠是要對付「他們」，這是永遠不可以讓「他們」忘記的；「他們」雖然有他們的衛隊，警察，特務，還有他們的科學，可是他們一定要提心吊膽，不可以把人的行動估計低了——這種沒有意義的，並不按理性做出來的行動。

他在苦到不能再苦的時候，就這麼想着。

他把土掩上那個身上彈痕累累的「無名氏」的屍體的時候，他看得很清楚：那位「無名氏」是已經反抗過了，他的命就這麼容易的送掉了，可是他的生命已經表示出來，生命是多麼的低賤，而且既然死是這樣的痛快，勉強把生命保持下去是多麼的卑鄙。可是還有最後一個教訓：那三個人的命是這樣的送掉了，可是他們自己沒有想到過，也沒有計算過，他們的行動會有什麼效果，他們也沒有計劃過從他們的行動裏可產生什麼樣的制度，可是他們不知不覺中已經播下一顆種子，這顆種子將要生長，將要結果。頂好的行動也就是讓頂多的人知道的行動——一下手就要四處都能知道的行動。

當然「他們」會採取報復手段。因此羣衆被嚇得獸住了，腳都不敢動一動，而且也抹煞了良心：全人類受苦，他們有勇氣去想像，可是他們自己頂親愛的人，他們的妻子，兒女，母親受苦，他們就不忍想像了。好吧，報復就報復吧，報復得讓劊子手沒有空閑休息，讓皮鞭，木棍，虎鉗，手槍沒有一分鐘停，結果我們頂親愛的人都毀滅了或是趕散了，結果什麼都不剩了，沒有感情，也沒有知覺。

春天過去，夏天來了，食物也改良了。現在每天有湯了，而且也有韃草蝗蟲可吃。已經磨鈍了的手指，到舊木頭的裂縫裏去挖，挖到螞蟻蟑螂，也可充飢。後來又有人發現了向日葵子。七月的某一天，

衛兵又把他們押送到另一座營房裏去。那邊有個政工人員對他們訓話。他說他們已經編入紅軍，不日就要拔上前線。他們吃得更好了，麵包也多了，也有一點鱈魚吃了。他們都發到一身舊制服。政工人員每天來訓話，他拿真理報讀給他們聽。幾天之後，舊日囚犯互相之間也談起話來了。他們談他們的新食糧新衣服。政工人員開始講述紅軍的英雄事蹟，和法西斯的暴行。消息慢慢傳到營裏來，大家都知道前線大吃敗仗。據說法西斯隊伍已經在佛洛尼殊和諾伏洛西斯克之間全線突破，正向高加索和頓河流域進攻。又據說上面有軍令下來，斥責紅軍將領指揮不力，勉勵全體紅軍將士爲保衛祖國而戰。那個軍令裏還宣佈成立「懲誠大隊」，逃兵罪犯就被編入這個特殊部隊裏。

因此他們現在的部隊也就是「懲誠大隊」。

舊日的囚犯們雖然知道這些，心裏也不慌張。他們和世事隔絕已久，心靈已經餓癩了，乍聽見這些話，一下子還不起作用，隔了好幾天，觀念才慢慢發展。於是他們皆大歡喜。真的他們快要開拔上前線去了。他們想到自己參加實際行動，可以發揮效用，不由得愈想愈起勁。連他們的身段都受到影響；他們的腰幹挺得比以前直了，脚步也不這麼拖拖沓沓的了，也沒有那種抬不起頭來的神氣了，他們的眼光變得穩定了。那個政工人員每天來訓話：他把真理報的社論唸給大家聽；他把文章剪下來，釘在佈告牌上，他們大家就起勁的讀着。有一天他們領到槍了，這一下，大家更添了一種新的興奮。裏面的人是都受過軍訓的，可是政工人員選給他們指導解釋。有時候，有人會把那桿步槍當作小猫小狗似的，輕輕的撫摸着。這種感情，卡爾也有，只是沒有這麼強烈。有了一枝步槍，就是表示重新做人了。舊日的囚犯

們的心裏，本來除了絕望以外，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有了一種新的自尊之感。這樣一個變化，卡爾的心裏也受到影響的。現在他只想到將來：每天只是思索着，他們的前途將要怎麼樣；經過了好幾個月絕望的幽禁，這一次好像是釋放到一個天地裏去了。有一天，他的烏克蘭難友巴夫倫科對他說：「我看你也視死如歸，活得很起勁呢。」卡爾對他看看，巴夫倫科說：「死倒也好，可是何必起勁呢？」卡爾很難爲情，也覺得恨恨的。他這樣容易的就上人家的當了嗎？一個人要爲自己的虛榮心所誤，那是太容易了。他覺到一種新的絕望：他覺得人這種狂熱的動物，是不可能有的堅定的主張和清明的行動的，人家只要把他們心裏反應的秘密，研究出來，他們就會乖乖的聽命受編了。可是想起這一點，他覺得他的思想裏有一種新的力量：因爲現在比以前更需要一次反抗，一點表示，一個行動。可是該怎麼着手呢？他們已經領到槍了，但是彈藥還沒有發下來；而且現在大家都反對他。可是他開始定計了。

有一天，政工人員對他們說，他們要上前線去了。他們被押上火車，進了鐵棚車，人上完了，門就反鎖鎖上。麵包他們已經領到。地板上有一個小孔，供他們大小便之用。火車在站上等了好久，才開出去。他們往西南行去，走了好幾天，中途有很多次停靠的很長的時間。車停的時候，就有人擲麵包給他們。後來車子又停了，大門打開，命令叫他們下車。他們跳下地，全身一抖，頓頓脚。他們到了前線的一個地區。他們又要往前穿過一片大草原。帶領他們的軍官們，都穿着「邊防軍」的制服，帶着自動武器。第二天的晚上，他們到了一個殘破的村莊。四處還遺留着新近才發生過戰事的痕跡。敵軍的屍體縱橫遍地。在村莊中部，小孩子們在挖一個大坑。附近堆了好幾十個紅軍士兵的屍體。還有死馬，斷肢，

殘臂，砲彈片，打毀了的槍砲，還有很多坍塌的房屋。有一幢還在燃燒。他們這一隊「懲誠大隊」被帶進了一座大房子，那房子本來是共產黨會議廳，德軍佔領了，就用來駐兵。地板上很整齊的鋪上一堆一堆的草排列得好像大馬槽裏的馬窠；有幾張用德文和羅馬尼亞文印成的報紙；有幾個空瓶，標籤上說是苦艾酒；還有些各式配備的零星碎片，皮帶，幾張紙牌，一隻皮靴。「懲誠大隊」的弟兄們開始來收拾這些雜物圾垃。有一個弟兄檢起了那些空瓶，往下倒，想揩油一兩滴酒喝喝；另外一個人檢到一隻空香烟盒，十分陶醉的嗅着紙上的香味；還有一個找到一個急救袋裏的剩餘的一些棉花和綳布；再有一個在一堆亂七八糟的地圖裏搜尋。他們正在翻尋德軍駐過兵的房屋裏的殘餘物資，一個俄國上校進來了。他急急的向帶領他們的軍官走去。那些人只見那軍官趕快立正，腳跟碰齊，道道地地的敬一個禮。上校說了幾句話，就出去了。接着就是大聲吆喝，發佈了各式命令，聲音之大，是那些人所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他們從這座漂亮房子裏又被趕出，開到村子外的一座圍場裏。那所圍場本來是敵軍用來收容戰俘的。可是，他們的眼界已經開過了，整夜的他們就談着這個。

次日早晨，他們又派到村外的一座房屋裏去，進門以後，排成一個空心方陣。他們起先還不知道，這樣排着是什麼意思。後來他們看見了，在方陣中間赫然四具屍首。屍首起初還認不出來，因為屍首一着土地，很快的看上去就像土地了。可是他們現在看出屍體都是赤裸裸的，而且四個都是女人。他們那些人都是好久沒有看見女人的身體的了。那四具屍體都是背着地，排成一列。他們看見屍體的乳房都已經割掉，是用粗硬傢伙，可能是用刺刀割掉的，當時曾經流過一些血。他們也看出那些女人是吊死的。

那個政工人員站在屍身後頭，粗聲粗氣的放開喉嚨開始大罵。他說這些本是住在這村子裏的俄國女人。他把她們的名字還報出來。她說她們都是愛國志士，幫助過游擊隊作戰的。德軍撤退之前，他們把那四個女人捉來，吊死了還把身上的肉割下來。那四具屍首是在紅軍進村子的時候發現的，它們都吊在一座穀倉的樑上。那個政工人員，照俄國的慣例大聲疾呼的叫着；他叫喊的是那些女人的高貴和勇敢；他叫喊的是法西斯侵略者的卑鄙和殘暴。可是他說的倒是真話。

卡爾一面聽着，一面注意到女人中的一個。她的嘴唇上有幾隻小黑蒼蠅爬着。他想要把那些蒼蠅刷走，替這個女人灑幾點同情之淚。那個女人的年齡很難猜，可是在他看來，她一定是個很年輕貌美的。她的臉在死後還有一派靜穆之氣，可是已經黯淡無神了。另外三個女人都是在恐懼痛苦中死去的，可是這個年齡比較輕的是安安靜靜的死去的，腐爛的臭味已經進了他的鼻孔。卡爾突然覺得他對於法西斯匪徒，起了一種強烈的痛恨；他的恨和那政工人員的高聲吶喊是不相干的，那個人現在正在講德國人如何的狡詐背信。他舉起眼睛，望了一望同自己排在一起的弟兄們。他們誰都不在看這四具屍首；可是他們都有一種百折不撓的決心，表現在外；他們的憤恨已經收到眼神後面去了，受了節制，更是可怕；在每人的臉上，在每個瘦削的臉上，都印好了這個決心：此仇不可不報！

他們那天發了彈藥，他們就排成單排縱隊，開到村南端的一點去。他們隊裏的軍官又加多了，在他們後面還有帶着機關槍的別種部隊。

交鋒的時間很短。第二天早晨很早敵人就來攻打。攻擊之前，敵人先是用輕型砲的砲火來開路。天

一亮，敵人的步兵，還有幾輛輕坦克車掩護着，開始發動。他們的目標就是「懲誠大隊」所據守的一座矮山頭。「懲誠大隊」據險扼守，瘋狂地作戰；可是這只是各自作戰，並不是一連訓練有素的人集體行動。兩營正規紅軍，都配有重武器，正藏在「懲誠大隊」的後方，作為本師的掩護，此刻還不露面。因此「懲誠大隊」的弟兄們既無砲兵掩護，又無任何重武器，可是他們對於作戰既然都沒有什麼經驗，這一點他們可並不知道。他們分成很多小班，每班在他們的軍官嚴密的注視之下，一起作戰，可是偶然也有一個人會跳起身來，瘋狂地衝進敵人的砲火裏去。他往往沒有走到敵人的陣線，就給打倒了。可是衝鋒如此的勇猛，倒也使得敵人躊躇起來。敵兵都穿褐沉沉的制服，帶着圓錐狀的羊皮高帽。他們是羅馬尼亞軍。羅馬尼亞的指揮官是不願意使得他們的農民出身的軍隊，精神上陷入不必要的緊張的。

到了薄暮時分，「懲誠大隊」已經大多死完，只剩了極少數人。卡爾和他的烏克蘭難友巴夫倫科在一起作戰，現在他們也都還活着；他們所以倖存，主要的是因為他們作戰比較聰明，找好的掩護，強弱懸殊的時候就不和人去拼。可是現在夜幕降下，他們隨了一個軍官，向後撤退，筋疲力盡垂頭喪氣的躲到一座田舍裏去。軍官帶了一枝自動步槍，他拿來架在窗上。每隔一些時候，他就大致朝敵人的方向，放出幾發子彈。他說非這麼做不可，這樣可以警告敵人，這方面的抵抗還沒有擊破。可是那軍官很快的覺得厭倦了，就命令卡爾和巴夫倫科輪流的值班放槍。他教他們這槍是怎麼使的。巴夫倫科值班的時候，卡爾就躺在田舍的地上休息。現在天已經黑了，戰爭以後特別靜寂，他的心裏重重的負着絕望！這裏在一陣無謂的廝殺之中，他把他的恨都發洩完了，一切在幽禁期間所支持他的感情都發洩完了。他的

一切計劃都終止了。他的心裏曲曲彎彎的思想，也曾顯出過天才的光芒，也曾引起他不小的希望，到此一齊消失了。他不怕死，可是他不甘庸庸碌碌的死，要死就得做一個英雄；這是他所逃不過的一點虛榮心。可是明天，無疑的，死要找上門來了。

那一聲爆炸，他不記得聽見了沒有。他所記得的只是他在恢復知覺，怔住了而且也受了傷，同時他聽見那軍官在慘叫。那聲爆炸不管它是什麼，卻把田舍的稻草燒上了，在火光之中，他看見那個溫文爾雅的巴夫倫科已經死了。那軍官的腦袋後面，有個血窟窿，他正在慘叫。卡爾剛剛醒來四肢乏力，不能行動，過了一下子，他想同那軍官說話。可是軍官只是在叫。後來他的叫喊成爲咒罵。他開始咒罵德國人，大聲嚷着，他們都該死，一個一個殺下去，殺得他們一個不剩。罵了一陣，他的聲音小下去了，卡爾聽見他在講莫斯科。「我真運氣，有一張派司去莫斯科，」他說。「證件都齊了。明天我本來就要走了。可是現在！現在走不成了。」很快的，那個軍官講不動話了；過一回就死了。

第三十一章 高吉克同志的建議

高吉克同志眯了眼睛從他的夾鼻眼鏡的厚玻璃裏看過來，有這末一兩分鐘，他的表情看來是溫和的。可是坐在他對面的女人，很快的就發覺：他的溫和的表情，只是因眼鏡光線一時曲折偶然造成的，同時也因為他的蒼白粗糙的臉偶然綳緊了一下的緣故。在夾鼻眼鏡背後的眼睛，凸得比平常更出了，他的眼光東西投射的動作也已停止；現在他的眼睛定着神望着，他的眼光隔了眼鏡看來，顯得遠遠的並不切身。薄而紅的嘴唇微微的分着，那是因為受了內心緊張思想集中的壓力的緣故，並不是在笑。他的一簇硬頭髮，在蒼白的前額上挺着。那女人看見了這些，心中十分害怕。

高吉克同志把她的報告書拿在手裏。

「這是什麼？」他說。語氣很平靜。

她不答覆。

「這是什麼？」他追問一句。他說話的時候，掌上的握力增加，那報告書的紙就摺皺起來了。

「你帶這些臭東西給我幹嗎？」他說。「你以為你在做些什麼？你在跟我鬧玩兒嗎？你是在跟我開

玩笑嗎？」

坐在他對面的女人搖搖頭。她說不出來。高吉克同志的聲調和他動作裏所暗藏的謀慮只表示一件事情：大禍快要臨頭。

「再說這是什麼東西！」高吉克突然叫起來了。「你以為你在幹些什麼？」
報告書突然撲撲的掉到地板上。

高吉克坐在椅子上的身體，一半轉了過去。他的近視眼正向他辦公室牆上的巨大人像照片看去。他看不很清楚。那女人知道他在看照片，可是她並不朝那邊望。同樣的照片她早見過很多，就是這個人。高吉克同志開始說話了；聲音很文靜，好像自言自語似的。

「她們懶惰了，」他說。「她們忘了對祖國的責任。她們受了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變得軟化。外國人的腐化已經包圍着她們。她們已經喪失了蘇聯公民的真性情。現在必須要求清除她們的惡影響。」

「哦，不，不……」

「那末這是什麼東西！」高吉克猛的又轉身過來。「你每天見到那外國人的。可是，他的行動你一點也不知道。你就不注意他曾經同某種份子接觸過的。」高吉克突然把聲音放低。現在他在笑了。他笑得很陰沉。「會不會你幫助過這位外國人吧？」

「不，不……」

「那末，你怎麼會沒有報告，那個外國人得到了一本當年沙皇時代作家楚客夫斯基所做的兒童讀物

『蟑螂王』呢？這個外國人就在你們的面前，進行着一種反革命的陰謀，而你偏偏看不出來！他的陰謀就是要毒害蘇聯兒童的心靈！他們有着一個秘密組織……」

高吉克尖聲的叫起來。他自己內心的恐懼發洩掉了。在他想像之中，這件事情愈看愈嚴重，後來就丟不開，直往下想下去，每想到一種新的可能的危險，他的恐懼也變得更厲害。他的尖聲大叫，使得他的滿是灰塵的桌子，和桌子上像殘花似的插着鋼筆鉛筆的筆筒也爲之震動！可是他的聲音並沒有回音，塞着棉花的門，和隔聲的窗把聲音收去了，因此他的聲音只停在屋子裏，傳不出去，傳了不遠，聲音就變弱，好像這間辦公室是無線電播音室，而高吉克是個怪里怪氣的丑角。

突然高吉克停住了。他想起他自己，他把呼吸停一停。他聲音變得文靜下去。

『烏達諾伐』，他說。『烏達諾伐。』她是那兒來的？誰把她介紹進來的？還說外國話。也許她是在葉速夫同志時代就在這兒的吧？」

「哦，不，不……」

「可是你在一九三七年被送進去過的，是不是？」

「那是送錯了的。我被放出來的。」

「是送錯了的嗎？」

「哦不是……是的……」

「一九三七年你因爲缺乏警覺性被送進去。你的警覺性可並沒有增加。」

烏達諾伐太太的頭俯得很低。她再也說不出什麼來。她真是想哭。

「走吧。再聽呀。」

烏達諾伐太太走開了。

第三十二章 維姐莉亞

福開森的故事

我回到偏屋裏來的時候，預計維姐莉亞會等着我的，可是她不在。我焦灼的等了她一個鐘頭，時間已是半夜，我知道她戒嚴以後是不會來的。我走下去到查理·索末斯的房間裏去。他躺在牀上看書，抽着香煙。他看的是的一本偵探小說，正看得出神。他說這本書是從代爾上校那裏偷來的，他看得很高興，因為就莫斯科而論，這本書已經比較算是一本新偵探小說（一九三九年出版）。這本書的設想很新奇。作者要用心理分析法來偵查罪犯。查理說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一來作者一方面可以描寫罪行，一方面又可以加一些淫穢片斷進去。他這麼的往下講了一會兒，他看出我精神不寧，無暇細聽。

「我真想能給你喝一點酒，」他說，「可是我沒有了。」

「沒有關係，」我說。「我的伏特迦配給證也用完了。」

「想念你那女朋友，覺得寂寞了吧？」查理說。他討人喜歡的笑了一笑。

「我想就是這個道理，」我說。

「你怎麼會認真起來，也真怪，」查理說。

「老實說吧，她答應今天晚上要來的，可是她沒有來，」我說。

查理哈哈一笑。「這種小事情，你應該不以為奇的，」他說。說罷，他看我一看，表情已經換過。

「請別告訴我，你是真愛上她了，」他說。

「沒有，」我說，「胡說。到底什麼算是愛情呀？」

查理仔細的看看我。「我相信我已經看見些『苗頭』，」他說。「不錯，我只要聽見人家說，『到底什麼算是愛情呀！』我準有把握說，此人已經陷入情網。」

「別胡說八道。」

「很嚴重，」查理說。他想了一會兒。「好吧，」他說，「要忘了你得花些時間。這是頂重要的。就得花些時間。你反正在這裏有時間。慢慢的自己就會好的。可是，詹美，我的孩子，你是一個怪人。怪人的事情很難說。有時候要幾年，有時候要結了婚才治得好。」

「哦，別說廢話，查理。」

「那末你得要好好照看你的小朋友。你知道他們對於此事大感興趣。我發現他們對於腐化的資本主義人士的頹廢行爲，他們的好奇心是永不會滿足的。」

「耶穌在上，查理呀……」

「很抱歉，老朋友。可是，不開玩笑的，你要步步小心。我聽說在北面茂曼斯克，英國海軍裏那位辛格密老將軍，把他的女朋友鎖在海軍辦事處的一間特別房間裏。任何什麼俄國人，他從不讓他們走近那間房間，就怕他們把她綁走，把她送到什麼伐木勞動營去。那邊的伐木營有好些呢？」

「這個我倒從沒有說過，」我說。「你以為他們不會干涉嗎？」

「老將軍這人不容易對付。他們假如想打進他的享有外交特權的產業，他要鬧一個天翻地覆的。這件事並不重要，我想他們犯不着告到上面去，當地那些小嘍囉怕事情鬧壞了，自己被送到喀什克斯坦去充軍，也不敢自出主意的去鬧。」

「他就這麼太平無事了嗎？他不是根據外交官特權就把她藏起來了嗎？」

「是的，可是一旦老將軍被召回英國，和他親愛的太太團圓的時候，天曉得那個小可憐兒要出什麼亂子呢。」

「俄國女人同外國人結婚以後，結果怎麼樣？」

「結婚！我的天哪，你在說些什麼？」查理從牀上坐起來了。

「不，不，」我說。「我不預備結婚。別這麼緊張。」

「好吧，你知道根據外交慣例，結果會是怎麼樣的。你非立刻離開俄國不可。是的，規矩如此。外交人員同當地的女人結了婚，立刻要召回本國。老朋友，我倒有點着急了，我怕你比我先走。你知道照名單，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別瞎着急。我知道。可是女的會怎麼樣呢？」

「女的？哦，她們的地位似乎不大受影響。我注意到一時她們還在附近並不走開。這得看她們是否能找到別的外國男人。我想她們的命運也不會有什麼特別。有一件事情是不會錯的：她們永遠走不出蘇聯的國門。」

「可是梅蘇士和舒華茲兩人怎麼辦成的呢？」

「特殊例子。大使替他們特別請求的。光這樣還不行。他們還得挑選時間。要等簽訂條約或者別的時候去說，才有把握。照現在情形，正是第二戰場宣傳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我敢說時間不能比現在再不利了。無論如何，梅蘇士雖然帶走一個老婆，他們可也留下人質的。她的母親以及她和前夫所生的孩子卻還留在這裏。」

我讓查理去看他的偵探小說了。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睡覺是不可能的。我又記起維姐莉亞看得這麼樂的那本兒童故事書。我知道了，我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她答應說她把書拿給她的朋友們看一看之後，就要拿回來的。書上沒有寫名字，也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可以表明是誰的，可是書既然已經不在我手裏，我心裏不得不着急。偏偏現在她自己又失約。

我忽然又想起，麗莎維德的動物玩具的藍本，就是楚客夫斯基那本小書裏的圖畫。沒有問題的，她的動物就是那裏模仿來的。別處還有什麼地方呢？別處那裏她會找得到那種活潑可愛的動物呢？

想起了這個，並不能減少我對於這本書的內疚和關懷。

電影劇本還在信封裏。我拿出來，想讀一讀。印好的俄文我看了上去還不太費事，可是俄文的手寫體我吃不消。紙是頂壞的一種，寫得又是匆匆忙忙。拿起我床頭字典，我設法要拿起這本電影劇本讀下去。我很快就發現，這劇本不止是把兒童故事擴大了，而且還添了很多東西。我對於電影劇本的寫作，所知不多，可是我想卡爾的寫法並不嚴格的合好萊塢規矩，而且，就此一點而論，同愛森斯坦（蘇聯電影導演）的辦法也不合的。可是裏面的材料可以化成一巨大的恐怕的幻想作品；對於狄斯耐還不很合式，頂好讓鐸萊（Doré 法國十九世紀畫家）來畫。啊，只要鐸萊還活着，而且會畫活動卡通就好了！整隊的蟑螂躲在房裏的朽木舊洞裏——這想起來多可怕；還有蟑螂大隊開步走；還有蟑螂大宴會。動物們的處境變得很可憐。獅子一面坦白罪狀，一面流淚；地鼠，兔子和鼯鼠整天的忙着讀真理報，把社論拿來死背。背景好像是個兇險的動物陳列檻，隱隱的露出大鐵籠和苦工磨坊的陰影。故事進展下去，動物們變得更瘦，更慘，更陰沉。後來，似乎他們要叛變，那時忽然鄰近的一座森林裏的動物來侵犯他們的地盤，把他們的食物搶走，因此他們就和敵人大戰；在這爭生存的惡戰之中，他們把鬱積住的怒氣怨氣都發洩掉，而且因為怒氣一直抑制住了，這次打得更為拼命。而蟑螂王在這次戰爭中學到了一個新的訣巧：他用盡手邊的一切方式，很巧妙的使得那些動物相信：全世界都在反對他們，別座森林裏的動物都在等機會來攻他們，拆他們的台，來毀滅他們獨一無二的制度。蟑螂王也在世界各處去製造混亂，激起憤恨心理，因此他對於他的臣民可以有話說了，使得他們可以聽信他的話，更進一步的受紀律節制，

屈服於他統治下的種種侮辱虐待。可是在這可怖的非人的世界之中，開始興起了一種觀念。蟑螂王想盡辦法要撲滅這種觀念；可是這種觀念的由來比他久，已經深入他的國家的歷史之中。這觀念是這樣：假如在他的獨裁之下生命是如此的卑賤無價值，那末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在戰爭中，人們憑一股無謂的熱情，把生命送掉，這叫做「愛國」，可是有許多人心裏更明白一點。幹嗎不用別種方式把生命送掉呢？在那些比較高貴的動物的心裏，這種觀念就開始鑽了進去。可是這觀念所採取的形式，不是集體自殺，因為那不是一個有自殺狂的國家，它所採取的形式是暴動，流血和暗殺。

以後的事情怎麼樣，我看下去很費力。可是在楚客夫斯基的薄書裡很快樂的把故事結束掉的那位麻雀先生，在電影劇本裡所遭受到的命運大不相同，我看了很傷心。在卡爾的故事裡，麻雀把蟑螂吃掉後，羣獸大怒，把麻雀撕成碎片，可是後來另一隻蟑螂登基，羣獸方才很悲哀的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做錯了。可是書上隱約看出，第二世的蟑螂王有了經驗，學乖了，行爲比前任謹慎得多。

電影劇本裡的涵義還多，很多我是譯不出來的。作者很顯然的有一種特別的想像力。他有一種天才，那種總是跟瘋狂分不開的傑出的俄國天才。或者也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他曾經受過某種可怕的經驗。人家怎麼能知道呢？好吧，天知道我拿了這本劇本該怎麼辦。我可以托一個新聞記者找一個什麼文學掮客，把它寄到好萊塢，愛爾斯特里或這一類拍電影的地方去。可是那時候就得要翻譯好了送去的。這倒要考慮考慮。

我一定是睡着了。我做了很多夢，無疑我的夢卻和那劇本有關。我記得我夢見一隻蟑螂在咬維莉莉

亞，真把我氣壞。火爐傍很暖和；有一次我又從夢境中浮起，我自己盤算，要不要把燈滅掉，好好上床去睡，可是我還沒有決定，忽的又睡着了。

我最後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雖然室內的窗簾還拉着。我的身體僵硬疲乏，我把皮鞋踢掉，躺到牀上去睡。我把厚厚鴨絨被拋上，很快的又睡着了。

一小時以後，我醒來了。我脫掉衣服，洗了一個澡。俄國老當差的把早餐送上。我不知道該做什麼。走出去找維姐莉亞是沒有意思的。我還是在這裏等她的。

我等着烏達諾伐照平常一樣，在十一點鐘來的，可是她沒有來，因此我心裏更形焦灼，雖然我毫無理由該着急。我朝窗邊走了十幾次，頭朝窗外望。景緻總是那樣子。可是晚上下了雪，每樣東西看上去都很新鮮。我窗外的寒暑表指着零下四十五度。我每次走到窗邊，總要看看寒暑表的度數。我想也許查理會上來，可是他來。我想他也許到公使館去了。我到後房去，想吩咐老當差的準備午餐，可是他不知哪兒去了。我回到我自己的屋裏，翻翻弄弄的想動筆來寫我必需得寫的報告，可是一事無成。我的心裏不知怎麼的煩燥異常。我可以把原因歸諸昨晚的事，昨晚我在那間小房間心裏太不痛快，那個女人爲「防疫逮捕」而捉去的消息，我的因爲把「蟑螂王」出借（雖然講好只借一晚上）而起的內疚，還有種種別的理由，可是我知道這一切都不成理由，主要的是因爲維姐莉亞沒有來。我想假如不是出了嚴重的事，沒有東西會使她不來的。我猜想也許她出門太晚——我記得前天晚上她去看戲也是來遲的——因此憲兵找她麻煩。可是我知道這個也不很近情。

這座房子空空的只剩我一個人，我就在我自己房間裏踱來踱去，替維姐莉亞擔心，我心事亂的程度是我以前自以為是不可能的。

下午已經很晚了，我好像聽見前門開了一下又關上。我傾耳細聽，我聽見輕巧的脚步聲慢慢的走上樓梯，走到樓梯頭上。我向房門走去，那時門慢慢的推開，在我面前的就是她。

「維姐莉亞！」我叫出來了。

我走過去吻她，伸出手臂圍住她。她的身體軟披披的。她沒有回我的吻，然後她很輕輕的吻了我一下。吻得很輕，同我以前所知道的熱烈的狂吻不同。

「出了什麼事？告訴我，」我說。

我知道一定出了什麼事了。她不答覆我。她走到我牀邊，重重的倒了下去。我想起了她第一夜到我房間裏坐在我床邊上的情形。可是現在是沒有一點挑逗了。「妖姬」已經不再存在；相反的，在她青春的臉上，陰沉沉的罩着一層憤恨；她的嘴唇張着，她的棕色的眼睛冒着火。她身體倒下去的姿勢，又是表示昂然不顧一切，又是表示充滿了絕望。我走到她那邊去。

「告訴我，」我說。「出了什麼事了？」

她不放鬆的看着我。她仔細的看着我。她這樣的釘着看我，是以前所沒有的。我等她開口。

「你沒有事吧？詹美？」她說。

「什麼事？」我說。

「沒有什麼，」她說。「沒有事。」

我看見那種不在乎的神情到她的眼睛裡來了：這種不在乎的態度，人們是用來節制感情的。於是她笑了，她笑裡帶着一種自暴自棄可又是不顧一切的神氣。

「他們怎麼對待你了？」

她又照她的新方式對我，突然的她捧着我的頭，吻了我一下。她又兩次三次的吻下去。她把她的手臂圍着我。同時她又很興奮的什麼都不怕似的大笑。

「他們打了你沒有？」我說。

她很驚奇的看了我一下。於是她又笑了。她伸手到她衣服裡去，取了一張紙。她遞了給我。

「沒有關係的，」她說。

我看看那張紙。上面的字我不大認得出來。我把字典拿來。我匆匆忙忙翻查的時候，維姐莉亞哈哈大笑。那張紙上是一個命令，將維姐莉亞逐出莫斯科，終身不得復返。她是要放逐到伏爾迦河上某處的集體農場去。

「他們把你送走了？」我說。

「Da (是的)」

「爲什麼呢？他們在搞些什麼名堂？你做了什麼？」

維姐莉亞又皺起眉來。那種陰沉沉的憤恨的表情又回到她臉上。我雖然問她，我並不期待她會答

覆。可是她開始說話了。

「有一個大陰謀也好。我喜歡陰謀。把恩·凱·韋·代總統殺死。」

「什麼陰謀不陰謀的？」

維姐莉亞對我看看。「你的陰謀。你不是有陰謀嗎？」

「我沒有陰謀，」我說。「這是什麼話呀？」

「你一點陰謀都沒有嗎？」

「沒有，」我說。

「真的，詹美，沒有陰謀？」

「沒有，沒有，沒有。」我說。「你不要胡亂的想人家在犯罪，把這種幻想從你的腦筋裏清除出去吧。」

突然維姐莉亞開始大笑。她笑了足足一分鐘。我要制止她，都不大可能。後來她就不笑了，對我看看，過一回又笑起來。我並不笑。我心裡急得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詹美一點陰謀都沒有？」

「他們還說了些什麼別的話？」我說。

「他們說我是蘇維埃壞女人。我不知道你有陰謀要宣傳。」

「什麼話！」

「是的，恩·凱·韋·代說你陰謀帝國主義宣傳。」

「那是做夢。」

「維姐莉亞大大的犯錯誤。我沒有告訴他們，他們很生氣。」

我想了一分鐘。「可是陰謀是怎麼一回事？」

「哦是的，大陰謀。因為這個陰謀，我在隔離室裡過了一夜。」

「你坐過監了。」

「一整夜。沒有關係。床很好，可是很冷。燈是整夜開着，可是沒有火。我的手不准放到毯子下面去。手一定伸出來。衛兵每半小時來看我一下。有聲音，所以我睡不着。」

「事情就是這樣嗎？」

「這不算什麼。我們——我們之間的每件事，他們都要知道。我說他們凶他們的娘。我說我很愛她。他們很生氣。恩·凱·韋·代跟維姐莉亞非常生氣。可是維姐莉亞不在乎。我說他媽的恩·凱·韋·代。」

「兇」字是她常用的一個粗話。

「所以他們要放逐你。」

「是的。」

「你要逃走嗎？」

「詹美，你真糊塗。俄國沒有人逃的。」

「他們說你什麼時候該走？」

「今晚。」

「不。不許今晚。」

「是的，火車在那兒了。」

「你不要去坐它。聽好，維姐莉亞，你待在這兒好了。外交產業，他們不敢來碰的。我來想辦法。」我看看那張放逐令的紙。「字是這個人簽的。他是誰？我要寫信給他。我要求跟他當面談談。他們不可以因為你同我睡過覺，就把你這樣辦。何況那個陰謀不陰謀的胡說八道，我也得要去辯明白。我不能讓事情就這麼下去。」

維姐莉亞坐在床上。她現在很認真。陰沉的表情又來了。

「那末他們要把我槍斃了。」

「把你槍斃！」

「是的。他們不喜歡反革命。」

「笑話，」我說。

我把我的手臂圍着她，吻了她一下。「聽着，」我說，「我們去結婚。」

「沒有用。還是集體農場去。」

「不，」我說。「我們有外交的保護。他們不敢對付你。」

我說這話的時候，我自己知道是假的。我的心亂得很。我不知道該做什麼。維姐莉亞看見我心亂如麻的情形，開始很溫柔地吻着我。

「不要担心，詹美，」她說。「不要担心。」

她把我的頭往下抱，我的頭緊貼了她的喉嚨和胸脯。我正吻着她喉口的結實的線條。我覺得她青春肉體的溫暖，因此青春的性感在我心裡鼓蕩起來了。

突然我抬起我的頭。我想起一樁事情來了。

「維姐莉亞，」我說，「那東西在哪裡？」

「什麼？」

「蟑螂王。那本書呢？」

維姐莉亞鬆了手。她不看我。

「你給了他們了？」

她點點頭。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跟維姐莉亞生氣嗎？」

「不，」我說。「這樣一件小事沒有什麼關係的。這事沒有關係的。比起你的問題，這太不重要了。我只是在想你。」

「他們說你這本書是從反蘇維埃份子裡拿來的。他們說你同反蘇維埃份子有陰謀。」

我對維姐莉亞看看。這幾個字突然使我大吃一驚。

「反蘇維埃份子？」我說。「這是憑空虛構的嗎？」

維姐莉亞搖搖她的頭。「他們知道詹美。我說你有陰謀，可是你不信。」

「我的天哪，」我說，「這情形不同。」

我站起來了。我在掛念麗莎維德和蘭吉。出了這樣一件事情，我怎麼能忘記她們呢？有人在密告她們了。他們現在非常危險。

「聽着，維姐莉亞，不要出去。是的，待在這兒。不要出去，不要動。我要去看我的朋友，就是給我書的朋友。我得要立刻告訴他們。你可不能離開這兒。」

維姐莉亞看來很垂頭喪氣的。

「你走了，詹美？」她說。

「是的，我非去不可，」我說。「我得要警告他們。」

維姐莉亞往下看，眼睛避開了我，她的長長的黑眼睫毛蓋住她的眼睛。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她的眼睫毛有多長。她的憂愁和絕望，本來是隱藏在她的撒嬌和反抗的態度底下的，此刻全部表現出來了。那個時候我確信我是愛她的。

「待在這裡，」我說。「別走。你在這裡很安全。我半小時之內就回來。」

我穿上大衣，戴起帽子，我吻了她一下。

「再會，詹美，」她說。

「不要說再會，」我說。「我就要回來的。」

「再會。」

第三十三章 告密者

瑪莉·安德森的獨白

我們的公寓管理員是個很和善的好人。雖然她愛講長講短，她的心可是很好。我後悔我沒有早跟她認識。否則的話，我內心要舒泰得多，也可以懂得更多的東西。我們的公寓管理員的工作很繁雜，因為她不但向居戶收錢，不但得督察各戶掃自己門前的冰雪，防止火警，以及一百種別的事情，而且還要嚴密的監視這裏的各戶居民，因為這些日子社會上有很多不負責份子在活躍。她怕小偷，怕刺客，每天晚上，她總把自己鎖在樓下她的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可以這麼鎖，別人都不能鎖，因為鎖是犯法的。可是小偷刺客還不算什麼；她頂擔心的是反動政治份子。莫斯科的生人太多，各國籍的難民散兵到處都是，因此什麼人都不可以信任的。她一直為這個擔心，可是她當然不能永遠的看着，尤其是她到了晚上就要害怕的，因此她得找人合作。我們的管理員當然是一個黨員，她一定得表現出她的最大的警覺性來，非但爲了她自己，也是爲她的親戚——她的一個親戚在外交部官位很高。假如她的公寓裏窩藏了間

諜或是反對份子，她也得要負責，而且要牽連她的全家。她對我說起這個，我很同情她。當然，我能幫助她。

我最近所聽見的那些話，我現在覺得，就是聽聽那種話也是錯誤的。這不過是些瘋話，沒有什麼意思，可是這也很壞。它造成了一種不安的空氣。在現在這時候，局面雖然如此，再說外國話是錯誤的。我知道是錯誤的，我也不該去聽的，只是我是多麼的想聽人說英文啊，我是多麼的寂寞，我又沒有人可以談話，而且我總以為那個外國人可以幫助我的，這麼一想，難怪我走錯了路。哦，我多麼的恨他們，那些志得意滿的外國人！好像他們總是有辦法可以幫你忙似的！一年以前，我還不是受了一次教訓。那些外國人走近我們，那就是錯誤的：我高興我把勇氣拿在手裏，而且我可以放心他不會再來了。外國人只要在我面前出現就帶壞了我們。而且，當然囉，他們總是在找我們制度裏的弱點，陰謀害我們，設計毀我們。我不是三歲小孩子，我總記得在紐約羅勃是個共產黨員的時候，人家怎麼的攻擊他；他們在他們的報紙上印出些什麼樣的謊話；他們的警察做出些什麼樣的暴行，他們在他們的國會裏提議些什麼樣暴虐的迫害方案。關於他們的資本主義，我是不會受騙的，因為我有過經驗，我知道它能壞到什麼地步；現在因為我懂得他們的語言，我知道他們在搞些什麼陰謀，因此我也能預防。

我很高興我同我們的管理員的關係這樣好。她解釋這許多的事情給我聽。當然，這些事情我本來也知道，可是現在我看每樣東西都清楚得多了。我開始想起羅勃當年常跟人討論的那些話。很奇怪的我怎麼現在會記起來，因為在那時候我常常是同一隻老鼠一樣的安靜。我總不去參加那些討論的，我也想不到。

起當時我有多少興趣。可是現在我想起來那些該是講些什麼的了，我也知道羅勃錯在什麼地方了。當然，男人總是固執自己的觀念的，從來不肯在實際常識面前認錯的。羅勃一直是太講理想。你不能够希望人家永遠的爲理想工作，爲理想生活。爲什麼黨對於人民是如此的嚴格，我現在搞懂了。俄羅斯人太容易接受印象，性情太不穩定。就拿蘭吉來說吧。那外國人一來，她批評我們制度的話，就說不完了。不過想使他有一個印象，如此而已。我現在看出來：人愈多有自由，愈會濫用自由。而且他們多麼會浪費時間，假如黨對他們不是這麼嚴的話，他們會把時間全花在談話上，事情搞得亂七八糟。這樣的話，他們怎麼能實行五年計劃，怎麼能打勝仗呢？現在工廠所以還能開工，全靠黨定下規矩：工作上班遲到者必定嚴厲處罰。只要看看各人民委員會貪污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對付他們那班人，一定得兇，否則你要他們做什麼，他們都不肯做的。工人們自己怎麼能管理工廠呢？他們非得歸訓練有素的黨員和特務部管理不可的。這一切我現在比以前懂得多，因爲我已經看出來：俄國人假如心懷不滿，一定拼命向前，什麼都制止不住他們的。對於他們，沒有「妥協」這麼一回事。這是因爲他們就像小孩子。每人都說他們就像小孩子。他們看每樣東西都只是黑與白，善與惡。假如一件事是壞的，他們立刻就要把它毀滅。因此俄國假如出現一個「反對勢力」，那是非常危險的。第一點，你不能够信任他們：他們一直暗中在陰謀害你，你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你在牀上殺死，因爲他們瘋狂的相信自己，他們以爲凡是他們所做的事都是對的。第二點，「反對勢力」會把每個人的思想搞亂：本來是好好的直捷了當的政策，每個人都容易遵循的，到那時成了有各種政策，互相對立，民衆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一切都足以證明：紀

律是非有不可的。社會非「一元化」不可。我用了「一元化」這個字，心裏很興奮。我以前沒聽說過這個字，是我自己翻譯出來的。可是我所要說的話，它全給表達出來了。

我對於我們的公寓管理員真感激。我很高興同她談話。她說我用不着爲找房間擔心，她不久就要替我找一間理想的小房間了。她說我也不用替小孩們擔心，她說她知道有一個辦法，可以不送他們進職業學校去。我聽見她的說話這樣直爽，倒驚奇了一下，可是這使得我對她更表示友好。她說職業學校是只給無產階級去讀的。她說她看出我的孩子聰穎非凡，將來可變成「少年先鋒隊」，再加入「青年團」，這樣他們就可以進一家特別學校。這些事情是她那在外交部裏的親戚告訴她的。她問我孩子們說不說英文，我一下子很害怕。可是我說是的，會說的。她說蘇維埃青年能夠把英文說得同英國人美國人一樣，這也很需要的。可是她警告我：假如他們將來進了特別學校，我也許不大好見他們，因爲他們的功課很忙。可是我說只要有人好好照管他們，我也並不在乎。

所以現在我幾乎是很快樂了。對於我所做的事情，我並不覺得後悔。

第三十四章 登陸

福開森的故事

我很快的走過摩訶伐耶街。我思忖了一下坐地底電車去是否可以快一點，可是想起了這時候的人羣，我決定頂好還是步行。天快黃昏。烏鴉正飛回克里姆林宮的巢裏去，像一片烏雲的他們飛過了古城，爽利的傍晚的空氣中充滿了它們的叫聲。屋頂上的雪到處都積了幾尺厚，你可以看見新雪一層一層的堆在舊雪上面，就像地質學標本的層次一樣。人們匆匆忙忙的趕着回家。有幾個在身後拖着小車，車裏整整齊齊的堆着木柴。有一個女人推着一輛底下有輪子的嬰孩車。我看見埃倫堡先生（蘇聯小說家）穿了貂皮大衣，戴了圓皮帽子出來散步，手裏一根紅帶子還牽着他的那頭開恩種小狗。穿着羊皮夾裏軍衣和氈靴的壯健軍人，大踏步的走過。電車裏擠滿了回家的人，擠得像是壓搾機快要壓下來的葡萄串。汽車高速度的飛過。有一處地方，一架大的機器掃雪器正在工作。穿着破舊衣服的老年人，拱起背來抵抗寒氣。圍巾遮着頭，走的時候眼睛不向兩邊看一看。小男孩子在玩坦克兵的遊戲，不戴手套的雙手插

在口袋裏面。幾個青年女子臂挽臂的走過，裙子裏面穿着滑雪褲子。麵包店上起板門來了，人羣無可奈何慢慢散開。我很快的走着，最後我到了普式庚銅像，再轉彎沿吐威斯客大道走去。這裏的人比較少，有好些個乞丐靠着牆站着。我用英文對他們說一聲：「No」，他們就縮回去了。我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戈果理的銅像。我再往右轉，就到了前五六晚我所走過的那條大街。那是一條直而平坦的街道。我上次來過之後，曾經下過幾次大雪，街上情狀頗有變動，但使我相信我沒有走錯。有幾幢房屋的模樣很怪，我還記得。可是街的新建的一面，我現在能看得清清楚楚，這倒略爲我迷糊起來。有些房子我應該記得的——我還是新近才走過的——可是我記不得了。走了一段之後，我想我已走過頭，於是重新再退回去。忽然我自以爲已經找到那幢房子，我走過去，再走進去。裏邊有個憲兵，我看來這幢房屋大約是個什麼樣的機關，我剛才自以爲認得，那是看錯了。衛兵朝我看看，我轉過頭來走出去。我匆匆忙忙的再往前走。走了幾碼路之後，我回頭望望，那個憲兵也已走出屋子，朝我看看。我再往前走。無疑我把那座公寓房子的地位算錯了。可是剛才同憲兵一照面，我又想起一樁事情來。會不會我得到得太晚了呢？會不會他們先我一着呢？這樣我就得闖進他們裏面去。好吧，這樣也好，這樣要強迫攤牌了。我已經沿街走了很多路，街上的樣子已經全換過。我敢說，那座公寓房子並不在附近。我往後走，走回到剛才遇見那憲兵的地方。從後門來看，我想也許辨認這座房子要容易一點。我從邊上一條小街進去，向周圍看看。可是沒有用。每幢房子看起來都像是我同米德迦進去過的那一幢，可是十分相像的也沒有。我不得不承認我把地方忘了。天現在黑了，黑暗之中找那個地方更沒有希望。

就在那時，我看見了那座房子。是的，這就有雕塑圖案裝飾的大門。我走到門口，推開一扇小門，走了進去。立刻潮氣，「麥霍加」，和松脂木的氣味撲鼻。裏面很黑。我等了一下，等我的眼睛能夠適應四周的黑暗。我再一看，看出來不是那個地方。這裏並沒有一條小過道通到右邊去。好像是那間小房間和裏面的人都已經不存在。就我而論，好像有人砌了一道牆他們砌沒了。泥水匠可能來過，把通到過道的進口砌沒了，而且在磚上塗了一層可惡的膠漆。我看看這座牆。我伸手出去摸摸它堅硬到什麼程度。那時我才知道我真的找錯了地方。我走出門去，黑夜已經降臨。我費了好大勁才走回吐威斯克大道，回到公使館又費了些時間。我決定明天再來找這個地方。白天光線好，時間又充裕可以讓我找尋，我相信我能找得到的。

我突然記起維姐莉亞還在等我。我進了我自己的房間，可是她不在。我走到樓梯口，再走下樓梯到查理·索末斯的房裏。我想她也許到那邊去找伴去了。

查理在整裝，準備赴宴。維姐莉亞不在。

「你看見維姐莉亞沒有？」我說。

「沒有，」查理說，身體轉過來，「可是聽見消息沒有？」

「沒有，」我說，「可是我非找到維姐莉亞不可。事情很緊迫。」

「你還沒有聽見這消息！這才美啦。總算我可以在你面前報告一下了。」

「天哪，」我說，「她能到哪裏去了呢？」

「喂，老朋友，你很着急，是不是？」

「是的，一點不錯。我到哪兒去找她去？」

「別管它。你聽見這個消息你就會高興的。老朋友呀，我們已經登陸了。」

「什麼？」

「今天早晨天亮的時候。是的，照老辦法。英美大軍今天早晨在北非登陸。從阿爾及愛直至卡薩勃蘭加。史密賽打電話給我的。多偉大呀，這是第二戰場啦！」

「是的，」我說，「他們登陸了、嗯？」

「英國大使館已經證實。最美的是，這一來把他的鬼話演說辭搞垮了。他非得重寫一過不可。」

「什麼演說辭？什麼東西？」

「還不明白嗎？就是『他』的革命紀念演說辭。他本來預備痛罵我們一頓，說我們不守信用，不開關第二戰場的。」

「哦，是了，是今天，是不是？」

「據我看來，你似乎不大起勁。」

「不，」我說，「你到底看見她沒有？」

「誰？哦，你的寶貝。沒有，我沒有看見她，我的老朋友呀。」

「天哪，我該怎麼辦好呢？」

「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該高興高興啦。這一來，我們在這裏的地位與前不同了。從今以後，事情都要簡單了。你要結婚也成，你要把太太帶出去也成。不，也許還不會這麼便當。怎麼一回事？老板罵了你啦？是不是？他說些什麼？」

「他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

「你接到他的通知沒有？」

「沒有，誰的通知？」

「怎麼，就是公使的通知。我們的公使的通知。」

「沒有。」

「可是，老朋友，他找了你我一下午。而且生好大的氣。莫洛托夫不知還是維辛斯基今天去看他去，而且罵了你。我還以為你爲這個事情擔憂呢。我說，老朋友，趕快去看他。趁老虎沒有出洞的時候，先去勸住他。你在搞些什麼名堂？我看你這一次麻煩找了不少。」

「別瞎嚼了。你說公使要見我。是不是？」

「瞎嚼？這不是個好字眼，老朋友呀。你居然在今天這種場合說起這種話來。是的，他要看你。非常重要。立刻要去！你的禍好像闖得不小。」

「好吧，我就去看他。」

「過後請到史密賽那邊去。他準備舉行一個派對慶祝登陸。」

「假如你看到了……」

「你的小寶貝？是的，當然，我會留住她的，老朋友。」

我離開索末斯，走進冷空氣裏去。我向公使館那房子走去。我心裏深深的在責備自己，難過非常，可是這倒並不是因為我替我們的公使找來了什麼麻煩的緣故。

第三十五章 死

卡爾的故事

他坐在窗口，望着路上。已經是戒嚴的時間，路上靜靜的闐無一人。他想今天夜裏該是時候了，因為這是革命紀念日。今晚上很合適，恰巧是革命先烈推翻帝制的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的計劃是這樣的。克里姆林宮大宴會之後，他們要叫女人的，要到下半夜才會回到他們的別墅裏去。轎車一輛一輛的要在「官道」開下來，開得很快，可是仍舊小心翼翼地冰雪，前前後後都是衛兵的汽車。他相信他知道該找哪一輛車：那輛巨型「派克」(Packard)的狀況他已認得出了，窗是淡青色的，車頂是黑色的。可是他不知道淡青色的玻璃窗是子彈打不進的，車頂是鋼板做的。他設想自己對那輛車瞄準，他的自動步槍的直射火力把司機和乘客都打死，車子轉了一個彎，砰的停住。假如各人還沒有完全打死，他們還想從車的殘骸爬出來，他就要用手榴彈。事情很簡單，就像麻雀啄死蟑螂一樣的簡單。可是他事情要做得徹底。他要跳到路上去，把剩下的手榴彈都擲完，那時衛兵們要提槍追來，他就開槍，直到子彈都打

完，自己也被打死爲止。

今天晚上，他覺得他的決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還要堅強。他竟不覺得寒冷。他的手很熱，可是很鎮定。他並不慌張。他握着自動步槍的陰涼的槍壳和扳機的護手部份。他必需要防止槍身發凍，免得時機來臨的時候，槍會塞着不動。他的手指把保險往前推。推上去很容易，槍已經上好子彈。現在所需要的是冷靜的瞄準和他手指輕輕的一撥，大事就可告成。他知道槍在手裏會跳的，可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在瞄準的時候把這個因素先算進去；他知道彎曲的子彈盒裏裝子彈三十六發；他知道他將要短短的六發一次，八發一次放出去，如此槍身不致太熱，他的手可以握得住；他知道他所需要的，不過是手指輕微的一撥，他想要把那輛「派克」汽車停住，也許要把三十六發子彈發完。即使子彈在打完以前，車子給止住了。他還是繼續的開槍把它打完。然後他要擲手榴彈。同時他要扣上第二盒子彈，跳下樓去，把這場戰爭結束。

事情如何進行，他已經在他眼前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很有把握。有一度他軟化了。最初他挑了一個時間，趁公寓管理員不注意的時候，回到家來，回到他母親同麗莎維德合住的小房間，那時他才從澡堂子裏出來，身上很乾淨，可是他自已覺得衣服太骯髒，就在那時候，他突然軟化了，身上沒有力氣而且意志也消沉下去。他剛剛站在門口。他所熟悉的景象，牆上的照相，沙發，小火爐，和室內老處女式的整潔，他看了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他的母親大聲一叫。他知道他站在那裏就像鬼魂出現一樣：剃光的瘦骨嶙峋的頭顱，深陷的雙頰，瘦細的脖子，冒着火的狂亂的眼睛。他的母親大聲一叫，接着歇斯里的

的哭起來了。還是麗莎維德出來歡迎他，她也流了幾滴眼淚，可是她把眼淚擦乾，把他抱住，貼近她的結實的圓渾的身體，再吻了他的雙頰。他們兩個一起才把他的母親勸住。可是他的母親伏在他的肩上，嗚嗚咽咽的又哭起來，哭了好久，她才伸手把他推開一點，仔仔細細的看他瘦得可憐的樣子，看看又哭起來。「這是他們把你害得這個樣子的呀。我的孩子，孩子呀，」她哭着。可是過了一會兒，她復原了。他知道當他母親的深藏的怒火湧上心頭的時候，她會恢復正常的。他看見了，他心裏覺得很安慰。這股怒火就是他母親的力量。憤怒支持着她。他本來以為他們有很多話好講，有很多事情要說明，可是事實上也並不多。他做囚犯的經驗，他說不出來，她們也不來問他；他的狀況，他的心境已經使人不言自喻了。他的父親的名字沒有提起，因此他知道父親沒有消息，他所以期待的也不過如此。他的母親注意到他的制服了，他看見她的眼睛裏露出恐懼之色。這是「恩·凱·韋·代」邊防軍的制服。他使他的母親小聲地說話，可是麗莎維德立刻想起來，眼前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他隱藏起來。他們考慮了一下。他們先考慮把他藏在他母親的房間裏。可是從很多理由看來，這是行不通的。他問了米德迦。米德迦的房間就在那裏。那是很小的一間，只夠容身，可是同米德迦本人一樣，那間房間很狡猾的令人難以注意。他可以躲到那裏去。突然，蘭吉明白了！在那一秒鐘，她已經猜透他的目的，認清他的眼光裏的興奮的意義。這因為米德迦的房間正俯瞰那條「官道」！她又敬又怕的看看卡爾，她臉上恐懼的表情是他所不能測度的。看見了這個，他的心頭動搖了；在他的幽禁時期所積聚的那股力量，他自己所發下誓願非提起不可的那種衝勁和蠻勁，到現在都快要瓦解了。他一直怕的是恐怕免不了要討論他的決心；他並不要

人家來勸他；他不要他的決心來受理智的支配。那時候蘭吉站起來了，他雙臂抱住她，他吻了她；她也由他去——他所要的就是她不要來干涉他，由他去做。突然的，一句話也不說，她的態度變了；恐懼已經消失，一種勇敢的，高貴的態度昇上來了，代替了剛才的恐懼。突然她也分到他一部份的興奮。他的意志力量的一部份，已經移給了蘭吉，他知道她的生命和他的有同樣的意義；他們都是奉獻給歷史的。他們之間有一種的默契，他覺得大為高興。他此刻對他母親的愛，是以前從來所沒有的；這是一種新的愛，好像是他可能對於一個少女所發生的愛一樣，因為他們倆好像要並肩前進，走過生命的門限；所不同者，這裏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可是這似乎使他們更快樂，更年青，而且更瘋狂地相愛。

麗莎維德看他們母子二人的手就這麼握着，眼睛裏的光發亮着，他們兩人已經是同謀的了；麗莎維德還是這樣的文雅，還是搞那些動物玩具，現在看上去有點悲哀。她的頭俯下，她也哭了一下，可是那不是快樂的眼淚，而是悲哀的眼淚。「哦，親愛的，」她說，「他們把你們害得這個樣子。」可是她又打起精神，就同平常一樣，替他們準備茶，鼓舞他們的興緻。他想她也猜透了他的意思。這一點他是怕的，因為麗莎維德是屬於理智清明的世界的，她這種人總是為自己的生命而感謝上蒼，她總是接受現狀的。可是她也很天真，對於世故一套，她還是個小孩子；他要轉移她的注意力，他就拿排列在屋子裏的動物玩具來開她的玩笑。她開始快樂的笑起來。她拿出楚客夫斯基的那本小書，她同他重新再拿來看一遍。他幼年最初所讀的幾課書，就是從這本書裏來的，他總是依着她的膝下一起來讀，這似乎是已經好多年以前了，那時她還年輕，而且即使在那時，待她儼然也同慈母一樣。他們看起那些動物的怪動作，

曾經一起笑過，把裏面的俏皮詩句，也曾重複的讀。於是突然的，他想起這件事來了。楚客夫斯基哪裏來的先見之明，會寫這樣一本書的呢？他爲什麼會料事如神的寫下這一個蟑螂的寓言呢？他要有所作爲的話，這裏就是他的榜樣；看了永垂不朽的俄國文學名著，他可以爲他自己所走的路子找一個理由了。他本來想把自己的思想寫下來；可是他的思想狂亂而沒有系統，而且這種論著再多一篇，人家誰會願意看呢？可是這裏他找到一種工具了；他的熱狂的想像力可以表達出來了。寫一部電影劇本！

那天晚上他就開始寫作。從此以後，他日日夜夜的寫。他工作得太興奮，反而速度減低；筆擱下了，已經好久，再拿起來都很困難，他選得訓練自己的手指；可是他總算做成了。這樣一個寓言可以有種種方式的變化，裏面的意象非常豐富，有深深的暗影，有耀人的光輝，有這許多的恐怖和美，因此他覺得自己下筆如有神來。好像有什麼精靈捉住了他的手，指導他寫；寫完之後，他覺得下一篇要震動世界的道理，已經寫下來了。而且假如能搬上銀幕，讓大眾都能看到，豈不是更美！

如何把這部劇本送到外面去，倒是很成問題。可是米德迎總是有辦法，他找來了一個外國人，一個同情他們的人，他是願意秘密的幫他們做的。

他寫了這部劇本後非常高興，他的創作使他覺得溫暖，增加了他的勇氣。每天早晨蘭吉端麵包和茶給他的時候，又覺得驕傲，又覺得愛他。她的身體本來是圓渾柔軟的，和他在一起，更一點都不緊張；一切都聽他了。她話說得很少，可是用了她的手指，她摸摸他的臉，碰碰他的熱的手，她使他鎮定下去。她不怕死，而她是他所唯一關心的人。他們預備一起死。

想起死的一刹那都是痛快的：使人神往，使人舒泰。因爲那件事情一做之後，性命不會再留下了。第一，公寓裏的人統統要捉去。其次，住在一條街上的人也統統要捉去。再其次，附近的人也統統要捉去。監獄又要客滿了，閹官們憑了這聽途說的情報，加上內心恐懼的刺激，又要開始他們的工作。他們會找到罪人的。是的，他們每個角落都會把罪惡發掘出來的——俄國式的罪惡，思想上的罪名。到處有人犯罪，結果特務部本身也要蒙受嫌疑（將來給他們打死的屍首也是穿他們的制服的），搜索要從高處做起。這就是澈底的毀滅：那時每個人都成了罪人，酷刑殘殺將要橫掃全國。到那個時候，他的道理要傳給全世界了。那個不懂事的外國人會把他的道理傳出去的，世界上人那時就都會懂得他爲什麼要做這一件事：因此，他們就要害怕陰謀是全球性的，他們就要怕國內國外的反革命——內外夾攻；國外的人留在國內做人質的親友要被傳進去；再進一步，在國外的人也要被召回來，就這麼進行下去。監獄，囚犯營，苦工團，礦山，伐木場都要擠得滿坑滿谷。所謂寬大的時期要過去了，而報復的時期要很快的來臨。可是他將要超乎這一切；這一些不是在他的目的之內的；他的行動是頂單純的一種，以後有什麼事都是他們，而不是他所造成的。

他現在就在想這一些事，夜是靜靜的，他的手指放在自動步槍上，眼睛往下凝視，望着全條的「官道」。

他後面有輕輕的腳步聲。

他很快的轉身過去。在他小房間的門口，他看見一個男人的身形。窗上淡淡的光照過去，他看見一

個矮而身材奇濶的人，臂膀粗而且短，剃光了的圓圓的頭和肩膀挨得很近。那人站在那裏，也不動，也不開口。

「格萊哥！」

那人靜靜的走進來，卡爾很快的往後朝窗子退一步。

「不錯，是格萊哥·索可，你父親的朋友。」

卡爾說不出話來。

「啊這裏很冷。你沒有生一個火，」格萊哥說。

「窗開着，」卡爾說。他突然覺得一陣寒戰。他靠窗立着，顫抖的手握緊了他的槍，他的手指力量已經差了，他的臉頰抖動，他的眼光四射。

格萊哥靠着米德迦的牀邊上一坐。

「官道上開着一扇窗是要受人注意的，」格萊哥說。

「誰告訴我的我在這裏？」

「這支槍很好。你把保險機已經往前推了。很好。有時候保險機凍住了會推不動的。」

「還有什麼別人知道沒有？」他們』知道不知道？」

「別緊張。公寓管理員缺乏警覺性，不久就要送去受訓了吧。」

格萊哥開始笑了。卡爾看見他的濶大肩膀在動，只是不聽見笑聲。

「一定是麗莎維德。因為麗莎維德你才來的。」

「我只是來談談。」

「談談！」

「因為我睡不着。夜裏我總是等『他們』，『他們』不來，我又睡不着。所以我要談談。」

「你是來勸阻我的。」

「不，來談談。談幾分鐘。談天還是我最近新學會的。以前我不能說話；這跟我的工作不合適的。可是現在，反正我在等候，我學會了談天。這是一種新的安慰。我向你推薦。這比吃藥好。」

格萊哥的話使卡爾大為吃驚。他好久沒有聽說這樣的話了：這種聲音並不是動作的反應，而是真正言之成理的。在囚犯營裏，他把說話的藝術忘了；在他自己頭腦裏把什麼東西都辯明白了，正呀，反呀，合呀，都是他自己在跟自己辯，後來他內心的聲音成了他所能聽見的唯一的声音，在他以外不再有理性存在，也不會有別人的言行來威脅他的邏輯。可是現在他的一切精細而狂熱的思想，在外面受到威脅了。有人提議要說話，把他拉進去一起來談，使得他心裏焦灼得難受。他覺得他的嘴說不出話來，他的額上肌肉變弱，唾液從腺裏開始分泌出來，就同上次他要同巴夫倫科說話時候一樣，可是這一次不是爲了餓，而是爲了恐懼。

「你有什麼要說的，格萊哥？」他說

「哦，今天來談談過去的回憶是很自然的。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令尊和我和其他已死的朋友，發動

了革命，創造了第一個工人國家。」

「我聽不清。」

「相信我們所創造的眞是一個工人國家，那是比較容易一點，因爲如此我們可以擁護我們的主張，就是說這不過是退化了而已，前面還有希望。」

卡爾開始抖動起來。格萊哥的話就像他自己所說的話的回聲。這個論證在他心裏盤旋了不知有多少次了。

「相信工人國家暫時會退化，」他接下去說，「暫時在第二流庸人手裏退化了，那比較容易。顯然你也相信的，否則你手裏不會握着這支槍的。」

卡爾的一陣寒戰過去。格萊哥是錯了。這一下使得卡爾參加辯論了，雖然他並沒有說出聲來，只是對自己說而已。你錯了，格萊哥，（他在心裏說，）你要找改革，或者是改良，或者甚至是報仇這件事的動機找錯了。這是你們老布爾什維克黨所看不到的。可是他並不高聲說出來。

「相信人是難的；相信人類是容易的，」格萊哥說。

「資產階級的格言，」卡爾大聲的說。他忽然對於自己很高興，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相信人類，那是資產階級的想法，」格萊哥說。「那就是相信宇宙間有種比人力量更大的力量，而爲人所不能控制，甚至並不能常常覺察到的，人就成了它的犧牲品；這樣就引起了對於神或命運的信仰，把人的責任免掉，而把權力委託給祭司或一種統治階級。」

卡爾聽來，又是驚懼，又是緊張。

「在另一方面，」格萊哥接着說，「相信人就是相信人有控制自己生活，組織自己生活的能力，就像我們在二十五年前所相信的一樣，可是這也就是胡信歷史是人的玩物，當權者的嗜好和幻想就可以影響歷史，一會兒把它這樣，一會兒那樣。因此我們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沒有賢明的人來管理，沒有一種制度是安全的，或者是行得通的。可是到那時為止，我們沒有一種確立的辦法擔保由賢人而不是由呆子來管理，我們也沒法擔保獲得權利之後不退化，不腐化。」

「你總是找理由來替恩·凱·韋·代辯護，」卡爾說。

「據我們當時的設計，人民最好的保障就是憑一種方法——制度裏面的一種制度——把對於人民無利的各階級一個一個的消滅。這就是我神聖的任務。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我所致力的就是清除那些搗亂份子，低能份子，和腐敗份子。我是工人國家中的一個外科醫生。」

一陣寒風從半啓的窗裏吹進來。

「我們是一個外科醫生的組織，」格萊哥慢慢的說，好像是在回憶，「而我們的工具是護手鐵和皮鞭，木棍和老虎鉗，生釘的皮鞋跟，塞滿石塊的長統襪子，打進腦膜裏去的軟頂子彈。而我們所做的工作也有不少：手脚折斷啦，內臟打碎啦，女人的乳房扭曲啦，嘴裏的血和唾液齊流啦，……」

這就是那時革命的一個特點，卡爾想；他覺得自己真比格萊哥優秀，從他那樣不相稱的身體，也居然一下子會滔滔不絕的講出這番道理，表現出純粹的卓越的理智；像牛一般的農夫，東躲西藏的猶太

人，逐水草而居的牧羊人，一旦得到解放，常常會表現光芒萬丈的理智出來；格萊哥·索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現在他的理智已經黯淡失色了，他的粗笨的身體束縛了他的思想，而且也害了他的思想。卡爾覺得自己是佔着格萊哥的上風，這使得他很鎮靜。

「再講良心也太晚了，格萊哥。『他』也是個大外科醫生而已——監察委員會的那位一等書記。」

「是的。」

「你們爲什麼不殺死他？」

「這是在我的任務以內的。」

「那麼你是有此心啦？」

「一直在心裏的。對於他和每一個握權的人。」

「爲什麼你不下手呢？」

「他的名字，就像別人的一樣，很可能會從一切委員會和公共佈告裏抽去的。不消六個月，人家就會把他忘了的。」

「他知道？」

「憑他的本能。」

「他先下手了？」

「只有他一個人下手。」

「現在所以你等着。」

「是的。」

「等他來毀滅你？」

「等得已經不耐煩了。」

「你只是說話。」

「是的。」

「爲什麼你不先下手呢？那是你的任務呀。」

「因爲好久以來，有很多年了，我已經發現外科手術和醫藥不能改造人種。過去我們想用小的開刀和內服外敷的辦法來維持工人國家的健康，可是你儘用刀割，你儘用鐵灸，人的惡病就像毒瘤一樣，會移植到身體別部份去的。病的根本是在人種裏面。」

「格萊哥，什麼時候你才發現：把你造成一個特務的，不是你的理想，而是你的性格？」

「好久，好久以前了。」

「先是失望，後來沒法自圓其說，再後來是譏諷，最後就是不信天下有是非了。」

「據說權力要把人腐化的；可是我發現，運用權力只有腐化的人才行。」

「你發現的是詭辯。」

「卡爾，你正是着手在搞外行的外科手術，我對你說了吧，即使你把他幹掉了，天地間就會搬出另

外一個像他的人出來的。」

「雖然你外表上是犬儒主義，你倒還相信。」

「我什麼都不相信。」

「不，最後你相信了。」

「沒有。」

「沒有錯，你仍舊相信你的革命理想。你相信雖然我們有種種缺點，而且給權力腐化了，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工人國家，此外就沒有別條路可走了。」

「沒有別的希望了。」

「因此你就相信『他』。」

「他要殺死我。」

「你將要發現他同你自己一樣的失望，一樣的嘲弄人生。可是這樣對於你也很有趣。他所用的那種陰謀詭計來維持他的權位的，你看了覺得很有趣，而且也很欣賞。雖然即使他的詭計就是用來對你的。」

「有趣？」

「是的，他正在同你開玩笑，讓你比你自己所預計的要多活幾天，這個玩笑你也參加一份的。」

「我現在能夠看出來他眼睛裏的譏諷的幽默了。」

「假如他要你這麼做，你同他的玩笑還會開下去。你會承認你的錯。你會坦白，或者做別的任何怪事情，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大笑話罷了。」

「這個我已經想過了。」

「這都是因為你的失望和你的譏諷，可是也是因為你還相信你的工人國家；即使把國家大權都交給你格萊哥·索可，你的做法也不會有什麼不同的，你的理想也已經幻滅了，你把人世也已經看破了，你統治起來還不是也和你本行的那種殘忍無道？因為你相信我們現在所有的是生命之流的必然的方向和趨勢。」

卡爾很興奮。因為他以前想過的，現在嘴裏都講得出來了，他是不得了的興奮。

「我來告訴你一件事吧，格萊哥，」他說，「我也相信的。」

「你相信『他』！」

「我相信：因為有他這麼一個人，他就是對的。錯的不是他，而是生命。我不接受你們那種名詞，什麼黨啦，『切加』啦，工人國家啦，或者是你的那種論證，那一些我會不信。我也沒有什麼幻滅，也沒什麼犬儒主義。可是我認為他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

「可是你想結果他的性命。」

「他的存在是偶然的，而且是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就同我所說的一樣。」

「我要結果的是我自己的性命。我要用我自己的性命，使得我的行動得到最大的宣傳。我碰上的恰巧是『他』，而不是別人，對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因為我自己這麼一死，我可以給每個人一種理想：就是對現在這個生命要提出抗議。人用不着再入黨了，因為這樣無非去幫助權力，幫助腐化而已；也用不着去加入軍隊了，因為這樣無非去犯罪害自己而已；可是他必須要單獨的行動，自主的行動，用他自己的生命作為武器。與其做奴隸活下去受罪，使當局者的權力擴大，使得危害人類的災禍層出不窮的發生下去，他不如否定了他自己的生命慾——那種騙人上當的原始的生命慾，不如犧牲了自己的殘生來反抗權威！只有這個武器是他們所不能反抗的，而它的效果是不能估計的。我所以要殺死『他』——世界上權威的最大典型，就是要告訴世界上人：每人都有這個武器在。」

卡爾說話的時候，眼睛閃閃發光，表現出一種快樂的瘋狂。他的瘦骨嶙峋的頭，凹陷的臉龐，大大的眼睛，都給一種超乎物外的力量所照亮了。

格萊哥看見了這個。他在牀邊上的位子稍為動了一下。

「你要殺死的是他，」格萊哥說，「而不是別人，你如何能證明，你所要做的不是逞個人的快意呢？」

「只有他，因為這樣全世界人都可以知道了。」

「你是不是以為，即使你的子彈把鋼甲打穿，即使衛兵不立刻把你打死，你是不是以為他的死亡會被公佈嗎？你想我來辦理這件事，會不會把它公佈？他們會嗎？」

卡爾眼睛裏的光縮下去了。

「你的計劃是要靠了那個到這裏來的外國傻瓜，把這件事情告訴給全世界人聽，你是不是以為他們的工作人員就不能破壞你這個計劃嗎？這個你一定得知道。」

卡爾開始顫抖了。口裏又在流唾沫了。他說不出話。

「可是，」格萊哥說，「假如你裏只有這個行動，乾脆就是這麼一個行動：把生命用掉，那末我們是同意的。」

突然卡爾怕起來了。他上了當了。『切加』進了他的屋子了。屋子裏有格萊哥這樣一個人：他的談笑自若，他的帶拉脫維亞音調的平淡的不分輕重的聲音，他的粗偉的體魄，他的任務，他對於死認識得這樣密切，以致他好像是某種野蠻人宗教裏的一個大法師——這一切突然把卡爾包圍起來了，圈住了他，支配了他。而這就是『切加』，就是NKVD。卡爾突然覺到了自己的弱點，他的困瘦了的身體，他的脆弱的精神，他的本來是精細而又狂熱的理智，可是現在闖進客觀世界裏來已經打垮了。他當初一時頓化，答應談話，而現在心裏是混亂萬狀，怒火中燒。

「我們怎麼是同意的呢？」他嘶啞的說。

「同意的是這一點：是這個人還是那個人，是他還是我，是沒有關係的。」

卡爾等他的第二步的手段。他是有手段在那裏。可是他量不出深淺。他痛苦的等着。

「你該走了，格萊哥，」他說。他很迫切的說，並不是爲了夜已經深了，而是爲了要維持他心意的

平衡。

時間是不早了，午夜已經過了好幾個鐘頭，全城一片靜寂。雪使什麼東西都靜下來了，寒冷把空氣變得又尖又硬，像一根鋼條一樣，它打下來的时候，挾着一種高而寥濶的聲音，可是人還沒有聽見，它又飛到縹渺高處去了。

格萊哥的肩膀在搖。他在笑。

「我是來談話的，」他說，「我們得到了辯證法了。」

「是麗莎維德叫你來的，」卡爾說。「可是這樣也制止不了我。我告訴你，我已經考慮過他們的報復行動了。」

「我可沒有說起呀。」

「我把殘殺，酷刑，監禁都考慮過了，可是我的心不會改的。」

「別再想它了。」

「是的，你想制止我的。可是我是制止不了的。」

卡爾的一切恐懼，慌張，焦灼，憂慮都集中了成爲格萊哥的痛恨。

「沒有東西能制止你嗎？」

「沒有。」

「卡爾，請想一想。我只要一舉手，就可以把你槍搶下來了。我只要一開口，就可以把憲兵叫來

了。」

卡爾把槍舉起來，橫提着，槍口對着格萊哥。

「可是，你看，我不這麼做，」格萊哥說。他開始又笑了。

他的笑對於卡爾是一種威脅。沒有幽默，也沒有聲音，他的笑是豈有此理的。可是他的笑支配住了他。天是不早了。每過一分鐘，那偉大的時機也更迫了。現在他覺得除非格萊哥出去，他的計劃可能永遠不能實現的了。他對於格萊哥的憤恨，愈來愈增加，恨極之餘，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他能把格萊哥殺死。

他對格萊哥看看，他知道他能殺死他。他能把格萊哥殺死，事情這樣也算完了，因為格萊哥一天不死，他就不得自由。格萊哥會全夜待下去的，而且下次可以再來，用他的談話來軟化他，腐化他，阻撓他。卡爾對格萊哥看看，他知道他能夠殺死他。

卡爾看他的時候，格萊哥眼睛抬起，也朝卡爾看。他的堅硬的黃色的眼睫毛，冷靜而理智的藍眼睛，就像野貓似的眼睛，慢慢的抬起來，朝卡爾看去。眼睛裏充滿了疲乏。

就在他在看的一刹那，卡爾突然知道這就是格萊哥所計劃的。這就是格萊哥所希望能激成的亂子。槍聲一響，把格萊哥打死，可是全屋子的人都要來圍着他了，他的計劃也就完了。

他突然知道了。

卡爾站在那裏看着格萊哥。卡爾並不動。他就像獵人一樣，在放出他致命一槍的時候，正看好了那

對聰明的小眼睛，那野籬的懂事的眼睛。在這緊張的一刹那，他心裏所過的時間是無法測量的。這同在囚犯所過的全部歲月一樣的長，同他全部生命一樣的長，同他所有的理智好像都漏走了。剛才他們兩人間的談話，他自己心事的洩漏，現在忽然變得很遠很遠的了，他不預備再說話了，就像當初不同他的難友巴夫倫科說話一樣，他放棄了說話的打算，回到他內心更安全更有把握的邏輯裏去，他內心的聲音是準確而推翻不了的，在他自己洩漏以前，他的內心的聲音早就能把格萊哥的企圖警告過他了。

可是當卡爾對格萊哥看的時候，他知道格萊哥逗留得太久了。就在那時在鋼樣的寒夜裏，遠處來了一陣汽車引擎的聲音，聲音很細，差不多是聽不見的；這一來，卡爾是覺得格萊哥逗留得太久了。

這個聲音，兩個人都聽見的；他們啞然無聲的聽着，聲音愈來愈響，後來很明白的聽得出是什麼樣的聲音了：一輛汽車正循着「官道」開來。

在那時候老籬的眼睛慢慢的閉上，過了一回又睜了開來。表情是一種絕對的疲乏，什麼樣的情感都給壓滅了，既無恨，也無愛，一切忠義道德統統不在，只是冷冷的，瞪着眼睛等待着長閉不醒！

卡爾再朝窗看看。汽車的聲音愈來愈響。再過幾秒鐘，它就可以恰到好處，成爲目標了。

他的頭腦又清明起來，他的意志是不能動搖的了。什麼東西都不能阻止他，即使格萊哥也不能。他預計短短幾響就可以把格萊哥了結，然後趁人家還沒有動手的時候，他要把開來的汽車打得搖搖擺擺的猛然停住。這個他在心裏看得很清楚，他的意興很高。

他轉過來朝着格萊哥，很快的把槍舉起，對着格萊哥的胸膛。

他剛剛想扳動槍機還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一條粗臂膀伸了過來，一隻厚重的手抓住了槍身，抓得很緊，把槍稍稍從卡爾身傍拉開一點，可是槍口的方向還是照舊。槍蓬蓬的放了，卡爾先只覺得槍身在跳動，後來才覺察到小房間裏轟雷般的聲音，槍在跳動，槍機鬆不下來，很快的三十六發子彈都用在他前面的那具粗大的身體上了，包着鏢的子彈打破了胸膛，打破了橫隔膜，打破了肚子，打破了臉，那龐大的身體向槍口彎過去，好像是歡迎那些子彈似的，好像是三十六發子彈還不夠使那具龐大而長命的軀殼靜止下來似的，那隻大手抓住了槍身，痙攣地，親熱地，強有力地抓着，一直等到槍聲不響了才放鬆，在安靜的冷空氣中只留下了焦肉的刺鼻的臭味。

放槍以後是一段沈寂，一輛紅軍的舊卡車軌軌的從窗下開過。

第三十六章 雅各索夫斯基元帥

第二次凶訊

克里姆林宮裏的聖喬治大殿已經佈置好了，革命紀念日的大宴會就要在這裏舉行。樓上走廊已經給大旗子隔開，鐮刀鎚子旗恰巧在英國米字旗美國星條旗的中間。地板上鋪了精美的毯子。一簇一簇光亮的電燈在雕花的牆上掛着。

將軍們，部長們三三兩兩的同外賓們一起站着。軍裝上的大紅，寶藍和黃金色的裝飾，剪裁恰到好處的後背，細腰身，像擦亮的五金一樣耀眼的長靴，珠寶環繞琳瑯滿目的勳章，高而且挺的領子，硬綑綑的肩章，金絲繡繞的袖子，這一切都給故宮舊殿添上新的光彩。外交官穿了緊身的深色的制服，也繡上很多條金絲，腰裏掛了銀的小佩刀，使滿座添了一種樸素的情調；部長們穿了黑上裝同外交官一樣的樸素；可是外賓們有的是穿卡嘰的，有一個穿了儀仗隊的大紅制服，別的全副禮服，內衣白得耀眼，表示他們勳位的潤緞帶在身上繞過，胸口掛着小巧玲瓏的勳章——這一切在這景緻上添了傳統所有的色

彩。他們正在等「領袖」下令。那時「領袖」穿了一身淡紅色的喬治亞上裝，鵝灰色的絲褲子，黑靴，正在同兩位大使談話。

全廳最英俊的人物無疑是雅各索夫斯基元帥，莫斯科保衛戰的英雄。雅各索夫斯基元帥頭髮金黃色，身材高大，背直頸長，穿了新的制服，儼然貴族神氣。在他的寬闊的胸脯上，掛着珠寶燦爛的蘇伏洛夫勳章和庫都索夫勳章，另外兩枚列寧勳章和「紅旗」勳章比較小而樸素，沒有那兩枚那樣的炫耀奪目，可是他驕傲的而且示威似的把這兩枚掛在那兩枚新勳章的上面，因為這是在革命時期和對波蘭作戰時期得來的。雅各索夫斯基元帥覺察到馬洛夫已經注意到他胸前勳章的掛法了。他看見馬洛夫在看着他。他看見那一對黑眼睛，像無眼臉的蛇眼一樣，正在看着他。雅各索夫斯基元帥有一副秀氣的瘦臉，他的眼睛好像老是要笑得繃起來的樣子。現在馬洛夫正在對他看，他轉過頭去，很鎮靜的看着掛在樓廊上的三面旗。他的表情沒有變化，可是他也許在想：假如列寧看見了這三面旗，會有什麼感想呢？

「領袖」的暗號已經下來了。元帥們，將軍們，外交官們，部長們同外賓們一起入席。長餐桌上，雪白的桌布餐巾，金銀器皿，磨得澄亮。食品非常精美：魚子醬有好幾種，裏海來的鮮肥魚子醬，也有堪察加來的紅色魚子醬。很大的鮭魚，原條的盛在長的銀碟上面，有幾段已經切開，露出淡紅色的魚肉和白的軟骨。鱈魚有好多不同的種類：生的，醃的，燻的，滷的；還有切成薄薄的北地大鹿的深色燻肉片，此外還有燻鱈魚，鱈魚，和別種魚類。有擬在肉凍裏的夜鶯舌頭，有鷄翅膀和冷黃蛋加上許多種調味汁，在大盤子上，排成美麗的圖案；還有大碗的羅宋沙拉。有滷小黃瓜和各種泡菜，甚至於還有鮮番

茄和柑橘。伏特迦酒是大壺盛着，要喝葡萄酒的可以用多種不同的杯子去配上四種高加索紅酒，高加索香檳，白葡萄酒，還有色深質輕的羅宋白蘭地。穿着白上裝的侍者們，在進食者的肘邊侍候着，按時端上那三十道菜。

爲「領袖」乾杯的時候到了，大家十分莊重，立得筆挺，肘彎成直角，整杯的伏特迦酒一口吞下。然後全體鼓掌。「領袖」自己也鼓掌，他的靈活的右手拍在不靈活的左手上。雅各索夫斯基元帥朝他看看，看看他的花白頭髮和鬍子，他的漸露老態的矮短身材，他的陰沉的微笑遮住了他的狼相的奸笑。雅各索夫斯基元帥參加鼓掌的時候，比人家晚了半秒鐘，馬洛夫注意到這件事了。他是存心要做給馬洛夫看的。伏特迦下肚，全身熱烘烘的，他正在這樣想：那些蟑螂們，他們多麼的想來對付我啊，可是他們現在還不敢，因爲我太有用了，他們以後下去還用得着我哩，一時他們還不敢除掉我，可是等到我鞠躬盡瘁的那天，他們就會撲到我身上來的！讓我們等着瞧吧；從前他們已經把軍隊毀掉過一次；看他們再敢第二次動手吧！他一面這樣想着，一面在看着這些外國人。他看他們互相顧盼示意，作會心的微笑，他憑直覺就知道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他們看見這副豪華的場面在好笑！突然，青年元帥雅各索夫斯基變得嚴肅起來，正襟危坐，充滿了驕傲和對於外國人的鄙視，不再以惹犯馬洛夫爲樂，而且他根本不得席上有這樣一個人了。

舉杯祝福了好多次。宴會進行了好幾個鐘頭，一直到那些外賓都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才停，那時大使們信口胡說了，他們的白襯衫前身也弄髒了，外藉武官從椅子裏跌出來了。到那個時候，舉杯已經舉

過一百次，演說也說過一百次。過了子夜以後，他們都已起身，電影也已經演過。

雅各索夫斯基元帥也已經走了。他在克里姆林宮車房叫了一輛車，吩咐司機開到華西里夫斯基那裡去。宴會是一回事，可是他從前線回來，有很多要公待處理。問題是德將馮·包羅斯會不會設法突破包圍，還是坐等救兵從外面來解圍。雅各索夫斯基對這問題考慮了已經很久。這件事情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心頭，即使在宴會時候也是如此，可是人家把他牽了來好像要拿他展覽似的，恐怕是因為比起郭伏洛夫，鮑爾庭那些人來，他的頭髮比較多一點，肩膀比較挺一點吧。他還在想着，可是他現在以為馮·包羅斯要守住斯達林格勒等候救援的。他算定了這一點，因為叫德國這位大將把他的卅萬人從現在這陣地撤退，穿過車輛無法通行的地帶——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也考慮到：撤退，照德國人的想法，是要不得的。他們有什麼計劃到春暖以後還要揮兵北上。希特勒會命令馮·包羅斯死守斯達林格勒，他們會派救兵去救他。他們太渺視紅軍了，因此他們不會想到自己處境危險的。馮·包羅斯本人上次大戰時同帝俄軍隊交戰過，也許會懂得這一點，可是納粹黨人會強迫他違背自己的意思做事的。他們雖然有攝影飛機，可是他們的情報工作還是非常之差。他們所接觸的一直是些劣等軍隊，在有些地方是些「懲誠大隊」——囚犯營裏搜集來的那批傢伙；德國人看見那批人也來打了，以為俄國已經是力竭智窮。舊日的紅軍和一九三七年的倖存份子都已經完了，西伯利亞部隊差不多已經打完，囚犯營裏可供調遣的政治人物也都完了，可是他們現在要碰到的是少壯的新兵——從蘇維埃工人羣裏訓練出來的大軍。曳引駕駛員和鐵廠工人的職司都讓身強力壯的蘇聯女人來代替了，他們將要衝鋒陷陣，攻破德軍，大潰敗就

快要開始。奇蹟是俄國的國內陣線怎麼能團結不倒的。全世界人眼巴巴的看俄國要崩潰，事實上差一點也給他們料到，因為經過殘忍的集體化運動和一九三七——三八大清黨之後，俄國是很可能垮台的，可是奇蹟救了他們。不，並沒有什麼奇蹟；這是制度的力量——一種冷酷無情強制執行的警察制度。同時也是俄國人民的意志，俄國人民的忍耐力。

這種籠統的考慮，並沒有使雅各索夫斯基元帥多花時間去想它。他開始詳密的着手設計未來的攻勢。馮·包羅斯在卡拉黑佈置的是羅馬尼亞兵。紅軍將要在塞拉菲莫維支和克萊茨卡耶兩處渡過頓河，一天之內很快的直下卡拉黑，羅馬尼亞兵就要投降的。同時，瑪林諾夫斯基軍隊的一部分要在斯達林格勒之南跨過伏爾迦河，很快的跨過大草原，從卡拉黑的南方和北路大軍會合。第二，第三，第四這三天，裝甲部隊和重武器開到，包圍圈要加緊了。同時，卓依可夫在斯達林格勒將和馮·包羅斯繼續的作戰，黑夜裏藉西岸高地的掩護，把軍隊向下游移動，送他們到「紅十月」區去作戰，同時島上的砲火不斷的隔河打去。德軍還調動得出多少軍隊來攻破這個包圍圈呢？頂多六師人，加上了也許一百輛坦克。他們可能從庫脫爾尼可夫沿鐵路推進，可是到了阿勃加納伏，瑪林諾夫斯基率領了渡過伏爾迦河在大草原上集中的生力軍，正好迎頭痛擊。瑪林諾夫斯基把敵軍趕過頓河，趕回芝力姆斯卡耶，然後各路軍隊會師之後，頓河流域的大攻勢就要開始，向西席捲，一直要追出俄國境界才會停止。

他的汽車在莫斯科的寒夜向前直駛，他正想着這些事情。他全神貫注的想着，大攻勢在十天以內就要發動，這次軍事行動的一點一滴他都在周密考慮，他想得太出神，以致他過了幾秒鐘才覺察到汽車已

經停住了。他的勤務兵已經從前座下來，有幾個穿深色制服的憲兵正站在街上一座公寓門口，而他的勤務兵正在對他們破口大罵。一輛秘密警察的卡車，橫在前面路上，正好把他們的去路擋住。勤務兵正在叫他們把卡車趕快開走，好讓元帥通過。他們在那裏鬧，元帥的思路已經打斷，他就往窗外望望，他看見雪鋪的人行道上，躺着兩具屍體。那兩具屍體是憲兵從附近的一幢房屋裏拖出來的，正要讓秘密警察卡車搬走。還有一個身影，是一個女人的身影，正跪在屍首邊上，捶胸號啕。

「什麼事？」雅各索夫斯基元帥問他的勤務兵。

「報告元帥，幾個罪犯，」勤務兵答道。

「莫斯科有些什麼樣的罪犯呢？」

「報告元帥，是邊防軍的一個逃兵。據說他用自動步槍殺了一個人，隨後用手榴彈自殺。女的是他的母親。」

「他們帶武器嗎？」

「是的，元帥，這也很平常。莫斯科罪犯有不少。」

元帥的汽車又往前開了。元帥又在計劃他在幾天之內就要由他率領發動的大攻勢了！——這攻勢結束之前，至少有一百萬個母親要哀悼她們的兒子了吧。

第三十七章 蘭吉的歸宿

火車在理亞仁停住。娥迦·特洛非莫芙娜和她的女兒嘉蒂步下車廂沿着鐵路走着。娥迦和她的女兒本來是在戰爭爆發後不久撤退到離車里雅賓斯克附近的一個小村裏來的。現在她們回到莫斯科來。大攻勢已經開始，敵人全線撤退，因此生死關頭的危險已經過去。娥迦的丈夫是個人民委員，同時也是蘇維埃工業界的一個大紅人，他有辦法給他的太太和拖油瓶女兒弄到兩張臥車票，而且兩人獨用一間。雖然車廂裡很溫暖，可是假如可能的話，走下火車來在爽利的寒冬空氣中走幾步，也是很舒服的。她們往前走，腳底下的雪吱吱作響。時間是黃昏，火車頭正在添燃料，預備連夜趕到莫斯科。她們一起踏着軌道走着，忽然嘉蒂看見了一件奇怪的東西。

「這是什麼？媽媽，看，這是什麼？」她叫道。

「不戴眼鏡我看不見的。」

娥迦很快的照嘉蒂所指的方向看去，可是她把頭轉了過去。她沒有回答嘉蒂。

「看來好像是一羣矮人，」嘉蒂說。在黃昏微光之中，她模模糊糊的看見對面鐵軌月台上有一二十

個矮小的人影。

「他們不是矮人，他們是人，」娥迦說。「來吧，回去了。」

她們在回去的時候，嘉迦還掉頭過來望，她現在很清楚的看見他們都是人，蹲踞在地上，兩腿收起，膝蓋縮在下頰的底下。在昏暗之中，他們靜靜不動的蹲着。在他們的旁邊，也在月台上，是些小包裏。嘉蒂看見兩個衛兵，槍托在肩上，站在他們的邊上。

她們回到暖和的車廂之後，嘉蒂說道：

「可是，媽媽，這是些什麼？他們爲什麼像這樣呀？」

「也許你這個孩子太機靈了，不可以知道的，」娥迦說。「假如你是別家的小孩，話講得這麼多，不該看的東西也看，早就該挨罵了，玩跳棋吧。」

「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呢，媽媽。」嘉蒂說。

「一個俄國小女孩，不可以問這麼多問題的，」娥迦說。娥迦歎了口氣。都是爲了戰爭，小孩子才會問這麼多的問題。他們年紀不大，記不得以前的事情；他們年紀又太小，根本就不懂。

「他們是政治犯，」娥迦說。「他們要送到——誰知道送到哪兒去呀？去喀什斯坦吧，也許？我們來玩棋吧。你走紅子，我走黑子。」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是俄國老規矩，」娥迦說。「皇朝推翻了，制度還沒有廢除。」

「我從來沒聽說過，」嘉蒂說。

「你沒聽說過的事情多着呢，小寶貝。」

「媽媽，」嘉蒂說，「告訴我吧。」

「告訴你什麼？」

「告訴我：人家捉你去的時候，你是怎麼樣的。」

娥迦對她的女兒看看。當一個母親第一次發覺她的女兒已經成熟了的時候，她就是這麼看法的。娥迦很吃一驚，可是她知道她不能發火。

「你怎麼知道我捉去的？」

「誰都知道的，媽媽。可是，當然，這是弄錯的。這誰也都知道。」

娥迦往後一仰的坐着。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好吧，你只是一個小孩子，」她最後說。「我想你有一天會知道的。是的，他們捉我去時也是一樣。火車每停一次，我們一樣的就得下來，膝蓋靠着下巴的蹲着。這樣我們就不能逃。誰站起來就要放槍。可是，這沒有什麼的。」

嘉蒂不能想像了。可憐的媽媽！誰能想像媽媽這樣蹲着呢？太滑稽了！可憐的胖胖的媽媽，喜歡香煙，漂亮玩意兒和陌生男人的媽媽。媽媽怎麼能這樣僵僵着呢？真太滑稽了。

「親愛的媽媽，」嘉蒂說，「是怎麼回事？捉去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的，寶貝。不這麼壞的。現在都全忘了。我從來不想它。我們來下棋吧。」

「從來不想它？」

「嘉蒂，你是個小笨蟲。從來不想的！」

娥迦看着棋盤，好像是她全副精神都放上去了。她正在想：想想我的孩子看。還得答覆她的問題。這種問題還得答覆，那是錯誤的。他們永遠不會相信情形沒有這樣壞。這個，老實說，我不在乎。我什麼都不在乎，也許除了那幾夜關在隔離室裏，聽女犯們的慘叫。娥迦的手摸摸胸膛。這一摸使得心頭這鬱結之感平了下去……

「看！」嘉蒂說。

火車在開動了。臥車慢慢的開過對面那鐵軌的月台。嘉蒂擦擦窗上的蒸氣，朝外面望出去。娥迦也向窗外瞥了一眼，恰巧燈光照處，她看着蘭吉·賽米亞芙娜·羅曼威夫愁痕斑斑的臉。

第三十八章 麗莎維德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沙俠（麗莎維德寫着），隔了這許多年你還聽見我的消息，你要覺得奇怪的。我寫信告訴你，我還活着，近況還好。我想起告訴你這個，因為你是我世上唯一的親人了；你會收到這封信的，因為我認識了一個好心的外國人，他答應把這封信寄給你。

我的孩子，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有些是很悲傷的，可是你要知道，這是爲了戰爭的關係。我滿腔悲哀的告訴你，我們的好朋友卡爾已經死了，蘭吉已經走了，伊凡一年以前上了前線，至今消息杳然。卡爾經歷了些很可怕的事（也是爲了戰爭的關係），因此蘭吉和卡爾都成了半瘋。老實說，我現在想來，他們是真瘋了。他們就是這樣，因此即使照現在這樣，也好。還是死了的好，不要活着受罪，而且對大家都危險。就我而說，我現在有教堂可走，它給了我永久的安慰。我不知道是否在上帝眼裏大大的犯了罪了，可是我總是祈禱，求神指導。我相信我告訴格萊哥，把他叫到我們小房間裏來，這樣做是對的。我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對的。可是現在他也死了，好在你並不認識他。可是現在我知道把那個美國女人找來是錯的，我當初以爲她會講英文，她可能幫助我們，可是我早該明白：外國人是永遠不會

了解俄國的。這一年過得很可怕。可是有你在那邊，我不該多哭的。你是我的兄弟，而且你是個俄國人，雖然你也是美國人。我一定要很驕傲的告訴你，你們在非洲的戰績，我們也常聽見。可是我們的仗打得也很好，法西斯侵略者就快要被趕出去。生活是比較好了。

親愛的，你不知道不知道我成了一個母親了嗎？不，不是一個真的母親。可是我有了四個螟蛉兒：莉娜，沙俠（我告訴我自己，他的名字是跟你取的），巴蒲加和才十四個月大的安妞霞。有一個鄰居在戰爭中死去，他們就是他的小孩子。他們統統住在我們那座大公寓房子的地底房間，我們一起過得很好。有這許多嗷嗷待哺的嘴，吃的東西總是不太多的，可是我們還有一個老婆婆，她去替我們排班。我工作很忙。我替農人們做布娃娃。我以前是做動物的，現在還是想做，可是現在那種動物是違禁的了，我只好做布娃娃。把布娃娃賣給農人們不容易，因為我們材料不夠，沒法把它們做漂亮，有點鈕扣緞帶就好了。緞帶！你以為你能夠寄些緞帶給我嗎？不，這不過是我在這裏縫紉時候的一種夢想罷了。我的莉娜也在學縫紉，不久她就要同我一樣快了，那時我們就可以收入兩倍的錢，不愁沒有東西吃。假如你能寄些什麼東西來的話，頂好是鞋子，麵條，或者隨便那一種食物。可是，不，親愛的沙俠，請你不要寄東西來，請你信也不要寫。這樣可以好一點。

我要告訴你，我們現在正乘勝邁進，你可以對戰爭增加信念。你現在不能寫信給我，可是有一天，誰知道，我們可以重新聚首，我這樣希望着。上帝永遠和你在一起，永遠保佑你。你的姊姊，麗莎維德。

第三十九章 俄羅斯的懷念

福開森的故事

他們在這裏喝一種叫「金蘭酒」的，可是我只叫了威士忌蘇打。三天以來，我天天站在薛浦茲餐廳的酒吧間裏，除了喝威士忌，我不知道有什麼更好的事做。我正好端起杯來，我看見了那個小個兒的人進來。我注意他，因為除了我之外，只有他一個人是非軍人。非軍人進薛浦茲的酒吧間是很少見的。差不多從早到晚都是穿制服的人。很粗壯的一羣，給太陽曬成紫銅色的了，高高的，營養充足的，他們是從沙漠上下來到開羅來過一個短假期的。他們都把德國兵稱做「茄利」。「茄利」好像一共只有十一師。有一度他們給「茄利」逼得好苦，可是現在「茄利」在逃走了。那些人走進酒吧間來隨隨便便的拿這件事來討論。我聽見他們很兇的批評他們的將軍，雖然他的戰術把「茄利」趕跑了。他們中有幾個像童子軍一樣穿了短褲，別的穿了棕色的厚布褲，他們卡嘰上身的頸項部圍了點花的圍巾。他們看上去就像優秀的戰士，而且他們有派頭。他們走進冬季花園拍拍手，叫一聲「阿三，」那個戴平頂回回帽的蘇

丹人就跑來，候命去帶一杯「金蘭酒」，或是「平氏酒」或者別的什麼。他們都是軍官；士兵是不許進來的。我沒有和他們任何人說過話。有時候他們對我看看，我想他們的這種神氣是專用來對付「老百姓」的。所以我對於剛才進來的那個矮小的人，不由得不特別注意起來。他同我一樣是個非軍人。他的衣服似乎隨隨便便，衣料和剪裁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馬馬虎虎的穿着，好像早晨無奈何才把衣服穿上去似的。我還沒有決定是不是要同他攀談。

我在這裏第一次同人攀談是失敗的。對方是一個去過莫斯科的英國人。一提起莫斯科我們兩個人才談起來。他從莫斯科飛到巴庫，這一段航程給他的印象很深。他對於巴庫特別有興趣，他說。我從飛機場上開進城的時候，我注意過油田沒有？我注意的。他又問我注意到沒有：在提油的油井連百分之一都不到？我沒有注意到，可是這種事情在加利福尼亞州也見得到。他說情形不同：巴庫的油田已經乾涸了。我們上次大戰以後曾經佔領過那地方，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可是他說那些蘇聯人來搞生產，效率頂差了。他說難怪他們工程技術幼稚，他們的工程師稍爲犯了一點黨規就可以隨便槍斃的。「記住我的話好了，」那英國人說，「他們缺油，他們會南下取油的。」「啊，耶穌基督啊，」我說，「下一次大戰慢慢的打吧。先把這場該死的仗打完了再說。」我又加了一句：「任何對俄國的攻擊將要是一個法西斯的攻擊。」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說這一句話的，可是我已經大大的得罪他了。那種人頂容易得罪了。所以那個矮小的人進來以後，我遲遲的不開口說話。可是，當然囉，從莫斯科飛來這段航程是很有趣的。（這樣的快的動身，誰都沒有機票和簽證的。）我們經過庫別什夫和烏拉爾斯克兩地，飛越滿目陽光的裏

海，來到巴庫。氣運頂好的一段，要推搭便車從德黑蘭到開羅的那一段。一個美國將軍，用他的私人車子把我帶來。他是一個南方人，聲音軟綿綿的很好聽。我正在飛機場，求一隻美國飛機把我帶走，就在那時，那個將軍說了：「到開羅去嗎？」好像開羅就在呎尺似的。「請進吧。我們是同路。」他很客氣；我們就談起來了，談了就難免談到俄國。他是主張互相瞭解等等的那一套的。可是他老實實告訴我，他這時候，真把俄國人恨死了，他恨的是過了波斯之後，俄國人對於那一頭的接濟線的處理辦法。情形好像是這樣：俄國駕駛員人手不夠，租借法案的飛機很多沒法開走送進俄國，只好堆在德黑蘭的飛機場；可是當地的俄國指揮官非但不讓美國駕駛員來幫它們送走，也不承認有這麼一樁困難，他的辦法只是有多少駕駛員，便驗收多少飛機，別的飛機他乾脆不要，總是在機器上挑小眼；一個螺絲釘鬆了，一隻螺絲帽寬了，或是那裏油漆括去了一點。「你不知道嗎？」我輕輕的說。「那個俄國指揮官假如對你承認了他無力點收，他要負破壞的罪名的。他有困難，可是他是一個專家，所以他在機器上找理由了。你要懂得俄國人，你就得同情他。」「好吧，年青人，」美國將軍說，「我這一輩子沒有這樣的辦過公事。我還不想重新開頭呢！」「你是不是有點生氣了？」我說，「你不想站起來告訴全世界人說：你們交出來的貨，已經多得俄國人用不完了？」「不，孩子，你看錯我了。」他看我一眼，他這種看法在他國內本州大概是專門用來對付自由份子的；我們的談話也就此提不起勁來了。

談話總是這麼談不起勁。他們那種人很可愛，萬分的客氣有禮。可是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我不能同他們說話，所以我只好立在酒吧間裏喝威士忌。酒吧司傅把我的酒瓶總放在櫃臺下面的。我覺得不喝伏

特迦，改喝威士忌，人也變得文明一點。我覺得總算我又回到文明世界來了，我記得這兩天早晨我看見些什麼（天太熱，睡不着，我就出去觀光了）。我看見骨瘦腿細的小孩子在鐵路軌道附近掏沙，掏的是小麥袋裏掉出來的麥粒；嬰孩們同鼓着翅膀的肥大的禿鷹爭街頭垃圾吃；土人區域是髒不堪言，普遍的是絕望的窮困和昏沉醜惡的道德破產；可是在那邊所謂花園城裏，矗立着皇宮似的公寓房子，沿着尼羅河的美麗的別墅，奢華的「家齊樂」夜總會，和那些埃及舞廳。老天爺哪，也許答案就是共產主義吧。假如這裏是共產主義世界，我是不是需要一個秘密警察組織去對付那種陰謀恢復舊秩序的反動份子呢？你是瘋了吧？媽的，想這個幹嗎？我從來不是這樣想的。可是我眼睛一直看着那個穿平民服裝的矮小的人。當然你猜到這是爲什麼了。他是一個俄國人。我錯不了的。這一類的臉和這一類的衣服，我是錯不了的。

最後我走過去了。

「對不起，」我說，「你是俄國人嗎？」

「是的，」他說。他是塔斯社在這裏的代表。

當然我知道塔斯社。我說四天以前我還是在莫斯科。

他對我笑了，滿臉的笑容。我記起了我的俄文，我們就講了幾分鐘話。他說他出門過很長的時間，他說說就吞吐其辭了，他沒有說明白到底時間有多長。他的眼睛剛才明亮了一回，現在黯談下去了。我看見他臉上的表情冷淡起來，正經起來，好像他的眼睛從我的身體越過，看到遠處的什麼東西似的。

談話也就此消沉下去。過了幾分鐘，他很客氣的說一聲對不起，就此走開了。

我懂得了。我知道塔斯社。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我想他在那邊有妻子母親，他非謹慎不可。可是他既然是一個俄國人，有人向他表示友好，他很容易熱誠歡迎的。所以他一開頭就得謹慎。

啊，天哪！我走到我房間裏去，脫掉衣服，躺在牀上。天熱得要死。我想換一套內衣，可是我的替換衣服都在一隻小皮箱裏，留在德黑蘭的飛多錫旅館裏。那時候如要去拿皮箱，就搭不上美國將軍的便車了。我想起了那份電影劇本也在皮箱裏。「蟑螂王」那本書是不在了，可是卡爾的稿子還在。

好吧，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米德迎說一個人過了一個相當時間，就會害上「愛俄病」的，這是真的嗎？原因倒並不是俄國，不一定是。

哦，維姐莉亞呀，我們這個世紀是多麼的長呀！

第四十章 米德迦

那是夏天的第一天。巡邏隊離開村落時，天氣已相當和暖了。中尉小隊長走在前面，帶着十一個人成單行前進。他們走進一片樹林去，涼沁沁的。腳底走過，地上的乾枝壓得拍拍作響。樹蔭下的河邊和向北的樹上，仍看得到一些殘雪。

樹林很少，可是前面的草原卻非常闊大。隊伍跟着中尉步過草原。草深沒脛，初夏的花朵如櫻花、風鈴草等到處可見。米德迦拔了一些風鈴草，結在步槍的刺刀插口上。十多個漢子都悶不哼聲。跟在米德迦後面的幾個也學他的模樣，把拔來的花朵結在步槍上面。天氣暖，而他們穿的還是冬天衣服。他們直淌着汗。

約摸走了一個鐘點，中尉就下令在一條小溪旁休息。他自己也想休息一下，反正又沒有政府指導員在旁邊。休息了十分鐘後，他們又回到大草原上走。這地區是南部的大平原，地面起伏不平。遠處的槍聲隱約可聞。米德迦從口袋裏掏出一些向日葵種子，放在咀巴去嚼，然後把壳吐出來。有一個士兵卻咬着一條在村子附近撿來的蘿蔔。

巡邏隊終於越過草原，又到了一片樹林來。中尉還沒踏入樹蔭前，突然止步。他聽到飛機的響聲。可是，聲音離他們雖然很近，卻看不到飛機的踪跡。米德迦對這種飛機的聲音卻聽慣了。他離開隊伍走出來，一邊鬆開腰帶，他想爲這件「事」已經想了一個鐘頭了，這時機不可失，突然，飛機在隊伍前面的樹上出現。那是一部梅塞史密特型的飛機，速度雖然減低了，引擎聲音仍是震天價響。飛機這麼近，連駕駛員都看得見了。他轉頭打量地面的士兵時，陽光照得他的護目鏡閃閃發亮。

巡邏隊站着不動，瞪着眼睛看他。這時，米德迦想出了個怪主意。他一轉身，彎下來，光屁股瞧着那法西斯傢伙一露。他那屁股又肥又白，這動作可說侮辱極了。那法西斯看到了，馬上加速引擎。聲音怕人，每個人都覺得有點驚慌。中尉馬上跑到林中去。除了米德迦外，其他人都跟着跑了。

米德迦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前臂抽着褲子。飛機驕地翹首上昇，引擎的聲音震盪得連樹葉都發起抖來。忽然，它又向樹林旁邊俯衝下來。米德迦這回拔足飛奔了。但他不是往林裏跑：他跑到平原外面去。法西斯黨徒開火了，機關炮的火光從機頭單反射回來，遠看真像旋轉的煙火。

飛機的速度太快了，加上在林邊，因此操縱相當困難。米德迦還在奔跑，一直往平原跑去。中尉向他呼叫，但誰也聽不清楚他喊什麼，因爲引擎的聲音太吵了。

駕駛員翻了一個筋斗，又衝着米德迦而來。這一次，他慎重異常，正面瞧着米德迦低飛，起先沒有開火。到距離一近，就按板機。米德迦靈活如野兔，一鑽就鑽到飛機的右邊去。他的同夥在林中看到被機關炮彈擊中的草皮，隨着米德迦腳跟後一塊一塊的翻起。

那法西斯傢伙又旋轉升空一次。米德迦亡命的走着。在那駕駛員看來，他一定像一隻綠絨布面上的小蒼蠅。飛機又俯衝下來了，遠遠瞄準米德迦。這一次他用的是機槍。米德迦的同夥在林中看到曳光彈像雨點一樣在他身邊四週落下來。米德迦像發了狂一樣，他在平原上跑，越跑越遠。

飛機一衝而上，像風箏一樣飄得遠遠的了。「這次完了，」中尉想。他冒着汗，大聲向他的部屬喊叫：「你們怎麼搞的了？你們大可以集中火力打它下來。你們真是鐵石心腸！同志在外邊正給人宰了，你們動也不動！」中尉的話還沒說完，飛機的引擎聲又響起來了。那傢伙真的回來了。

平原的遠處，米德迦的影子又現出來了。他還是跑着。這一次，那法西斯傢伙把飛機拉得很低很低，向後的氣流壓著草面。跟着機槍響了。他的射程幾與人的肩膊高度平衡。他一面開槍一面輕輕的擺動一下飛機，其道理猶如一個機槍手爲了擴大他的火線而把槍管移動一樣。

米德迦突然又不見了。在林中他的同志再看不到他的影踪。

飛機爬高，在草原上繞了個圈子後，雙翼搖擺了一下，朝西邊逸去。引擎聲完全消失後，中尉帶着巡邏隊走到草原上。他們一個跟着一個，悶聲不響的走着。有時中尉會停下來細聽，後面的人就擠上來。

他吩咐他們散開。米德迦仍無下落。他們估計他的屍體一定是給野草埋沒了，但只要細心找一下，不久就會找出來的。可是，什麼地方都找遍了，仍然看不到什麼痕跡。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聽到一聲呼喊。起初，這個人以爲是身旁的朋友發出的聲音，最後發覺原來別的

同志也聽到了。他們乃呼擁而上，找到了米德迦。原來他躲在一條冰雪解凍時沖積出來的陰溝內。起先，米德迦還不肯站起來呢。

「他跑了？」米德迦問道：「那王八胚子走了？」

他的同志圍着他，笑着把他拖出來。

「你的馬褲髒得不像話，」中尉說：「快拿些草來擦擦。你現在真是臭氣冲天！」

「那狗娘養的。那狗娘養的法西斯王八蛋！」米德迦喃喃罵着。

他太興奮了，竟然用英文罵起人來。他的同志都聽不到他說什麼，他們都躺在花草上面，浴在陽光裏，看着他脫下褲子，抓着一大把草來擦淨。他們笑着、鬧着。米德迦朝天的屁股，在陽光照耀下，猶如一個缺口的月亮。

大地出版社叢書目錄(一)

函購九折優待 郵撥帳號19252號

社 址：臺北市瑞安街23巷12號

電 話：7074464

書 名	作 者	實價
①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教育）	張劍鳴譯	平裝50元精裝80元
②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教育）	張天溥、姚宜瑛譯	平裝50元 精裝80元
③愛爾蘭手記（散文）	彭 歌著	35元
④風樓（散文）	白 辛著	平裝50元精裝80元
⑤論藝術	張秀亞譯	45元
⑥斑衣吹笛人（小說）	吳奚真譯	40元
⑦饜子金寶	劉紹銘譯	平裝50元精裝80元
⑧芥川獎作品選集第一集	劉慕沙譯	平裝65元精裝95元
⑨芥川獎作品選集第二集	劉慕沙譯	55元
⑩翻譯研究	思 果著	[平裝120元 精裝150元
⑪怎樣愛你的孩子（教育）	張劍鳴譯	平裝60元精裝90元
⑫蛇（短篇小說）	朱西寧著	55元
⑬月亮的背面（短篇小說）	季 季著	35元
⑭名作家與名著	張 康著	40元
⑮大豆田裏放風箏（散文）	雨 僧著	50元

大地出版社已出版叢書目錄(二)

- | | | |
|-----------------|-------|-------------|
| ⑯怎樣培養孩子的興趣 | 張劍鳴譯 | 平裝50元精裝80元 |
| ⑰爲自己而活 | 陳秋坤譯 | 50元 |
| ⑱蟬 (短篇小說) | 林懷民著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⑲旅人的故事 (遊記) | 鍾梅音著 | 110元 |
| ⑳張愛玲的小說藝術 | 水晶著 | 50元 |
| ㉑女人怎樣在男人世界中打天下 | 杜奇榮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㉒美國風情畫 (遊記) | 張天心著 | 平裝90元精裝120元 |
| ㉓苦澀的美感 (文藝評論) | 何懷碩著 | 平裝80元精裝110元 |
| ㉔十年燈 (文藝評論) | 何懷碩著 | 平裝75元精裝105元 |
| ㉕白玉苦瓜 (現代詩) | 余光中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㉖講理 | 王鼎鈞著 | 55元 |
| ㉗霜天 (短篇小說) | 司馬中原著 | 平裝45元精裝75元 |
| ㉘聖女之歌 (翻譯長篇小說) | 張秀亞譯 | 90元 |
| ㉙響自小徑那頭 (散文) | 劉靜娟著 | 55元 |
| ㉚考驗 (長篇小說) | 於梨華著 | 100元 |
| ㉛心底有根弦 (散文) | 劉靜娟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㉜吃的藝術 (散文) | 劉枋著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㉝怎樣幫助孩子進大學 (教育) | 枳園譯 | 平裝30元精裝60元 |
| ㉞經驗的河流 | 丁樹南譯 | 45元 |
| ㉟零時 (散文) | 趙雲著 | 40元 |
| ㊱把生命放在手中 | 趙雲著 | 40元 |

大地出版社已出版叢書目錄(三)

- | | | |
|-----------------|----------|------------|
| ③7 看花集 (散文) | 思 果著 | 平裝50元精裝80元 |
| ③8 一切的峯頂 (世界名詩) | 沉櫻編譯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③9 金閣寺 (長篇小說) | 鍾肇政、張良澤譯 | 60元 |
| ④0 臺灣本地作家小說選 | 劉紹銘編 | 60元 |
| ④1 我戰勝了心臟病 | 張天溥、張之美譯 | 60元 |
| ④2 飄蕩的晚霞 (長篇小說) | 莎岡著 李牧華譯 | 45元 |
| ④3 日安憂鬱 (長篇小說) | 莎岡著 李牧華譯 | 45元 |
| ④4 微笑 (長篇小說) | 莎岡著 李牧華譯 | 45元 |
| ④5 奇妙的雲 (長篇小說) | 莎岡著 李牧華譯 | 45元 |
| ④6 沒有影子的 (長篇小說) | 莎岡著 李牧華譯 | 45元 |
| ④7 夢迴重慶 (散文) | 吳 痴著 | 50元 |
| ④8 瑪瑙杯子 | 蕭 白著 | 40元 |
| ④9 異鄉之死 (短篇小說) | 季 季著 | 55元 |
| ⑤0 故鄉與童年 (散文) | 梅 遜著 | 60元 |
| ⑤1 玉人何處 (長篇小說) | 崔文瑜譯 | 80元 |
| ⑤2 當代女作家小說選集 | 姚宜英編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⑤3 藝術家肖像 | 思 果著 | 50元 |
| ⑤4 域外郵稿 | 何懷碩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⑤5 與父母談心 | 汴 橋譯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⑤6 怎樣教養○歲到六歲的孩子 | 枳 園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⑤7 老師怎樣跟學生說話 | 許麗玉譯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大地出版社已出版叢書目錄(四)

- | | | |
|------------------|------|------------------|
| ⑤8 父親手冊 | 汴 橋譯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⑤9 梵谷傳 | 余光中譯 | 平裝185元
精裝215元 |
| ⑥0 科西嘉的復仇 | 劉光能譯 | 平裝40元精裝70元 |
| ⑥1 英語散文集錦 | 吳奚眞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⑥2 當代的生活藝術 | 吳奚眞譯 | 平裝85元精裝115元 |
| ⑥3 我的瑪利 | 陳迺臣譯 | 平裝40元精裝70元 |
| ⑥4 驀然回首 | 丘秀芷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⑥5 霓虹詩集 | 霓虹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⑥6 天涯有知音 | 張天心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⑥7 中年女性的二度青春 | 杜奇榮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⑥8 了解你青春期的兒女 | 汴 橋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⑥9 愛的尋求—以撒·辛格的自傳 | 簡清國譯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⑦0 傳香火 | 劉紹銘著 | 平裝70元精裝100元 |
| ⑦1 林居筆話 | 思 果著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⑦2 蘇打水集 | 水 晶著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⑦3 藝術、文學、人生 | 何懷碩著 | 平裝90元精裝120元 |
| ⑦4 怎樣教養6歲到12歲的孩子 | 枳 園譯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⑦5 蕭莎 | 彭 歌譯 | 平裝90元精裝120元 |
| ⑦6 莫斯科的寒夜 | 夏濟安譯 | 平裝110元
精裝140元 |
| ⑦7 星帆 | 白 辛著 | 平裝55元精裝85元 |
| ⑦8 建中養我卅年 | 子 于著 | 平裝60元精裝90元 |
| ⑦9 眼眸深處 | 劉靜娟著 | |

莫斯科的寒夜

高夫力·白倫敦著
夏濟安譯

A ROOM ON THE ROUTE

文壇大師、台大教授，極愛護學生，白先勇、劉紹銘、歐陽子、王文興、水晶等名作家，受他影響既深且遠。本書由濟安先生胞弟夏志清先生作序。以俄國為背景，揭露史達林共產主義奴役人民的暴政，殘摧智識份子的真相，一九四六年出版後，國外「時代週刊」、「禮拜六文藝評論」、「大西洋」等月刊都大力贊揚，譽為極震撼人世，揭露蘇俄內幕的佳作。



No. 576

大地出版社



H\$22.00